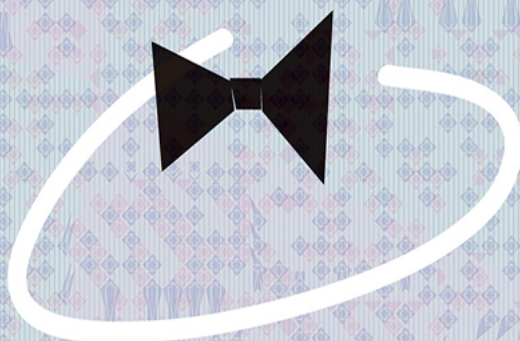


Les mandarins I  
Simone de Beauvoir



# 名士风流

I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许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名士风流I

作者：【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8月

ISBN：9787532749638

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纳尔逊·阿尔格伦

# 第一章

亨利朝天空看了最后一眼，天空似一块黑色的水晶石。上千架飞机击破了这份宁静，这实在让人难以想象；然而，断续的话语在他脑海中跳跃，发出欢快的声响：进攻停止了，德军溃败了，我马上就可以外出了。他绕过沿河马路的一角。街头又将弥漫着油的香味和橘花的芬芳；人们又将在阳光灿烂的露天咖啡座上纵情地谈天说地；他也可以在吉他声中喝上一杯真正的咖啡了。他的双眼、双手和肌肤都处在饥饿状态：多么漫长的饥馑岁月啊！他慢慢地登上冰冷的台阶。

“总算熬出头了！”波尔紧紧拥抱着他，仿佛历尽万劫之后重逢。亨利从她的肩头上方，抬眼望着那棵灯光闪烁的枞树，它在屋里数面大镜子互相反照之下，显得到处都是，无边无际。桌子上，摆满了杯碟与酒瓶；几束槲寄生和枸骨叶冬青散乱地扔在一副踏梯下面。他挣脱开身子，把外套往长沙发上一丢。

“你听到广播了吗？有好消息。”

“啊！快对我说吧。”她从不听广播，只想从他嘴里得到消息。

“你没有发现今晚的天空这么明亮？听说冯·龙德施泰特<sup>[1]</sup>的后方出现了上千架飞机。”

“我的上帝！那德国人再也不会打来了。”

“根本就谈不上他们会再打来。”

说实在的，他脑中也掠过了这种念头。

波尔诡秘地一笑：“我做了防备。”

“什么防备？”

“地窖里面有个小贮藏室，我已经让门房把它腾出来了，必要时你可以躲在里面。”

“你不该跟门房讲这种事，这样只会引起恐慌。”

她用左手紧紧地捏住披肩的末端，像是在护着自己的心脏。

“他们会枪杀了你的。”她说，“我每天夜里都能听到他们敲门，当我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他们站在我面前。”

她一动不动，半闭着双眼，仿佛真的听到了什么动静。

“以后就不会有了，”亨利乐呵呵地说。

她睁开了眼睛，垂下了双手。

“战争真的结束了？”

“为时不会太长了。”亨利把踏梯搬到横在天花板正中的大梁下面，“要我帮你一把吗？”

“迪布勒伊一家很快就会来帮我的。”

“为什么非要等他们呢？”

他拿起铁锤，波尔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你不去工作了吗？”

“今晚不去了。”

“你每天晚上都这么说。一年多了，你一个字也没有写。”

“别担心，我有写作的欲望。”

“这份报纸占用你的时间太多了，瞧你几点钟才回家。我肯定你什么也没吃，你不饿吗？”

“现在不饿。”

“你不累吗？”

“一点儿也不累。”

她的眼睛关切而贪婪地盯着他，在这种目光之下，他感到自己犹如一块易碎而危险的瑰宝——原来这就是令他精疲力竭的原因。他登上踏梯，用手小心翼翼地轻轻敲击着一枚钉子。这座房屋年代已不短了。

“我甚至都可以告诉你，我要写的将是一部欢快的小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波尔的声音有点儿不安。

“就我说的这意思，我想写一部欢快的小说。”

他差点就当场编造起这部小说的内容来，他很喜欢把自己的构思大声地讲出来。可波尔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那目光如此强烈。他没有吭声。

“把那一大把槲寄生给我拿过来。”

他小心地挂上了布满白色嫩芽的球状绿枝，波尔又给他递了一枚钉子。对，战争结束了，至少对他来说如此。今天晚上，是真正的节日。和平正在开始，一切都在开始。节日、消遣、玩乐、旅游，也许还有幸福，反正自由绝对少不了。他在横梁上系好了槲寄生、枸骨叶冬青和圣诞夜的彩色饰带。

“怎么样？”他边爬下梯子边问。

“好极了。”她走近枞树，把一支蜡烛重又竖直，问道：“如果不再有危险了，你要出发去葡萄牙吗？”

“当然。”

“你一去旅行，肯定又不工作了吧？”

“我想不会。”

她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抚弄着在枝叶间微微摇晃的一只金色的饰球。他开口说出了她正等待着的话：

“真遗憾，不能带你一起走。”

“我完全清楚这不是你的过错。别伤心，我周游世界的欲望愈来愈小了。这有什么用呢？”她莞尔一笑，继续说着，“我等着你，要是平安无事，等待也并不使人厌烦。”

亨利忍不住想笑。这有什么用呢？问得奇怪！里斯本、波尔图、辛特拉、科英布拉，多么美丽的地名！他甚至无需说出这些地名就可感觉到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他只需在心中默默自语：我将再也不呆在这儿，我要远走高飞了。远走高飞，这个词儿比最美的地名还美。

“你不去打扮一下？”他问道。

“我这就去。”

她登上室内的楼梯上楼去了。亨利走到餐桌边，想了想，他确实饿了，可每当他承认肚子发饿想吃东西时，波尔便往往焦虑不安，甚至连面孔都变了形，他拿起一块肉放在一片面包上，咬了一口，他暗下决心，自言自语道：“从葡萄牙回来后，我一定到旅馆去住。”夜晚，回到一间无人等待着你的卧室，该是多么惬意啊！甚或在他热恋着波尔的时候，他也一心想独居一间空屋。只是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间，她每天夜里都像死了一样躺倒在他那具遭受了可怕的摧残的躯体上，既然他已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她，岂敢拒绝她什么要求？再说，宵禁也给这种结合提供了方便。“你什么时候远走高飞都可以。”她常常这样说，可当时他还不能走。他抓起一瓶酒，用开瓶塞钻钻进软木瓶塞，木塞子吱嘎作响。只要一个月时光，波尔就可能习惯那种没有他在身边的生活，她若不习惯，也活该。法兰西从此不再是



一座囚笼，国界即将打开，生活再也不该是一种桎梏。整整四年，自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关心的只是他人。这足够了，也太过分了。眼下该过问一下自己了。正因为如此，他迫切需要独居，需要自由。漫长的四年之后，一个人要重新恢复原来的模样，谈何容易啊。有成堆的东西他必须弄个一清二楚。什么东西？暖，他目前尚不明白，可抵达那儿之后，当他独自徜徉在油香扑鼻的街巷时，他会尽量设法明确自己的处境。他心头再次激动地一跳：天空又将一片蔚蓝，窗户上又会飘忽着晾晒的衣服。他将作为一个游客，双手插在兜里，行走在人群之中，他们操的不是他的语言，他们的所忧所虑也与他毫不相干。他将纵情地去生活，去感受生活，这样，也许会使一切变得明朗起来。

“多可爱！你把所有瓶塞都打开了！”波尔步履轻盈地走下楼梯。

“确实，你就爱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他微微一笑，说道。

“因为你爱的就是紫罗兰色！”她回答道。十年来，他一直钟爱着紫罗兰色：整整十年，真漫长啊。“你不喜欢这件裙服？”

“噢！漂亮极了。”他慌忙说。“我只是想也许别的颜色配你也很合适，比如绿色。”他顺口说道。

“绿色？你觉得我穿绿色好？”

她站在一面镜子前，显得心慌意乱。一切都已枉然，黄色也好，绿色也好，总之，她十年前的花容月貌，他再也看不到了。想当初，每当她懒洋洋地把戴着紫罗兰色长手套的手臂伸给他时，他总是那么心满意足。他朝她轻轻一笑：“来，跳舞吧。”

“好，我们跳吧。”她的声音是那么热烈，亨利不禁一愣。最近这一年里，他俩的共同生活变得黯然失色，连波尔都显得对它感到厌

倦，然而，在九月初，她突然变了。如今，在她的每一句话中，在她的亲吻和目光之中，一种激情在微微颤动。他搂起她的腰，她紧紧地贴着他，低声道：

“你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跳舞时的情景吗？”

“记得，那是在宝塔舞厅，你说我跳得差劲极了。”

“那天，我让你开了眼界，参观了格雷万 [2] 博物馆。你当时连格雷万博物馆都不知道，你一无所知。”她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说道。她的额头紧贴在亨利脸颊上。“我又看到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情景。”

往事也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们俩登上了海市蜃楼宫中的一块座石，周围是如林的石柱，他俩置身其间，仿佛得了分身术，变成了无数对伴侣！“对我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你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你一定会是世上最光荣的男子汉。”他朝一面硕大的镜子看去，只见镜中沿着一条枞树形成的小径，他们这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一对伴侣被映照成数不清的身影，一眼望不见尽头。波尔朝他微笑着，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如今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一对儿了？

“有人敲门。”亨利说着，快步朝门口走去。原来是提着篮子和篓子的迪布勒伊一家。安娜抱着一束玫瑰花，迪布勒伊肩上搭着几大串红辣椒，身后跟着的纳迪娜显得闷闷不乐。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您知道消息了吗？空军终于出击了。”

“知道了，一千架飞机！”

“他们被一扫而光了。”

“他们完蛋了。”

迪布勒伊把那些红辣椒放在长沙发上：“用这玩意儿来装饰装饰你们这间乱得像窑子似的小屋子。”

“谢谢。”波尔毫无热情地谢道。迪布勒伊把这套公寓说成窑子，听了好不让她气恼。他常说像窑子，是因为这屋里摆着这么多面镜子和挂着红色窗帘的缘故。迪布勒伊察看了一番屋子，说：“应该把红辣椒挂到中梁上去，这要比槲寄生美。”

“我喜欢槲寄生。”波尔斩钉截铁地说。

“槲寄生，是傻玩意儿，毫无特色，过时了。再说，它是寄生玩意儿。”

“把红辣椒挂到楼梯的扶手上吧。”安娜建议道。

“挂在这里，要漂亮多了。”迪布勒伊说。

“我坚持挂我的槲寄生和枸骨叶冬青。”波尔毫不相让。

“行，行，这是在您的家里。”迪布勒伊说道，然后朝纳迪娜示意：“过来帮我一把。”

安娜取出了熟肉酱、黄油、奶酪和糕点。“这是用来调制潘趣酒的。”她边说边把两瓶朗姆酒往桌上放。接着，她把一包东西塞到波尔的手中：“喏，这是给你的礼物。这个是给您的。”她说着递给亨利一只陶瓷烟斗，上面一只鸟爪正死抓着一只小蛋，与路易十五年前用的烟斗一模一样。

“真棒极了！十五年来，我一直渴望有这么一只烟斗。您是怎么猜透我的心思的？”

“因为您跟我说过！”

“一公斤茶！你真救了我的命。”波尔惊叹道，“多香啊！真正的好茶！”

亨利动手切起面包片来，安娜往上抹黄油，波尔则一面往面包片上涂肉酱，一面忐忑不安地察看着迪布勒伊用锤子猛击铁钉。

“您知道缺点儿什么吗？”他朝波尔大声说道，“缺一盏大水晶玻璃吊灯。我一定给您搞一盏来。”

“可我不需要！”

迪布勒伊把一串串红辣椒挂好，然后走下楼梯。

“不错！”他一边说一边用挑剔的目光检查着自己的杰作。他走近餐桌，打开一袋香料。多少年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调制潘趣酒，这配方是他在海地搜集来的。纳迪娜倚着楼梯扶手，嘴里咀嚼着一个红辣椒。她芳龄十八，尽管常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床上乱睡，但看上去仍然像情窦初开的少女。

“别把装饰品给吃了。”迪布勒伊朝她喊叫道。他把一瓶朗姆酒倒进色拉盒内，转身对亨利说：“我前天遇到了萨玛泽尔，我很高兴，因为他似乎已经打定主意跟我们走。您明天晚上有空吗？”

“十一点之前，我无法离开报社。”亨利回答道。

“那就十一点来一趟吧。”迪布勒伊说，“我们要讨论一下怎么行动，我很希望您能在场。”

亨利淡淡一笑：“我这就不明白为什么了。”

“我跟他说过您跟我一起工作，您在场分量会更重。”

“我并不认为像萨玛泽尔那样的家伙对此会很重视。”亨利仍然微笑道，“他肯定十分清楚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可他跟我想法一致，决不能放弃政治而让政客去搞。”迪布勒伊说，“您来吧，哪怕只稍待片刻也行。萨玛泽尔手下有一批人，值得重视，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我们用得着。”

“听着，您不要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政治！”波尔声音不快地说，“今天晚上是节日。”

“那又怎么样？”迪布勒伊反问道，“难道在节日里就禁止谈论令人关心的事情？”

“可您为什么坚持要把亨利往这桩麻烦事里拖！”波尔不甘示弱，“他已经够劳累的了，他已经跟您说过几十遍了，政治让他烦透了。”

“我知道，您把我看作一个不正经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把他的小伙计们往歪道上引。”迪布勒伊微笑道，“可政治不是堕落，我的美人，也不是社会游戏。要是三年后爆发新的战争，第一个抱怨的也许就是您。”

“这是危言耸听！”波尔道，“等这场战争彻底结束后，没有人想再打一次新的战争了。”

“人们想还是不想，您觉得这起得了什么作用！”迪布勒伊说。

波尔正要回击，可亨利抢过了话头。“真的，”他并无恶意地说，“我没有时间。”

“时间永远都有。”迪布勒伊说。

“对您来说是这样。”亨利微笑着说，“可我呀，是一个凡夫俗子。要我整整一个月，天天连续工作二十小时，也不睡觉，我做不到。”

“我也同样办不到。”迪布勒伊说，“我再也不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了。不过，不会要求您干那么多事的。”他神色不安地尝了尝潘趣酒，又这样补充了一句。

亨利开心地瞅了他一眼。不论是二十岁还是八十岁，迪布勒伊总是一双贪噬一切的大眼睛，满目喜悦，永远显得那么年轻。这真是个狂热的家伙！相比之下，亨利常觉得自己不专一、懒惰、不坚定，即使逼着自己也无济于事。二十岁时，他是多么崇拜迪布勒伊，以至觉得自己应该处处效法于他。结果呢？他还是永远睡不够，大量服麻醉剂，陷入愚蠢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他不得不痛下决心：放弃娱乐。于是他渐渐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同时，也丧失了写作的乐趣，慢慢变成了一部机器。整整四年里，他完全是一部机器。现在，他首先要使自己重新成为一个人。

“我毫无经验，真不明白这对您会有什么用场。”他说。

“没有经验，这自有它好的一面。”迪布勒伊开腔道。接着，他淡然一笑：“再说，就目前而言，您的大名对许多人来说颇有影响。”他笑得更带劲了，“在战前，萨玛泽尔在大大小小的各个派别中都混过，可我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才需要他，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游击英雄，他的名字有影响。”

亨利开口笑了起来，在他看来，只有当迪布勒伊想表现得恬不知耻之时，才显得最为幼稚天真。波尔谴责他危言耸听，这自有道理，倘若他真的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那他决不会如此开心。事实是他看到出现了行动的可能性，迫不及待地要适时利用。亨利并不感到那么兴奋。显然，自一九三九年以来，他变了，从前，他是左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使他厌恶，社会不公平令他憎恨，也因为他把世上所有的人都看作兄弟。可这种美好的高尚情感并没有使他投入任何行动。如今，他知道自己若真的想要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他自己必须付出代价。马勒菲拉特尔、布古安和皮卡尔在小树林边丢了命，可

他将永远怀念他们，仿佛他们还活在人间：他和他们围坐在一起，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盆红酒玉葱烧野兔，他们饮着白葡萄酒，谈论着前途，尽管并不十分相信会有什么前途。这四个当兵的，等战争一结束，他们各自又将重新成为一个资产者、一个农民、两个钢铁工人。此时此刻，亨利明白了，在其他三人和他的眼里，自己可能会像一个或多或少有点耻辱，但心甘情愿的特权者，再也不会是他们中间的人了。若要继续做他们的伙伴，唯有一条路可走：一如既往，与他们继续共事。一九四一年，当他与科隆布树林小组一起共事时，体会更为深刻了。开始时，事情并不顺利，弗拉基一口一个：“你明白吧，我是个做工的，我说的是做工的人的理。”亨利恼火极了。然而，多亏了他，亨利领悟到了从前根本不知晓的一些事理，从此感觉到了这种威胁：仇恨。可他消除了这种仇恨，在共同的行动中，他们最终把他看作了自己的战友。可是，一旦哪一天他又重新成为一个冷漠无情的资产者，这种仇恨必将重现，那是理所当然的事。除非他做出相反的表现，不然，他肯定是亿万人民的敌人，是人类的仇敌。他绝对不希望这种下场，他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有所表现。不幸的是，行动已经改变了形式。抵抗斗争是一码事，政治又是另一码事。政治，这远远不能激起亨利的热情。他完全清楚类似迪布勒伊打算从事的运动意味着什么：委员会、讲演会、代表大会，人们讲呀，讲呀；势必要玩弄数不完的手腕，要没完没了地妥协，没完没了地接受站不住脚的折衷方案。时间被白白浪费，一让再让，气得让人发狂，还有那令人满怀忧郁的厌烦，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嫌恶的了。主办一份报纸，这是他心爱的事业，当然，两者并不相互排斥，甚或能互为补充。断不能把

《希望报》作为遁词。不能，亨利自感没有权利回避，他只是设法把代价控制到一定限度。

“用我的名字，让我出席几次会议，这些，我无法拒绝您。”他说，“可不要对我有更多的要求。”

“我当然对您要有更多的要求。”迪布勒伊说。

“不管怎么说，眼下不行。从现在起到我出发这段时间，我有做不完的事。”

迪布勒伊直瞪着亨利的双眼：“还始终坚持那个旅行计划？”

“决不放弃。最迟三周后，我就要启程。”

迪布勒伊声音中带有愠怨：“这是开玩笑吧！”

“啊！我这下放心了！”安娜一副嘲讽的神气望着他说，“若您想去漫游一番，那您就去好了，您可以解释说这是唯一可做的明智的事情。”

“可我不想，这是我高人一筹之所在。”迪布勒伊说。

“我应该说，旅行对我来说就像是个神话。”波尔说道，继而向安娜莞尔一笑，“坐了十五个小时的火车后，你给我送上一朵玫瑰花，这所给予我的远胜过艾勒汉卜拉宫 [\[3\]](#) 的花园。”

“啊！旅游，当然会使人兴趣盎然。”迪布勒伊道，“可眼下，留在这里更令人热情洋溢。”

“可是我呀，我是多么渴望到别处看看，需要时，不惜徒步远行，哪怕鞋子里满是硬硬的干豌豆，再磨脚也能忍耐。”

“那《希望报》呢？您整整一个月扔下不管？”

“我不在，吕克照样会办得很出色。”亨利回答说。



他诧异地望着他们仨。“他们根本体谅不到！”总是这同样几副面孔，永远是一式的装饰，谈论的始终是老话题，遇到的总是一样的问题，愈变愈是千篇一律：到头来，大家都感到像一个死去的活人。友谊，巨大的历史激情，对这一切，他已经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品尝到了其中的滋味。可如今，他需要别的东西，这种需要如此强烈，哪怕试图做一解释，也会显得可笑。

“圣诞快乐！”

门开了，樊尚、朗贝尔、塞泽纳克、尚塞尔，整个办报的班子全来了。他们带了酒和唱片，一个个面颊冻得通红，扯着嗓子齐声高唱着《八月时光》那首老调子：

他们在何方，我们再也不能相见，  
结束了，结束了，一切都烟消云散。

亨利快乐地朝他们微笑。他感到与他们一样年轻，同时觉得或多或少是自己塑造了他们。他张口与他们一起高唱起来。突然，电灯灭了，潘趣酒闪闪发光，圣诞装饰物噼啪作响。朗贝尔和樊尚往亨利身上撒光闪闪的礼花星子，波尔点燃了枞树上的儿童蜡烛。

“圣诞快乐！”

他们成双成对、成群结伙地赶来，细听着迪詹戈·莱因哈特弹奏的吉他，他们跳啊、喝呀，纵声欢笑。亨利搂着安娜的腰肢，她声音激动地说：“差不多像在登陆的前夕，在同一个地点，来的也是这些人！”

“是的，可现在，登陆已经盼来了。”

“对我们来说，已经盼来了。”她说。

他知道她心里惦念着什么，此时此刻，比利时的村庄正在燃烧，滚滚热浪拍击着荷兰的乡野。然而在这里，却是一个节日的夜晚，第一个平安无事的圣诞节。有时候，必须庆贺一下，热闹一番，不然，打了胜仗又有何用？这是在过节，他又闻到了这熟悉的白酒、烟草和米粉的香味，闻到了长欢之夜的气息。千百道五彩缤纷的水柱在他脑海中喷射。战前曾度过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在蒙巴纳斯咖啡馆，大家开怀地喝着牛奶咖啡；在弥漫着油墨味的工作间，大家尽情地交谈；在小巧玲珑的舞厅里，他怀里搂着波尔这一世间最美的女子。在那嘈杂的金属机械声四起的拂晓时分，总是有一个温柔得令人发狂的声音对他喁喁私语，说他正在写作的一定是部好书，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了。

“您知道，”他说，“我已决定写一部欢快的小说。”

“您？”安娜一副逗乐的神情，瞅了他一眼，“什么时候动笔？”

“明天。”

真的，他突然迫不及待地要重新成为过去的他，成为一个他一直希望做的人：作家。他也重新体会到了这一躁动不安的欢乐：我要动笔写一部新的作品。他要畅叙正在复现的一切：黎明、长欢之夜、旅游和欢乐。

“您今晚看来心绪挺好。”安娜说。

“是的，我感觉到就要走出一条漫长的隧道。您没有这种感觉？”

她犹豫了一下：“我不清楚，不过，这条隧道中总也有过美好的时光吧？”

“那当然。”

他朝安娜微微一笑。她模样俊俏，今晚身着朴素的衣裳，在他看来反倒显得热情浪漫。若她不是自己的老朋友，不是迪布勒伊的妻子，他准十分乐意向她献几分殷勤。他一连请她跳了几曲，接着又邀克洛蒂·德·贝尔琼斯起舞。这位女子袒胸露肩，挂满了祖传首饰，专来与这帮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凑凑热闹。他接着又邀请了雅内特·康热和吕茜·勒诺瓦。所有这些女子，他对她们是太熟悉了，可还会有别的节日、别的女人。亨利朝普莱斯顿一笑，此时，普莱斯顿正微微摇摆着身子，穿过房间向前走来。这是亨利在八月份遇到的第一位熟悉的美国人，两人马上投入对方的怀抱之中。

“我坚持要来和你们共庆圣诞节。”普莱斯顿说。

“让我们共庆佳节吧！”亨利说道。

他们喝了酒，普莱斯顿颇带感情地讲起了纽约之夜。他已有几分醉意，倚着亨利的肩膀。“您应该来纽约。”他以急不可待的口气重复道，“我保证您会获得巨大成功。”

“当然，我一定去纽约。”亨利说道。

“到了纽约，租一架小型飞机，那是观赏当地风光的最好办法。”普莱斯顿说。

“我不会驾驶。”

“噢！那比开汽车还容易。”

“我一定学一学驾驶飞机。”亨利道。

对，葡萄牙之行只是个开端，还有美国、墨西哥、巴西，也许还要去苏联、中国，都要去走一走。亨利将重新开着小车，并将驾驶着飞机。灰蓝色的天空充满沉甸甸的希望，前程在无限地扩展。

突然，出现了一片寂静。亨利惊异地发现波尔坐到了钢琴前。她开始歌唱起来。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唱了。亨利极力以公正不倚的耳朵去倾听她的歌声，他过去怎么也无法对这一歌喉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当然，这不是一副无足轻重的嗓子，有时人们仿佛听到了铜钟大吕般浑厚而圆润的声音在回荡。他再次思忖：“她为何半途而废？”当时，他曾把波尔的自我牺牲看作爱情的一种震撼人心的表示。后来，波尔放弃了一切尝试成功的机会，他对此感到奇怪，琢磨着波尔是否以他们的爱情为借口而逃避考验。

掌声大起，他也跟着别人鼓掌，安娜低声赞叹道：“她的歌喉永远是这么漂亮。要是她重返歌坛，我肯定她会走红。”

“您真这么认为？为时已晚，不是吗？”亨利道。

“为什么？只要重新学唱几课……”安娜神色中带着几分犹豫，看了看亨利，继续说，“我觉得这对她有益。您应该鼓励她。”

“也许。”他说了一声。

他细细打量着波尔，她正笑靥动人地听着克洛蒂·德·贝尔琼斯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辞。这显然会改变她的生活，无所事事对她来说毫无好处。“而对我，这可以使事情大大简单化！”他暗自思忖。说到底，这有什么不行？今晚，一切看来都有可能实现。波尔将闻名遐迩，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热情，这样，他便可以自由自在周游四海，在此处和彼处过着时间虽短暂却欢乐的风流生活。为什么不行？他露出微笑，走近纳迪娜，她一直站在炉旁，神色阴郁地嚼着口香糖。

“您为什么不跳舞？”

她耸肩膀：“跟谁跳？”

“您若愿意，跟我。”

她并不漂亮，与她父亲长得太相像了，花蕾般少女的体态，却配了张郁郁寡欢的面孔，看了真不顺眼。她碧蓝的双眼，酷似安娜，可却那么冷漠，以致显得毫无光彩又天真稚气。不过，那条羊毛裙遮盖下的身段却比亨利想象的要更婀娜多姿，那乳房也更为丰满。

“咱俩是第一次跳舞。”他说。

“是的。”她接着又说了一句：“您跳得真好。”

“您吃惊吗？”

“我明白，这帮毛头小伙子谁也不会跳舞。”

“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学。”

“我知道。”她说，“我们什么机会都未曾有过。”

他对她笑了笑。一位妙龄女郎，即使丑陋，终归是位女郎。他爱她身上科隆香水淡雅的馨香和新洗涤的内衣散发出的幽幽的清香。她跳得不好，可这无关紧要，这里有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欢声笑语，有小号的高昂吹奏声，有潘趣酒的醇厚芳香，还有回映在一面面镜子里的那些枞树闪烁着的点点光亮，窗帘后面，是纯净的黑色夜空。迪布勒伊正在表演一个小魔术节目：他把一份报纸剪成碎片，可一转手重又完整无缺；朗贝尔和樊尚在用空瓶决斗；安娜和拉舒姆在唱一部伟大的歌剧的唱段。火车、飞机、轮船在围着地球转动，人们可以随意登上一游。

“您跳得不错。”他彬彬有礼地说。

“我跳得简直像头小牛犊，糟糕透了。可我不在乎，我不爱跳舞。”她带着几分疑虑察看了一下亨利的脸色，继续说，“一帮迷上爵士音乐的小疯子，乌七八糟的爵士音乐和烟味、汗味臭不可闻的地下室，这一切，您感兴趣？您？”

“有时就感兴趣。”他问道，“您对什么感兴趣？”

“对什么都没兴趣。”

她回答的声音如此粗暴，亨利不禁好奇地打量了她一番。他暗自揣摩，到底是因生活的失意还是恣意放纵自己才使她被推进了那么多人的怀抱？可能是心绪不宁的原因吧，她脸孔冷酷的线条反倒变得柔和起来了。他心中暗想：若是迪布勒伊的脑袋躺在枕头上，该是个什么模样？

“我一想到您要去葡萄牙，就觉得您出奇地走运。”她忌恨地说。

“不久，旅行一定会很容易的。”他说。

“不久！您是想说一年后或两年后吗？您是怎么混到机会的？”

“是法国宣传机构要我做几场报告。”

“显然，谁也不会请我做报告。”她低声咕嚕道，“您要报告很多场吗？”

“五六场。”

“这样您就可以整整游逛一个月了。”

“无论如何得让老家伙们有点补偿吧。”他快活地说。

“可年轻人有什么补偿？”纳迪娜问道。她大声叹了一口气，又说道：“最起码出点新鲜事也好呀。”

“什么事？”

“自从处于所谓的革命时期以来，什么也没有变化……”

“八月份，总归有了点变化吧。”亨利说。

“八月份，人人都说一切都要大变，可跟以前几乎没有两样：吃得最少干活最多的还照旧是这些人，可大家仍然觉得这样很好。”

“这里谁也不觉得这样很好。”亨利说。

“可大家都凑合。”纳迪娜气呼呼地说，“无奈，只得浪费光阴去干活，这就已经够让人恶心的了；要是做了活连肚子都填不饱，我呀，宁愿去当强盗。”

“我完全赞同，我们意见完全一致。”亨利说，“可再等等吧，您太急于求成了。”

纳迪娜打断了他的话：“瞧您说的，就像是我家里人，唠唠叨叨地跟我解释来解释去，说什么应该等一等。可我根本不信。”她耸了耸肩膀，“说实在的，谁也不做任何努力。”

“您呢？”亨利笑眯眯地问道，“您是否做了点努力？”

“我？我还不到做努力的年龄。”纳迪娜回答道，“我算什么！”

亨利哈哈地朗声大笑。

“别伤心。您会长大的，年龄嘛，长得快着呢！”

“快？长一岁要过三百六十五天！”纳迪娜说。她耷拉下脑袋，一时默默无声地在心头琢磨。蓦然，她抬起双眼：“带我走吧！”

“去哪儿？”亨利问。

“去葡萄牙。”

他淡然一笑：“我看这不太可能。”

“只要有点儿可能就可争取。”他没有回答，纳迪娜紧紧追问：“为什么不可能？”

“首先，上面不会同意让我们两个人走。”

“算了吧！您谁不认识。就说我是您的秘书。”纳迪娜的嘴巴在笑，可目光热切而严肃。他一本正经地说：

“倘若我要带什么人的话，那是波尔。”

“她不喜欢旅行。”

“可她乐意陪伴我。”

“整整十年，你们朝夕相处，她还没见够？多一个月少一个月，这对她又有何妨？”

亨利重又露出笑容：“我回来时一定给您带橘子。”

纳迪娜的面孔沉了下来。亨利的眼前出现了一副迪布勒伊吓人的面孔。“您知道，我再也不是八岁的小丫头了。”

“我知道。”

“不，在您眼里，我永远是个用脚往壁炉里乱踢的脏丫头。”

“才不是呢，证据是我请您跳了舞。”

“噢！这是一次家庭聚会。可您不会邀我陪您一起外出。”

他颇有好感地细细打量了她一番。至少有了这么一位姑娘希望能换换空气。她希冀许多东西，新鲜的东西。可怜的丫头！她确实未有过任何机遇。骑自行车去法兰西岛，这差不多就是她做过的全部旅行了。清苦的少年时代，再说，那位小伙子死了。她好似很快得到了安慰，可不管怎么说，那总还是个可怕的记忆呀。

“那您错了。”他说，“我请您。”

“当真？”纳迪娜的双眸闪闪发亮。她一旦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看上去就可爱多了。

“周六晚上，我不去报社，咱俩八点整在红酒吧见。”

“到时做什么呀？”

“由您定。”

“我没主意。”

“到时我会有主意的。来，喝一杯。”

“我不喝酒，我再吃一个三明治还行。”



他俩走到了食品橱前。勒诺瓦和朱利安正唇枪舌剑，争辩不休：这是家常便饭了。他俩都斥责对方以不光彩的方式背叛了年轻时代的良知。昔日，他们觉得超现实主义过于拘谨，还不够怪诞，合力组建了“超人”运动。勒诺瓦后来成了梵文教授，作些神秘费解的诗作；朱利安则当了图书馆馆员，放弃了写作，也许他是少年得志，恐惧中年平庸、江郎才尽吧。

“你对此持何看法？”勒诺瓦问，“必须采取措施，反击附敌作家，对不对？”

“今天晚上，我不想费神思索。”亨利乐呵呵地回答道。

“阻止他们发表作品，此乃错误之策。”朱利安道，“当您全力撰写檄文之时，他们时间充裕，准会写出好书来。”

一只大手猛地搭在亨利的肩头：原来是斯克利亚西纳。

“瞧我拿什么来了：美国威士忌，我好不容易搞到两瓶。巴黎第一个圣诞节前夜，这是开怀畅饮的好时机。”

“棒极了！”亨利道。他斟了一杯威士忌，递给了纳迪娜。

“我不喝酒。”她一副被冒犯的神态说道。

她扭过脚跟，亨利把酒杯送到自己的唇边。他已经把这酒的味道忘得一干二净。说真的，从前，他更喜欢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不过，既然他把苏格兰威士忌的滋味也忘得一干二净，两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谁想喝一杯正牌的美国威士忌？”

吕克拖着两只患痛风的大脚走了过来，身后跟着朗贝尔和樊尚。他们各自满满斟了一杯。

“我更喜欢优质白兰地。”樊尚说。

“这酒不差。”朗贝尔说道，可自己并没有把握。他用探询的目光望着斯克利亚西纳：“在美国，他们真的每天都喝上十二杯吗？”

“他们，他们指谁？”斯克利亚西纳反问道，“美国人有一亿五千万，他们并不都像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他的声音很不中听，对比他年轻的人，他往往不怎么客气。他故意猛地朝亨利转过身子：

“我刚才与迪布勒伊严肃地谈了谈，我心里很不安。”

他显得忧心忡忡，平时他就是这么一副神情，仿佛他在场也好，不在场也罢，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与他个人休戚相关。亨利毫无心思分担其忧虑，只是嘴上问道：“到底为了什么？”

“他目前正在组建的运动，我认为其主要目的好像在争取共产党手下的无产阶级。可这和迪布勒伊原先的打算似乎根本不是一回事。”斯克利亚西纳声音阴郁不快地说。

“对，完全不是。”亨利道。

他心中痛苦地思索：“一旦我被迪布勒伊卷进去，每天不得不忍受的就是这类无休无止的争论。”他再次感到自己浑身上下被远走高飞的强烈欲望所吞没。

斯克利亚西纳定睛看了他一眼：“你与他走一条道？”

“十分谨慎地小步走。”亨利回答道，“搞政治，并非我所长。”

“你十有八九没有看透迪布勒伊正在打什么主意。”斯克利亚西纳说。他用责备的目光盯着亨利，“他正在组织一个所谓独立的左派，可实际上同意与共产党人统一行动。”

“对，我知道。”亨利说，“那又怎么了？”

“怎么了，他是在打他们的牌。被共产主义吓坏的人为数很多，他要使这些人与共产党人重新接近。”

“不要对我说你反对统一行动。”亨利说，“若左派开始闹分裂，岂不好看！”

“受共产党人奴役的左派！这是一剂迷魂药。”斯克利亚西纳说，“如果您已决定与他们一块走，那就加入共产党好了，这样做更干脆。”

“做不到，对许多问题，我们看法都不一致。”亨利说。

斯克利亚西纳耸了耸肩：“那么，从现在起，要不了三个月，斯大林派准会谴责您是社会叛徒。”

“到时再瞧。”亨利道。

他没有丝毫的兴致继续争论下去，可斯克利亚西纳死盯着他的眼睛：“别人对我说《希望报》在工人阶级中读者很多。真的吗？”

“不错。”

“如此说来，你手中掌握着唯一的一份非共产党人的，却能打入无产阶级的报纸！你意识到担当的责任重大吗？”

“我意识到了。”

“如果你让《希望报》为迪布勒伊效劳，那你就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勾当的同谋。”斯克利亚西纳道，“虽然迪布勒伊是你的好友，”他又附加了一句，“可必须反对他。”

“听着，至于报纸，它任何时候都决不会为任何人效劳，既不为迪布勒伊，也不为你。”亨利说。

“总有一天，《希望报》必须要确立其政治纲领。”斯克利亚西纳说道。

“不。我决不要先验的纲领。”亨利回击道，“我坚持只谈我所想的，谈我是怎么想的，决不随便被人所左右。”

“这站不住脚。”斯克利亚西纳说。

突然，响起吕克平静的声音：“我们坚决不要政治纲领，因为我们要顾全抵抗运动的统一。”

亨利自斟了一杯美国威士忌。“所有这一切全是他妈的混账玩意儿！”他低声骂了一句。吕克嘴边总是挂着这些字眼：抵抗运动精神，抵抗运动统一。至于斯克利亚西纳，一旦有人跟他谈起苏联，他就脸红脖子粗。这些人最好还是到他们的角落里去说胡话吧。亨利一饮而尽。他用不着别人给他出主意，对报纸该怎么办，他自有主张。当然，《希望报》也许免不了要表明政治立场，可必须要完全独立。亨利保留了这份报纸，并非要把它办成像战前那些报刊一样的货色。当时，形形色色的报刊竟明目张胆地蒙骗公众，其后果已经看到：由于每天看不到值得信赖的权威性文字，大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如今，派别之间的论战已经结束，大家对基本点的看法差不多趋于一致，必须趁此良机培育读者，而不应把东西往他们脑子里硬灌。亦即不要把观点强加给他们，而应该培养他们学会自己做出判断。这并非易事，读者往往要求现成的答案。切勿给他们造成无知、不可靠和自相矛盾的感觉。而难就难在这里：要无愧于他们的信任，而不是骗取他们的信任。办报有方的证据便是几乎到处都有人购买《希望报》。“如果自己也跟共产党人一样教条，何必又斥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呢？”亨利暗自思忖。他打断了斯克利亚西纳的话：

“你不觉得可以把这次争论推到另一天吗？”

“行。我们约个时间。”斯克利亚西纳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了记事本。“我认为我们进行立场观点的交锋，已经刻不容缓。”

“等我旅行回来再说吧。”亨利说。

“你要去旅行？是出差搜集情况？”

“不，是去消遣消遣。”

“眼下？”

“当然是的。”亨利回答道。

“这不是开小差吧？”斯克利亚西纳说。

“开小差？”亨利乐呵呵地说，“我不是当兵的。”他一抬下巴，指了指克洛蒂·德·贝尔琼斯：“您应该邀克洛蒂跳舞，就是那位挂满了首饰、十分裸露的太太。她是名副其实的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对你十分仰慕。”

“上流社会女子，这可是我的癖好之一。”斯克利亚西纳笑嘻嘻地说。他摇了摇头：“我承认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

他前去邀请克洛蒂。纳迪娜在与拉舒姆跳舞，迪布勒伊与波尔围着圣诞树在旋转。波尔并不喜欢迪布勒伊，可迪布勒伊常常能想方设法逗得她发出笑声。

“你可是把斯克利亚西纳搞得气愤极了！”樊尚快活地说。

“我要出外旅行，他们都气极了。”亨利说，“首先是迪布勒伊。”

“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朗贝尔说道，“你比他们干得都多，不是吗？因此，你有充分的理由出去休息一下。”

“确实，”亨利心里想，“我跟年轻人最合得来。”纳迪娜羡慕他，樊尚和朗贝尔理解他，他们和他一样，刚有可能，便抓紧机会要去看外面发生的一切，马上报名当了战地通讯员。亨利在他们身边呆了许久，不厌其烦地谈论起过去那非凡的日子。想当初他们占了报社的办公室，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卖《希望报》，而亨利则在撰写社论时抽屉里放把手枪。今天晚上，他觉得这些往事增添了崭新的魅力，因

为他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清楚地听到了这些往事：他躺在松软的细沙上，大海是碧蓝碧蓝的，他懒洋洋地回忆着逝去的时光，回忆着这远方的朋友，并为自己独自躺在那里自由自在而心旷神怡。他心里乐滋滋的。

忽然，他发现自己仍呆在这间红色的公寓里，时间已凌晨四点。许多人已经离去，大家都要走了，他将又独自和波尔呆在一起，将不得不与她说话，向她表示爱抚。

“亲爱的，你的晚会简直是部杰作。”克洛蒂拥吻着波尔说，“你有一副奇妙的歌喉。若你愿意，准会成为战后的一个大歌星。”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奢望。”波尔开心地说。

是的，她没有这种雄心壮志。亨利最清楚她心中的愿望：成为世界上最光荣的男子汉怀中最美的女人。要促动她改变幻想，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最后几位宾客离去了，公寓突然间空空荡荡。楼梯上传来咚咚的声响，那脚步声继而节奏分明地击打着街巷的沉寂，波尔动手收拾起丢在椅子下的空杯子。

“克洛蒂言之有理。”亨利说，“你的嗓音永远是那样美妙。我已经许久没有听到你的歌声了！你为何不再歌唱？”

波尔的脸上露出了喜色：“你喜欢我的歌喉？你愿意我经常为你歌唱？”

“当然。”他笑眯眯地说，“你不知道安娜跟我说了点什么，她说你应该重返歌坛。”

波尔神色不悦地瞪了他一眼：“啊！不！别跟我提这事。这事早就了结了。”

“为什么？”亨利问，“他们那么热烈地鼓掌，你已亲眼看到了吧？他们大家都被感动了。眼下，许多夜总会都在开业，人们渴望新的歌星……”

波尔打断了他的话：“不，我求求你，别强求了。让我公开登场，我厌恶，别强求了。”她用苦苦哀求的声音重复说道。

亨利困惑不解地打量了她一番。“厌恶？”他用犹豫不决的口吻说道，“我这就不明白了，过去你对唱歌并不厌恶，你如今也没有变老。你知道，你呀，甚至更美了。”

“那是我生命中的另一段时光，”波尔道，“一段永远埋葬了的时光。我从今之后，只为你歌唱，而决不为他人歌唱。”她话中含着如此强烈的情感。亨利不再做声，可他在心底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再次发动进攻。出现了一阵沉默，波尔开口问道：“我们上楼吧？”

“上楼。”

波尔坐在床上，她摘下耳环，轻轻取下戒指。“你知道，”她声音平静地说，“要是我刚才对你要外出旅行有所指责的话，请你原谅。”

“想到哪儿去了！你完全有权利不爱旅行，并说出来。”亨利说。一想到晚上整个聚会期间，她心头一直为此事而深深内疚，亨利不禁感到局促不安。

“我完全理解你渴望出去走走。”波尔说道，“我甚至也十分明白你想不带着我，独自外出。”

“并不是我要想。”

她手一挥，打断了亨利的话：“你用不着客气。”她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两眼直直的，上身笔挺，俨然一位阿波罗神殿里正在静思的女祭司。“我从来未曾想到要把你困在我们爱的牢笼之中。假若你不希

望新的天地，不补充新的营养，那你就不能成为你自己了。”她朝前俯下身，目光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只要我不是你的累赘，也就心满意足了。”

亨利没有答腔。他既不想使她陷入绝望境地，也不愿给她任何鼓励。“要是我心头能对她产生几分怨恨也行啊！”他暗自在想。可是，他激不起丝毫怨气。

波尔站起身，嫣然一笑，她的脸上重又显出了人情味，她双手搭在亨利的肩头，用自己的脸庞贴紧他的面颊说道：“你离开我能行吗？”

“你完全清楚，不行。”

“对，我清楚。”她快活地说，“就是你说行，我也不相信。”

她朝浴室走去。必须不时跟她说一句话，给她一个笑脸，断不能不这么做。她把这笑脸和话语当作圣物珍藏在心底，当她的信念发生动摇时，她每每从中索取奇迹。“可不管怎么样，她内心知道我再也不爱她了。”亨利自言自语。他这样讲，也是为了使自已深信不疑。他开始脱下衣服，套上睡衣。她自己虽然也知道，可要是她不答应，事情不会有任何进展。耳边传来了丝绸的窸窣声，继而又响起汨汨水声和水溅玻璃声。往昔，这响声往往使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他不快地对自己说道：“不，今晚不行。”波尔出现在门口，一头细密的秀发披在肩头，神情严肃，赤身裸体。她风韵几乎不减当年，只是对亨利来说，这花容月貌已经毫无意义。她钻入被窝，默不作声地紧贴着他，他找不到任何借口拒绝她。这时，她已经心荡神驰地喘着粗气，贴得更紧了。亨利动手抚摸她的臂膀，抚摸她的腹部，他感觉到自己的血液乖顺地向下流去。这当然更好，额头上一个热吻，决不会就使波



尔满足的。要向她解释清楚还不如干脆满足她的欲望省时间。亨利吻着那张灼热的嘴巴，它还是老一套，像平素一样在他的嘴下自动张开。可过了片刻，波尔离开了他的双唇，于是亨利怪不舒服地听到了她老调重弹，低声诉说起他早已不向她表白的那些话：“我永远是你的——一串漂亮的紫藤花，对吗？”

“永远是。”

“那你爱我吗？”她把手放在他那强壮的身体上面问道，“你真的永远爱我吗？”

他感到没有勇气挑起悲剧。他已经习惯于招认一切，而这一点，波尔十分清楚。“真的。”

“你属于我吗？”

“我属于你。”

“对我说你爱我，说呀。”

“我爱你。”

她轻信地长喘了一口气。亨利猛地抱住了她，嘴巴紧压她的双唇。他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她的身体，为的是尽快完事。在她的体内，他犹如置身于这间红得过分的公寓，赤身通红。波尔开始呻吟起来，像往日一样，低声喊叫着。可是在过去，亨利的爱是她的保护神，她的喊叫、呻吟、欢笑和吻咬是神圣的祭品。可今天，他睡在一个误入歧途的女人身上，这女人说着淫秽的语言，那爪子抓得让人难受。他厌恶她，也厌恶自己。她仰着脑袋，紧闭着眼睛，裸露着牙齿，奉献得如此彻底，痴迷得如此可怕。亨利恨不得打她几记耳光，让她清醒过来，对她说：“是你，是我，我们在做爱，仅此而已。”他感到自己在强行糟蹋一具僵尸或一位疯女，却怎么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性欲。当

他最终又放任地扑倒在波尔身上时，他听到了一声胜利的呻吟。波尔低声问道：

“你幸福吗？”

“当然。”

“我是多么幸福。”波尔说道，两只明亮的眸子凝视着亨利，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亨利让这张亮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脸蛋依在自己的肩头。“巴旦杏树又将花满枝头……”他闭着双眼道，“橘子树上一定会结出果子。”

---

[1]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元帅。

[2] Jacques Grévin（1538—1570），法国医生、剧作家和诗人。

[3] Alhambra，位于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摩尔王朝宫邸。

## 二

不，我不会在今天就看到自己的末日。无论今天还是别的日子，永远不会。别人会看到我的死，但我自己永远见不到死的一天。

我又闭起双眼，却难以重新入睡。死神怎么又穿越了我的梦境？死神在游荡，我感到它在徘徊。为什么？

我并不是永远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会死去。孩提时代，我信仰上帝。一件洁白的裙服和两只熠熠闪光的翅膀在天堂的更衣室里等待着我：我希冀穿透乌云。我躺在绒被上，合抱着双手，任凭自己沉醉在天堂的极乐之中。有时，我在睡梦中自言自语：“我已经死了。”但是，我那警觉的声音确保我永恒。死亡的沉寂，我恐怖地发现了它。一条美人鱼在海边渐渐死去，她为了一位年轻男子的爱而放弃了自己不朽的灵魂，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留下几抹白色的浪花。为了让自己心静，我常在心底默默地说：“这是个传说。”

这并非是个传说。美人鱼就是我。上帝变成了冥冥苍穹深处的一个抽象概念。一天晚上，我把它彻底抹去了。我从未为抛弃上帝而遗憾，因为是它窃走了我的乐土。可是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一旦我抛弃了上帝，我便判了自己死刑。当时，我才十五岁，在空荡荡的套间里，呼天喊地。后来我恢复了理智，扪心自问：“别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将怎样生活？难道我要带着这般恐惧去生活？”

打从我爱上了罗贝尔之时，我便再也不感到恐惧，对任何东西都毫不惧怕。只要我呼唤一下他的名字，我便平安无事。他就在毗连的房间里工作；我可以起床，去开门……可是，我仍然躺在床上。我不敢肯定他听不见那细微的咬噬的声响。大地在我们脚下断裂，苍天在我们头上张开一道深深的裂缝，我再也不知道我们是何许人，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命运。

我蓦地惊跳起来，睁开眼睛：怎么能假设罗贝尔面临危险呢？这怎能容忍？他没有跟我说过任何真正令人焦虑的事，也没跟我说过什么新鲜事。我浑身疲惫不堪，我酒喝过量了，原来只是凌晨四点发作的一场小小的谵妄。但是，谁能决定何时神志最为清醒？难道不正是在自感仍然安然无恙之时，我又说了谵语？我是否真的相信安然无恙？

我难以回首往事，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向来不十分留意。唯有事件本身清清楚楚：逃难、回归、警报、炸弹、长队、开会、《希望报》的创刊号，一切都历历在目。在波尔的寓所里，一支棕色的蜡烛喷吐着尚未燃尽的火焰，我们用两只罐头盒制作了一只小炉，用纸烧火，烟熏得我们眼睛像针扎了一样。外面，是一摊摊鲜血，枪弹呼啸，炮声隆隆，坦克轰鸣。然而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间笼罩着同样的死寂，经受着同样的饥饿，珍藏着同样的希望。每日清晨，我们被同一个问题所催醒：✠字旗是否仍在参议院上方飘扬？当我们在蒙巴纳斯十字街头围看节日的篝火欢腾雀跃时，我们心中荡漾的是同样的节日的喜悦。接着，秋去冬来，我们在圣诞树闪烁的光芒之中终于忘却了我们已经死亡，我察觉到我们重又开始存在，各自为着自己而存在。“你觉得过去还会重现吗？”波尔问道。亨利对我说：“我渴望写一部欢快的小说。”他们终于可以重新高声畅谈，发表作品，终于又可以商讨问题，建立组织，筹划行动。正是因为这一切，他们一个个才喜气洋洋。我不该选择这样的时刻自我折磨。今夜是节日，是第一个和平的圣诞节，也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迪埃戈无缘欢度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尽情欢跳，我们围着闪烁着希望之光的圣诞树热烈拥抱，可已不在世间的人是何其多呀，啊，何其多！谁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临终嘱托，谁也不知他们葬身何处。空间把他们彻底吞没了。解放后的第三天，热纳维埃夫收到了一口棺材：确实是这一口吗？雅克的尸体没有找到。一位战友说他曾把一些笔记本埋到了一棵树下。什么笔记本？哪一棵树？索尼亚曾通过别人要一件羊毛套衫和几双丝袜，后来她再也没有索要过任何东西。拉舍尔和美貌非凡的罗莎的尸骨葬在何处？过去，朗贝尔曾多少次搂抱着罗莎柔美的身子；

如今紧搂着纳迪娜，纳迪娜笑得是多么开心。想当初，迪埃戈过去紧紧抱着她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喜笑颜开。我凝望着镜面深处的那条枞树小径，心中默默地在想：这些蜡烛、枸骨叶冬青和槲寄生，他们看不到了，这儿给予我的一切，全是我从他们那儿夺来的。“有人把他们打死了。”第一个死的是谁？是他父亲还是他？死亡没有列入他的计划：他当时是否知道自己就要死亡？他曾奋力抗争还是安于天命？怎能知道呢？既然他已经身亡，知道又有何用？

既没有留下生日纪念，也没有留下墓穴碑文。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才摸索着穿越他所热爱的这一喧闹的生活，仍然寻觅着他。我把手伸向灯泡，可又垂了下来。我的写字台里有一张迪埃戈的照片，可即使看上几个时辰又有何用？乱如荆棘的头发下那张有血有肉的脸，我再也看不到了；那张脸上，一切都大得不成比例：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他坐在办公桌前，罗贝尔问道：“万一纳粹胜利，您干什么去？”他回答道：“纳粹胜利没有列入我的计划。”他的计划，是娶纳迪娜为妻，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本来他是有可能成功的，早在十六岁时，他就已善于把词语变成钱币，也许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成功，需要五年或者四年。他活得是那么仓促。我们常常紧挨着围坐在取暖电炉旁，我高兴地望着他贪婪地阅读黑格尔或康德的著作。他飞快地翻动着书页，仿佛在浏览一部侦探小说，可实际上他都读懂了。唯独他的梦想总是姗姗来迟。

他的所有时光几乎都在我们家度过。他父亲是西班牙籍的犹太人，一心就想着做生意赚大钱，他自称受到西班牙领事馆的保护。迪埃戈责备他父亲生活奢侈，找了一位肥肥胖胖的金发女郎做情妇。我们生活清苦，这正合他的心意。后来，他到了崇拜他人的年龄，对罗

贝尔充满敬意：一天，他带着自己的诗作来找罗贝尔，我们就是这样与他结识的。他与纳迪娜相遇，一见钟情，马上把他的爱奉献给了她。这是他的初次恋爱，也是唯一的一次恋爱。纳迪娜为感到自己不可缺少而无比激动。她把迪埃戈安顿到家里。迪埃戈对我也很喜欢，尽管觉得我过分理智了些。晚上，纳迪娜总是要我陪伴着，他和往常一样，躺在她的身旁，常问我：“还有我呢，您不吻吻我？”我便吻吻他。那一年，我女儿和我，我们亲亲热热。我感谢她能够保持真挚的爱情，而她也感激我没有违背她的心愿。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她当时虽然年仅十七岁，可罗贝尔和我都认为，就获取幸福而言，任何时候都不嫌早。

他们充满激情，善于幸福地生活。在他们身边，我重又获得了青春。“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来，今晚是节日。”他俩一人拉着我的一只胳膊，对我说。那一天，迪埃戈偷了他父亲一块金币，他更爱自己动手去拿，而不愿接受施舍，像他这般年纪的人就是这种脾气。他轻而易举地把金币换成钞票，与纳迪娜在月宫公园高低起伏的滑车道上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当我在街上与他俩相遇时，他们正在大口咬着从面包商后屋买来的一只大得出奇的奶油水果馅饼。这是他们用来开胃的惯用手法。罗贝尔在电话中受到了邀请，可他不同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于是，由我陪着他俩。他们俩脸上沾满了果酱，双手被集市上的灰尘染得黑乎乎的，但在他们的眼睛里分明流露出那种做了错事还洋洋自得的傲慢神气。饭店侍应部领班准以为他俩来这里是要迫不及待地将来路不明的钱财挥霍一空。他给我们指了尽头的一张餐桌，冷若冰霜却不失礼貌地问道：“先生没有上装吗？”纳迪娜把自己的上装搭在迪埃戈那件布满窟窿的旧粗毛线衫上，露出了皱皱巴巴

又肮脏脏的紧身上衣。不过，还是有人服侍我们。他俩先要了冰激凌、沙丁鱼，继而又点了牛排、油炸土豆、牡蛎，最后又要上冰激凌。“不管怎样，反正到了胃里全部混在一起了。”他们整个嘴巴一边往食油和奶油里乱舔，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们填饱肚子是多么快乐！尽管我到处想方设法，但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挨饿。“吃吧，您吃吧。”他们不由分说地让我吃。最后，他们拿了几块肉糜，放在口袋里带给罗贝尔。

就在此后不久，一天清晨，德国人拉响了塞拉先生的门铃；西班牙领事换了，可他毫无耳闻。迪埃戈那天夜里恰好在他父亲家睡觉。那位金发女郎没有受到打扰。“请转告纳迪娜，不要为我担惊受怕。”迪埃戈说，“我会回来的，因为我一心要回来。”这就是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几句话。他平时是多么喜爱说话，可他所说过的其他一切话语永远被吞没了。

时值阳春季节，天空蔚蓝，桃树披满了玫瑰色的花朵。纳迪娜和我骑着自行车在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中穿行，我们的心头充满了欢乐，仿佛是在欢度和平时期的周末。然而，德朗西监狱的摩天大楼无情地戳破了这迷人的假象。那位金发女郎给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德国人送了三百万法郎<sup>[1]</sup>，此人不时给我们一点有关犯人的消息，并答应帮他们父子越狱。有两次，我们透过望远镜瞥见了迪埃戈扒在遥远的窗台上，他那宛如羊毛似的鬃发被剃得一干二净，向我们微笑的不再完全是他，他那被毁坏的形象在尘世之外游荡。

五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发现大军营里空荡荡的，一些草垫子晒在窗台上，窗户大敞，牢房空无一人。在我们存放自行车的那家咖啡馆



里，有人告诉我们夜里有三列火车离开了车站。我们紧挨着架着铁丝网的高墙，站立着窥望了许久。蓦地，我们看清了在遥远的高处两个孤独的身影朝我们俯着身子，年轻的那一位胜利地挥舞着贝雷帽。菲利克斯没有撒谎，迪埃戈没有被火车带走。我们高兴得透不过气来，骑车向巴黎城区奔去。

“他们关在一个美国俘虏营里。”金发女郎对我们说，“他们过得很好，天天晒太阳。”可是，她没有见到他们的面，我们给他们寄了粗毛线衫、巧克力，他们通过菲利克斯传话，向我们致谢。然而，我们却再也没有收到他们一封亲笔信。纳迪娜要求得到信物：迪埃戈的戒指和一绺头发，可他们恰好换了俘虏营，关押在远离巴黎的某个地方。渐渐地，再也说不清他们身处何地，他们杳无音信，踪影全无。无影无踪与不复存在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当菲利克斯最后心情忧郁地告诉我们“他们早就被枪毙了”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纳迪娜接连几夜乱喊乱叫。我从夜晚到清晨，整夜整夜地把她抱在怀里。后来，她渐渐恢复了睡眠。开始时，迪埃戈常在黑夜里进入她的梦境，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不久以后，连幽灵也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她这样做自有道理，我不能责备她。守着一具尸体又有何用？我知道，有人用尸首来制造旗帜、盾牌、枪支，用来制造勋章、喇叭，乃至居室的装饰，可还是让他们的尸骨安息为好。无论成了丰碑还是成了宇宙间的尘埃，他们总归是我们的兄弟。可是，我们别无选择：他们为何离开了我们？但愿他们也让我们安宁。把他们忘了吧。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吧。我们的生活中要做的已经够多了。死者既然死了，对他们来说，一切再也不成问题，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节日的夜晚过后，我们还要醒来，我们怎样生活下去呀？

纳迪娜与朗贝尔在欢笑，唱片在转动，地板在我们脚下颤抖，蓝色的火花在摇曳。我凝视着直躺在一块地毯上的塞泽纳克：他十有八九在梦中回想他当初斜挎步枪、漫步巴黎的辉煌时光。我望着被德国人判了极刑，在最后时刻与一个德国俘虏交换幸免于难的尚塞尔，望着未婚妻被他不义的父亲告发了的朗贝尔，望着亲手宰了十二个保安队 [2] 队员的樊尚。他们将如何对待这如此沉重、如此短暂的过去，如何面对残缺的未来？我能有什么法子助他们一臂之力？助人是我的分内事。我有办法把他们安顿在长沙发上睡下，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梦，可我再也不能让罗莎复活，再也不能使那十二个被樊尚结果了性命的保安队员复活。即使我能成功，使他们淡忘自己的过去，可我能向他们展现怎样的未来？我能使他们消除恐惧、打消梦想、克制欲望、想方设法适应一切，可我能让他们适应什么样的境况呢？我发现在我的周围，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东西了。

确实，我酒喝得太多了，开天辟地的不是我，谁也不会找我清账。可我为什么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人着想？我自己照顾一下自己不也很好吗？我让脸颊紧贴着枕头。我是在这里，确实是我自己：令人忧虑的是，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可想的东西。噢！若有人问我是何许人，我可以出示身份证。为了成为精神分析医生，我不得不先任人分析一番。他们发现我身上具有相当突出的俄狄浦斯 [3] 情结：我与一位比我年长二十岁的男人结婚，对我母亲存在明显的挑衅性，几次同性恋的倾向性行为得以妥善了结，这一切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我感谢天主教的教育赋予了我极为强烈的超我意识：这正是我奉行清教主义 [4]、自爱不足的原因所在。我对女儿的情感的双重性源于我对母亲

的挑衅和对我自己的无动于衷。我的病例再普通不过了，完全属于既定的范围。在天主教徒的眼中，我的情况也极为平常：一旦发现了肉欲的诱惑，我便不再信仰上帝。我与一位无宗教信仰的人结了婚，这最终使我彻底失落了。从社会观点看，罗贝尔和我属于左派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并非纯属无稽之谈。我就这样被明确地划分了类别，并接受了分类，尽力去适应我的丈夫、我的职业，适应生生死死，适应大千世界及其可怖的一切。这就是我，差不多就是我，亦即谁也不是。

一个人做到谁也不是，这说到底是一种特殊的恩赐。我望着这些有名有姓的人在寓所里来回走动，心里并不羡慕他们。罗贝尔嘛，当然，他生来命运不凡。可其他几位，他们岂有那份胆量？他们怎敢自命不凡或冒冒失失地把自己当作食粮去喂养一群陌生人？他们的姓名被千万张嘴巴所玷污，好奇的人们钩去了他们的思想、心脏和生命：倘若我也落得这个地步，被那些捡破烂的人贪婪地钩耙，那我最终免不了会把自己视作一堆垃圾。我为自己谁也不是而感到庆幸。

我走到了波尔身旁，战争丝毫没有削减她那挑衅性的优雅风姿。她身着一件长长的紫罗兰发光丝裙，双耳挂着紫晶饰环。

“你今天晚上真漂亮。”我说。

她朝几面大镜子中的一面瞥了一眼。

“对，我漂亮。”她凄楚地说。

她是漂亮，可她的两只眼睛下方，几道重重的黑晕和她服饰的色彩一样深。实际上，她十分清楚亨利本来是可以携她同往葡萄牙的，她了解的事情比她嘴里说的要多。

“你该高高兴兴才是，圣诞节前夜，你操办得多么出色。”

“亨利那么喜爱热热闹闹过节。”波尔说道，她戴着紫晶戒指的两只手在机械地捋着那闪光变幻的裙服丝料。

“你不给我们唱点什么？听你唱歌，让我多高兴。”

“唱歌？”她惊诧地问。

“对，唱歌，”我笑着说，“你忘了你过去常唱歌。”

“过去，那多遥远。”她说。

“现在再不唱了，可现在又和过去一样了。”

“你这么认为？”波尔的目光直刺我的眼睛深处，仿佛穿透了我的脸庞，在向一只玻璃球发问，“你认为过去可以重现？”

我知道她期待我做出何种回答，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可不是个预言家。”

“无论如何得让罗贝尔给我解释清楚，时间是什么。”她若有所思地说。

爱情也许并不是永恒的，在她接受这一道理之前，她差不多已经准备否认空间与时间的存在了。我为她感到恐惧，这四年里，她终于明白了亨利给予她的只不过是一种厌倦的情爱。可解放以后，我真不知道在她的心间又唤起了怎样的疯狂的希望。

“你还记得《这位才智横溢的黑人》那支歌吗？我是多么喜欢，你不愿意为我们唱唱？”

她朝钢琴走去，掀开琴盖。她的嗓子有点哑，可还是那样动人心弦。我对亨利说：“她应该重返歌坛。”他好像感到诧异。当掌声消失后，他走到了纳迪娜身边，两个人翩翩起舞。我真不喜欢纳迪娜看他的那副神态。对她也一样，我毫无办法救助她。我把我唯一的一件像样的衣裙送给了她，把我最漂亮的项链借给了她，我能做的全都做

了。虽然我可以探察她的梦幻，可无济于事。她所需要的是朗贝尔时刻准备献给她的爱。可怎么阻止她糟蹋这份爱呢？她一直站在小楼梯上，面色苍白地注视着我们大家。可当朗贝尔步入寓所时，她一步几级地跨下了楼梯，一动不动地站在最后一级，像凝固了一般，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感到尴尬。朗贝尔向她走去，神情严肃地对她微微一笑：

“你来了，我多么幸福！”

她用生硬的语调说道：

“我是来看你的。”

这天晚上，他身着雅致的灰色套装，实在英俊。他的穿着总像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追求朴素的美。他举止彬彬有礼，嗓音平稳而且准确，不轻易露出笑容，可他目光的慌乱和嘴唇的温柔无不显出他的青春活力。纳迪娜从他严肃的神情中得到满足，见他表现胆怯而感到心安。她献殷勤地打量着他，显得有点幼稚可笑：

“你玩得开心吗？听说阿尔萨斯的风光是那么秀丽！”

“你知道，一旦风景区被军队占领，就变得一片凄凉了。”

他们坐在楼梯的台阶上，长时间地交谈，然后又跳舞、欢笑，后来为了换换口味，两人可能又吵了一架；和纳迪娜在一起，总是以吵闹而告终。此时，朗贝尔独自坐在火炉旁，满脸不高兴。眼下根本不可能到房子的两头去把他俩扯到一起，让他们携起手来，重归于好。

我走到食品橱前，喝了一杯白兰地。我的目光顺着自己的黑裙往下移动，停留在自己的大腿上；会想到自己长着一一条大腿，真滑稽可笑，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条腿，连我自己也没有。色如焦黄的面包似的丝裙下，这条腿细长有力，与别的腿没有什么两样，它总有一天也会

被彻底埋葬，仿佛从未曾存在过：这显得多么不公平。我正沉醉在对这条细腿的欣赏之中，这时，斯科利亚西纳向我走了过来：

“看您样子好像玩得不怎么开心嘛！”

“尽我努力吧。”

“年轻人太多了。年轻人呀，从来就不开心。作家也太多了。”他一抬下巴，指了指勒诺瓦、佩勒迪埃和康热，“他们都在写作，对吗？”

“都在写。”

“您，您不写？”

我笑着回答说：“噢，上帝，不！”

他粗鲁的言谈举止惹我喜欢。从前，我跟众人一样，拜读了他名噪一时的作品《红色的天堂》，尤其使我激动的是他那部有关纳粹奥地利的大作：充满激情的见证，远胜一般的通讯报道。逃离苏联之后，他又逃出了奥地利，取得了法国国籍，可这整整四年里，他一直呆在美国，今年秋天，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很快用“你”称呼罗贝尔和亨利，可似乎从未注意到我的存在。他从我身上移开了目光，说道：“我常想，他们将会怎么样？”

“谁？”

“一般来说指法国人，可尤其是这批人。”

这次，轮到我细细打量他了：三角脸，高颧颊，锐利又严厉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像女人的一般。这不是一张法国人的面孔。苏联对他来说是个敌国，而美国，他又不喜欢。天底下没有一处使他感到是自己的家。

“我是乘一艘英国船从纽约来的。”他挂着一丝微笑说道，“轮船服务员有一天对我说：‘可怜的法国人，他们连仗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不知道。’我觉得这话对整个局势概括得比较精辟。”

他的话音中分明含有几分得意，真惹我生气。我说：“给过去的事件起个什么名称，这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未来。”

“正是如此，”他激动地说，“正是为了未来幸福，才必须正视现实。我感觉到这里的人对此毫无意识。迪布勒伊跟我谈什么文学杂志，佩隆关心的是开心的旅游，他们好像都以为可以像战前一样生活。”

“那么，上天是派您来擦亮他们的眼睛啰？”

我声音生硬，斯克利亚西纳淡然一笑：

“您会下象棋吗？”

“很不高明。”

他继续挂着笑容，那股学究气早已从他脸上消失了。我们早就是知己朋友，意气相投。我心想，他又要来向我施展斯拉夫人的魅力了，而这魅力确实起了作用。我也忍不住笑了。

“下象棋时，要是我作为旁观者观战，我比棋手看得要清楚得多，哪怕我的棋艺不比他们高明，那么，这里情形也是如此：我是从外边来的，所以我看得清。”

“看清什么了？”

“死胡同。”

“什么死胡同？”

我陡然忐忑不安地这样问他。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肩并肩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旁观者。这束来自外界的目光刺得我心绪不宁。

“法国知识分子已置身于死胡同中。事情落到他们头上了。”他带着某种洋洋自得的神态继续说道，“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只有在一定的文明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倘若他们想要人为地挽救这一文明，其结果必定一无所获，他们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赋予艺术和思想。”

“罗贝尔并非生来第一次积极从事政治。”我说，“政治活动从未妨碍他写作。”

“不错，一九三四年，迪布勒伊牺牲了许多时间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斯克利亚西纳口气文雅地说，“可当时，他的道德观与其文学观似乎可以调和。”他又愠怒地接着说，“在法国，你们从未紧迫地感觉到历史的重担。在苏联，在奥地利，在德国，历史的重担是无法逃避的。正因为如此，比如我就不写作。”

“您过去写过。”

“您以为我就不梦想创作别的作品？可眼下根本顾不上。”他一耸肩膀，“只有历史上有过那种可恶的人文主义传统，才会面临斯大林和希特勒而去关心什么文化问题。显而易见，”他继续说，“在狄德罗、维克多·雨果和饶勒斯 [5] 的故国，人们总是想象文化和政治可以携手并进。巴黎长时间自视为雅典。雅典已经不复存在，早完蛋了。”

“至于历史的紧迫感，我认为罗贝尔在这方面比您强。”

“我并不攻击您的丈夫。”斯克利亚西纳只是微微一笑，否定了我这句话的完整意义，充其量只把它当作夫妻间感情忠诚的一种强烈表示。“实际上，”他补充说道，“我一直认为目前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是



罗贝尔·迪布勒伊和托马斯·曼。问题正是这样：我之所以预言迪布勒伊必将放弃文学，是因为我坚信他头脑清醒。”

我耸了耸肩膀。要是他想以此来奉承我，那可看错了对象，我打心眼里厌恶托马斯·曼。

“罗贝尔决不会放弃写作。”我说。

“迪布勒伊著作中的非凡之处，”斯克利亚西纳说，“在于他善于把对美的执著追求与革命精神熔于一炉。他在生活中也达到了类似的平衡：他一方面组织‘警觉委员会’，一方面勤于写作。可如今的问题是，这一和谐的平衡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罗贝尔一定能获得新的平衡，请相信他。”我说。

“他必将牺牲其美的追求。”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他脸上闪现出喜悦，得意地问道：

“您研究过史前史吗？”

“比下象棋强不了多少。”

“可您也许知道，壁画和在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文物表明了艺术的发展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连续不断的。可突然，绘画与雕塑消失了，人们发现了数个世纪的空白，这一空白与新技术的兴起恰好吻合。那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纪元，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人类必将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再也不容人类拥有自我表现的奢望。”

“类推证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说。

“就不这么比方了。”斯克利亚西纳耐心地说，“我以为正是由于你们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因此很难清醒地理解它的含义。一场战争绝不等于一个社会乃至一个世界的彻底摧毁，仅仅是摧毁的开端。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必将引起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导致我们的

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本身的革命：我们将很难回忆我们过去的面貌。到时，艺术和文学在我们眼里将只不过是过了时的消遣而已。”

我摇了摇头，斯克利亚西纳激情如火，继续说：

“噢，一旦哪一天世界的霸权掌握在苏联或美国的手中，法国作家的使命还会有什么意义？到时谁也不会理解他们，甚至都不会有人再讲他们的语言。”

“听您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一前景令您神往。”我说。

他一耸肩膀：“这是典型的女人之见，她们没有能力脚踏实地和客观地看问题。”

“就让我们脚踏实地吧。”我说，“客观上，绝没有证明整个世界一定会属于美国或苏联。”

“迟早会的，这是必定的。”他一挥手，止住了我的话，向我露出了斯拉夫人那漂亮的笑脸，“我理解您。解放刚刚不久，你们大家都还沉浸在欢乐之中。四年里，你们吃了许多苦，你们认为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了。可是，代价是永远付不够的。”他突然尖刻地说，直盯着我的眼睛，“您是否知道在华盛顿有一派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执意要扩大战役，一直打到莫斯科？用他们的观点看，他们确有道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极权主义如出一辙，都坚决要求无限地扩张；他们两个国家无论如何得决一雌雄。”他的声音变得凄凉起来，“您自以为是在庆贺德国的失败，可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这只是您个人的判断。”

“我知道迪布勒伊坚信和平能够实现，并相信欧洲也有实现这种和平的可能。”斯克利亚西纳说道，继又宽厚地一笑，“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我们最终不是被斯大林所吞并，就是被美国所侵占。”

“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死胡同可言了。”我乐呵呵地说，“再担心也无济于事，那些以写作为乐的人尽管去写好了。”

“要是没有任何人读您的东西，还硬要去写，是多么愚蠢的游戏啊！”

“当一切全都完蛋，也就只好玩愚蠢的游戏了。”

斯克利亚西纳不再做声，接着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就某种局势而言，不利的因素总归要少一点吧。”他俨然在交心。“要是苏联获胜，那没什么可说的，必定是文明的末日和我们所有人的末日。若是美国获胜，那灾难可能不那么严重。假如我们得以把我们的某些价值观强加给美国，得以保留我们的某些观念，那么也许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他们有一天会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重新建立联系：但必须考虑彻底调动我们的一切可能手段。”

“别对我说什么一旦发生冲突，您希望美国获胜！”我说。

“不管怎么说，历史的发展必将导致无阶级社会的产生。”斯克利亚西纳说，“这只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了。为了生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们的幸福，我热切地希望革命爆发在美国而不是在苏联统治的世界。”

“世界要是被美国统治，我似乎预感到革命将出奇的缓慢，将迟迟不能爆发。”我说。

“那您想象革命将由斯大林分子发起啰？革命，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它在法国确实美好。可在苏联，我向您担保，革命就不那么美好了。”他耸了耸肩膀，“你们是在给自己预备到时将惊诧莫名的荒诞事！等到了苏联人占领了法国的那一天，你们准会开始明白的。不幸的是，那时就太晚了！”

“被苏联占领，连您自己也不会相信吧。”

“遗憾呐！”斯克利亚西纳说，继又叹息道：“说来说去，还是算了吧。让我们乐观些吧。假设欧洲有它自己的良机吧。只有通过每时每刻不懈的战斗，才可能拯救欧洲。决不能各自只为了自己工作。”

我这下倒无言以答了。斯克利亚西纳所希冀的一切，仅仅是要法国作家保持缄默，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思。他的判断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他那悲切的声音引起了我内心的反响：“我们将怎么生活？”自晚会一开始，这一问题就一直像针刺一样，痛苦地缠绕着我。它已经出现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了？

斯克利亚西纳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看着我：“两者必居其一：像迪布勒伊和佩隆这样的人要么重新正视现实，投入到行动中去，那就需要他们全力以赴。要么自欺欺人，硬要继续写作：他们的作品必定脱离现实，毫无前途。这种作品岂不就是盲目之作，只能像亚历山大体诗歌一样让人伤心？”

遇到一个滔滔不绝地议论世界和他人，同时又不断抬高自己的对话者，交谈真是困难。我实在没有把握不伤他，但我还是开了腔：

“将人们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在徒劳无益，生活总会摆脱这种困境的。”

“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要么像亚历山大城，要么像斯巴达城邦，不战则败，别无选择。眼下，还是自己多想想这些事情为好。”他带着某种仁义补充说道：“只要事先有思想准备，牺牲就不再痛苦了。”

“我坚信罗贝尔决不会有任何牺牲。”

“我们一年后再谈吧。”斯克利亚西纳说，“一年以后，他要么开小差，要么再也不写作。我不觉得他会开小差。”

“他永远不会放下笔。”

斯克利亚西纳脸上一亮：“赌点什么？一瓶香槟？”

“我什么也不赌。”

他淡然一笑：“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一个样，非得亲眼看到天上那一动不动的星星和路旁的里程碑才信。”

“您知道，”我耸了耸肩膀，反唇相讥道，“那些一动不动的星星这四年旋转得可出奇了。”

“知道。可您还不是坚信不疑，法国永远是法国，罗贝尔·迪布勒伊永远是罗贝尔·迪布勒伊，不然，您就会觉得自己没救了。”

“喂，”我开心地说，“您的客观性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我不得不站在您的立场上来理解您：您借以反对我的只不过是主观的信念。”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一丝微笑又使他那两只在审问似的眼睛变得热烈起来。

“您对待事情很严肃，对吧？”

“因事而异。”

“有人事先就跟我说过。”他说道，“不过，我很喜欢严肃的女人。”

“谁跟您事先说过？”

他做了一个笼统的手势，既包括所有人，又不指任何人：“有人呗。”

“他们跟您说了些什么？”

“说您冷淡、严厉，可我不觉得。”

我紧抿双唇，以免再提别的问题。镜子的圈套，我有办法戳穿。可人的目光，这令人昏眩的深潭，有谁能抵挡得住呢？我总是一身黑色，沉默寡言，也不写作，这一切便构成了我的形象，人们有目共

睹。我谁也不是。我就是我，这说来容易。可我到底是谁？到哪里去找我？必须置身于所有大门的另一侧。可若是我叩门，他们谁都不会做声。我猛然感觉到我的面孔在焚烧着我，我真恨不得把它撕去。

“您为何不写作？”斯克利亚西纳问。

“书已经够多了。”

“这并非是唯一的原因。”他两只到处搜寻的小眼睛紧紧盯着我，“事实是您不愿暴露。”

“暴露什么？”

“您表面看去十分自信，可心底却极为怯懦。您就属于那种因无所事事而引以为骄傲的人。”

我猛地打断了他的话：“别枉费心机来分析我的心理状态，我对它了若指掌。我是精神分析专家。”

“我知道。”他朝我微微一笑，“最近哪个晚上我们能不能一起吃顿晚餐？在这昏暗的巴黎城，我弄得晕头转向，谁也不认识了。”

我猛然想到：“啊，在他眼里，我倒是长着大腿的。”我掏出记事本。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一起吃晚饭，”我说，“一月三日好吗？”

“好，八点钟在里茨饭店的酒吧。行吗？”

“行。”

我感到局促不安。噢！他对我到底持何种看法，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每当我从他人的意识中隐约地看到自己的形象，我总少不了恐慌一阵，可持续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因为我并不介意。此时令我心绪不宁的，是我通过并非属于我的眼睛瞥见了罗贝尔。他真的置身于死胡同？他搂着波尔的腰肢，正带着她旋转，另一只手不知在空中比画

着什么。也许他是在给她解释时间的流逝，反正她在笑，他也在笑，不像处于危险之中。若他身处险境，他会知道的：他很少出错，从不欺骗自己。我走到一扇窗洞里，躲在红色的窗帘后面。斯克利亚西纳说了许多蠢话，可他也提出了某些问题，我无法轻而易举地摆脱其缠绕。在那一个个漫长的日子里，我回避了一切问题。人们是多么盼望这一时刻：解放、胜利，我要抓住这一时机，未来的事情明天再考虑总还来得及吧。可是，眼下却考虑起了未来的事情，思忖罗贝尔会怎么想。他的疑虑从不表现为沮丧的神情，而是化为超负荷的活动。难道这些谈话、信函、电话和不知疲惫的夜间工作并不掩盖着某种焦虑吗？他从不对我隐瞒什么，可有时也暂时把某些忧虑埋在自己心底。“再说，”我痛苦地想到，“今天夜里他还对波尔说：‘大家正处于交叉路口。’”他常常这样说，我总出于怯懦而避免赋予这些词句真正的分量。“交叉路口”。可见在罗贝尔的眼里，世界处于危难之中。而对我来说世界就是他：他处于危险之中。当我们手挽着手在熟悉的黑暗中穿行，沿着河畔回家时，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并不足以让我放下心来。他喝了很多，极为开心。当他一连闭门工作几个昼夜之后，哪怕有机会出门走一走，也就成为一件了不起的壮举。今晚的聚会经他一说，如此富于立体感，以至我仿佛看到他像个瞎子似的从中穿越了过去。他呀，简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可我心底却继续在小声自问：战争期间，他充满激情撰写的回忆录，至今尚未完稿，这是为什么？莫非是个征兆？什么征兆？

“不幸的波尔！对一个女人来说，被文学家所爱，这不啻是个灾难。”罗贝尔常常这样感叹。他完全相信佩隆跟他说的有关波尔的一切。

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波尔身上。

“我担心解放会冲昏她的头脑。”我说，“去年，她几乎再也不做任何幻想，可现在又开始玩弄起狂热的爱情来了，她是在单相思，是独自在玩。”

“她费尽心机，非要让我说时间并不存在。”罗贝尔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她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既然现在战争结束了，她希望能寻回过去的时光。”

“大家都这么希望，难道不是吗？”我问道，仿佛觉得自己的声音带着喜悦。可罗贝尔却猛地紧挽着我的胳膊。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没有，一切都很好。”我用轻快的口吻回答说。

“得了！得了！当你拿出贵夫人似的声音，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罗贝尔说，“我敢肯定，此时此刻你脑子里正转得厉害。你喝了几杯潘趣酒？”

“肯定不如您多，再说喝了潘趣酒也无济于事。”

“啊！你承认了！”罗贝尔得意洋洋地说，“是有什么心事，连潘趣酒也无济于事。到底是什么事？”

“是斯克利亚西纳。”我笑着说，“他对我解释说法国知识分子完蛋了。”

“他巴不得这样！”

“我知道。可他说的还是让我发憊。”

“像你这个年纪的大姑娘，遇到一个什么先知，还轻而易举地受影响！斯克利亚西纳，我很喜欢他，他呀，爱折腾，说胡话，不安稳，眼睛四处乱转，可千万不要拿他当真。”



“他说政治一定会把您吃了，您必将不再写作。”

“你相信了？”罗贝尔乐呵呵地问。

“可您的回忆录迟迟不完稿，这是事实。”

罗贝尔犹豫了一下：“这是特殊情况。”

“为什么特殊？”

“在回忆录里，我提供了那么多反对我的武器！”

“正是这样作品才有其价值。”我激动地说道，“一个敢于自我暴露的人，是多么难得啊！说到底，只要他敢这么做，也就胜券在握了。”

“对，等他死了。”罗贝尔说道，继而耸了耸肩膀，“可我现在又重新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我有一大帮劲敌，等这些回忆录发表的那一天，你想象得出他们那副高兴劲儿吗？”

“您的敌人总会找到攻击您的武器，不是这，就是别的。”我说。

“请设想一下这些回忆录一旦落到拉福利、拉舒姆或小朗贝尔的手中，或落到哪个记者的手中。”罗贝尔说。

罗贝尔撰写回忆录时，脱离了整个政治生活，不过问任何前景，断绝了与公众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作品是否会发表。正是这样，他重又体验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无名的作者刚刚踏进文学殿堂时的那种孤独感，在没有方位物指点、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去冒险进取。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的作品。我不耐烦地说：

“那么，只要一搞政治，就再也没有权利写感情真挚的作品了？”

“有权利，可不能写引起丑闻的书。”罗贝尔说，“你完全知道，在当今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若非要去讲，就不可能不造成丑闻。”他微微一笑，“说真的，所有有关个人的事情都可能造成丑闻。”

我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几步。“您花费了三年时间撰写那些回忆录，现在往抽屉里一扔，您觉得无所谓吗？”

“我再也不想它了。我在考虑写另一部作品。”

“什么作品？”

“过几天再跟你说。”

我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罗贝尔：“您觉得挤得出时间写吗？”

“肯定。”

“噢！我看并不那么肯定：您根本没有一分钟能由您自己支配。”

“搞政治，起步最艰苦，慢慢就顺利了。”

我觉得他说得过分轻松了，紧接着追问道：“要是不顺利呢？您放弃搞那个运动还是停止写作？”

“你知道，我一时辍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罗贝尔挂着微笑回答说，“我这一辈子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够多了！”

我心头一揪：“您前几天还说您的作品尚未完成呢。”

“我始终这么认为，不过可以再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个月？一年？十年？”我问道。

“听我说，”罗贝尔用商量的口吻说道，“天底下多一部书少一部书，这并不那么重要。现在的形势令人欢欣鼓舞，你要明白：左派是第一次手中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也是第一次有可能联合搞一个运动，既独立于共产党人，又不至于有为右派效劳的危险。决不能放过这一机会！我等了它一辈子了。”

“我呀，我倒觉得您的作品事关重大。”我说，“它带给人们的，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至于政治工作，并不是您单枪匹马就可以担当得了的。”

“可唯独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政治。”罗贝尔快活地说，“你应该理解我：警觉委员会、抵抗运动，这很有必要，可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今天，事关创建大业，这更有意义。”

“我完全理解，可您的作品更让我感兴趣。”

“我们向来认为不是单纯为了写作而写作。”罗贝尔说，“在某些时刻，其他形式的行动更为迫切。”

“对您并非如此。”我说，“您首先是个作家。”

“您完全清楚这不对。”罗贝尔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革命。”

“是的。可您为革命服务的最好手段，是写您的书。”

罗贝尔摇了摇头：“这要因时而异。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取得胜利。”

“要是赢不了胜利，会有什么后果？”我说，“您总不至于真的相信面临新的大战的危险吧？”

“我不相信新的大战明天就会爆发。”罗贝尔回答道，“可确实必须设法避免在世界上造成一种战争的形势：一旦出现这种局势，迟早会动手打起仗来。同时也要避免这次胜利被资本主义所利用。”他一耸肩膀：“在自得其乐地写那些可能谁也不会去读的书之前，必须阻止发生的事情多着呢。”

我猛地在马路中间止住步子：“什么？您也认为人们会对文学不感兴趣！”

“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做！”罗贝尔说。

他说得确实太轻巧了！我愤愤地说：“看您的样子，好像无动于衷。可一个世界要是没有文学艺术，那肯定凄惨得可怕。”

“不管怎么说，目前，还有千百万人，对他们来说，文学等于零！”罗贝尔说。

“是的。可是您总指望这一切得以改变。”

“我始终指望于此。你的看法如何？”罗贝尔说，“问题正是如此，如果世界一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人们必须要经历一个几乎顾不上文学的时期。”

我们走进了工作室，我坐在皮椅的扶手上。是的，我潘趣酒喝得太多了，四壁在我周围旋转。我朝二十年来罗贝尔不分昼夜伏在上面写作的写字台瞥了一眼。现在，他已经年届六旬，如果顾不上文学的阶段持续很久，那他有可能无望看到这一阶段结束的那一天，对此，他不该如此无动于衷。

“得了，您知道您的作品尚未完成，五分钟前您还说就要动笔撰写一部新书：这就意味着还有人读您的书……”

“噢！这绝对可能。”罗贝尔说，“但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他紧挨着我，坐在皮椅上。“这另一种可能性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可怕。”他乐呵呵地补充说道，“文学是为人服务的，而人却不是为文学而生。”

“可对您来说，那太凄惨了。”我说，“假若您不再写作，您就不会有丝毫的欢乐。”

“我不得而知。”罗贝尔说，又淡淡一笑，“我没有想象力。”

想象力，他当然有。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当他对我说“我的作品尚未完成”时，他是多么焦虑不安。他刻意追求的是这部作品要有分量，能流传后世。尽管他矢口否认，但他首先是一个作家。也许在开始时，他一心只想服务于革命，文学仅仅是一种手段；可如今，文学

已经成为目的，他为了文学而酷爱文学，他的全部作品就是雄辩的证明，尤其是他再也不愿发表的那些回忆录。他撰写这些回忆录仅仅是为了写作的乐趣。不，事实是他为谈论自己感到厌倦，而这种反感不是好征兆。

“可我有想象力。”我说。

四壁在旋转，可我感到十分清醒，比没喝酒时要清醒得多。没喝酒的时候，头脑中步步设防，想方设法假装糊涂。突然，我一切全看得一清二楚。战争正在结束：一个再也没有任何保障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罗贝尔的前程没有保证：他很可能放弃写作，甚至他过去的全部作品都可能被虚无所吞没。

“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问道，“事情到底是往好还是往坏的方向发展？”

罗贝尔哈哈大笑起来：“啊！我可不是先知！不过，手中倒是掌握着很多王牌。”他又补充了一句。

“可到底有多少获胜的机会？”

“你愿意我放手大干，还是希望我小打小闹？”

“用不着来讥笑我。”我说，“总可以时不时给自己提提问题吧。”

“我给自己提出了不少问题，你要知道。”罗贝尔说。

他常向自己发问，而且比我更为严肃。我从不付诸行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总是好激动。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可与罗贝尔在一起，我即使错了也无所谓！

“您呀！只提那些您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我说。

他重又笑了起来：“是的，正是这样更明智，提其他问题又解决不了大事。”

“这并不成其为可以不提其他问题的理由。”我说道。我的语气变得咄咄逼人，不过不是对罗贝尔，而是对我自己，对我这些天来的盲目。“不管怎样，我希望对将会发生的事有个概念。”我说。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又喝了那么多潘趣酒，你不觉得明天早晨再谈会更清楚些吗？”罗贝尔问道。

一到明天早晨，墙将不再旋转，家具和摆设将重归其位，整齐有序，我的思绪也将如同往昔，有条有理，我又将重新得过且过，只需看清脚下的路，无需瞻前顾后，心里也不再为这些鸡毛蒜皮、争执不休的麻烦事犯愁。可我被这如此井井有条的一切搅得疲惫不堪。我瞅了一眼迪埃戈坐在炉边时用的坐垫，他常说：“纳粹胜利没有列入我的计划。”可后来，他们把他枪杀了。

“脑子里的念头总是过分清楚！”我说，“战争胜利了，这个念头就清清楚楚。哎，那么多人死去了，今天晚上他们都不在场，过的是什  
么怪节日！”

“可心想他们并没有白白死去，总归与认为他们是白白送了性命不一样吧。”罗贝尔说。

“迪埃戈就是白白送了命。”我说，“即使并不是白死又怎么样？”我气呼呼地接着说，“这种一切都在超越自己、向别的事物发展的运动体系对活人来说倒真合适。可是，人死了就是死了，对他们不是超越，而是背叛。”

“并不一定就背叛他们。”罗贝尔说。

“只要忘却了他们和利用他们，就是背叛了他们。”我说，“怀念之情，这也许没有什么用处，要么就再也不是真正的怀念。”

罗贝尔犹豫了片刻，“我想我是生来就不善于怀念的。”他神色困惑地说，“对我无法解答的问题，对我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不太关心。我并不是说我就有道理。”他补充说道。

“噢！我也不是说您有错。不管怎样，人死了就是死了，我们呢，还活着，再怀念也无济于事。”

罗贝尔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那就不要自寻烦恼了。你知道，我们也都都会死的，这也就使我们与他们十分相近。”

我抽回手。此时此刻，任何情爱我都厌恶。我不想得到安慰，我还不愿意。

“啊！真的，您那可恶的潘趣酒搅乱了我的心。”我说，“我要去睡觉了。”

“去睡吧。明天，提什么问题随你的便，甚至那些无济于事的问题也行。”罗贝尔说。

“那您呢？您不去睡？”

“我想我还是去冲个淋浴，再工作一下为好。”

“显然，罗贝尔抵御怀念之情的能力比我要强。”我躺在床上暗自思忖，“他忙于工作，四处活动，因此对他来说，未来比过去要更实在。他写作：自己力所不及之事以及不幸、失败、死亡等等，一旦让它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获得其应有的位置，他就感到无所牵挂了。可是我，我别无他法，我所失去的，再也无法觅回，我的背叛行为，任何东西都无法赎回。”我突然开始哭泣起来。我想：“在哭泣的是我的眼睛，而他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惜用的不是我的双眼。”我流着泪水，二十年来，我第一次孤独无援，独自经受着内心的痛苦和恐惧。我终于昏昏入睡，梦见我已经死去。我猛然惊醒，恐惧始终存在，一

个小时以来，我一直在与它搏斗，可它依然存在，死神继续在游荡。我开了灯，可马上又灭了灯，如果罗贝尔发现我的门扉下有亮光，他准会不安的。一切都无济于事，今天夜里，他无法给我帮助。当我想和他谈谈他自己时，他回避了我的问题，他知道自己身处险境。正是为了他，我才感到恐惧。迄今为止，我对他的命运始终充满信心。我从未试图安排他的命运，因为事无巨细，都是由他做出安排。我与他相依为命，共同生活，就仿佛生活在我自己心中，从来没有任何隔阂。可突然间，我再也没有信心，我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罗贝尔再也不是恒星、路标，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年届六旬的老人，身体虚弱、易病，失去了过去的保护，又面临着未来的威胁。我两眼睁得大大的，背靠着枕头。我必须想方设法拉开一定距离，以便更好地看清他，仿佛在这二十个春秋，我未曾毫不犹豫地爱过他。

要这样做，并非易事。曾有过一段时期，我远远地望着他，可那时我年纪太轻，看他时距离拉得太远了。一些同窗好友在索邦学院把他指给了我，人们对他议论纷纷，话中交织着钦佩与愤慨。人们私下传说他酗酒、逛妓院。若真是如此，对我倒更有吸引力。我儿时笃信宗教，这给我留下了副作用。在我看来，罪孽是上帝不存在的可悲的表现，倘若有人告诉我迪布勒伊强奸少女，我准会把他奉为一种圣人。可惜他的恶癖微不足道，而他取得的过多的荣誉倒惹我恼怒。我开始听他授课，并暗自发誓，一定要把他当作一个虚假的伟人。他显然不同于其他教授，来时像阵风，总要迟到四五分钟。一开始，他的两只狡黠的大眼睛少不了先审视我们一阵，然后开始授课。他的声调忽而和蔼可亲，忽而咄咄逼人。他一副粗暴的面孔，声音猛烈，经常纵声大笑，我们有时觉得他带有几分疯狂，这一切之中无不蕴藏着某



种挑衅。他身着十分洁白的衬衣，双手干干净净，脸刮得无可挑剔，因此，他穿的夹克衫、毛线衣和肥大的鞋子更显得有伤大雅，不是因为马虎所能原谅的。他喜欢的是舒适而不是体面，即无拘无束，这在我看来是故作姿态。我读过他的小说，可不大喜欢。我期待的是这些小说能给我某种令人激奋的启示，可它们给我讲述的却是普普通通的人物、平平庸庸的情感和一大堆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琐事。至于他授的课，确实很有趣，这我同意，可说到底，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独到之处。他总是那么自信，使得我无法抵挡内心的欲望，恨不得驳斥他一番。噢！我也坚信真理属于左派，打从我孩提时代起，我就觉得资产阶级思想散发着某种愚蠢和虚假的气息，散发着一种极为难闻的臭味。后来，我在《福音书》中得知人是平等的，人人皆兄弟，对此，我坚信不疑。只是由于我的脑子里长时间以来灌输的都是绝对的东西，因此依我看，苍穹的虚无使任何道德都显得微不足道。然而迪布勒伊却想象尘世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希望。我在第一篇论文中就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革命，好吧，”我写道，“可后来结果如何？”一个星期后，在下课的时候，他把作业还给了我，对我大加讽刺。我的绝对观点据他看是一种不能面对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梦想。我无力与他抗争，他自然大获全胜。可这证明不了任何问题，我直言不讳地跟他挑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星期，我们重又开始辩论，这一次，他想方设法说服我，而不是压服我。我不得不承认私下交谈时，他丝毫没有把自己视作伟人的架势。此后，上完课，他常常主动与我交谈，有时还一直陪我到门口，路上尽绕远儿。后来，下午和晚上，我们一起外出，既不谈论道德，也不谈论政治，任何高深的话题概不涉及。他经常给我讲故事，但更多的是带我去游玩，他向我展现了街道、公

园、河畔、运河，领我观看了墓地、市郊贫民区、货场、空地、小酒店和巴黎城中我不熟悉的角角落落。我发现许多我自以为了解的事物其实看也没有看过。经他一指点，一切都获得了无穷的意义：无论人们的面孔、声音、服饰，还是一棵树、一张布告、一块霓虹灯招牌或其他任何东西。我趁机重读了他的小说，这才恍然大悟，以前根本没有读明白。迪布勒伊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他心血来潮，仅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而去写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一合上书，人们立即会感到心头震动，激起愤怒、厌恶和反感，迫切需要事物发生变化。读了他作品中的某些段落，人们会把他视为一个纯粹的美学家：他对词语有独特的鉴赏力，对诸如阴天下雨、天空晴朗、爱情纠纷、偶然的故事等等有着一一种天真无邪的兴趣，只不过并不就此止步不前；你会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那些人物之中，似乎他们之间的任何问题都会与你休戚相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如此强烈地要他继续写作。通过我自己的感受，我明白了他带给读者的是什。在他的政治思想和诗人般的激情之间，并不存在距离。这是因为他非常热爱生活，以至他希望人人都能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也正是因为热爱人，所以属于人的生活的一切都使他充满激情。

我重温他的作品，倾听他的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我对此是那么专心致志，以至我从未想到问一下自己他到底为什么喜欢与我交往。此时，我已经无暇顾及发生在自己心间的一切。一天夜晚，当他在卡鲁塞尔公园把我搂到他的怀里时，我竟气愤地说：“我只拥抱我将爱上的男子。”他平静地回答我说：“可您爱我！”我很快明白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之所以对此毫无察觉，是因为这来得太快了：只要有了他，一切的发展都是那么迅速，首先制服我的甚至就是这一点。其他

的人是那么拖沓，生活是那么缓慢，而他却和时间赛跑，冲击一切。打从我明白已经爱上他那一刻起，我便满怀激情地紧跟着他，令人不胜惊讶的事情目不暇接。我懂得了人可以没有家具摆设，不需时刻表而生活，中午可以免去午饭，夜里可以不需睡觉，下午则可以睡大觉，在树林子和在床榻上一样可以享受云雨之欢。成为他怀抱中的一位女子，这在我看来既简单又欢快，当欲望使我惊恐不安的时候，他的微笑使我心安。我的心头笼罩着一丝阴影：假期临近，一想到分离，我就感到害怕。罗贝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莫非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向我提出结婚？可当时，我脑子里甚至从未掠过这种念头，我才十九岁，觉得被心爱的男子所爱和被尊敬的父母和万能的上帝所爱一样自然。

“可我爱你！”后来过了很长时间，罗贝尔这样回答我说。出自他的嘴里，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一年前，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时，他爱过我吗？还有那一年，他难道没有可能选择另一个女人以减轻因没有参加行动而造成的痛苦吗？这些问题微不足道，别提了。可以肯定的是，他狂热地希望我能幸福，而他的希望没有完全落空。至此，我没有不幸，没有，但也并不幸福。我身体健康，也有欢乐的时刻，但极大部分时间都在忧伤中度过。愚蠢、谎言、不公、痛苦：在我的四周，是一个漆黑一团的混沌世界。这一个月又一个星期，一个又一个世纪，日日重复，无处归宿的时光，是多么荒谬！生活，就是在四十或六十个年头里，在虚无中踟蹰，等待着死亡。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那么勤奋地学习，唯有书本和思想经受得住考验，在我眼里，唯有它们真实可信。

多亏罗贝尔，思想才降临到人间，地球变得像一部书那样完整统一，这是一部恶始而将善终的书。人类总是向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历史也有着它自己的某个方向，我的命运也是如此。压迫和贫困有可能自生自灭，邪恶已被战胜，丑闻已被扫除。苍穹在我头顶重又合拢，昔日的恐惧在我心头消失。罗贝尔并不是只凭大道理使我挣脱了困境，他向我表明了只要活着，生命就可自我满足。对于死，他毫不在乎，他的活动并非只是消遣，他爱其所爱，求其所求，对任何东西都不逃避。总而言之，我唯一的要求，只是能与他相似。如果说我提出了生活的问题，那主要原因是我在家中感到厌倦。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厌倦。罗贝尔以他对未来的设计，从一片混沌之中创造了一个充实的、秩序井然的、纯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唯一的问题，是要从中赢得我自己的立身之地。成为罗贝尔的妻子，这满足不了我，在嫁给他之前，我从未考虑过当妻子的生涯。此外，我一分钟也未打算过积极从政。在这个天地里，理论可以激起我的热情，我也有某些强烈的情感，可实践令我望而生畏。我必须承认我缺乏耐心，革命正在进行，可它发展如此缓慢，迈着如此迟疑不决的小步！对罗贝尔来说，只要一种解决方法比另一种可行，那它就是好的，他总把最小的祸当作福。他自有道理，这毋庸置疑，可我似乎还未彻底消除我那些绝对化的旧梦：这满足不了我的愿望。继而，前途在我眼里显得十分遥远，我难以对尚未降生于世的后人发生兴趣，我更渴望救助眼下那些尚活着的人。为此，这救生的职业一直诱惑着我。噢！我从未想过可以从外界给某人带来预先设计的希望。但是，使人们失去幸福的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要帮助人们从中解脱出来。罗贝尔给了我鼓励，在这方面，他与正统的共产党人有着区别，他认为在资

本主义社会里精神分析的运用有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也许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仍能发挥其作用。他甚至觉得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重新考虑传统的精神分析是一项令人神往的工作。事实上，这确实激起了我的热情。我的日子与在我身边旋转的地球一样充实。每日清晨，都伴随着头一日清晨的欢乐；每日夜晚，我心头重又觉得充盈着各式各样的新鲜事。年仅二十岁，就从心爱的人手中获得一个世界，这是多好的运气！在这个世界中赢得应有的位置，这又是多好的福气！罗贝尔也成功地完成了关键的一步：他使我免于孤独，却没有剥夺我的清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我有自己的友情、自己的乐趣、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忧虑。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沉浸在某人怀抱的温情之中消受夜晚，或像今天一样，如同少女似的独处闺房，度过黑夜。我望着墙壁，望着门扉下的光线：我曾多少次感受到这份甜蜜，我沉睡着，而他就在我声音可及的地方工作。早在很多年前，我们之间的欲望就已经衰退，可是我们如此紧密相连，躯体的结合已经无关紧要，放弃这种结合，我们并不会因此失去什么。我仿佛觉得这是战前的某个夜晚，这种令我夜不能寐的焦虑心情并不是新添的。世界的前途往往漆黑一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死神为何又来游荡？它继续在徘徊，到底是为什么？

多么固执的荒诞！我感到耻辱。这整整四年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坚信战后我们将重新寻回战前的时光。就在刚才我还对波尔说：“现在，又重新与过去一样了。”现在，我又试图告诉自己：“过去，与现在完全一样。”可是，并不一样，我是在撒谎：不像过去，从今之后将永远不再像过去。以前，即使最令人担忧的危险，我也胸有成竹，肯定能从中解脱出来，罗贝尔必定能摆脱危险，他的命运给我

保证了世界的命运，反之亦然。可是，现在有着那么一个痛苦的过去，怎能还对未来充满信心？迪埃戈死了，死去的人太多了，丑恶又回到世间，幸福一词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的四周，重又是混沌一片。也许世界最终能摆脱危机，可要等到何日？两三个世纪，这太漫长了，属于我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万一罗贝尔的一生在失败、怀疑与绝望中结束，那这一切再也无可挽回。

他在工作间里轻轻走动，他在阅读，在思索，在制订计划。他会成功吗？要不然，后果如何？没有必要往最坏处想，谁也没有把我们吃掉，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再属于我们的历史中瞎撞。罗贝尔已经沦落到一个被动的见证人的角色，他将如何了却自己的一生？我知道革命对他已经铭心刻骨到何种程度，革命是他心中的绝对存在。他的青年时代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是在昏暗的小屋子里长大的，从小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那漫长的岁月中，社会主义是他唯一的希望。他信仰社会主义，并非因为宽厚，也并非逻辑使然，而是出于需要。成为一个男子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像他父亲一样当一个活动家。尽管他经历了一九一四年的极端的失望，继而在图尔代表大会<sup>[6]</sup>两年后与加香<sup>[7]</sup>分道扬镳，而自己又无能为力，难以在社会党人中重新激起昔日的革命热情。但这一切远没有使他脱离政治，他一有机会，就重又投入政治活动，眼下，他比任何时刻都充满激情。为了让自己放心，我暗暗对自己说，创作源泉永不会枯竭的。我们婚后的那几年里，他没有从事别的活动，创作极丰，并自得其乐。或是，他首先是个作家吗？我尽量让自己这么想，直至今天夜里。我还从来没有胆量窥听他内心独自的对话，我再也不对我们的过去那么自信了。他之所

以那么快就希望要个孩子，无疑是因为我不足以充分证明他的存在，或许他是在寻找一种报复，以回报他再也控制不了的未来。对，这一做父亲的欲望在我看来很说明问题。我们去布律埃旅行的凄惨气氛也意味深长。我们漫步在布满他儿时足迹的大街小巷，他领我看了他父亲执教的学校和他九岁时在里面聆听饶勒斯讲话的那座昏暗、低矮的房子；他向我讲述了他初次接触日常的烦恼和毫无希望的工作时的情景；他讲得太快了，咬词也太过分，可突然，他颇带不安地说：“一切都未改变，可我却在写小说。”我只想把这看作是一时的冲动，罗贝尔生就性格开朗，我很难想象他会产生严肃的怀旧之情。可是，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之后，他整整一个时期，忙于组织警觉委员会。我发现他完全可以更开心些，我不得不承认事实：从前，他是在勉强地控制自己。他一旦感到无能为力，陷入孤独的境地，那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写作，更是如此。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他一边拼命强压心中的烦躁，一边写作。是的，情况正是这样。可与从前迥然不同，他仍然与共产党人和某些社会党人保持联系，对工人的统一和最终的胜利存有希望。我清楚地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饶勒斯的那句话：“未来的人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最富于生命力的人。”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建设未来，未来的人一定会阅读，正因为如此，他才勤于写作。面临一个死路一条的未来，这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假若他的同代人再也不听从他的话，假若后代再也不理解他，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沉默。

那该怎么办？他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沦为渣滓的活人，这真可怕，可还有更坏的命运，那便是舌如打结，不能讲话。那还不如干脆死了为好。我难道会有巴不得罗贝尔死去的那一天吗？不会的，这

难以想象。他已经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可每次总是化险为夷，他一定会摆脱困境的。我不知会以什么方式，可他一定会寻找到某种东西，比如，他哪一天会登记加入共产党，这并非不可能；当然，眼下他还未想到这一步，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抨击得太猛烈了。可是，假设他们的路线发生了变化，假设除了共产党人再也不存在任何统一的左派，那么，我想罗贝尔也许不会继续无所活动，也许最终会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我不喜欢这种打算，要他屈从于他持有异议的命令，这对他来说比任何人都更痛苦。至于采取何种策略，他自有考虑。尽管他尝试着奉行犬儒主义<sup>[8]</sup>，可我完全清楚他将永远忠实于他从前的道德观。别人的理想主义总令他发笑，他有着自己的主义，共产党人的某些手段，他是绝对不能苟同的。不，这一解决方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差别太多了，他的人道主义与他们的并非同一回事。要是这样，他不但再也写不出任何真情实感的东西，而且将被迫否认他的整个过去。

“那活该！”他一定会这么对我说。刚才他还说：“多一部少一部书，这无关紧要。”可他真的是这么想吗？我对书向来十分看重，也许看得太重了。我年轻时，喜爱书胜于真实的世界，书对我至今还留下某种影响，书为我保留了一种美好的永恒的情趣。真的，我对罗贝尔的作品如此动情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是他的作品死亡了，那我们俩又将难以摆脱灭亡的命运，未来只不过是一座坟墓罢了。罗贝尔并不这样看待事物，可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忘我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十分希冀身后留下名声，这名声对许多人来说具有深长的意味。再说，写



作，是他在世上最热爱的东西，是他的欢乐，他的需要，是他的生命所在。放弃写作无异于自杀。

那么，他也只得逆来顺受，别人让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其他作家就是这样做的。那是其他人，罗贝尔绝对不会。我最多只能设想他违心地行动，可写作，完全是另一码事，若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心声，那笔就会从他手中自动掉落。

啊！我看到了，那条死胡同。罗贝尔牢牢地坚持某些想法，我们在战前坚信这些想法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他的整个一生，既执著于丰富他的思想，又致力于让这些思想变为现实，假设这一切永远都不能发生，那又将怎样？罗贝尔始终捍卫人道主义，可要是决议违背了他的意愿被通过，罗贝尔能怎么办？倘若他帮助建设的是一个与他信奉的各种道德标准对立的未来，他的行动就是荒谬的。但是，若他执著地维护某些永远不可能在世间降临的道德观念，那他就成了一个迂腐的空想家，而他最不主张的就是成为一个类似的人。不，如果有此种结局，那别无选择，不管怎样，只能是失败、束手无策，而这对罗贝尔来说无异于活活死去。正因为如此，罗贝尔才充满如此强烈的激情投入斗争。他告诉我局势给他提供了他等待了整整一辈子的机遇，这我同意；可其中也暗藏着比他经历过的要更为严重的危险，对此，他自己也清楚。真的，我敢肯定，我刚才所思忖的一切，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思量前途对他来说也许是座坟墓，他将像罗莎和迪埃戈一样葬身其间，不留任何痕迹，其结局甚或更糟；也许未来的人们会把他视为落伍者、笨蛋，视为故弄玄虚的家伙，不是无用就是有罪，纯粹是一堆废物。也许可能有那么一天，他试图用他们这种残酷的眼睛来审视自己，那么，他必定在绝望中了却一生。绝望无援的罗贝

尔，这不啻是个悲剧，比死亡本身还要难以承受。我宁愿自己去死，宁愿他去死，也不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不。明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清晨醒来，眼前始终将笼罩着如此巨大的威胁，对此，我无法忍受。但是，纵然我上百遍地呼喊“不，不，不”也无济于事。明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我醒来时，将面临这一威胁。如果是一种信念，那至少可以带着它死去，然而这种无穷无尽的恐惧，日后将不得不经受它的煎熬。

---

[1] 旧法郎，100旧法郎合1新法郎。

[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奸组织的治安部队。

[3] Oedipu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杀父娶母。俄狄浦斯情结引申指恋母或恋父情结。

[4]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在宗教或道德上极端拘谨，严格奉行十诫。

[5] 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政治活动家、作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人道报》创办人之一。

[6] 法国社会党于1920年12月25日至31日在图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拥戴者分成两派，彻底决裂。

[7] Marcel Cachin（1869—1958），法国政治活动家，曾任《人道报》编辑部主任，法共政治局委员。

[8] 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哲学流派。

## 第二章

翌日清晨，广播证实了德军溃败的消息。“和平真的开始了。”亨利上桌时对自己重复说道。“这下我终于可以写作了！”他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天天写作。”可到底写些什么？他并不清楚，但为之而庆幸，过去他的目的太明确了。这一次，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在事先毫无考虑的情况下与读者倾心交谈，就像给一位友人写信。他也许能成功地向人们讲述在他过去结构过分讲究的作品中从无一席之地的各种事物。人们希望用词语挽留的东西何其多，可它们却都一一失去了！他抬起头，透过窗户仰望冷酷的苍穹。一想到这个上午又要流逝而去，真令人惋惜。这天上午，一切都显得那么珍贵：白纸、酒香和冷却的烟味以及从附近的咖啡馆传出的阿拉伯音乐。巴黎圣母院如同苍天一样冷漠，一个流浪汉在小巷间狂舞，脖子上挂着饰有蓝色鸡毛的大项圈，两个身着节日盛装的姑娘笑嘻嘻地看着他。今天是圣诞节，是德国溃败的日子，某种东西重又开始出现了。在这整整四个年头，他让那一个个清晨、一个个夜晚从自己的指间白白流失了。现在，他要付出三十个春秋，努力把它们追寻回来。人不能倾吐胸中的一切，这不错，但总可以设法表达自己生活的真正乐趣；各人的生活自有各自独特的情趣，这就需要吐露，不然也就没有必要用笔去“倾诉我过去和现在所热爱的一切，谈谈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画了一束花。他到底是谁？消失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后，他变成怎样一个人？

从内心去描绘自己的特征、去界定自身，谈何容易。他不是个政治狂，也不是个写作迷，也不是什么伟大的热血男儿。确切地说，他感到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说到底，他并不为此感到不好意思。一个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真诚地谈论自己，这有什么不好？他要以芸芸众生的名义，为芸芸众生说话。真诚：这是他本应追求的唯一独到之处，是他必须遵循的唯一要求。他在花束上又添了一朵鲜花。要做到真诚，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并不打算自我忏悔。俗话说，凡小说都是谎言。啊！他以后倒要看看这话是真是假。眼下，尤其不能让问题捆住手脚；信步漫游，随便怎么迈开第一步：比如就从月光下的瓦德花园开始信步走去。空空的白纸，必须加以利用。

“你那部欢快的小说已经开始动笔了吗？”波尔问。

“我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我准备让自己也大吃一惊呢。”他哈哈大笑说。

波尔耸耸肩膀。可这也是真话。他不愿知道，他在纸上胡乱地固定下了他生活中许许多多阶段，从而享受到了莫大的乐趣，除此之外，他别无奢求。晚上，要去与纳迪娜约会，他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可他告诉波尔，他要与斯克利亚西纳一起出门。近一年来，他学会了对自己的坦诚有所保留；“我和纳迪娜外出”这简简单单几个字说不定会挑起一系列的问题，招来种种飞短流长，所以，他宁肯说点别的原因。不过，这位姑娘一直被他当作侄女对待，而且她又不讨人喜爱，与她出门都要瞒着，确实荒谬。当初鬼使神差，竟与她相约，更是不可思议。他推开红酒吧的门，走到餐桌边，纳迪娜早已在拉舒姆和樊尚中间坐定。

“今天没有争吵吧？”

“没有。”樊尚气恼地说。

年轻人一起挤到这家窄小的红酒吧，与其说为了朋友之间欢聚一番，倒不如说是为了与政敌交锋。他们各自代表着各家各派。亨利经常到这里来呆上一刻，他多么想坐下来和拉舒姆以及樊尚一边随便聊聊，一边看看店中的客人，可是纳迪娜却马上站起身来。

“您带我去吃晚饭？”

“我正是为此而来。”

门外，一片漆黑，人行道上积满了冰冻的污泥。他到底该怎么打发纳迪娜？他开口问道：“您愿意上哪儿？去意大利人餐馆？”

“去意大利人餐馆。”

她并不让人扫兴，她任他挑选餐桌，跟他一样要了一份甜椒和一份杂烩仔牛肉。不管亨利说些什么，她全都表示赞同，满脸喜色，亨利顿起疑窦。实际上，她没有听他说话，而是面对着碟子微笑，还一边在忙而不乱地吃着。亨利突然中断了话声，她似乎毫无察觉。待她把最后一口咽下了肚，她一张手，擦了擦嘴巴：

“现在，您领我去哪里？”

“您不喜欢爵士音乐，也不爱跳舞？”

“不喜欢。”

“咱们可以去北回归线咖啡馆试试。”

“那儿好玩吗？”

“好玩的夜总会您见得多了。在北回归线咖啡馆，交谈交谈可不好。”

她耸了耸肩膀：“要交谈，地铁的板凳就很好。”接着，她脸上露出喜悦：“有几家馆子，我特别喜欢，那里可以观看赤身裸体的女人。”

“不可能吧？您觉得这玩意儿有趣？”

“噢！是的，土耳其人浴室就更有趣了。不过，有歌舞演出的小酒店也不差。”

“您莫非有点中邪了吧？”亨利笑着说。

“可能。”她冷冷地回答道，“那您有什么更好玩的？”

由一位既不是处女又没有出嫁的大姑娘陪伴观看裸体女人，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有伤大雅的了；可是，亨利要负责让她开心，又缺乏想象力。他们来到了阿斯塔特酒家坐下，面前放着一只香槟酒桶，店堂里还是空空荡荡的，舞女们围着吧台在聊天。纳迪娜仔细地打量了她们一番。

“要是我是个男人，我每天晚上都带个漂亮的女人来，一天换一个。”

“每晚都来，一天换一个，可最终还不是都一个样。”

“绝对不会。那位可爱的棕发女郎和那位挺着那么漂亮的假乳房、一头棕红发的女人，虽然都穿着裙服，可完全不是一个味儿。”她用掌心托着下巴，打量了亨利一眼，“您和女人玩不开心吗？”

“像这样，不开心。”

“那要怎样？”

“呃，要是她们漂亮，我特别喜欢看着她们，和她们跳舞，或聊聊天。”

“要聊天，还是跟男人聊好。”纳迪娜说，她的目光变得布满疑云，“说来说去，您邀请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漂亮，舞跳得很糟，也不会聊天。”

他微微笑道：“您记不得了？您责怪我从不请您。”

“每次有人责怪您哪件事没有做，您都会去做吗？”

“那您为什么接受了我的邀请？”亨利反问道。

她向亨利溜了一眼，这目光是那么毫不掩饰地富于挑逗性，不禁使他感到惊慌：难道真的如同波尔所说，纳迪娜每见到一个男子都无法不委身于他？

“决不应该拒绝任何邀请。”她一副教训人似的口气说道。

她一时默不作声，搅动着香槟。接着两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起来，不过纳迪娜时不时故意保持缄默，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亨利，脸上露出一副惊诧莫名的怪嗔神情。“我总不能玩弄她吧？”他暗自思忖。她只不过惹起他几分欢心，亨利对她了解极了，要玩她再容易不过。可一想到迪布勒伊夫妇，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他想方设法打破沉默，可有两次，纳迪娜竟然故意打起呵欠来。他也觉得时间是那么漫长。几对男女在跳舞，大多是美国汉子和一些姑娘，还有一两对假冒的外省夫妇。他决定等舞女们一表演完节目就马上离去。当他终于看见她们登台表演时，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总共有六位舞女，她们戴着胸罩，穿着饰以闪光片的三角裤，头顶法兰西和美利坚合众国国旗色彩的大礼帽。她们跳得不好也不差，长得也不过分丑。这个节目毫无意思，根本激不起欢笑，可纳迪娜为何一副如此欣喜的神态？当舞女们脱去胸罩，露出涂着石蜡的乳房时，她用心不善地瞥了亨利一眼：



“哪一位您最喜欢？”

“她们都一个样。”

“左边那位金发女郎，您不觉得她的小肚脐长得挺迷人？”

“可一副十分可悲的面孔。”

纳迪娜不再做声，她用显出几分腻烦的行家目光细细打量着舞女。当她们终于一手挥舞着三角裤，另一只手用三色大礼帽紧掩着下身退出场去时，纳迪娜开口问道：

“长着一副漂亮的面孔重要，还是身段优美更重要？”

“要看情况。”

“什么情况？”

“整体，还有口味。”

“从整体上看，按您的口味，我能打几分？”

他轻蔑地盯了她一眼：“两三年以后再告诉您：您还没有长定型呢。”

“死以前，永远不会定型。”她用愠怒的声音说道。她的目光绕着整个舞场到处乱转，最后落到那位面孔可悲的舞女身上。那位舞女走到吧台边坐下，穿着一条黑色的短裙。“她真的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您应该邀她跳舞。”

“并不是这样就会让她很开心的吧。”

“她的伙伴们一个个都有男人陪，她像是个没人要的货似的。那就去请她跳跳吧，这又会费您什么东西？”她陡然激烈地说，紧接着声音温柔地哀求道：“就去跳一次。”

“如果您非要我跳的话。”亨利道。

金发女郎毫无热情地伴他步入舞池。她平平庸庸、傻里傻气，亨利真不明白纳迪娜为何对她感兴趣。说实在的，纳迪娜如此任性，已经开始让他厌烦。当他回到座位在她身边坐下时，她已经满斟两杯香槟，若有所思地望着他。

“您真好。”她说道，两只眼睛向他频送秋波。突然，她淡淡一笑，问道：“当您喝醉了酒，您会变成一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吗？”

“我一醉，就觉得自己特别可笑。”

“那别人会怎么想？”

“当我醉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她指了指酒：“那您就一醉方休吧。”

“喝香槟，我不会醉。”

“您能连喝多少杯不醉？”

“很多杯。”

“三杯以上？”

“那当然。”

她不信地瞅了他一眼：“我倒想开开眼界。您一口气把这两杯酒喝掉，您会一点儿事都没有？”

“一点儿事都没有。”

“那喝吧。”

“为什么？”

“人总是爱吹，必须让他们当面出丑。”

“喝了这酒，您是不是还要我顶着头走路？”亨利问道。

“喝了，您就可以回家睡觉。喝吧，一杯一杯连着喝。”

他干了一杯，感到胃里一翻。她又把另一杯送到他手上。

“有话在先，连着喝。”

他又一干而尽。

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床上，身边是一位一丝不挂的女人，正揪住他的头发，摇晃着他的脑袋。他含混不清地低声问道：“是谁呀？”

“是纳迪娜。醒醒，已经很晚了。”

他睁开眼睛，电灯亮着，这是一间陌生的房间，是旅馆的客房。他回想起了工作室、楼梯，在这之前，他喝香槟酒，现在头痛得厉害。

“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你喝的香槟酒掺了七十度的烧酒。”纳迪娜朗声大笑道。

“你偷着往香槟里掺了烧酒？”

“掺了点儿！跟美国汉子在一起时，若我要让他们醉，我常用这一手。”她淡淡一笑，“这是捉弄你的唯一办法。”

“你捉弄了我？”

“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他一抓脑瓜：“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噢！没有什么关系。”

她跳下床，从提包里拿出一把梳子，赤条条地站在大衣橱镜前，开始梳理起来。她的躯体多么富有青春气息！他难道真的紧搂了这个肩臂丰腴、乳房富有弹性的身躯？她蓦然发现了他的目光：“别这样看着我！”她一把抓起连衫衬裙，慌忙往身上套。

“你太漂亮了！”

“别说蠢话！”她声音傲慢地说。

“你为什么要套上衣服？来呀。”

她摇了摇头。他有点忐忑不安地说：“你有什么责怪我的吗？我醉了，你知道。”

她走回床榻，吻了吻亨利的面颊：“你刚才很可爱。可我不乐意再来一次。”她又走开去，并补充道：“同一天里不能再来了。”

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这实在令人恼火。她套上了短袜，亨利赤裸裸地躺在被窝里，感到很不自在：“我要起床了，请你把身子转过去。”

“你要我转过脸去？”

“请你。”

她脸冲着墙，背着手，像个受罚的小学生似的站在一角。她遂用含讥带讽的声音问道：“这还不行吗？”

“行了。”他扣了裤带回答道。

她一副挑剔的神情细细打量着他：“你什么事都搞得那么复杂！”

“我？”

“让你上个床、起个床，你都那么多麻烦事。”

“你弄得我头痛极了！”亨利说。

他为她不愿再来一次感到遗憾。她身段柔美，真是怪姑娘。

他俩来到了蒙巴纳斯车站旁边那家早早开门的比亚尔小咖啡店。就座后，面前摆着冒牌的咖啡。他开心地问道：“说到底，你为什么非要和我睡觉？”

“认识一下。”

“你都像这样结识他人？”

“一旦跟某人睡了觉，就消除了拘束，两人在一起比以前就更自在了，不是吗？”

“拘束消除了。”亨利笑着说，“可你为什么这么乐意跟我交往？”

“我希望你觉得我挺可爱。”

“我觉得你很可爱。”

她带着一副既狡黠又尴尬的神情看了看他：“我希望你觉得我挺可爱的，可以领我去葡萄牙。”

“啊，原来如此！”他把手放在纳迪娜的胳膊上，“我已经跟你说过，这根本不可能。”

“是由于波尔的缘故？可既然她不跟你一块儿走，我完全可以去。”

“不行，你不能去，我会让她感到很伤心的。”

“别告诉她就是了。”

“那可要撒大谎了。”他淡然一笑，“何况她总会知道的。”

“那么，为了避免造成她痛苦，你就让我失去我那么渴望的东西？”

“你真的那么渴望？”

“一个阳光充足、有吃有喝的国度，我恨不得让自己的灵魂能去那儿安息。”

“你在战争期间挨饿了吧？”

“瞧你说的！要知道找吃的，妈妈可真了不起；她常骑自行车行程八十公里，给我们弄回一公斤蘑菇或一块变质的肉。尽管如此，仍免不了要挨饿。当我结识的第一个美国人把他那份食物连同盒子一起往我怀里塞时，我简直都疯了。”

“正是为此你才那么喜欢美国人？”

“真的。再说，开始时我觉得挺好玩。”她耸肩，“现在，他们组织得太严密了，再也没有什么意思。巴黎重又变得阴森森的。”她以一副苦苦哀求的神情望着亨利，“带我走吧。”

他真想能给她这一乐趣。给一个人以真正的幸福，是多么让人宽慰！可又怎能让波尔承受这一切？

“你已经有过不少风流事，”纳迪娜说话，“波尔还不是忍了。”

“谁告诉你的？”

纳迪娜狡黠地一笑：“女人之间谈起自己的感情生活，那才带劲呢。”

确实，亨利曾向波尔招认了几次不忠的行为，她都原谅了，并对此表现出不屑一顾。可是今天，难就难在要说出外出的原因，这势必要逼他说假话，永远也解释不清。他再也不愿这样做。要么冷酷无情，干脆要求得到自己的行动自由，可他又勇气不足。

他喃喃地说：

“外出旅行一个月，那可不一样。”

“可一回来就可以分开嘛。我才不愿意把你从波尔手中夺走呢！”纳迪娜放肆地笑着说，“我只是想出游，仅此而已。”

亨利犹豫不决。和一位冲着他微笑的女人一起漫步在陌生的街巷，双双坐在露天咖啡座上；夜晚又在旅馆的客房里拥抱她那富于青春活力的热乎乎的躯体，这一切确实诱人。再说，既然他已经下定决心与波尔分道扬镳，再踌躇等待又有何益？时间消除不了任何隔阂，往往适得其反。

“听我说，”他说道，“我不能给你许任何诺言，要记住这绝不是诺言；可我尽量去和波尔商量商量，要是我觉得带你一起走有可能的话，那么，就答应你。”

## 二

我泄气地望着那幅小油画。两个月前，我吩咐孩子“画座房子”，他却画了一座别墅，有屋顶、烟囱，还冒着青烟，可不见一扇窗户、一扇门扉，四周围着高高的黑栅栏，铁栏杆尖尖的。“现在，画一家人吧”，他于是画了一个男子，手上牵着一个小孩。今天他又涂了一座没有门扉、围着锋利漆黑的铁栏杆的房子，我们闯不进去。难道这是一个特别难以诊治的顽症？还是我不善医治？我把画放进了病历。是我不会还是不愿？孩子的逆反行为也许恰好反映了我自身感觉到的逆反心理：两年前在达豪集中营丧命的那位陌生人，要把他从他儿子的心中抹去，这不禁使我心悸。我暗自思忖：“那我应该放弃这一疗法。”我呆呆地立在办公桌旁。眼下还有两小时，也许抓紧时间可以把病案记录整理完毕。可我还下不了决心。当然，我总是给自己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医治，往往就是损毁。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个人的心理平衡又算得了什么？但是，我却始终激情洋溢，热心于给每一个病例寻找答案。我的目的不在于给病人提供一种内心虚假的慰藉，如果我想设法帮助他们摆脱心中的幻梦，那是为了能使他们获得正视现实世界中各种真正的问题的能力。我每获得一次成功，就觉得完成了一项有益的工作。任务是多么巨大，它需要大家的合作，而这正是我昨天所思虑的。但是这就意味着每个明智的人在使人类走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都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我却再也不相信会达到这一美好



的和谐。未来抛弃了我们，无需我们的参与，倘若只限于现实而言，那么即使小菲尔南变得像其他所有孩子一样开心、顽皮，又有何益呢？“我简直像是在纺质量极其低劣的棉纱。情况不妙。”我暗自思忖，“要是这样下去，最后只有把诊所关了。”我走到浴室，端出了一盆水，拿了一大把旧报纸，蹲在壁炉前，炉子里毫无生气地燃着纸团子。我把废报纸用水打湿，动手揉成一团团。对此类活儿，我不像过去那样厌恶了，有纳迪娜的帮助，加上女门房有时也帮我一把，整个家我拾掇得还算过得去。当我揉着这些旧报纸时，我至少肯定自己是在做某件有益的事情。令人烦恼的是这用的仅仅是我的双手。我终于做到了再也不想小菲尔南，再也不考虑我的职业。可仍然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我脑中又像唱片似的猛烈旋转：“在斯塔沃格<sup>[1]</sup>，被纳粹褐衫队残害的儿童不计其数，连收葬他们的棺材都不够了……”我们，我们总算幸免于难，可别处遭受了灾祸。人们匆忙藏起国旗，纷纷把武器扔入水中，男的夺门外逃，女的死守家门，任凭雨水拍打的街巷里，传来声嘶力竭的叫喊声；这一次，他们不再以宽宏大度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而是怀着刻骨仇恨，杀气腾腾地扑来。他们终于走了，可欢乐的村寨焦土一片，孩子们的尸骨如山。

一股寒流使我浑身战栗，纳迪娜猛地打开了门，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叫我帮你一把？”

“我以为你在穿衣服呢。”

“我早就穿好衣服了。”她蹲在我的身旁，手中捏着一份报纸。“你害怕我不会？可我总还是能干的。”

实际上她笨手笨脚的，报纸总是打得太湿，搓得不够紧。可尽管这样，我还是应该喊她来的。我细细看了她一眼。

“让我来帮你打扮一下吧。”我说。

“给谁看？给朗贝尔？”

我到自己的衣橱里找出了一块披巾和一枚古老的首饰别针，把一双薄底浅口皮鞋递给她。这双鞋子是一位自觉已经康复的女病人送给我的礼物。纳迪娜犹豫了一下：

“可你今晚要出门，你到时穿什么？”

“谁也不会再看我的脚了。”我笑着回答。

她接过皮鞋，咕噜了一声：“谢谢！”

我真想回答一声：“没什么！”我的体贴和慷慨往往惹得她不高兴，因为她并不真心感激我，恰恰相反，她在心底里责怪我这样做。我感觉到她在感激与怀疑之间左右摇摆，她毛手毛脚地揉着纸团。她生疑是有道理的。在我惯用的手段中，忠诚与大方实际上最不公平道。我想方设法要消除她的痛苦，可结果总是让她感到理亏。她痛苦，是因为迪埃戈死了，是因为她没有节日裙服，是因为她笑得不美，由于心情忧郁而变丑了。她痛苦，是因为我不善于让她服从我，是因为我爱她爱得不够。也许不像恩赐似的待她，免得她无所适从，这样做更合适。要是我把她抱在怀里对她说“我可怜的小姑娘，原谅我没有更爱你”，我也许能给她安慰。要是我把她抱在怀里，也许我心底能筑起防线，不再怀念那些没有葬身之地的小孩尸体。

她抬起头：“关于当秘书的事，你又跟爸爸商量了吗？”

“前天以来，一直没有再谈。”我连忙又补充说，“杂志四月份才出刊，有的是时间。”

“可我急需知道我该怎么办。”纳迪娜说，接着往火里扔了个纸团，“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反对。”

“他已经对你说过了，他觉得你准会浪费了自己的光阴。”可是，我觉得寻找一个职业，承担大人的责任，这对纳迪娜有好处，但是罗贝尔想得更高更远。

“可是学化学，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她一耸肩膀说道。

“谁也不强迫你学化学。”

纳迪娜当初选择化学，是为了与我们斗气，没想到她吃尽了化学的苦头。

“化学并不让我厌烦，”她说，“烦人的是当学生。爸爸根本没有意识到：与你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相比，我比你老练多了，我想做点真正的事情。”

“你完全知道我是同意的。”我说，“请你放心，要是你父亲见你死不改变主意，他最后总会点头同意的。”

“他会说同意，可我知道他到时会拿出什么腔调！”纳迪娜一副赌气的样子说道。

“我们一定能把他说服。”我说，“你知道，要是我是你的话，我该会怎么做：我这就马上开始学打字。”

“马上学，我不行。”她犹豫了片刻，接着带着几分挑衅的神情盯着我，“亨利要领我跟他一起去葡萄牙。”

我一时慌了手脚。“这是你们昨天决定的事？”我用一种很难掩饰我内心不悦的声音问道。

“我早就决定了。”纳迪娜回答道，继又咄咄逼人地问道：“你肯定会骂我吧？你准会为了波尔责骂我吧？”

我在手中搓着一个湿纸团：“我觉得你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痛苦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

“说来也是。”

我再没有多说，我知道我缄默不语会惹她生气。她本来需要有人给她出主意，可她不由分说，一概拒绝，这样做的确也让我恼怒。她要的是我有话干脆明说，可是我却讨厌干涉她的私事。我还是鼓了鼓勇气说道：“亨利并不爱你，他眼下没有心思去爱……”

“那朗贝尔，他就那么傻，会娶我？”她抱有敌意地反问道。

“我从来没有逼你结婚，可朗贝尔爱你是事实。”

她打断了我的话：“首先，他并不爱我；他连让我跟他睡觉这样的要求都从来没有提过，甚至在圣诞前夜，我主动向他表示，他也不答理，气得我直跳。”

“因为他期望从你身上得到的是别的东西。”

“要是我不惹他喜欢，那是他的事；再说，我理解他已经有过像罗莎那样的姑娘，难呀。我请你相信我根本无所谓。只是不要老缠着我说他爱上了我。”纳迪娜声音越说越激动。我一耸肩膀。

“你愿意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好了！”我说，“我任你自由，你还有什么要求？”

她轻轻咳了一声，当她惶恐不安的时候往往这副样子。“亨利和我之间只不过是一起玩玩。回来后就分手。”

“坦率地说，纳迪娜，你真这么想？”

“真的，我真这么想。”她过分自信地回答道。

“可等你跟亨利呆了一个月以后，你就会迷上他的。”

“绝对不会。”她的两只眸子里又闪现出挑衅的目光，“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昨天跟他睡觉了。可我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

我移开了眼睛，我实在不愿知道。我没有表露出窘迫的样子，说道：“这不说明问题。我有十分把握，等你们回来后，你一定会想抓住他不松手，可是他肯定不乐意。”

“到时瞧吧。”她说。

“啊！你承认了，你希望抓住他不放。可你错了，目前他所希望的，是获得他的自由。”

“这就要赌一场了：我觉得这挺好玩的。”

“盘算、耍手腕、窥伺、等待，你觉得这好玩！可你连爱都不爱他！”

“也许我是不爱他。”她说，“可我需要他。”

她朝壁炉里扔了一大把纸团。

“跟他在一起，我能生活下去，你理解吗？”

“要生活下去，用不着任何人。”我不快地说。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你把这就叫做生活！说实在的，我可怜的妈妈，你以为你过的是生活？跟爸爸一谈就是半天，剩下的半天跟那些疯疯癫癫的人打交道，你说这就叫生活！”她站起身子，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用激怒的声音继续说道：“我有时也免不了干蠢事，这我不说。可我宁愿在窑子里了却一生，也不肯戴着冰冷的山羊皮手套，独自逍遥地过日子：你那双手套，总也不脱。你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给人出主意，可你对人到底有何了解？我完全可以肯定，你从没有用镜子照照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噩梦。”

每当她理亏或对自己感到怀疑时，她总是采取这种对我进行攻击的策略；我没有答理一声，她朝房门走去。跨到门口时，她猛地止步，声音较为平静地问道：

“你等会儿来跟我们一起喝杯茶好吗？”

“你到时喊我一声就是了。”

我站起身，点了一支烟。我能怎么办？我再也不敢过问什么了。当她开始寻觅迪埃戈，继而到处厮混、躲避迪埃戈时，我曾试图插手；可是，纳迪娜突然发现了不幸，打击太猛烈了，她因此而愤恨、绝望，陷入歧途，越走越远，再也无法控制住她，只要我设法跟她谈谈，她马上就堵起耳朵，大喊大叫地逃出家门，直到拂晓时才回家。在我的一再要求之下，罗贝尔才开始开导她，那天晚上，她没有出门去找那位美国上尉，一直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可第二天，她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句话：“我走了。”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又是一夜过去了。罗贝尔四处找她，我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多么可怕的等待！清晨四时许，蒙巴纳斯的一位酒吧招待打来了电话。我赶去后，发现纳迪娜躺在酒吧的一张长凳上，醉得不省人事，一只眼睛又青又肿。“就由她去吧，千万不能跟她对着干。”罗贝尔劝我说。我别无选择。倘若我继续再对抗下去，纳迪娜说不定会开始忌恨我，故意嘲弄我。可是她心里明白，我让步是违心的，实际上是在责备她：她因此对我耿耿于怀。也许她没有全错，要是我当初给她更多的爱，我们俩的关系可能不至于像今天的这个样子：也许我能有办法不让她过这种为我所指责的生活。我久久地伫立着，双眼望着火苗，心里反复说道：“我爱她爱得不够。”

我当初并没有盼她降生于世，是罗贝尔迫不及待地希望有个孩子。我怨恨纳迪娜妨碍了我和罗贝尔之间的倾心交谈。我爱罗贝尔爱得太深了，而对我自己不够在意，当我从这个闯入世间的小丫头身上发现罗贝尔或我的相貌时，并没有因此而激起我的母爱。我无所谓地看着她的蓝眼睛、头发和鼻子。我尽量不斥责她，可她感觉到了我的缄默和保留态度：她从小就对我疑心。任何一位小姑娘都无法与她相比，她是那样拼命地要战胜对手，去占据她在父亲心中的位置。她不甘心于跟我同类，当我向她解释她很快就要来初潮，并说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她恐慌不安地细听着我的话，而后竟把她那心爱的花瓶在地上砸了个粉碎。初潮来后，她火气如此之大，以致整整十八个月没有行经。迪埃戈的出现，在我们之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气氛：她终于获得了非她莫属的珍宝，感到已经跟我平起平坐，我们母女间因此而产生了情爱。可是后来，一切变得更糟了，如今，是糟上加糟。

“妈妈。”

纳迪娜在喊我。我顺着走廊走去，心里在想：我要是呆得太久，她会说我独占了她的朋友；可要是走得太急，她会以为我瞧不起他们。我推开门，里面有朗贝尔、塞泽纳克、樊尚、拉舒姆；没有一个女的，纳迪娜从来就没有一个女友。他们围着取暖电炉在喝着美国咖啡，她递给我一杯黑乎乎的、呛人的东西。

“尚塞尔被打死了。”她突然说。

我并不怎么熟悉尚塞尔，可是十天前，我亲眼看他与别的人围着圣诞树欢笑。罗贝尔也许说得有理，生者与死者之间并不存在多少距离。然而，这些正在默默无语地喝着咖啡的未来的死者却一副羞愧的

神色，像我一样为如此活在世间感到耻辱。塞泽纳克无神的眼睛比平日更加呆滞，俨然一个动了大脑切除手术的兰波。我开口问道：

“怎么回事？”

“什么也不清楚。”塞泽纳克回答说，“他兄弟收到了一封短信，说他死在了战场上。”

“他不会故意寻死吧？”

塞泽纳克耸了耸肩膀：“也许是。”

“也有可能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樊尚说，“我们那些将军们才不怜惜人命呢，他们简直就是些大军阀。”

在他那张苍白的脸庞中间，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两个伤口，而他的嘴巴又酷似一条刀疤，乍一看，谁能想象得出他本长着一副端正、清秀的五官。与他恰恰相反，拉舒姆的面孔俨然一块任凭海流拍击的崖石，格外平静。

“事关荣辱！”他说，“若还坚持耍伟大强国的威风，那我们必定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替死鬼。”

“噢，瞧你说的，缴了法国内地军的枪，这并不坏。不过要是能悄悄地解决，这样对那些先生也许更合适。”樊尚说道，那条张开的“刀疤”挂着一丝微笑。

“你又在影射什么东西？”朗贝尔两眼直盯着樊尚，厉声地问道，“戴高乐给德·拉特爾下达了清除所有共产党人的命令？要是你指的是这个，那就明说吧，至少要有胆量说呀！”

“根本无需命令。”樊尚说，“他们不必细说就心领神会。”

朗贝尔一耸肩膀：“这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也许确有其事。”纳迪娜咄咄逼人地说。



“肯定没有这事。”

“有何证据？”她问道。

“啊！你中计了。”朗贝尔说，“他们胡编乱造出一件事来，然后要你去证明是假的！显然，我不能向你论证尚塞尔不是背部中人一枪死的。”

拉舒姆淡然一笑：“樊尚可没有说这事。”

他们总是这样争辩不休。塞泽纳克保持沉默，樊尚和朗贝尔唇枪舌剑，拉舒姆见有机会便插上一句。一般情况下，他总责备樊尚奉行左派主义，也责怪朗贝尔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严重。纳迪娜全凭自己的情绪，一会儿站在这一方，一会儿又跑到另一方。我避免卷入他们的争吵之中，今天他们吵得比平时更凶，无疑是因为尚塞尔的死使他们或多或少都感到震惊。不管怎样，樊尚和朗贝尔生来就凑合不到一处。朗贝尔一股子少爷气，而樊尚穿着那身羊皮里上衣，加上那副不健康的、狡猾的面孔，更像个无赖：他的眼睛里总藏着一股不太让人心安的东西。可我怎么也无法相信他竟用真的手枪杀过真的人。我每次见到他，总想起这件事，可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也许拉舒姆也杀过人，可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这样他也就不会惹麻烦了。

朗贝尔朝我转过身子：“连跟伙伴们也谈不拢了。”他说，“啊！眼下的巴黎，可不是好玩的。我思忖尚塞尔那样做是否也有道理，我不是说白白去送死，而是去打仗。”

纳迪娜气鼓鼓地盯了他一眼：“你从来就没在巴黎呆过。”

“我呆得够久了，觉得巴黎阴森可怖，可当我在前线转悠时，我又感到不光彩。”

“可你为了当一个战地记者，什么招都使出来了！”她声音刺耳地说。

“我宁愿那样也不愿呆在这里，不过那也只是个权宜之计。”

“噢！要是你在巴黎呆烦了，谁也不留着你。”纳迪娜满脸怒气地说，“听说德·拉特尔就爱漂亮的小伙子，你就去扮演英雄吧，去呀！”

“这也不比玩别的差。”朗贝尔咕嚕道，一边瞪了她一眼，这目光别有所指。

纳迪娜轻蔑地打量了他一番：“到时你成了到处缠着绷带的伟大伤兵，那也不赖。”她冷冷一笑，“只不过别指望我去医院探望你。两个星期后，我就要到葡萄牙去了。”

“去葡萄牙？”

“佩隆带我去，我作为秘书。”她用满不在乎的声调说道。

“噢，他真走运。”朗贝尔说，“他可以独占你整整一个月。”

“不是谁都像你这么讨厌。”纳迪娜说。

“是的，这年头，男人都这么贱。”朗贝尔嘀咕道，“贱得像女人。”

“你真粗野！”纳迪娜说。

我心中恼怒地自问，他们怎么就热衷于这些幼稚的把戏！不过，我相信他们可以相互支撑着重新生活下去，他们也一定能最终消除那些使他们又合又分的记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互相诋毁、攻击，可憎恶的却是自身的不忠。不管怎么说，卷进去是最愚蠢的做法。我任他们争吵下去，离开了屋子。塞泽纳克跟着我来到前厅。

“我能跟您说点事吗？”

“说吧。”

“是求人帮忙的事，”他说，“我想求您帮个忙。”

我回想起了八月二十五日那一天，他肩挎着步枪，系着红绸带，加上他那满脸胡子，一派威武的雄姿，俨然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八四八年革命战士。如今，他那蓝色的眼睛已经死气沉沉，满脸浮肿，跟他握手时，我发现他手心发潮。

“我睡眠不好。”他说，“我……我身上发痛。有一次，一个朋友给了我一盒美铋钠栓剂，我用了疼痛减轻多了。只是药店老板非要处方不可……”

他一副哀求的神情望着我。

“怎么个痛法？”

“噢！浑身痛。头痛。尤其是做噩梦……”

“用美铋钠可治不好噩梦。”

他的额头和双手一样湿乎乎的。

“我把什么都告诉您吧。我有位女朋友，我很爱她，想娶她，可是我……我要是不用美铋钠，跟她什么事都干不了。”

“美铋钠，是以鸦片为主要成分。”我说，“您常用吗？”

他神色惊恐不安：“噢！不，只是我跟吕茜过夜时才用一点儿。”

“那还好。用这类玩意儿，很快就会中毒。”他仍然哀求似的看着我，额头上渗出汗珠。“您明天上午来找我吧，”我说，“我到时看看能不能给您开这张处方。”

我回到房间。可以肯定，他多少已经中毒。他何时开始吸毒的？为什么？我叹息了一声。又是一个，我只得服侍他躺在长沙发上，设法让他倾吐出心中的一切。这些半死不活的人有时累得我精疲力竭。出了门，他们总算能够行走，勉勉强强地扮演大人的角色；可在我这

里，他们重又成了屁股沾满屎星的婴儿，得由我来给他们洗刷掉他们的婴幼儿期。可是，我持的是一种无人称的话语，是理智、健康的话语。这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之所在，我的真正生活也不在这里，我为他们和我自己而感到厌倦，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感到厌倦。“冰冷的山羊皮手套。”纳迪娜这样说我。“冷淡，让人敬畏。”斯克利亚西纳又那样说。难道我在他们眼里就是这个形象？难道我就是这副样子？我回想起了孩提时代的撒野撒娇，回想起了少年时代那颗心的激烈跳动，回想起了那八月时光的狂热亢奋。可是这一切都已经遥远。实际上我内心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在颤动。我用梳子梳理着头发，又修饰了一下面部。人们不能无休止地陷入恐惧之中，不然必定会心力交瘁。再说，罗贝尔已动笔撰写新的作品，心绪甚佳，我也再不深更半夜惊醒，浑身冷汗。可是，我仍然感到一蹶不振。我寻不到任何原因，不知为什么如此忧心忡忡，要么是我感觉不到幸福而伤心。毫无疑问，我过去被宠得太过分了。我拿起手提包，戴上手套，去敲罗贝尔的门。我没有任何心思出门。

“您不会太冷吧？您需要烧点废纸取取暖吗？”

他把扶手椅往后一挪，朝我微微一笑：“我感觉很好。”

这当然。罗贝尔向来感觉很好。那两年，整天萝卜腌酸菜加芜菁甘蓝，他吃得照样津津有味。他从不感觉到冷：仿佛他凭着瑜伽功体内就能造热能似的，有时我深更半夜才回家，他裹着那床苏格兰毛毯，仍然埋头写作，一见我竟会惊诧地发问：“怎么，到底几点了？”关于他那部新作，他只是含含糊糊跟我说了几句，可我感觉得出他颇为得意。我坐了下来。

“纳迪娜刚刚告诉我一个荒唐的消息。”我说，“她要陪佩隆去葡萄牙。”

他猛地向我抬起双眼：“这不遂你心意？”

“是的。佩隆可不是那种要捡便捡，要扔就可以扔的人，她准会迷上他，而且会迷得离谱。”

罗贝尔把手搁在我的手上：“你就不要为纳迪娜犯愁了，首先，要是她能迷上佩隆，那才怪呢。不管怎么说，她很快就会摆脱痛苦的。”

“她总不能一辈子用来摆脱痛苦。”我说道。

罗贝尔哈哈大笑：“真没法子！你女儿像个野小子似的东睡一夜，西睡一夜，总惹你不舒服。可我像她这个年纪时也是这样。”

罗贝尔总是把纳迪娜当男孩子看待。我开口说道：“那可不是一码事。纳迪娜见了男人就抓，换了一个又一个，这是因为她若独自一人，就觉得不是在生活。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听我说，她害怕孤独，这完全可以理解，迪埃戈的事还就在眼前。”

我摇摇头：“并不只因为迪埃戈。”

“我知道，你认为其中有我们的过错。”他以怀疑的口吻说道，继又一耸肩膀，“她会变的，来日方长，她准会变的。”

“但愿如此。”我紧紧地盯着他，“您知道，要是她有个真正感兴趣的工作，这对她至关重要。那个秘书的位置，就给了她吧，她刚才还跟我提这件事呢，她特别喜欢那个工作。”

“可是，那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罗贝尔说，“整日打信封、整理资料，对像她这样聪慧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坑害了她。”

“她那样会感到自己有所用处，这对她无疑是个鼓励。”我说。

“她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她得继续求学。”

“眼下，她需要有所作为，她也许会是个优秀的秘书。”我又补充道，“不能对人要求过高。”

对我来说，罗贝尔的要求总是那么令人振奋，可适得其反，最终使纳迪娜丧失了信心。他从不向纳迪娜发号施令，他相信她，耐心地等待；可她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她小小年纪就阅读了一些过分严肃的书籍，尚未成人就过早地加入大人的交谈。后来，她对这种教育方式感到厌倦，首先拿自己出气，现在又处处让罗贝尔失望，以此进行某种报复。罗贝尔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每当他从我的话语中预感到某种责备，他总是这副神态。

“要是你真的认为这对她合适……”他说，“你比我更了解。”

“我真的认为。”

“那么，行吧。”

他轻易地让了步，这说明纳迪娜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他大失所望。只要再也不能毫无保留地热爱某种东西或从事某项工作，罗贝尔很快就会对它丧失兴趣。“显然，要是能有个职业，她可以因此不依靠我们，这就更好了。”我说。

“可她所需要的并非真正的自立，她是想拿自立当游戏。”罗贝尔冷冷地说。他再也没有兴趣谈论纳迪娜，我自然难以激起他的热情，使他对一个他根本就不赞同的计划提起精神。我不再做声，可他突然气冲冲地说：

“我真不明白佩隆为什么要做这次旅行。”

“他渴望休假。”我说，“对此，我是理解的。我认为他完全有权利去消遣消遣，他做得已经够多了……”我热情地补充了一句。

“他做得比我是多些。”罗贝尔说，“可问题不在此。”他一副蛮横的神态瞅着我，“革命解放联合会要起步，我必须有一份报纸。”

“我知道。”我说，继又犹豫不决地补充道：“我在想……”

“什么？”

“不知亨利是否会把那份报纸让给您，他对那份报纸是那么珍惜。”

“根本就不是叫他把报纸让给我们。”罗贝尔说。

“那是要让他服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指挥。”

“他本来就是其中一员。采取一个明确的纲领，对他大有好处。一份报纸若无政治纲领，就站不住脚。”

“不要政治纲领，这正是他们的思想。”

“你把这叫做思想！”罗贝尔一耸肩膀。

“‘超乎于各派之上，坚持抵抗运动精神！’这类无稽之谈，对那个可怜的吕克来说，确能起点作用。呃，抵抗运动精神，这不禁使我想到洛迦诺公约 [2] 精神。佩隆不会上当而迷信那骗人的灵动桌 [3] 的。我有把握，他最终一定会行动的，只不过需要费点时间等待。”

我害怕罗贝尔到时会给自己搞个措手不及。每当他一心要实现某个计划，他往往把别人当作简单的工具。可是那份报纸，亨利为它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那是他的命根子，他决不会心甘情愿任人强加什么纲领的。

“您为何至今尚未跟他谈？”我问。

“眼下他一心只想着去游逛。”

罗贝尔神色显得如此不悦，我连忙建议道：“想方设法说服他留下。”

为纳迪娜着想，如果亨利放弃这次旅行，正中我下怀；可为了亨利，我又为此而感到遗憾：他是多么渴望能出去走走。

“你对他很了解！”罗贝尔说，“他要是固执起来，那才叫固执呢！我还是等他回来再说为好。”他把毯子往膝盖上一拉，“可不是要赶你走。”他乐呵呵地说，“可平时你最讨厌迟到……”

我站起身：“您说得有理，我得走了。您真的就不愿意去？”

“噢！不！我没有任何欲望去和斯克利亚西纳谈论政治，你嘛，他也许会饶了你。”

“但愿如此。”我说。

在罗贝尔闭门写作的那段时间，我经常没有他陪伴而独自外出。可今天夜里，当我突然陷身于寒冷与黑暗的包围之中，真后悔，不该接受斯克利亚西纳的邀请。噢！我理解自己，我看到的总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对此，我已感到几分厌倦。朋友，我对他们太了解了，整整四年里我们肩并肩生活在一起，这给人以温暖。可如今，我们那亲密的劲儿已经冷却，散发着无益于人的霉味，我终于抵挡不住新的诱惑，让步了。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我也一样，绝无心思去谈论政治。一跨入里茨饭店的门厅，我停下了步子，对着一面镜子，细细地审视了自己一番。要做到衣着寒酸却又不失高雅，本该经常注意拾掇拾掇，可是我宁肯不屑一顾：身穿这件旧大衣，脚套这双木底鞋，我这副模样可真不佳。在好朋友的眼里，我无论如何都还是我；可斯克利亚西纳来自美国，那儿的女人个个都那么喜爱打扮，他准会发现我这双木鞋的。我心里不禁想：“我不该这么随便。”



当然，斯科利亚西纳笑容可掬，不会流露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吻了吻我的手，这是我讨厌的事情，手比面孔还更裸露，有人那么紧贴着去打量，让我好不别扭。

“您喝点什么？”他问道，“来杯马提尼？”

“就喝杯马提尼吧。”

酒吧里挤满了美国军官和衣着时髦的女人，热气、烟味和呛人的金酒味很快渗入我的脑袋。我为呆在这里感到乐滋滋的。斯科利亚西纳在美国度过了四个春秋。那是一个伟大开放的国度，在那里，泉井喷射的是果汁和冰激凌。我贪婪地向他询问这一切，他很乐意地一一解答，我慢慢喝着第二杯马提尼。接着，我们到了一家小饭馆用晚餐，我毫无顾忌地把血红的牛肉和奶油白菜往肚子里填。这一次，轮到斯科利亚西纳向我提问了：要回答他那一个个过分细致的提问，确实困难。每当我设法重新品尝过去的日子里那天天如此的滋味——在那因宵禁令而门扉紧闭的屋子里弥漫的白菜汤味，以及当罗贝尔开秘密会议迟迟不归的时候，我内心笼罩的那种沉寂——他便不由分说地打断我的思路，他听得十分入神，仿佛感到词语在他的心底进行漫长的跋涉；可是，说话只能为了他，而不能为了自己。他打听一些实用的情况，诸如怎样设法制作假证件？如何印刷《希望报》？如何散发报纸？他也要求了解总体状况，我们是在怎样的精神氛围中生活？我竭力满足他，可难以如愿：我所说的不是比他想象的更糟糕，就是不如他设想的那么难以忍受。虽然真正的灾难并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烦忧，怎么对他讲述迪埃戈的死呢？那词语太悲怆，我难以启齿，那词语也太无情，他不会往脑子里装。那个过去，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重新经历；然而时过境迁，它竟然渐渐地显出了一

种淡淡的温馨。我理解朗贝尔为何在这和平的岁月中产生厌倦，这种和平使我们重新获得了生命，却不赋予我们生活的理由。当我在小饭馆的门口再次面临那种寒冷与黑暗时，不禁回想起昔日我们是多么骄傲地向它们挑战。可如今，我需要光明，需要温暖，我渴望某种别的东西。斯克利亚西纳没有任何挑衅的意思，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对别人大加抨击，我希望他很快改变话题。他愤怒地指责戴高乐的莫斯科之行。

“严重的是，”他以谴责的口吻对我说道，“整个国家似乎对此都表示赞同。瞧瞧佩隆和迪布勒伊，他们都是些正派人，却与共产党人携手并进，这对了解底细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无名的痛苦。”

“罗贝尔可没有跟共产党人一块儿走。”我安慰他说，“他试图创立一个独立运动。”

“他跟我谈过，可他明确表示决不采取反对斯大林分子的行动。独立于他们，而又不反对他们！”斯克利亚西纳沮丧地说。

“您总不希望他反共吧，瞧眼下的局势！”我说。

斯克利亚西纳神情严肃地望着我：“您读过我的书《红色的天堂》吗？”

“当然。”

“那么，您该有个大致的看法，当我们将欧洲作为礼物拱手奉送给斯大林之时，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

“绝对不可能那样做。”我说。

“事实恰恰如此。”

“不对！必须赢得与反动派斗争的胜利，倘若左派开始分裂，那就完了。”

“左派！”斯克利亚西纳讥讽地说，继又专横地一挥手，“啊！咱们别谈政治了，我害怕与女人谈论政治。”

“又不是我挑起的。”我说。

“这倒是，”他出人意料地严肃说道，“我请求原谅。”

我们又回到里茨饭店的酒吧坐下，斯克利亚西纳要了两杯威士忌。这酒味让我高兴，因为这是一种新味道，斯克利亚西纳的价值就在于我对他还不太熟悉。这个夜晚突如其来，因而散发着昔日那种充满青春气息的芬芳；往昔，夜晚的聚会并不雷同，晚会上，常与陌生人相遇，他们说的话往往出人意料，有时还发生一些新鲜的事情。五年来，在世界上，在法国，在巴黎，在别人的身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可是就轮不到我的头上。难道从今之后，我再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呆在这里真怪。”我说。

“怎么怪？”

“这热气，这威士忌，这声音，这军装……”

斯克利亚西纳环顾四周：“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给我征用了—一个房间，因为我是一家法美合办的杂志的记者。”他淡淡一笑，“万幸的是，这里的生活费用马上就要贵得让我无法再呆下去，我将被迫离开。”

“您就不能不落到被迫的地步才走？”

“不能。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金钱很腐蚀人。”一束喜悦的光芒使他的脸庞变得年轻了，“我一旦有钱，就尽快花掉它。”

“这不是维克多·斯克利亚西纳吗？”一个眼神十分和蔼的秃顶小老头走到了我们的桌旁。

“是的。”从斯克利亚西纳的眼里我看到了几分怀疑，同时又发现某种希望。

“您认不出我了？自维也纳一别，我老多了。我是马纳斯·哥德曼。我自己许了愿，万一能与您相遇，一定要向您致谢：谢谢您的书。”

“马纳斯·哥德曼！当然认识！”斯克利亚西纳热情地说，“您现在法国生活？”

“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一直都在。我在居尔集中营呆了一年，后来侥幸逃脱……”他说话的声音比他的目光更加温和，温和得近乎死气沉沉。“我不想打扰您，我为能与《棕发女郎维也纳》的作者握手感到荣幸。”

“我为能再次与您相见感到高兴。”斯克利亚西纳说。

矮小的奥地利人已经轻轻地离去，走出玻璃门，消失在一位美国军官的身后。斯克利亚西纳目送着他，突然说道：

“又是一次失败！”

“一次失败？”

“我本该让他坐下，跟他谈谈，他需要某种东西，可我不知他的住址，我的又没有给他。”斯克利亚西纳的话声中含着恼怒。

“若他想再见您，一定会到这儿来找您的。”

“他一定不敢。我该先开口询问他，这本来又不是难事！在居尔呆了一年，我猜想那整整四年里，他一直东藏西躲。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看上去像个老头。他肯定渴望某种东西，可我让他走了。”

“他并没有显出失望的神色。也许他真的只是想向您道谢。”

“这是他给自己找的借口。”斯克利亚西纳一口气把酒喝了个精光，“张口请他坐一坐，这是多么容易的事，一想起本可以办到却没有去办的事，心里真憋气！什么机会都白白放过了！没有思想、没有冲动，不像过去那么开放，而是紧闭心扉。最大的罪孽莫过于此：疏忽罪。”他极为内疚地兀自讲着，没有容我插话，“那四年里，我一直呆在美国，吃得好，穿得暖，平平安安。”

“您那时无法留在这边。”我说。

“我也可以藏起来嘛。”

“我不知这又有何用。”

“当我的朋友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我寓居维也纳；当另一些战友在维也纳惨遭褐衫党徒的杀害时，我又来到了巴黎；而当巴黎被侵占期间，我又去了纽约。问题的关键是要探清如此苟活着是否有什么意义。”

斯克利亚西纳的声调触动了我的心。我们也一样，每当我们想起被流放的人们，心里就感到耻辱：我们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可我们没有分担足够的苦难。

“有难不能同当，仿佛成了罪人。”我又补充道，“感到自己有罪，真让人难受。”

突然，斯克利亚西纳显出一副隐秘、默契的神情，朝我微微一笑：“这要看具体情况。”

我一时细细察看着这副狡黠而又痛苦的面孔：“您是想指某些可以免得我们遭受良心责备的内疚心理。”

他反过来打量着我：“您可真不蠢。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聪明的女人，也许是因为她们还不够聪明吧，于是她们想表现自己，叽叽喳喳

说个不休，可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与您初次见面时让我吃惊的是，您那种始终保持缄默的姿态。”

我莞尔一笑：“我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迪布勒伊、佩隆和我，我们都讲得很多，您神态安详地倾听着……”

“您知道，”我说，“听别人说话是我的职业。”

“这不错，可那神态不同。”他点了点头，“您肯定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要是我年轻十岁，我准交给您医治。”

“给您分析分析，这对您有吸引力吗？”

“现在为时已晚。一个成熟的人，是利用自己的缺陷与恶癖自我塑造的人；人们可以毁灭他，却不能医治他。”

“这要看什么病。”

“有益的唯有一种：保持自我，绝对自我。”

他的面孔突然由于一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坦诚而变得温和起来，他话声中那份给人以信任感的凄楚潜入我的心底。我冲动地说道：“比您病重的还有。”

“怎么回事？”

“有些人，你一见到他们，不禁会想他们怎么能够自我承受，不禁暗自思忖，这些人除非痴呆，不然肯定会对自己感到恐怖。而您并不给人造成这种印象。”

斯科利亚西纳的面容仍然那么严肃：“您就从不对自己感到恐怖？”

“从不。”我嫣然一笑，“可我与自我很少发生关系。”

“正因为如此，您才那么让人感到心安。”斯克利亚西纳说，“我们一见面，我马上就发现您这一点：您一副很有教养的少女的乖模样，让大人们尽管放心交谈。”

“我的姑娘都十八了。”我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再说，我向来无法忍受少女。可是一位宛若少女的妇人，那就迷人了。”他细细打量了我一番，继续说道：

“真有意思，在您的生活阶层里，所有女人都是很开放的；就您而言，人们也会揣摩您是否欺骗过您的夫君。”

“欺骗！多么可怕的字眼！罗贝尔和我都是自由的，我们互相从不瞒着什么。”

“可您从来没有滥用过这种自由？”

我有些尴尬地说：“只要有机会。”为了掩饰窘态，我一口饮尽了杯中的马提尼。这种机会不是很多。在这一方面，我与罗贝尔迥然不同。他认为在酒吧随便找个漂亮女人，跟她共度一小时，这很正常。可是我，我绝对不会答应把不能当朋友结交的男人当作情夫，我对友情的要求是严格的。这五年里，我一直毫无遗憾地过着清白的日子，我想我还会永远这么生活下去；作为一个女人，我的生活已经完结，这很自然：有多少东西都已经毁灭了，永远……

斯克利亚西纳默无声地端详着我：

“不管怎么说，我敢打赌在您这一辈子没有过多少男人。”

“正是。”我说。

“为什么？”

“找不着。”

“要是找不着，那是您压根儿没有找。”

“对所有人来说，我都是迪布勒伊的夫人或安娜·迪布勒伊大夫：这只能赢得尊敬。”

他笑呵呵地说：“我并不那么想尊敬您。”

出现了一阵沉寂。我开口说道：

“为什么一个自由的女人就非得跟天底下所有的男人睡觉？”

他严肃地看了看我：“要是您对他有几分好感的男人开门见山，提出要您跟他过夜，您会干吗？”

“这要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

“看他，看我，看具体环境。”

“就假设我现在向您提出这个要求。”

“我不知道。”

我早就猜透了他的用心所在，可我还是一时不知所措，乱了方寸。

“我向您提出要求：同意还是不同意？”

“您也太快了。”我说。

“我讨厌装模作样：向一位女人献殷勤，对自己和对她都掉价。我并不以为您会喜欢故作风雅的调情话。”

“不喜欢。可在做出一项决定之前，我喜欢先考虑一番。”

“那您就考虑考虑吧。”

他又要了两杯威士忌。不，我不想跟他睡觉，也不想跟任何别的男人睡觉。我的躯体早就沉睡在一种自私的麻木状态：我会以怎样的堕落行为去打扰它的安宁？再说，这似乎绝不可能。纳迪娜那么轻而易举地委身于陌生男子，对此，我常常瞠目结舌；在我这孤寂的肉体



和我身边独自饮酒的男人中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想象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他裸露的怀中，就像假设那躺着的就是我的老母亲一样荒谬。我说：

“等看看这晚上相聚的情况如何再说。”

“真荒唐。”他说，“脑子里总缠绕着这个问题，您怎能指望我们谈论政治或精神分析？您完全应该知道您将要做出何种决定，赶紧明说吧。”

他如此迫不及待，这清楚地向我表明了不管怎么说，我还不像我的老母亲；应该相信，至少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我是令人渴望的，因为他就渴望得到我。纳迪娜常常说她上床就像上饭桌一样无所谓，也许她说得有理。她责备我总戴着冰冷的山羊皮手套去接触生活，果真如此吗？若我脱掉这手套，将会发生什么事？倘若今晚不脱去，从今往后还会脱去吗？“我的生命已经完结。”我充满理智地对自己说，可是，与理智唱对台戏的是我尚有多少个春秋要打发。

我突然说道：“行，那就是同意。”

“啊！回答得好。”他像个医生或教授似的用鼓励的口吻说道。他想握我的手，可我拒绝了这份报答。

“我想要杯咖啡。我担心酒喝得过量。”

他淡淡一笑：“要是个美国女郎，准会再来一杯威士忌。”他说，“不过，您有道理，万一我们哪个醉得不省人事，那就丢丑了。”

他要了两杯咖啡，随之而至的是不快的沉寂。我说同意，这主要是出于对他的好感，是因为他善于在我们俩之间建立起这种亲密却不稳固的关系；可现在，这声同意冻结了我的好感。咖啡刚一喝完，他便说：

“上我房间去吧。”

“马上去？”

“为什么不？您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再也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

我多么想有时间慢慢适应我所做出的决定，希望从我们缔结的协议中渐渐萌生出一种默契。可事实却是我再也找不到任何话题。

“上楼吧。”

房间被行李箱挤得满满的，有两张铜床，一张摆满了衣物和纸张，一张圆桌上摆着一些空的香槟酒瓶。他把我抱到怀里，我唇间感觉到了一张暴烈、欢快的嘴巴；是的，是可能的，是轻而易举的；某种东西在我身上发生了，它有别于其他的东西。我阖上双眼，进入了与现实一样沉重的梦境，直到拂晓时分，才心情轻松地醒来。这时，我听到了他的话声：“仿佛少女受到了恫吓。我们不会伤害少女的，我们只不过让她失去童贞，不会加害于她。”这些话虽然并非对我而言，却猛地把我催醒。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扮演一个被强奸的处女的角色，或玩弄别的什么把戏。我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

“等一等。”

我躲进了浴室，匆匆地梳洗，拒绝任何思虑：要考虑已经来不及了。不等任何念头有时间在我脑中萌发，他已经来到了床榻，躺在了我的身旁。我紧紧地抱住他：现在，他是我唯一的希望。他的双手扒去了我的连衫衬裙，抚摸着我的腹部。我卷入了墨色的欲望波涛之中，任其冲击、颠簸、吞没；任其掀起、抛下；有时，我直落真空；我就要堕入欲河，陷入茫茫黑夜。多么惊心动魄的旅行！他的声音又把我抛到床榻：“我需要留点神吗？”“如果可能的话。”“你没有堵上吗？”他问得如此唐突，我不禁感到一阵恶心。“没有。啊！为什么？”

要再动身去周游，已经很难。我重又在他的怀中默默思虑，保持沉默，紧贴着他的身子，透过我全身的气孔吞噬他的体温：我的骨架、肌肉在这情火中融化了，安宁宛如细丝般柔软的螺旋，一层又一层地围着我缠绕。这时，他口气专横地说道：“睁开眼睛。”

我掀起眼睑，可它们像被沉重地压迫着，重又垂落在我那双被光线刺得难以睁开的眼睛上。“睁开眼睛。”他说，“这里是你，是我。”他言之有理，我不愿意回避我们俩。但是，我首先必须适应这一奇特的存在：我的肉体。眼睛要看着他那陌生的面孔，同时又要在他的目光打量之下，在自己的心底漫游，两者要同时兼顾，这确实是强人所难。既然他强求，我便看着他。我在混沌世界的半途中止住脚步，这是一个既无光明又不黑暗的世界，在这里，我既无身躯也无肉体。他掀起床单，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房间取暖很差，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少女的那种下腹。我任凭他好奇地打量这具既不冷又不热的躯体。他的嘴巴逗弄着我的乳房、爬行在我的腹部、顺势向我的下身移动。我急忙又闭上眼睛，整个儿藏匿在他拼命与我争夺的欢乐之中：这遥远而孤独的欢乐，宛如一朵被掐断的鲜花，那里，被损坏的鲜花正飘溢出浓郁的芬芳，渐渐在凋谢；而他兀自含糊不清地在说话，我尽量充耳不闻。但是，我感到厌倦。他又回到我的身旁。他的温暖顿时又使我浑身激荡。他不由分说地把他的性具塞到我的手，我毫无热情地抚摸着。斯克利亚西纳责备道：

“你对男人的性具并不真爱。”

这一次，他发现了我的一个缺点。我心里在想：“要是我整个人都不爱，我怎能喜欢这块肉？我从何处去汲取柔情献给这位男子？”他的

两只眼睛里隐藏着一种敌意，令我气馁；但是，对于他我并没有罪，哪怕是出于疏忽。

当他进入我的体内时，我并没有多少感觉，他遂又开始嘟嘟哝哝地说起话来。我嘴里阻塞着水泥，双颌之间再也无法透出一声叹息。他一时默不作声，但继而又说：“看。”我微弱地摇摇头：那里发生的一切与我如此无关，以致一旦我看到了，我会感到自己像是个观淫癖似的。他说：“你害羞！少女害羞了！”他一时陶醉在胜利之中。他接着又说道：“告诉我，你感觉如何，告诉我。”我仍然一声不吭，我隐隐约约感到体内有一个东西，可并无真正的感觉，就好似麻木的牙龈对牙医的金属器械只感到惊诧而已。“你有快感吗？我要你有快感。”他话声中透出怒气，要求算账似的说得一清二楚：“你没有快感？这没关系，夜长着呢。”黑夜太短暂了，永恒太短促了。败局已定，我心里清楚，我自问该怎么收场。当一个女人一丝不挂，孤身陷入敌手的怀抱，那她便毫无防御能力。我松开牙关，使劲从嘴中掏出词句。“您别这样总占着我，松开我……”“可是，你并不冷漠。”他愤怒地说，“你是用大脑在抵抗。可我一定要强迫你……”

“不。”我说，“不……”要解释清楚，太困难了。他的眼睛里闪现出真正的仇恨，我为自己一时被肉体快感这一温柔有余的幻景欺骗感到耻辱：一个男人，可不是一家土耳其浴室，我明白了。

“啊！你不愿意！”他说道，“你不愿意！真是驽驴的脑瓜！”他轻轻地敲击着我的下巴。我已经浑身疲倦，无力再以发怒脱身了；我开始战栗起来：一只拳头在挥舞，千只拳头……“到处都是暴力。”我暗自在想。我浑身颤抖，泪水夺眶而出。

现在，他吻着我的眼睛，喃喃低语：“我在饮你的泪水。”他的脸上露出胜利的柔情，使他重又回到了孩提时代。我怜悯他，也同样怜惜自己：我们俩都失败了，失望了。我轻抚着他的头发，强迫自己运用惯常的昵称“你”。

“你为什么恨我？”

“啊！是逼迫的。”他遗憾地说，“是逼迫的。”

“我并不讨厌你。我多么喜欢在你的怀里。”

“真的？”

“真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真的；某种东西发生了，虽然错过了，令人伤心，而且滑稽可笑，却是实在的。我嫣然一笑：

“你让我度过了多么有趣的一夜，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夜晚。”

“从来没有？哪怕跟年轻小伙子在一起？你没撒谎吧？”

词语替我撒了谎：我承担了它们的谎言。

“从来没有。”

他狂热地紧紧抱着我，接着又进入了我的体内。“我要你跟我同时感到快乐。”他说，“你愿意吗？你一定得告诉我：就是现在……”

我气恼地想，他们发现的就是这玩意儿：同步！仿佛这能证明什么似的，似乎能取代默契。纵然我们同时享受，我们哪能就不分离？我深知我的快感在他心间不会有任何反应，而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他的快感，那只是为了让自己摆脱出来。然而，我被战胜了；我终于同意喘息、呻吟，我猜想自己不怎么熟巧，因为他问道：

“你没有感到愉快？”

“感到了，我向你保证。”

他也被战胜了，因为他不再强求。几乎转瞬之间，他紧贴着我睡着了，我也昏昏入睡。他那只横放在我胸部的胳膊把我憋醒了。

“啊！你在这儿！”他说，他睁开了眼睛，“我在做噩梦。我常做噩梦。”他在十分遥远的地方，在地狱的深处跟我说着：

“你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我藏起来？”

“把你藏起来？”

“对。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该多好。咱们就不能一起消失几天？”

“我没有地方。再说，我也不能走。”

“真遗憾。”他说道，接着问道：“你，你从来不做噩梦？”

“不经常做。”

“啊！我真羡慕你。我夜里需要有人在我身边。”

“可我马上得走。”我说。

“别马上走。别走。别丢下我。”他紧紧抓住我的臂膀，我成了救生圈，这是在哪次沉船事故中？我说：

“我等你睡着了再走。你愿意我们明天再见面吗？”

“当然。十二点整我在你家旁边的咖啡店等你。行吗？”

“一言为定。尽量安心地睡觉吧。”

当他的呼吸声变得粗厚均匀时，我悄悄下了床。这个与我的体肤紧密相依的夜晚，要挣脱它的怀抱，是痛苦的；但是，我不愿引起纳迪娜的疑心，各人自有欺骗他人的招儿：她对我和盘托出，而我什么都瞒着她。我一边在镜前重新装扮出一副端庄的面具，一边在想，纳迪娜对我做出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因此而埋怨她。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在床榻上从一个男人身上学到了多

少东西！远比逼着他坐在沙发上，听他胡言乱语几个星期收益大！只是要经受住这类的体验，我太脆弱了。

整个上午我忙得不可开交，塞泽纳克没有赴约，可别的病人很多。我只能在心底默默地思念着斯克利亚西纳：我渴望再与他相见。我们共度的那个夜晚一直牵挂着我的心，它有头无尾，荒唐可笑；我希望通过我们俩的交谈，能胜利地挽救这一夜，把它善始善终地过完。我先来到了咖啡店：这是一家深红色的小咖啡屋，桌子光洁明亮，我常来此买烟，可从未坐过。隔开的雅座里，成双成对的男女在喁喁私语。我要了一杯准是冒牌的波尔图葡萄酒。我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再也不甚明白我在等待什么东西。斯克利亚西纳像阵风似的匆匆赶到了。

“我请求原谅：我今天有十个约会。”

“您还是来了，真好。”

他朝我微微一笑：“睡得好吗？”

“很好。”

他也要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接着向我倾过身子，他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任何敌意。

“我想向您提个问题，行吗？”

“提吧。”

“您为什么那么轻易就同意上我房间去？”

我嫣然一笑：“出于好感。”我说。

“您当时没有醉吧？”

“根本没有。”

“那您没有后悔吗？”

“没有。”

他犹豫了片刻，我感觉到他是希望在内心的账本上记录详细的批评记录。“您跟我说您从来没有消受过这样的夜晚，我想知道，这是真的吗？”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真的，又不是真的。”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他失望地说，“这绝对不可能完全是真的。”

“当时是真的，可到了第二天就不那么真了。”

他一口气饮尽了那发黏的葡萄酒。我紧接着说：“您知道让我寒心的是什么呢？是您有时显得那么充满敌意。”

他一耸肩膀：“这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两性之战？”

“我们不是同一类人。我是就政治上而言。”

我一时瞠目结舌：“在我的生活中，政治是那么微不足道！”

“无所谓本身就是采取的一种立场。”他冷冷地说，“您要明白，要是在这一方面不完全站在我一边，那么离我就始终很遥远。”

“那您就不该让我去您房间。”我责备道。

他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可是，一个女人离我很遥远，我无所谓，要是我渴望她的话，我完全可以跟一个女法西斯分子睡觉。”

“既然您抱有敌意，您就不会无所谓。”

他只是淡然一笑：

“在床上，相互有点怨恨，这并不坏。”



“真可怕。”我说，两只眼睛细细打量着他，“您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摆脱自我！”我说道，“您对人可以有怜悯心，也可以产生内疚，但肯定不可能有好感。”

“啊！今天是您给我做精神分析。”他说道，“继续分析吧，我对这玩意儿感兴趣极了。”

他的眼睛简直就像昨天夜里窥视我一样，充满贪婪，仿佛患了狂躁症。这样的目光，我无法承受，除非对方是个孩子或是个病人。

“您以为凭蛮横就可粉碎孤独，在爱情方面，没有比这更笨拙的了。”

他像是挨了一拳！

“说到底，昨天夜里是一次失败了？”

“多少是这样。”

“你还会重新开始吗？”

我犹豫不决。

“会的。我不喜欢一败就收场。”

他面孔骤然变得冷酷起来：“这种理由真差劲。”他一耸肩膀：“做爱可用不着头脑。”

这正是我的观点：他的言语和欲望之所以刺伤了我，是因为这一切都来自他的大脑。我说：“我猜想我们俩都太有头脑了。”

“那么还是不再来为好。”他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的，若再遭失败，结果会更加糟糕；看来，很难设想获得成功。我俩根本就不相爱，甚至连说话都是多余的，从来就没有任何东

西需要挽救，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包容着结果。我们彬彬有礼地闲聊了几句，接着我便回到了家中。

我并不怨恨他，也不怎么责怪自己。再说，正如罗贝尔很快就对我说的的那样，这没有多少关系：仅仅是在我们记忆中存放的一件往事而已，只与我们有关。不过，当我上楼回到自己卧室时，我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设法脱去自己那双冰冷的山羊皮手套。“为时已晚。”我在镜中瞥了自己一眼，喃喃地说，“现在，我的手套已经与我的皮肤紧紧贴在一起，要想脱去，非得剥掉我的皮。”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并非只是斯克利亚西纳的过错，其中也有我的错。我出于好奇心，出于挑衅，也因为疲倦，睡到了那张床上；同时也是为了向自己证明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某种东西：可我证实的无疑是事情的反面。我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镜前。我隐隐约约地想到，自己本可以过上迥然不同的生活，可以打扮自己，炫耀自己，享受到虚荣心的微妙乐趣或感官的强烈刺激。可一切为时已晚。我突然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有时像是另一个女人的过去；如今，我正是那另一个女人：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我高声喊叫：“我上了年纪！”战前，我太年轻了，感受不到岁月的重负；接着是整整五个春秋，我完全忘却了自己。如今当我又恢复了自我，却得知我已被宣判：我的暮年等待着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逃避，我已经从镜子深处瞥见了它。噢！我还是一个女人，月月照例行经，一切都未改变。只不过现在我醒悟了。我掀起头发：这绺绺白发，不是什么好奇的东西，再也不是什么征兆：这是个开端。我头上就要活活地染上我骨骼的颜色。我的脸庞还会显得光滑、健康，可这副面具时刻都会剥落，裸露出两只老太婆患伤风似的眼睛。冬去春

来，失败可以补救，可任何办法都无法阻挡我的衰老。“连焦急都来不及了。”我转身离开了自己的形象，心中想道，“连后悔也为时已晚。只有继续这么下去。”

---

[1] Stavelot，比利时地名。

[2] 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在瑞士洛迦诺签订的公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欧洲的和平”，实际上是英、法企图固定战后德国西部的边境，把德国的侵略矛头推向东方。希特勒上台后，于1939年废除该公约。

[3] 一种专供迷信的招魂术使用的桌子。

## 第三章

纳迪娜一连几个晚上来报社找亨利。一天夜里，他们俩甚至再一次进入旅馆的一间客房，但这一切并没有带来多少欢乐。对纳迪娜来说，做爱显然是一种无聊的事情，亨利也很快产生了厌倦。可是，他倒十分喜爱与纳迪娜一起出门，看着她吃，听着她笑，跟她随意交谈。她对许多事情都视而不见，但一旦她发现了什么，反应是强烈的，而且从不弄虚作假、不懂装懂。他暗自思量，她兴许是个令人愉快的旅伴。他被她那热切的愿望感化了。每次她都问：

“你谈过了吗？”

“还没有。”

她耷拉着脑袋，神情如此沮丧，以致亨利每每感到问心有愧。阳光、食物和真正的旅行，所有这一切，她都被剥夺了，如今，他还要再剥夺她。既然他已经下决心分手，让她享受这一切又有何妨？再说，即使是为波尔的利益着想，与其在他们俩分离时让她空欢喜一场，还不如在出发前说清楚为好。远离她时，他总感到自己是正确的：他几乎从未跟她玩弄虚情假意，当她假装相信已经消逝和被埋葬的过去可以重现时，实际上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每当他来到她的身旁，他便觉得自己也有过错。“我不再爱她，莫非是个混蛋？”见她在公寓里来回踱步，他常常这样扪心自问。“要么当初爱她就是个错？”他当时和朱利安及路易一起在多姆咖啡馆，邻桌有一位肤色宛若紫藤的美丽女子正在装模作样地阅读《不幸的遭遇》，她还在独脚小

圆桌上放着紫罗兰色的长手套。他从她面前走过，说了一声：“您的手套多漂亮！”“您喜欢吗？那就是您的了。”“我要它有何用？”“您可留作我们相遇的纪念。”他俩的目光都蒙上了一层柔情。几个小时以后，她赤身裸体，他紧紧地贴着她，赞叹着：“你太美了！”不，他不能谴责自己，被波尔的美貌和声音，被她言语的神秘色彩以及她微笑中透溢出的隐隐约约的持重所迷惑，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她年纪比他稍大些，了解许许多多琐碎的小事情，对此，他却一无所知，因而在他眼里，显得比那些大事还重要得多。在她身上他最欣赏的，是她对世俗利益的蔑视；她翱翔在一个超自然的天地里，亨利难以和她比翼齐飞，为此他感到绝望；她不惜把自己变成纯粹的肉体投入他的怀抱，亨利对此惊愕不已。“当然，我当时也有点昏头。”他承认。她相信山盟海誓，也相信保持她自我存在的奇迹；无疑因为这一点，他才是有罪的：想当初，他过分热烈地赞美波尔，可后来，又过于清醒地衡量她的价值。是的，他俩都有过错，可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必须摆脱这一切。他嘴里总是翻来覆去地嘀咕：她该有所察觉吧？一般来说，每当他保持沉默，她很快便会开口询问他。

“你为什么要挪这些小摆设？”他问道。

“你不觉得这样摆更漂亮吗？”

“难道你就讨厌安下心来坐上一分钟？”

“我惹你生气了？”

“没有，可我想跟你谈谈。”

她嘴巴一抽，露出微笑：“看你的神态多么庄严！你别是跟我说你再也不爱我了吧？”

“不。”

“那别的什么事，我都无所谓。”她坐下说。她一副耐心而又带有几分嘲讽的神情，朝他倾过身子说道：“说吧，我亲爱的，我听你说。”

“相爱与不相爱，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他说道。

“可对我来说，就是唯一的。”

“对我可不是，你也清楚，其他东西也举足轻重。”

“当然，我清楚，你的工作，你的旅行，我从来没有让你放弃过。”

“我珍惜的还有另一样东西，我经常跟你提起，那就是我的自由。”

她又淡淡一笑：“别跟我说什么我不让你自由吧！”

“只能自由到共同生活可以允许的程度，可对我来说，自由，这首先就是说独居。你还记得，当初我搬这里来时，我们说定只是在战争期间住在一起。”

“我并不以为我对你是个负担。”她说道，笑容荡然无存。

“谁也不可能比你更好相处。可我认为还是像当初那样分开生活更好。”

波尔微微一笑：“可你那时每天夜里来这里找我，你都说没有我，你睡不着。”

他是说过这话，可只有一年。他并没有反驳，只是说：“这不错，可我工作是在旅馆，在我房间……”

“那房间，只是你年轻时代的异想天开而已。”她以宽容的口吻说道，“男女分居，没有床第之欢：你得承认你的那一套太抽象了，我无法相信你至今还那么当真。”

“不，并不抽象。一起生活，这既会导致关系紧张，又会引起放任自流；我感觉到我常常惹人不愉快或漫不经心，这让你伤心。还是真正想见面时再见为好。”

“我总是渴望见到你。”她怪嗔地说。

“可是当我疲惫不堪、心绪不佳或要工作时，我喜欢一个人呆着。”

亨利的声音硬邦邦的。波尔又露出了笑容：

“你马上就要独自出门一个月。等你回来看看你是否会改变主意……”

“不会，我永远不会改变。”他斩钉截铁地说。

波尔的目光陡然颤抖起来，她喃喃地说：

“向我起誓一件事情。”

“什么事？”

“决不跟另一个女人同居……”

“你疯了！多荒唐的念头！这不用说，我向你起誓。”

“那么，你就可以重新按你年轻时的那些可爱的习惯去生活。”她以无可奈何的声调说道。

亨利好奇地审视着她：“你为什么要求我起誓？”

波尔的目光重又变得慌乱，她一时缄默无语，接着强装出平静的口吻，说道：“噢！我知道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能取代我在你生活中的位置。可是，我眷恋的是一些象征。”她欠身要站起来，仿佛害怕再听到别的什么。可亨利拉住了她。

“等等。”他说，“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跟你谈谈。我决不跟另一个女人生活，决不。可是，无疑是因为这四年里太清苦了，我渴望新的东



西，我渴望冒险，我向往男女之间那些无关紧要的艳遇。”

“可你不是已经有过一次了吗？”波尔沉住气说，“那是跟纳迪娜。”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撒谎撒得很不高明。”

有时，她是那么糊涂！可有时又是那么敏锐！他不知所措，尴尬地说：“我没有跟你明说，真蠢，可我害怕不明不白地让你伤心。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也决不会持续多久。”

“噢！请你放心！我不会跟一个小姑娘吃醋的。尤其不会嫉妒纳迪娜！”她靠近亨利，坐在他座椅的扶手上。“我在圣诞之夜就已经跟你说过，像你这样的男子决不会受与别人同样的法则束缚。我决不会用那种庸俗的忠贞形式强求你。就跟纳迪娜开开心心吧，随你跟谁都无妨。”她快活地抚摸着亨利的头发，“你看见了吧，我尊重你的自由！”

“看见了。”他说道。他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到失望。如此轻而易举地获胜，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结果，至少应该乘胜追击吧。“实际上，纳迪娜对我丝毫没有感情。”他补充说道，“她所需要的，仅仅是让我带她一道去旅行；当然，我们一回来就分手。”

“去旅行？”

“她要陪我去葡萄牙。”

“不行！”波尔说。她那副平静的面具猛然间炸得粉碎，出现在亨利眼前的，是一张有骨有肉的面孔，双唇颤抖，两眼噙着晶莹的泪珠：“可你跟我说，你无法带我一起去！”

“你没有坚持，所以我就没有尽力争取。”

“我没有坚持！？为了能与你同行，我什么都在所不惜。我只是理解你的心思，你是想单独旅行。为了你的清静，我十分乐意做出牺牲。”她愤怒地喊叫道，“可为了纳迪娜，决不！”

“我独自一人还是跟纳迪娜在一起，这没有多大差别。”亨利带着恶意说道，“既然你不嫉妒她。”

“这差别有天大！”她惊骇不安地说，“过去你要么一个人出门，要么就是我陪伴着你，我们始终都生活在一起。战后的第一次旅行，你没有权利带另一个女人一起去。”

“听着，”他说，“要是你觉得这是个什么象征的话，那你就完全错了。纳迪娜渴望开开眼界，她是位可怜的姑娘，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带她出去走走，我觉得是个快乐，仅此而已。”

“那么，要是真的仅此而已，”波尔慢慢地说，“那你就别带她去。”她一副苦苦哀求的神情望着亨利说：“我以我们爱情的名义求求你。”

他们一时默默无言地打量着对方。波尔满脸哀求的神色。可亨利突然感到心头一狠，仿佛他面临的不是一位身陷绝境的弱女子，而是一个手持刑具的刽子手。他于是开口说道：“你刚才还口口声声说尊重我的自由。”

“是的。”她声音粗野地说，“可要是你想毁了自己，我就要阻拦你。我决不让你背叛了我们的爱情。”

“换句话说，我的自由就是按你的意愿行事。”他含讥带讽地说。

“噢！你多不公平！”她呜咽着说，“你做的一切我都接受，一切的一切！可我知道，就这一点我不该接受。除了我，谁都没有权利跟你一起走。”

“这是你下的指令吧。”他说。

“可这是明摆着的！”

“我可不明白。”

“因为你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因为你一意孤行，硬要蒙住自己的眼睛！听我说，”她以通情达理的声音说，“你不要死恋着那位姑娘，你看这让我多么伤心。别带她走。”

亨利保持缄默，对这种理由实在无言以答。他怨恨波尔，仿佛她采取了某种本能的强制力量与他抗争。

“行了，我一定不带她走！”他说罢站起身来，向楼梯走去，“只不过从今往后再也不要跟我谈什么自由！”

波尔紧跟着他，把双手搭在他肩头：

“你的自由，就是让我经受痛苦？”

他猛地挣脱开身：“如果当我做我渴望做的事情时，你硬要让自己经受痛苦的话，那我就得在我的自由和你之间做出抉择。”

他迈了一步，她声音不安地呼喊了一声：“亨利！”她双眼惊骇不安：“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我说的意思。”

“你总不会去故意毁了我们的爱情吧？”

亨利朝她转过身子：“好！既然你一再坚持，那我们这次就干脆说个清楚吧！”他对她实在气恼，不能不最终摊牌：“我们之间有误会，我们对爱情的看法并不一致……”

“没有任何误会。”波尔慌忙说，“我知道你又要对我说些什么：爱情是我的整个生命，可你想要爱情只是你生命中的一种东西而已。我知道，我同意。”

“是的，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亨利说。

“不是！”波尔说，“啊！所有这一切纯属荒唐。”她声音激动地补充说道：“你总不能因为我要求你不要带纳迪娜一起走，就对我们的爱情提出异议啊！”

“我一定不带她走，这已是说定的事情。可这里涉及的是别的东西……”

“噢！听着。”波尔突然说，“算了。要是非得带她走才能证明你是自由的，那我还是愿意你把她带走。我才不愿让你以为我束缚了你。”

“假如在我整个旅行期间，你非得折磨自己的话，那我是决不带她走的！”

“要是你出于忌恨，以糟蹋我们的爱情为乐，那我经受的折磨就更大了。”她耸了耸肩膀，“你是做得出来的，你对自己的任何冲动都看得那么重。”

她满脸哀求的神色看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我对你并不忌恨。”她可以这样长时间地等下去。她叹了口气：“你爱我，可你又不愿为我们的爱情做出任何牺牲。非要我奉献一切。”

“波尔，”他声音和蔼可亲地说，“假若我这次与纳迪娜一起出外旅行，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一回来就再也不跟她见面，你和我之间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

她默不作声。“我这是在讹诈，”亨利心里想，“这真有点可耻。”最糟糕的是波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就是要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模样，但心底却十分清楚她接受的是一桩颇为肮脏的交易。可怎么办？必须千方百计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他一心想带纳迪娜走。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波尔说，继又叹息了一声，“我猜想自己太看重象征了。说实在的，这位姑娘陪不陪着你，没有多少差别。”

“没有任何差别。”亨利威严地说。

继后的日子里，波尔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不过她的每个举动、每次沉默无不在表示：“我无力反击，你滥用了这一点。”确实，她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武器。可是，这本身就是个圈套，它逼得亨利无路可走，要么成为牺牲品，要么当刽子手。他没有任何欲望扮演牺牲品的角色，麻烦的是他也不是一个刽子手。在他与纳迪娜在奥斯特利茨车站月台碰头的那个晚上，他感到心里挺不好受。

“你来得可不早。”纳迪娜一副抱怨的神态说道。

“我没有迟到。”

“快点上车，火车兴许就要开了。”

“决不会提前开车。”

“谁也说不准。”

他们俩上了车，找了一个空的隔厢。纳迪娜神色困惑地站在两排座位中间，一动不动地傻呆了一阵。接着，她背向车头，凭窗而坐；她打开手提箱，像个老姑娘似的动手仔仔细细地拾掇起来：她套上一件室内便袍，穿上拖鞋，双腿裹上一条毯子，头下垫上枕头；然后，她又从当旅行包用的草提包里拿出一包口香糖。这时，她才想起了亨利的存在，笑靥动人地问道：

“波尔见你真的要带我走，她准大喊大叫了一阵吧？”

亨利耸肩膀：“这显然不会让她高兴。”

“她说了些什么？”

“与你无关。”他生硬地说。

“可我要知道，可以开开心。”

“跟你谈那些，我才不开心呢。”

她从提包里取出一件尚未织完的石榴红毛衣，动手编织起来，嘴里还嚼着口香糖。“她太过分了。”亨利不快地想。也许她是故意逗他，因为她怀疑亨利仍在牵挂着那套红色的公寓。行前，波尔跟他吻别，眼里没有一滴泪水：“祝你旅途愉快。”可此时，她正在哭泣。“我一到就马上写信。”他自言自语。列车启动了，在郊区凄惨的暮色中飞驰。亨利打开一部侦探小说，朝对面那副满含愠色的面孔瞥了一眼。眼下，他没有任何办法消除波尔的悲伤，因此，用不着为此扫了纳迪娜的兴。他鼓了鼓精神，欢快地说：

“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穿过西班牙了。”

“是的。”

“他们想不到我们这么早就会到里斯本，我们有两天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她默不作声，专心致志地打了一会儿毛衣，接着往长座椅上一躺，用蜡球堵上耳朵，用披巾蒙住眼睛，把屁股朝向亨利。“我还指望有张笑脸来补偿波尔的泪水给我造成的痛苦呢！”他自嘲地想。他读完了小说，灭了灯。车窗上再也看不到蓝漆，车窗外黑洞洞的一片，天上没有一颗星星，车厢里冷飕飕的。他为何呆在这列火车里，面对一位大声呼吸的女子？我要让过去的重新出现，可这突然显得绝对不可能实现。

“她总可以更可爱一点吧！”翌日清晨，在通往伊伦的路上，他耿耿于怀地自言自语道。连他们走出昂代车站，身上感受到了阳光与微风的抚摸时，她也没有露出一个笑脸。当亨利接受护照检查时，她竟

然放肆地打着呵欠。此刻，她正迈着野小子般的大步在他前面走，他提着两个沉甸甸的旅行箱，头顶着这轮全新的太阳，浑身热乎乎的。他毫无兴致地看着前面那两条长着细细的汗毛、刚劲有力的腿，她脚上那双短袜显得那两条裸露的腿更不讨人喜欢。一道栅栏在他们身后重新关上，六年来，他第一次踏上异邦的土地；一道栅栏又在他们面前打开，他听到了纳迪娜的一声赞叹：“啊！”这是一声热情洋溢的叹息，纵使如何抚摸，也从来没有从她嘴里掏出这般吟叹。

“啊！瞧！”

路旁，一座被烧毁的房屋附近，摆着一个货摊：上面有橘子、香蕉、巧克力；纳迪娜飞奔过去，抓起两个橘子，递给亨利一个；原以为这欢乐垂手可得，只有两公里的距离将它无情地与法兰西隔开，然而当他看到这份欢乐时，却感到四年来取代了他心脏的那团黑乎乎、硬邦邦的东西瞬间变成了一堆乱麻。他曾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看过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荷兰儿童的照片，可现在他恨不得坐在弹坑边，双手捂着脑袋，不再挪动一步。

纳迪娜又恢复了欢快的情绪，她拼命地往嘴里填水果和糖果，穿行在巴斯克乡村和卡斯蒂利亚荒漠，她笑咪咪地凝望着西班牙的天空。他们又在火车座椅的积尘中睡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上午，他们沿着一条淡蓝色的溪流前进。溪流弯弯曲曲，在橄榄树林中蜿蜒，渐渐形成一条大河，最后是一片湖水。火车停了下来：里斯本到了。

“这么多出租车！”

一长溜出租车在火车站的院子里等待着旅客。亨利寄存了行李，对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说：“带我们去逛一逛。”在高高低低的街道上，有轨电车叮当作响。当他们以令人晕眩的车速顺坡飞驶直下时，纳迪

娜吓得惊叫起来，她紧紧搂住亨利的胳膊：他们已经失去了驾车飞驰的习惯。亨利也搂着纳迪娜的胳膊，哈哈大笑。他左顾右盼，显出难以置信的欢乐的神采：过去竟然又重现了。这是一座南方城市，灼热而又凉爽；天边，大海遥遥在望，微咸的海风拍击着大海的岬角：这座熟悉的都市，他认出来了。然而，与往日相比，它比马赛、雅典、那不勒斯、巴塞罗那还更令他惊诧，因为在今日，一切新事物都无异于奇迹。这座性情娴静的都市，山丘连绵，高低起伏，连同那色彩柔和、清冷的房屋和一艘艘白色的巨轮，它是多美啊！

“让我们在市中心的某个地方下车。”亨利说道。出租车在一座大广场停了下来，四周是影院和咖啡馆。露天咖啡座上坐着一些身着深色套装的男人，没有一个女人。女人们都挤在商业街上，摩肩接踵，街道顺坡而下，一直通往小港湾。亨利和纳迪娜很快打住了脚步：

“真想象不到！”

皮革，货真价实的皮革，厚实、柔软，皮革味隐约可闻；猪皮旅行箱、貂皮手套、浅黄色的毛皮烟袋，还有那鞋子，厚厚的皱胶底走路来不出声响、不发脚汗。真正的丝绸、真正的羊毛、法兰绒套装、府绸衬衫。亨利猛然想到自己身着粘胶短纤维套装，脚穿翘尖碎纹皮鞋，相当寒酸。周围的女士们一个个身着裘皮服饰，脚穿丝袜和精制的薄底浅口皮鞋，置身于她们中间，纳迪娜显得像个流浪女。

“明天，咱们要买些东西。”他说，“买很多很多东西！”

“这话好像不当真吧！”纳迪娜说，“告诉我，要是巴黎人看到这场面，会说些什么？”

“跟我们说的一样。”亨利笑哈哈地说。



他们在一家糕点铺前停下脚步，可这一回引起的不再是垂涎，而是愤慨，纳迪娜气得目光发愣，像凝固了一般；亨利也一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愣了片刻，接着推了推纳迪娜的肩膀：“咱们进去。”

里边，除了一位老头儿和一个小男孩，一张张独脚小圆桌的周围尽是女人，她们一个个头发油光闪亮，身着裘皮服装，挂满首饰，浑身肉鼓鼓的，正在虔诚地履行她们每日的填食任务。两个梳着黑色发辮的小姑娘斜佩着蓝色饰带，脖子上挂着许多勋章，一副矜持的神态，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杯浓浓的巧克力，上面堆着高高的搅奶油。

“你想吃吗？”亨利问道。

纳迪娜点了点头，女招待把一杯巧克力放在她面前。纳迪娜把杯子举到唇边，脸上的怒气转眼消失了。“我不能喝。”她说，接着又以抱歉的口吻补充了一句：“我的胃已经不习惯了。”但是，她感到这种不适并非由于胃的原因，她想起了某件事或某个人。亨利没有追问她。

旅馆的房间装饰着艳丽的提花布，浴室里有热水，摆着货真价实的香皂和毛浴巾。纳迪娜重又喜笑颜开，坚持要用马鬃手套给亨利擦身，擦得他从头到脚，浑身皮肤发红、发烫，接着，她又笑嘻嘻地让他仰躺在床上。她做爱时心情是多么舒畅，让人觉得她这回是真的得到了享乐。翌日上午，当她用那只粗糙的手触摸着厚实的毛料、光滑的丝绸时，她的两只眸子闪闪发亮：“巴黎过去有这样漂亮的商店吗？”

“比这要漂亮多了。你不记得了？”

“我没去过漂亮的商店，我那时太小了。”她带着热望，看了看亨利，“你认为这一切迟早有一天又会有的吗？”

“总有一天，也许。”

“他们这里的人怎么这么富？我还以为是个穷国呢。”

“这是个穷国，可有很富的人。”

他们为自己以及巴黎的亲朋好友买了布料、袜子、内衣、鞋子和棉毛衫。他们进了一个地下餐厅用午餐，餐厅的墙壁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画，骑马的斗牛士在挑逗着愤怒的公牛。“肉或鱼，只供应一份：他们总还是有限制的！”纳迪娜笑呵呵地说。他俩吃了颜色发灰的牛排。接着，他们穿上了皮鞋，这鞋子的黄颜色虽然不怎么顺眼，但鞋底颇为华丽。他们顺着通往贫民区的鹅卵石路面街道向上走去。在一个十字街口，一群赤脚的孩子观看着一个早已褪色的小木偶的表演，听不到一声欢笑。马路愈来愈窄，临街的墙面全都剥落，纳迪娜的脸色阴沉下来：

“这条街脏死了，这样的街道很多吗？”

“我想肯定是的。”

“你看了好像并不生气嘛！”

他无心去生气。实际上，当他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上方又看到阳光灿烂的窗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衬衣衬裤时，心底甚至腾起一片欢乐。他们默默无言地顺着一条肮脏潮湿的小巷向前走，纳迪娜突然停在一条路面泥泞的石阶路中间。“真脏死了！”她又重复道，“咱们离开吧。”

“噢！再走一段吧。”亨利说。

过去在马赛、那不勒斯、比雷埃夫斯或中国城，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在那些脏乱的街巷游逛；当然，无论在过去还是今日，他都希冀根绝这一切贫穷；但是这一愿望仍然是抽象的，他未曾有过逃避的欲望，因为这里有强烈的人的气息，冲得他飘飘欲仙。山上山下，仍还是万头攒动、生机勃勃，蓝色的天空还是闪耀着灼热的光芒，直射屋顶。亨利仿佛觉得即刻就要获得昔日那无比强烈的欢乐，他沿着一条条街巷追寻的正是这一欢乐的气息，然而他没有寻觅到。蹲在门前的妇人在炭火上烤着沙丁鱼，不太新鲜的鱼味盖过了热油的香味。妇人们都赤裸着双脚，这里，男女老少都赤脚行走。朝着大街敞开的地下室里，没有一张床、一件家具、一幅画像，只有简陋的搭床、浑身脓疮的孩子或遥远处的一只山羊；外边，听不到一声欢乐的话语、一声爽朗的欢笑，只见一双双死气沉沉的眼睛。莫非这儿经受的苦难比别的城市更为深重？或许人们非但没有变得铁石心肠，反而对灾难更加敏感？不祥而晦冥的街巷上方，苍天的蔚蓝色显得格外残酷。亨利感到自己被纳迪娜无声的沮丧感染了。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位身着破烂黑衣的妇女，她怀里的婴儿紧咬着她那裸露的乳房，她神色惊恐地奔跑着。亨利突然说：

“啊！你说得对，咱们离开吧。”

但是，离开也无济于事，在第二天法国领事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亨利便意识到了这一点。餐桌上摆满了三明治和精美的糕点，女士们身着早被人遗忘的色彩艳丽的裙服，一个个喜笑颜开；大家都讲着法语，美惠女神山的情景早已被抛到脑后，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它的灾难与亨利毫不相关。他彬彬有礼地跟别的宾客一起欢笑。突然，年迈的蒙多兹·达斯·维埃纳把他拉到了沙龙的一角；此人在萨拉

查 [1] 独裁之前，曾任过公使。他衬着硬领、系着黑色领带，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着亨利：

“里斯本给您印象如何？”

“是座十分美丽的城市！”亨利回答道。对方的目光突然变得阴郁，亨利马上笑吟吟地补充了一句：“我应该说我尚未见多少东西。”

“平常，来这里的法国人总是想方设法对什么都视而不见。”达斯·维埃纳耿耿于怀地说，“你们的瓦莱里，他只欣赏大海、花园，可其他什么也看不见。”老人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您是否也硬要蒙上自己的眼睛？”

“恰恰相反！”亨利说，“我还怕眼睛不够用呢。”

“啊！根据别人向我做的有关您的介绍，这正是我所期望的。”达斯·维埃纳声音温和下来说，“我们约一约明天碰面的时间，由我负责向您介绍里斯本。美丽的外表，是的！您到时就可以看到那后面的东西！”

“我昨天已经在美惠女神山转了一圈。”亨利说。

“可您没有进屋去看看！我希望让您亲眼看看他们吃的是什么食物，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不然，您不会相信我的。”达斯·维埃纳一耸肩膀，“对葡萄牙的忧伤及其奥秘竟耗费了那么多笔墨！可是事情很简单：这里的七百万葡萄牙人中，只有七万吃饱肚子。”

要溜已不可能：第二天上午，亨利整个儿用来参观一座座又脏又乱的住房。昔日的公使在傍晚时召集了一些朋友，特意安排亨利与他们见面：这又不能拒绝。他们个个身着深色套装，衬着硬领，戴着圆顶礼帽，说起话来礼节周到，可内心的仇恨不时使他们那副通情达理

的面孔变得畸形。这些人从前都是公使、记者、教授，由于拒不归顺独裁统治，而落得个家破人亡；他们的亲朋好友中都有被流放的，他们自己生活贫困，走投无路；这些仍然坚持斗争的人深知地狱般的孤岛在等待着他们：一位大夫免费为贫苦人治病，想方设法开一家诊所或在医院里引入一点卫生设施，很快就成了嫌疑犯；谁要组织夜校授课或有什么慷慨甚或慈善的举动便是教会和国家的敌人。尽管如此，他们始终坚持斗争。他们坚信不疑，纳粹主义的灭亡一定会带来这一伪善的法西斯主义的末日。他们做梦也想推翻萨拉查，建立一个与法国业已成立的阵线类似的国民阵线。他们知道自己孤立无援：英国资本家在葡萄牙有利可图，美国人则正在与政府谈判购买亚速尔群岛空军基地。“法国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他们一再重复，并且恳求：“要把事实真相告诉法国人。他们并不清楚，倘若他们了解，定会帮助我们的。”他们硬是跟亨利定下了每天的约会；他们给他提供大量的事实、数据，向他口述各种统计数字，领他去看遭受饥饿的郊区；这与他梦想的假日并不完全一致，可他别无选择。他答应发起新闻运动，以触动公众舆论：政治独裁、经济剥削、警察恐怖，以及对群众有步骤的愚弄和神职人员的可耻勾结，他要把所有的这一切统统公布于众。“若卡尔莫纳获悉法国准备支持我们，他会与我们一起行动。”达斯·维埃纳口气肯定地说。他与比多是老相识，考虑向他建议缔结一种秘密协定：如得到法国支持，未来的葡萄牙政府在非洲殖民地的处理方面可以给法国提供方便。要不伤和气，那实在很难向他解释清楚这项计划是何等不切实际！

“我一定去见杜尔纳勒——比多的办公室主任，他是抵抗运动的一位战友。”亨利在赴阿尔加维的前夕承诺道。

“我马上制定一个详尽的计划，您回国时委托给您。”达斯·维埃纳说。

离开里斯本，亨利感到乐滋滋的。法国办事处借给他一部小车，以给他做巡回报告提供方便，而且请他不必客气，车子愿意用多长时间都行。看来他终于要度上名副其实的假日了。不幸的是，他新结识的那些朋友迫切希望他能利用最后一个星期，与他们共同商讨有关事情：他们将要搜集详尽的资料，并安排他与萨莫拉工地的一些共产党人见面。这实在无法推脱。

“这样一来，勉强强只剩下半个月时间游逛了。”纳迪娜赌气说。

他们在特茹河对岸的一家小餐馆用晚餐，女招待端上了几块炸鳕鱼干和一瓶脏乎乎的粉红色的葡萄酒。透过玻璃窗，里斯本城隐约可见，水天相接，灯火闪烁。

“开着小车，半个月准能看许多地方！”亨利说，“你要知道咱们多走运。”

“就是呀！不能好好利用多可惜。”

“那么多人都指望我，让他们失望太不该了，难道不是吗？”

纳迪娜一耸肩膀：“你帮不上他们任何忙。”

“我可以以他们的名义说话，这是我的职业，要不就不必当记者了。”

“也许就是没有必要。”

“别现在就考虑回国的事。”他以妥协的口气说，“咱们就要美美地周游一番。看看海滨那闪烁的灯火，多美的景色啊！”

“这有什么美的？”纳迪娜问道。她就喜欢提这类问题，惹人生气。亨利耸肩膀。“说真的，这并不美，可你为什么觉得美？”纳迪娜追问道。

“美就是美，不为什么。”

她额头贴着窗玻璃：“要是不知道背后的一切这也许是美的，可一旦了解了……这又是一种假象。”她恼怒地说，“我憎恨这座肮脏的城市。”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假象。但是，他禁不住感到这灯火是多么美；那贫穷的强烈气息，那充满欢乐的花花绿绿的小巷，亨利再也不会被诱惑。然而，在那昏暗的海滨忽明忽暗的点点灯火不可抵挡地触动了他的心：也许因为这灯火使他回想起了昔日的时光，那时他尚不了解美丽的外表后隐藏的一切；或许在这里他所爱的只是对蜃景的记忆。他又想起了纳迪娜：十八岁了，可她的记忆中尚未有过任何幻景！他至少已经有过一个美好的过去。“还有一个现在，一个未来。”他在心底大鸣不平。“幸运的是，还有许多东西值得去爱。”

还有许许多多，真幸运！他手中重新握着方向盘，行驶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公路上，多开心啊！多少年没有开车了，第一天亨利有些害怕；这车子仿佛有它自己的生命，更何况它笨重、不稳、吵闹，而且相当任性。不过，它现在已经像一只手似的主动听他使唤。

“开得多快啊！真棒极了！”纳迪娜惊叹道。

“你过去有没有坐车兜过风？”

“在巴黎坐过吉普车，可从来没有开得这么飞快。”

这也是一种假象，是对自由和力量的习惯错觉，可是，纳迪娜却无所顾忌地接受了这一错觉。她降下了所有的车窗玻璃，贪婪地饮着

风尘。若亨利听她的话，那他俩永远别想下车；她喜爱的，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飞驰在公路和苍穹之间，而对周围的风景几乎无动于衷。然而这景色是多么美啊！金合欢铺撒着一层金粉；片片橘林无边无际，枝头挂满了浑圆的果实，疑是远古时代恬静的乐园；巴塔利亚怪石嶙峋，呼声阵阵；两条庄严的石阶肩并肩通向一座黑白分明的教堂；贝雅的街上久久回荡着一位修女昔日失恋时的泣诉声。在散发着非洲气息的南部，矮小的驴子永不停息地旋转，从干渴的大地里汲取微薄的一点水；遥远处，在红土地上深深扎根的龙舌兰丛中，一座光滑闪亮的乳白色的房子时隐时现，给人一片虚假的阴凉。他们沿着山路往北行驶，路旁的石块仿佛盗走了花朵鲜丽的色彩：有紫罗兰色，有红色，也有赭石色；紧接着，在米尼奥和缓的山坡上，流光溢彩的石色重又归还给了满目的花卉。真的，美丽的景色，它飞速地而后闪去，让人来不及细想掩藏在背后的一切。无论在花岗岩质的海岸，还是在阿尔加维滚烫的道路上，农夫们总是赤裸着双脚行走，不过很少与他们相遇。欢快的景象在红港消失了，这里，肮脏的海水色如殷红的鲜血；破旧的房子比里斯本的还更加阴暗潮湿，里面挤满了一丝不挂的儿童，墙上贴着告示：“不卫生，严禁居住。”几个四五岁的小姑娘，身披破麻袋在垃圾箱里寻找破烂。吃午饭时，亨利和纳迪娜只得躲进了一条昏暗的小巷深处。可他们还是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一张张小脸扒在小饭馆的窗玻璃上。“我恨透了城市！”纳迪娜怒气冲冲地说。她整整一天独自呆在房间里，次日上了路，才勉勉强强松开了牙关。亨利也没有设法逗她消消气。

原定返回的那一天，他们在离里斯本三小时路程的一个小港停车吃了午饭；他们把车扔在小客栈门前，登上了一座俯瞰大海的山丘；



山顶高耸着一轮白色的风车，车顶盖着绿色的板瓦，车翼固定上了一个个窄颈小瓷瓮，风儿一吹，呜呜欢唱。下山时，亨利和纳迪娜在葱葱茏茏的橄榄树和花团锦簇的巴旦杏树中奔跑，林中大自然的乐声紧紧伴随着他们。最后，他们一屁股坐在小海湾的沙滩上，一艘艘小船张着锈迹斑斑的风帆，迟疑不决地缓行在昏暗的海面上。

“我们在这里多好。”亨利说。

“对。”纳迪娜神色阴郁地说，接着又说了一句，“我饿死了。”

“这是明摆着的，你一点东西也没有下肚。”

“我要的是煮鸡蛋，可他们却给端来一碗温水和几个生鸡蛋。”

“鳕鱼味道很美，蚕豆也很好吃。”

“只要有一滴油星，我就反胃。”她气呼呼地吐了一口唾沫，“我唾沫里还有油呢。”

她突然脱去衬衫。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明白？”

她没有戴胸罩，仰天而卧，把两只富有弹性的乳房裸露给太阳。

“不行，纳迪娜，要是有人来。”

“谁也不会来。”

“你想当然。”

“我才不在乎呢，我想感觉一下阳光。”她任海风抚摸着乳房，任细沙逗弄着头发。她凝望着蓝天，怪嗔地说：“既然是最后一天，应该尽情享受。”

亨利没有答话，她唉声叹气地问道：

“你真的非要今晚回到里斯本？”

“你完全知道那里有人等着我们。”

“咱们还没有见到山呢，他们都说山色最美。一周的时间，咱们可以再饱览一番。”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有人要见。”

“那些衬着硬领的老头儿？他们要是摆进人类博物馆的橱窗里去展览，那很好；可作为革命者，让我笑掉大牙。”

“我觉得他们令人感动。”亨利说，“你知道，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

“他们高谈阔论。”她抓起一把细沙，任其顺着指缝往下流淌，“全都是空话，就像修士，空话连篇。”

“自视甚高，瞧不起试图干点事情的人，这很容易。”亨利有点恼怒地说。

“我责备他们，正是他们从不真正去干些什么。”她气恼地说，“要是我，决不这么废话连篇，一枪毙了萨拉查算了。”

“这对事情发展没有多少好处。”

“他一死，事情就有发展了。就像樊尚说的，至少死是不饶人的。”她若有所思地望着大海，“要是真横下一条心跟他拼命，那就一定能结果他的性命。”

“千万别去拼命！”亨利笑眯眯地说，把手搭在那只沾满沙粒的胳膊上，“要知道，那样我该会多悲伤！”

“那至少死得有价值。”纳迪娜说。

“你就这么着急去死？”

她打了个呵欠：“你就这么乐意活着？”

“反正不让我厌烦。”他乐呵呵地说。

她支着臂肘，抬起身子，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番：“给我解释解释，像你这样从早到晚胡写个不停，这真充实了你的生活？”

“当我写作时，是的，我感到生活充实。”他回答道，“我甚至非常渴望能重新执笔写作。”

“你当初是怎么想起写作来的？”

“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亨利说。

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可他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对往昔的记忆赋予了何等的分量。

“我年轻时，一部书在我眼里显得多么神奇。”

“我也一样，爱书。”纳迪娜激动地说，“可书已经多如牛毛，再创作又有何用？”

“各人要说的东西跟他人并不相同：每人有自己的生活，有他自己与事物、与词语的独特关系。”

“要是想到有的家伙写过的东西比你以后制造出来的要强很多，你就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纳迪娜的话中隐约透出几分恼怒。

“开始时，我并不这么想。”亨利笑盈盈地说，“要是有什么也没碰过，人总是狂妄自大。可后来一旦陷了进去，也就对自己所写的一切发生了兴趣，再也不浪费时间和别人比个高低了。”

“噢！当然，人总是要凑合着过下去！”她赌气似的说，然后又仰倒在沙滩上。

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向一个并不热爱写作的人解释为何爱上写作，谈何容易。退一步说，他能向自己解释清楚吗？他并不以为人们会永远读他的作品，然而当他执笔写作的时候，他每每感到处于永恒之中；他成功地把许多东西注入了词语，似乎觉得是他彻底挽救了这

一切；然而，其中到底又蕴藏着什么？从何种程度上讲，这也仅仅是一种幻景而已？这是他在这次度假期间本该澄清的问题之一，可是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弄清。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所有那些甚至不愿尝试着表现自己的生命产生了一种几乎充满焦虑的怜悯感：如波尔、安娜、纳迪娜。“嗨！”他心里想，“我的书竟在眼前的局势下出版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迎接读者的挑战了，一想到他们正在阅读他的小说，议论他的小说，他不禁感到心悸。他朝纳迪娜俯去身子，朝她微微一笑：

“不错吧？”

“是的，呆在这儿很惬意！”她有点唉声叹气地说。

“很惬意。”

他和纳迪娜的手指交叉在一起，紧贴着热烘烘的沙粒；阳光下黯然失色、无精打采的大海和那成为蓝色的一统天下的苍穹之间，高悬着幸福；也许只要纳迪娜嫣然一笑，他就能抓住这份幸福：每当她露出笑容，便成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可惜这张布满雀斑的面孔仍然毫无生气。他叹息道：“可怜的纳迪娜。”

她猛地挺起身子：“为什么可怜？”

她无疑值得怜悯，可他并不十分清楚到底为了什么。“因为这次旅行让你失望了。”他说道。

“噢，你知道，我本来就没有多少指望。”

“可总有过美好的时刻。”

“美妙的时光还会再来。”她两只眸子里那冷飕飕的蓝光陡然一热，“别管那些老空想家了，咱们可不是为这而来的。咱们去游山逛水吧。只要我们的骨架子上还有血肉，就尽情欢乐吧。”

亨利耸肩膀：“你完全清楚，尽情欢乐可不那么容易。”

“那就尽量试试吧。到山里去好好游览一番，这不好吗？你就爱游逛。可那些会议、那些调查，让你烦透了。”

“那当然。”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逼迫着你非得干那些让人厌倦的事情？是种天职？”

“你要明白：难道我能向那些可怜的老人解释说他们的灾难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葡萄牙国家太小，世人对它不屑一顾？”亨利淡然一笑，朝纳迪娜倾去身子，“我能这样吗？”

“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说你病了，我们呢，往埃武拉方向去。”

“这样会伤了他们的心。”亨利说，“不，我不能这么做。”

“还是说你不愿意吧。”纳迪娜尖刻地说。

“得了，”他不耐烦地说，“我不愿意。”

“你比我母亲还坏。”她鼻子上粘着沙粒，嘀咕着。

亨利身子一伸，躺在她的身旁。“咱们欢乐欢乐吧。”从前，他善于作乐。若在过去，他一冲动起来，准会牺牲那帮老谋反者的梦想，一心沉湎于昔日曾经享受的那份欢乐之中。他合上眼睛。他躺在了另一个海滩上，身边是一位金褐色皮肤的女郎，她身穿碎花海浴裙裤，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女：波尔。棕榈枝在他们头顶摇曳，透过芦苇，他们窥望着肥肥胖胖的犹太女郎满脸喜气地从海上走来，她们一个个身着裙服、罩着面纱、戴着首饰，十分累赘；夜里，他们经常偷看身裹白布在海里冒险作乐的阿拉伯女人；要么便去墙基呈古罗马风格的小酒馆喝一杯浓浓的咖啡，或者静静地坐在集市上，亨利抽着水烟筒，一边跟阿穆尔·哈尔西纳天南海北地闲聊；然后再双双回到星光荧荧的房间，躺倒在床榻上。但是，此时此刻，亨利最为怀念的是他

在旅馆平台上每天上午度过的时光：头上，是蔚蓝的天空，周围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芬芳。他乘着新的一天到来时刻的凉爽，顶着正午时分的酷热，双脚踩着滚烫的水泥地面不停地挥笔写作，直到他终于被阳光暴晒、被词语缠绕得头脑发昏时，才走到内院的阴凉处喝一杯冰镇茴香酒。他前来寻觅的，正是杰尔巴 [2] 的蓝天、夹竹桃和汹涌的大海，是夜晚闲聊的欢乐，尤其是清晨的凉爽和中午的酷热。他为什么觅不到昔日生活中已经感受过的那份灼热而温柔的情趣？然而，他是多么渴望这次旅行！多少天来，他心里只挂念着它，梦想着迎着太阳躺在沙滩上；现在，他来到了这里，有太阳，有沙滩：原来是他的心田里缺少某种东西。他再也不明白“幸福”、“欢乐”这些古老的词语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只有五个感官，它们却如此迅速地产生了厌倦。他的目光已经厌倦，厌倦这样没完没了地望着那除了蓝色还是蓝色的无穷无尽的蓝。他真恨不得抓破这层绸缎，撕破纳迪娜柔滑的皮肤。

“天开始凉了。”他说。

“对。”她突然紧贴着他，他透过衬衣，感觉到了胸前她那两只裸露的、充满了青春活力的乳房。“暖暖我的身子。”

他轻轻地推开了她。“穿上衣服。我们回村庄去。”

“你害怕有人发现我们？”纳迪娜的两只眸子闪闪发亮，双颊升起了两朵淡淡的红晕，可亨利知道她的嘴巴仍然是冷冰冰的。“你以为我们能拿我们怎么着？会用石头砸我们？”她一副诱惑的神态问道。

“起来吧，该回去了。”

她全身紧紧地压住他，他难以抵挡这股欲望，浑身软绵绵的。他爱她朝气蓬勃的躯体，爱她光洁透亮的肌肤；倘若她真的愿意从欢乐

中得到抚慰，而不故意恬不知耻地在床榻厮混的话……她半闭着眼睛，细细地端详着他，手顺势向他的裤裆方向摸去。

“让我来……你放松，让我来。”

她的手和嘴都十分灵巧，可每当他让步时，总能看到她眼睛里那股胸有成竹的得意劲儿，他讨厌这股劲头。“不行。”他说，“不。这里不行。这样不行。”

他挣脱了身子，站了起来；纳迪娜的衬衫就扔在沙地上，他给她扔到了肩头。

“为什么？”她恼恨地说，又拖长声调添了一句，“也许在露天，还更有趣一点。”

他弹了弹沾在衣裤上的沙粒。

“我在琢磨你到底是否还有个女人的样子。”亨利故意拿出宽容的口吻说。

“噢！你知道，真正喜爱让男人摆弄的女人，我敢肯定一百人中挑不出一个：那是她们冒充高雅，故意摆出的一种姿态。”

“算了，我们别争了。”他挽起她的胳膊说，“来，我们去给你买点糕点和巧克力，你在车上好吃。”

“你尽把我当个小姑娘对待。”她说。

“不。我十分清楚你不是个小姑娘。我比你想象的要更理解你。”

她怀疑地瞅了他一眼，唇间露出了一丝微笑。“噢！我并不总是讨厌你。”她说道。

他更用劲地挽着她的胳膊，两人默默地向村庄走去。阳光渐暗，小船返回港湾，几头牛正拖着船往沙滩方向走去。村民们有的站着，有的围坐成一圈，全都在凝望着。男人的衬衣和女人肥大的裙子花花

绿绿，饰着欢快的色彩，可是这片欢乐却凝固在死气沉沉的静止气氛之中。黑色的头巾包裹着石头一般的面孔，死死盯着天际的眼睛不抱有任何希望。见不到一个举动，听不到一句话语。仿佛一阵咒语使所有的舌头全都打了结。

“他们真急得我想大声呼喊。”纳迪娜说。

“我猜想他们也听不到你的呼喊声。”

“他们在等待什么？”

“不等待什么。他们知道他们什么都等待不到。”

广场上，生命在有气无力地叹息。一群孩子在乱喊乱叫，在海上丧生的渔夫丢下的孤寡的妻子坐在路旁行乞。开始，当亨利和纳迪娜听到身着厚实的裘皮服装的资本家太太煞有介事地对乞丐说“耐心等待”时，他们还愤愤不平地瞥她们一眼。可现在，当那一只只手向他俩伸来，他们便像窃贼似的拔腿就跑：乞丐太多了。

“给你买点东西吧。”亨利在糕点铺前拉住了纳迪娜，说道。

她走进铺子，两个脑袋剃得光溜溜的孩子鼻子紧贴着窗玻璃，当她双手捧着纸袋在门口出现时，他们喊叫了一阵。她停下脚步。

“他们在说什么？”

亨利犹豫了一下：“说你真有运气，肚子饿了能有吃的。”

“噢！”

她一气之下，猛地把鼓鼓的纸包扔到了孩子手中。

“不。我这就给他们一点钱。”亨利说。

她一把拉住了他：“别管，他们倒了我的胃口，这些肮脏的野孩子。”

“你饿了。”



“我告诉你，我再也不饿了。”

他俩登上了小车，一时默默无语地行驶着。纳迪娜以哽咽的声音开口说道：

“我们本该去另一个国家。”

“哪一个？”

“我不知道。可是你，你应该知道。”

“不，我不知道。”他说。

“总该有个可以生活的国度吧。”她说。

突然，她泪水夺眶而出，亨利惊骇地望着她：波尔泪如雨下，那很自然；可看到纳迪娜哭泣，这几乎就像他无意中发现迪布勒伊在呜咽一样令人难过。他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把她拉到身边。

“别哭，别哭了。”他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粗硬的头发。他为何就没有办法让她微笑？他为何心情沉重？纳迪娜拭了拭眼泪，猛地一擤鼻涕。

“可是你，你年轻时，幸福过吗？”她问道。

“幸福，我幸福过。”

“你瞧！”

亨利说道：“你也一样，你总有一天会幸福的。”

本该更紧紧地搂着她，对她说：“我，我一定能让你幸福。”此时此刻，他多么渴望：一时渴望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然而他什么也没说。他猛然想到：“过去并没有重现，过去决不会重现。”

“樊尚！”纳迪娜向站口冲去。樊尚身着战地记者服，笑盈盈地在招手。纳迪娜脚穿皱胶底鞋，擦地疾行，伸手抓住了樊尚的胳膊，站稳了脚跟：“你好！”

“旅行归来的人们好！”樊尚乐呵呵地说。他赞叹地噓了一声：“你穿戴多么漂亮！”

“一位真正的太太，嗯？”纳迪娜原地一旋身子说道。她身着裘皮大衣，穿着长袜和薄底浅口皮鞋，姿态高雅，而且相当富于女人魅力。

“把这给我！”樊尚夺过亨利身后拖着的一只巨大的水手旅行包，“是具尸体？”

“五十公斤吃的东西！”亨利说，“这是纳迪娜为她家提供的食物，如何把这包东西弄到伏尔泰沿河大街倒是个问题。”

“没问题。”樊尚一副得意的神态说道。

“你偷了一部吉普车？”纳迪娜问。

“我什么也没偷。”

他步履坚定有力地穿过站口的院子，停在一部黑色的小车前：“这车顶呱呱，不是吗？”

“这车是我们的？”亨利问。

“是的。吕克这下总算开心了。你说这车怎么样？”

“小了点。”纳迪娜说。

“这可以给我们提供极大的方便。”亨利打开车门说道。他们勉强把行李塞进了小车的后部。

“你以后一定会带我去兜风吗？”纳迪娜问道。

“你没有疯吧？”樊尚说，“这是部工作车。看来装了你们这么些东西，确实有点儿挤。”他坐到司机位置上，手执方向盘，车子艰难地发出轰鸣声，终于启动了。

“你有把握肯定会开车？”纳迪娜问道。

“要是你亲眼见到我那天晚上在布了雷的道路上，没有任何照明开着吉普车猛冲的情景，你就不会无端地侮辱我了。”樊尚看了看亨利，“我把纳迪娜放下，送你去报社？”

“行。《希望报》情况怎么样？在那个鬼地方，我连一期也没有看到。报纸版面还是原来那么小？”

“还是。他们又准许了两家报纸出刊，可不给我们解决纸张；吕克比我了解情况，会给你汇报的。我刚刚从部队回报社。”

“印数没有下降吗？”

“我想没有。”

亨利迫不及待地要去报社。只是波尔肯定事先给车站打过电话，她知道列车没有误点；她准两眼死死地盯着挂钟，捕捉着任何声音，焦急地等待着。等他和樊尚把纳迪娜同行李送进了电梯，亨利说：

“我想了想，还是先回家。”

“可伙伴们在等着你。”樊尚说。

“告诉他们，我一小时之后就到报社。”

“那我把劳斯莱斯给你留下。”樊尚说。他在狗诊所前停下车子，问道：

“我把行李箱取下来？”

“就拿最小的那一只，谢谢。”

亨利遗憾地伸手推门，不料撞倒了一只垃圾桶，发出了声响，女门房的狗开始狂吠起来。还不等亨利敲门，波尔便打开了：

“是你！真是你！”她扑进他的怀里，接着往后一退，“你气色很好，你晒得黑黑的！回来的路上没有太累吧？”她微笑着，可嘴角有一小块肌肉在痉挛似的抽搐。

“一点儿不累。”他把旅行箱放在长沙发上，说道，“这是给你的。”

“你真可爱！”

“打开吧。”

她打开箱子：有丝袜、麂皮鞋、一只女用手提包、一些布料，还有披巾、手套。他当时选择每件物品都十分细心，而且惶惶不安，恐有不妥。现在，他真的有些失望了，因为波尔只是显出一副激动而且隐含着宽容的神情看着，没有动手去摸一摸，也没有俯下身子。“你多可爱！”她重复道，说着猛地把目光转向亨利，“你的那只旅行箱在哪里？”

“在下面，放在车子里。你也许已经得知，《希望报》弄到了一部小车，樊尚开车去车站接我了。”他激动地说。

“我这就给门房打电话，让人把你的箱子送上来。”波尔说。

“不用了。”亨利说，紧接着又补充道：“你这个月过得怎么样？天气不是很糟吧？你出门走走了吗？”

“走了走。”她含糊其辞地说，面孔僵得没有一丝表情。

“你去看谁了？你做了些什么？跟我谈谈好吧？”

“噢！这没意思。”她说，“别谈我了。”她遂接着往下说，可声音显得漫不经心：“你知道，你的书获得了成功。”

“我一无所知。书真的成功了？”

“噢，当然，批评家们什么也没有看明白，可他们嗅出了这是一部杰作。”

“我很高兴。”亨利假扮笑脸说道。他多么想再提几个问题，可波尔的用词实在让他受不了。他改变了话题：“你看过迪布勒伊夫妇吗？”

他们情况如何？”

“我匆匆见过安娜一面，她工作繁忙。”

她有口无心地说着话。可亨利多么迫切希望能马上重新投入自己的生活！他问道：

“你没有把每期的《希望报》都保存下来？”

“我读也没读。”

“没有读？”

“你这段时间没有在报上写文章，我有别的事要考虑。”她搜索着亨利的目光，脸上又显出了活力，“这个月里，我考虑得很多，我明白了许多事理。我后悔，你行前我不该对你发火，我真后悔。”

“噢！别谈这些事！”他说，“首先，你从来没有对我发过什么火。”

“发过！”她说，“我再对你说一遍，我感到后悔。你也明白，我早就领悟到一个女人对像你这样的男人来说，不可能就是一切；哪怕世上所有的女人都不可可能意味着一切；然而我没有真正地接受这一现实。现在，我已经准备用百分之百的宽厚之心去爱你，这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有你自己的事业，它应该摆在首位。”

“什么事业？”

她终于扮出了笑脸：“我已经意识到我也许经常给你添麻烦，我也理解你渴望重新过一过独身的生活。可你尽可放心：独身，自由，我全部答应你。”她紧紧地盯着亨利，“我亲爱的，你是自由的，你要牢记这一点；再说，你也刚刚证明了这一点，不是吗？”

“是的。”他说，他低声补充了一句：“可我已经向你解释过……”

“我记得，”她说，“但是我对你肯定地说，鉴于我内心发生的变化，你再也没有理由要独自搬到旅馆去住。听我说：你渴望独立，渴望冒险，可你也想要我，对吗？”

“当然。”

“那就留在这儿；你决不会对此感到后悔的，我向你发誓；你将发现我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今之后，我对你来说将是多么轻松愉快。”她站起身，伸手拿起电话，“女门房的侄子马上就把你的箱子送上来。”

亨利站了起来，向室内的便梯走去。“以后再说吧。”他心里想。他不能刚一踏进家门就无情地折磨她。“我去洗一洗。”他说，“他们在报社等着我。我只是回家来亲亲你。”

“我完全理解。”她充满柔情地说。

“她将尽一切努力向我表明我是自由人。”亨利坐进黑色小车，心里没好意地想。“噢！可这不会持续多久，我在她身边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耿耿于怀地暗自盘算着，狠了狠心，“明天我就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眼下，他再也不愿多想她。重新置身于巴黎，他心里多么欢畅！街道上，灰蒙蒙的，去年冬天，人们饥寒交迫，如今，他们每人终于都有了鞋穿；再说，还可以跟他们交谈，为他们讲话；在葡萄牙之所以那么令人沮丧，是因为常常感觉到自己纯粹是一个证人，一个对异国灾难无所救助的证人。亨利下了车，亲切地看了看报社大楼的门面。《希望报》情况如何？他的小说真的获得了成功？他快步登上楼梯，随之响起一片欢呼声；一个条幅遮住了走廊的天花板：欢迎旅行归来的人。他们沿墙站立，夹道欢迎，每人高举着钢笔，仿佛持着

利剑，齐声高唱着一支歌曲，歌词难以听清，什么“萨拉查，运气差”。只有朗贝尔不在场。为什么？

“大家都到酒吧去！”吕克喊叫道，有力地用手一拍亨利的肩膀，“很好吧？”

“你晒得黑极了！”

“瞧瞧这双鞋子。”

“你给我带回了什么报道？”

“瞧你穿的衬衫！”

他们触摸着套装、领带，一个个赞叹不已，他们提了一个又一个问题，酒吧招待则一杯又一杯地斟酒。亨利也询问着有关情况：印数确实有所下降，但报纸马上又要以大版面出版，这样情况就会好转；报社曾遇到了新闻检查方面的麻烦，不过并不严重。众人对他的书都倍加赞扬，他收到的读者来信多极了；他出差期间出版的《希望报》已备一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通过普莱斯顿，也许能偷偷地弄到一点纸张，那个美国佬还答应帮助出一份星期日增刊；此外，尚需讨论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一连三个晚上，亨利没有睡上一个好觉，被这声音，这话声，这笑声，这许许多多问题搅得有点晕乎乎的：既晕乎乎，又乐滋滋。现实生活如此欢乐而又紧张，却跑到葡萄牙去寻觅早已埋葬了的、消逝了的过去，多蠢的念头。

“我一回来高兴极了。”他内心冲动地说。

“大伙儿见到你也没有不高兴。”吕克说，又补充道：“相反，大家都开始迫切需要你；我把话说在前头，你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我正巴不得。”

打字机咔咔作响，他们打着滑步，在走廊里四散而去，爆发出阵阵笑声：国家刚刚诞生，人们都还是零岁，他们显得多么年轻！亨利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坐到扶手椅上，内心升腾起一股老坐办公室的人特有的欢愉。他打开《希望报》的最近几期：常见的署名，漂亮的设计，没有浪费一点版面。他把整个一个月的报纸一期接一期浏览了个遍。他不在场，他们照样干得十分出色，这正表明了他的成功所在：《希望报》不仅仅是一场冒险的战斗，而且是一项十分牢固的事业。樊尚有关荷兰的报道极为出色，朗贝尔关于集中营的文章更加精彩。毫无疑问，他们都善于用恰当的笔调：没有一句蠢话，没有任何谎言，也没有一个不实之词。《希望报》以其正直触动了知识分子，以其生动赢得了广大的普通读者。唯有一点不足：塞泽纳克的文章极为平庸。

“我可以进来吗？”

朗贝尔不好意思地站在门洞处，满脸微笑。

“当然！你躲到哪儿去了？你完全可以去车站嘛！可恶的无情种。”

“我想车上坐不下四个人。”朗贝尔一副尴尬的神情说道。“还有他们那个小小的庆祝会……”他一撅嘴巴补充道，话说到半截，又吞了回去，最后又说道：“不过现在，我打扰你吗？”

“一点也不。你坐吧。”

“旅行愉快吗？”朗贝尔一耸肩膀，“也许别人问你已经不下二十遍了。”

“马马虎虎，美丽的景色，可有七百万人食不果腹。”



“他们的衣装挺漂亮。”朗贝尔一边打量着亨利，一边称赞道，继而微微一笑：“那儿，红色的皮鞋是流行式样？”

“橘黄色或柠檬色，可皮革都是优质的。富人应有尽有，这正是最可恶之处，我到时再跟你细说。还是先把这里的情况跟我谈谈。我刚刚读了你的文章，文章很出色，你知道。”

“简直就像篇法语作文。”朗贝尔自嘲地说，“谈谈您参观集中营的体会，写这个题目的，我想至少不下二十人。”他脸上陡然一亮：“你知道，真正棒的是你的书；我当时累得浑身散架，我一直开车奔波，一天一夜没合眼，可一拿起你的书，我一口气往下读，不读完怎么都安不下心来睡觉。”

“你是在讨我欢心吧！”亨利说。

溢美之词往往让人难受，可朗贝尔确实让他打心眼里高兴。亨利梦寐以求的正是有人这样读他的书：一个性急的小伙子，迫不及待地要连夜把全书读完。仅为了这点就值得写作，尤其是为了这一点才写作。

“我想你读读评论文章会挺有兴趣的。”朗贝尔说，往桌子上扔了一个黄色的大纸袋，“我也凑了点热闹。”

“当然，我挺有兴趣，谢谢。”亨利说。

朗贝尔有点焦虑不安地看了看亨利：“你在那边写东西了吗？”

“一篇报道。”

“你眼下能马上给我们写另一部小说吗？”

“我一有时间就立即动笔。”

“抽点时间吧。”朗贝尔说，“我以为你不在报社这段时间……”

他的脸霍地一红：“你得做好防备。”

“防谁？”亨利淡然一笑，问道。

朗贝尔又犹豫了一下：“听说迪布勒伊正焦急地等着你。千万别上他那一套的当……”

“我或多或少已经陷进去了。”亨利说。

“那么，赶紧摆脱出来。”

亨利微微一笑：“不。今天要继续不参与政治，已经不可能。”

朗贝尔的脸布上了阴云：“啊！那你是在责备我？”

“一点儿也不。我是说就我自己而言，已经不可能。我们俩的年纪可不一般大。”

“这与年纪又有什么关系？”朗贝尔问。

“你到时就明白了。人们总是在不断明白事理、不断变化。”他淡然一笑，“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抽时间写作。”

“必须这样。”朗贝尔说。

“噢，快说，你说得那么好听，你跟我谈的那些消息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些消息一文不值。”朗贝尔说。

“请都给我拿来，然后咱们抽个晚上一起去吃顿晚餐，我一定好好跟你谈谈看法。”

“那好。”朗贝尔说。他站起身。“我猜想你不愿接待她吧，可那个小玛丽-昂热·比塞非要采访你不可，她已经等了两个小时，我怎么回她的话？”

“就说我从不接受采访，我忙得不可开交。”

朗贝尔把身后的门关好，亨利把黄色纸袋里的东西全倒在桌上。女秘书在鼓鼓的卷宗夹上标着：小说通讯。他犹豫了片刻。他在战争

期间创作了这部小说，从未考虑等待它的将是何种命运，甚至也不敢肯定会有什么命运等待着它。如今，小说问世了，人们也阅读了；亨利也就受到了评判、议论，得到了评价，就如同他经常评判、议论他人一样。他把剪报一一摊开，开始浏览起来。波尔说什么“一举成功”，他以为她夸大其辞；可事实如此，评论家们用的也是赞美之词。朗贝尔显然抱有偏心，拉舒姆也不例外，所有这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批评家对抵抗运动的作家都存有明显的善意；不过，友人和陌生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证实了新闻界的评价。确实，即使保持清醒头脑，也大有令人得意的地方：这些怀着激动心情写下的文章的确激荡人心。亨利欢快地伸了伸腰。刚刚发生的这一切具有几分神奇的色彩。两年前，厚实的窗帘紧遮着漆成蓝色的窗玻璃，他与黑暗的城市和整个地球隔断了联系，他的那支笔在纸上犹豫地摆动。如今，出自他喉舌的那些很不清晰的呐喊在世间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声音，他内心秘密的运动化作了他人心田中的真理。“我本该向纳迪娜好好解释。”他心里想，“倘若别人无关紧要的话，那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但是，如果说他人举足轻重的话，那要用词语赢得他们的友情、他们的信任，又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要听到自己的思想在他们心中引起反响，这谈何容易。”他抬起眼睛，门开了。

“我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一个抱怨的声音说，“你总可以给我一刻钟吧。”玛丽-昂热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是用于《未来》杂志，要一大篇东西，登在头版，并配以照片。”

“请听着，我从不接受采访。”

“关键就在这里，这样一来，我的采访就价值千金了。”

亨利摇了摇头。玛丽-昂热愠怒地接着说：“你总不能为了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毁了我的事业吧？”

亨利微微一笑。一刻钟的交谈对她如此举足轻重，可对他来说却那么微不足道！说实在的，他的心绪颇佳，真想谈谈自己。喜爱他作品的人中，肯定有不少希望能对作者有更深入的了解；他愿意给他们提供一点情况，目的在于使他们能真正地对他产生好感。

“行。”他说，“你需要我给你讲点什么？”

“呃，首先，你的出身？”

“我父亲是蒂勒的一个药店老板。”

“然后呢？”她问道。

亨利迟疑了片刻。开门见山就谈自己，这不太妥当。

“谈吧。”玛丽-昂热说，“跟我谈谈儿童时代的一两件往事。”

往事，他跟所有人一样都有不少，可他觉得那些往事并不太重要，唯独在亨利二世餐厅用的那次晚餐，那天晚上，他终于摆脱了心头的恐惧感。

“好，这就算一件。”他说，“这几乎无足轻重，可对我来说则是许多事情的开端。”

玛丽-昂热把铅笔支在采访本上，用一副鼓励的神态望着他。亨利继续说道：

“我父母之间最重要的话题，是威胁着世界的灾难：红祸、黄祸、野蛮、堕落、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我把这一切总看成是恐怖的魔鬼，它们就要吞噬整个人类。那天晚上，我父亲如同往昔那样预言：革命就要爆发，文明即将堕落，我母亲则一副惊骇的神情随声附和。我突然想到：‘可不管怎么说，最终获胜的也还是人。’这也许不是我

当时想的原话，可意思差不多。”亨利微微一笑，“那效果神奇极了，魔鬼不复存在：天底下相处的都是人。”

“然后呢？”玛丽-昂热追问道。

“然后嘛，自这天以后，我驱逐了魔鬼。”他说。

玛丽-昂热神色困惑地看了亨利一眼：

“可你的故事，它是怎么结束的？”

“什么故事？”

“你刚刚开始讲的故事。”她不耐烦地说。

“没有别的结尾。它已经讲完了。”亨利说。

玛丽-昂热“啊”了一声，紧接着以抱怨的口吻补充道：“我想要点生动别致的东西！”

“噢！我的童年没有任何别致之处。”亨利说，“药店让我生厌，外省的生活令我烦恼。万幸的是，我在巴黎有个叔叔，他介绍我进了《星期五》报社。”

他打住话头。他初到巴黎的几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可不知从何说起。

“《星期五》是份左派报纸。”玛丽-昂热说，“你那时就有了左派的思想？”

“我特别恐惧右派的思想。”

“为什么？”

亨利思虑了片刻：“我当时二十岁，雄心勃勃，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成为民主党人。我想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不过是公平条件下首屈一指的人物。倘若竞赛一开始就有人耍了花招，那下的赌注也就失去其一切价值。”

玛丽-昂热在本子上刷刷直记，她看上去并不聪慧。亨利搜索一些通俗易懂的词句：“一只黑猩猩和人类中最低能的人之间的差别要比后者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差别大得多！表现自我的意识，这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亨利正要张口往下说，可玛丽-昂热抢在了他的前面：

“跟我谈谈你的第一步。”

“什么第一步？”

“涉足文坛的第一步。”

“我或多或少一直都在写点什么。”

“《不幸的遭遇》问世时，你多大年纪？”

“二十五岁。”

“是迪布勒伊大力推荐了你吧？”

“他帮了我许多忙。”

“你是怎么与他结识的？”

“报社派我去采访他，却是他设法让我说话；他让我以后去看他，我也就去了……”

“谈谈细节吧。”玛丽-昂热以抱怨的口吻说道，“你谈得糟透了。”她紧紧地盯着亨利的眼睛：

“你们在一起时都谈了些什么？”

他一耸肩膀：“什么都谈，跟普通人一样。”

“他鼓励你写作了吗？”

“是的。我一写完《不幸的遭遇》，他就让莫瓦纳读了，莫瓦纳很快就接受了……”

“你获得了巨大成功？”

“获得了行家的好评。你知道，那真可笑……”

“是的，就跟我谈一点可笑的事吧！”她一副诱惑的神情说道。

亨利有点犹豫。

“可笑嘛，是因为人们往往以巨大、辉煌的梦想开始，可后来获得一点小小的成功，也就十分满足了……”

玛丽-昂热叹息道：

“有关你其他作品的名字及其发表年月，我都有了。你是否应征当过兵？”

“在步兵部队，是个二等兵。我从来没有想过当军官。五月九日在武济耶附近的天神山我负了伤，被送到蒙特利马尔，九月份回到巴黎。”

“你在抵抗运动中具体做了些什么？”

“吕克和我于一九四一年创办了《希望报》。”

“可你还从事过其他活动？”

“那无关紧要，不谈了。”

“那好。你最近的一部作品，你写作的确切时间？”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

“你是否已经动笔写别的东西了？”

“还没有，不过我就要写。”

“什么？一部小说？”

“一部小说。可目前还十分模糊。”

“我听说要办一份杂志？”

“是的，是一份月刊，将由我和迪布勒伊负责，由莫瓦纳出版，名叫《警觉》。”

“迪布勒伊正在创建的那个党到底是怎样一个党派？”

“说来话长。”

“怎么？”

“去找他打听吧。”

“谁也接近不了他。”玛丽-昂热叹了口气，“你们都是怪人。要我有了名气，我一天到晚让人来采访。”

“那你就腾不出任何时间做事了，你也就一点名气都没有了。现在，你该行个好，让我工作了。”

“我还有一大堆问题要问呢！你对葡萄牙有何感受？”

亨利耸肩膀：“肮脏。”

“因为什么？”

“因为一切。”

“你再解释一下，我总不能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对读者说：肮脏。”

“那么，你就告诉他们萨拉查的父道主义是可耻的独裁，美国人应该尽快把他赶下台。”亨利像连珠炮似的说道，“不幸的是，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他就要把亚速尔群岛的空军基地卖给美国人。”

玛丽-昂热皱了皱眉头，亨利补充道：“如果这让你为难，你就别说，我马上就要在《希望报》上披露真情。”

“不，我一定要说！”玛丽-昂热说。她用一副深沉的神态看了看亨利：“到底是何种内因促使你做这次旅行？”

“听着，要在事业上出人头地，你并不非得提一些愚蠢的问题。我再跟你说一遍，行了，你还是乖乖地走吧。”

“我需要某些小插曲。”

“我没有什么插曲。”



玛丽-昂热小步离去，亨利感到有些失望：她没有提那些应该提的问题，他也丝毫没有谈他有必要谈的事情。可说到底，他该说些什么？“我希望我的读者了解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可我自己却没有完全定型。”噢，再过几天，他就要动笔投入新的创作，他一定设法系统地给自我画个像。

他重又开始阅读有关小说的通讯。有多少电讯和剪报需要细读，有多少信函需要回复，又有多少人需要接待！吕克已经有话在先：他要做的事多着呢。此后的几天里，他独自呆在办公室工作，只到睡觉时才回波尔处。每次他刚有点时间坐下来写专题报道，负责编排印刷的人便来索稿，有一页就取走一页。过分漫长的假日之后，这样拼命工作一阵，使他感到欢悦。他在电话中听出了斯克利亚西纳的声音，但内心没有激起一丝热情。

“喂，无情无义的家伙，你回来都四天了，还一直没见你露面。快到巴尔扎克街的伊斯巴饭店来。”

“抱歉，我手头有事。”

“别抱什么歉，快来！大伙儿等着你喝杯香槟叙叙友情呢。”

“谁等着？”亨利欢快地问道。

“里面有我。”响起了迪布勒伊的声音。“还有安娜、朱利安。我有几十件事要跟您谈。您到底在忙乎什么？您就不能从您那个洞穴里出来一两个小时？”

“我本打算明天去您家。”亨利说。

“还是快点来伊斯巴吧。”

“行，我这就去。”

亨利挂上电话，微微一笑。他十分渴望再见到迪布勒伊。他拿起话筒，拨通了波尔：

“是我。迪布勒伊夫妇和斯克利亚西纳在伊斯巴等着我们。是的，是伊斯巴饭店。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比你更清楚。我这就开车来接你。”

半小时后，他和波尔举步踏下一条石阶，石阶的两侧站着衣着古怪的哥萨克人。波尔穿了一条长裙，崭新崭新的，看来这绿色配她确实不太相称。

“多怪的地方。”她嘀咕道。

“跟斯克利亚西纳打交道，思想上对什么都得有所准备。”

外面，夜阑人静、阒无声息，以致伊斯巴饭馆的豪华显得让人惴惴不安：仿佛就像是进入刑房之前停留的一块邪恶之地。装饰的四壁血红一片，帷幔的波状皱褶红得像在滴血，茨冈乐手的丝绸衬衫也是殷红的颜色。

“啊！你们终于来了！你们摆脱了他们的纠缠？”安娜问道。

“他俩倒显得平安无事。”朱利安道。

“我们刚刚遭到了一帮记者的围攻。”迪布勒伊说。

“那些记者一个个都武装着照相机。”安娜补充说。

“迪布勒伊妙极了。”朱利安兴高采烈、结结巴巴地说，“他说……我记不起他说了些什么，反正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要再说几句，他差点就要对他们动起手来了……”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全都开了腔，唯独斯克利亚西纳在一旁发笑，流露出几分高人一筹的神态。

“我刚才真的以为罗贝尔就要动手了呢。”安娜说。

“他回答说：我们可不是博学的猢猻。”朱利安喜形于色地说。

“我向来把自己的脸面看作私人财产。”迪布勒伊充满尊严地说。

“问题是对像您这样的人来说，”安娜插言道，“露脸就算裸体；一旦露出您的鼻子和眼睛，那就成了裸露癖。”

“可他们却不给真正的裸露狂拍照。”迪布勒伊说。

“这就是个过错。”朱利安说。

“喝吧。”亨利给波尔递去一杯伏特加，说道，“喝吧，我们要补喝的杯数多了。”他说罢一饮而尽，然后开口问道：“可人家是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的？”

“真的，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惊诧得面面相觑。

“我猜想是饭店侍应部领班打了电话。”斯克利亚西纳说。

“可他不认识我们。”安娜说。

“他认识我。”斯克利亚西纳说。他咬着下嘴唇，犹如一位做了错事当场被捉住的女人，惊慌失色。“我希望他能根据你们的身份好好为你们服务，所以我把你们是谁告诉了他。”

“哼，我看你倒好像是干了件漂亮事似的。”亨利说。斯克利亚西纳那幼稚的虚荣心一直让他感到惊愕。

迪布勒伊哈哈大笑起来：“是他告发了我们，就是他本人！这可不是瞎编的。”他猛地朝亨利转过身子：“旅行如何？说是度假，可传说您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报告、搞调查。”

“噢！我总还是逛了一圈。”亨利答道。

“可读了您写的报道，人们反倒更想去别的地方游逛，那可是个凄惨的国家！”

“是凄惨，可也美丽。”亨利乐呵呵地说，“凄惨尤其是对葡萄牙人而言。”

“我不知道您是否存心那么写的。”迪布勒伊说，“可您确实写道，大海蓝蓝一片，那蓝色成了一种阴森可怖的色彩。”

“有时确实这样，可并非总是阴森可怖。”亨利淡然一笑，“您知道写作是怎么回事。”

“知道。”朱利安说，“要不说真话，就必须撒谎。”

“不管怎么说，我为归来感到高兴。”亨利说。

“可您并不着急见您的朋友？”

“着急，我迫不及待。”亨利说，“每天清晨，我都对自己说要马上去你们家走一趟，可一转眼又到了下半夜。”

“是的。”迪布勒伊以责备的口吻说道，“那么，明天您得想办法好好看住您的表，我无论如何要把一大堆事情告诉您。”他微微一笑：“我认为我们正有个良好的开端。”

“您已经开始招兵买马了？萨玛泽尔打定主意了？”亨利问道。

“他并不完全同意，可总能达成某种妥协。”迪布勒伊回答说。

“今天晚上不要谈论正经事！”斯克利亚西纳说。他向一位戴着单片眼镜、神态傲慢的领班打了个手势：“两瓶烈性啤酒。”

“非要不可吗？”亨利问道。

“他呀，是指挥人的。”斯克利亚西纳双目不离领班，说道，“自一九三九年以来，他消瘦多了。他过去是个上校。”

“你是这地方的常客吧？”亨利问道。

“每当我想让自己心碎，我便来此细听音乐。”

“比这更经济的办法多着哩！”朱利安说，“再说，所有人的心早就已经碎了。”他神色茫然地下结论道。

“我的心要听到爵士音乐才能碎。”亨利开腔道，“而你的这些茨冈人，他们反倒砸了我的脚。”

“噢！”安娜说。

“爵士音乐！”斯克利亚西纳说，“我已经在《阿贝尔之子》一书里就爵士音乐发表了明确的看法。”

“您以为谁都可以发表什么明确的看法吗？”波尔声音傲慢地问道。

“我不想争辩，您到时自己读吧，法文版很快就要问世了。”他一耸肩膀。“印数五千册，这微不足道！对富有价值的书应该有特别措施。你的书印了多少册？”

“呃，五千册。”亨利回答道。

“真荒唐。你写的终归是一部有关德国占领时期的书呀，像这样的书应该印十万册。”

“你跟新闻部长说去好了。”亨利说。斯克利亚西纳气盛到了蛮横的地步，令亨利感到不快；朋友之间应避免谈论自己的作品，不然会让大家都尴尬，扫了大家的兴。

“我们下月就要有一本新的杂志问世。”迪布勒伊说，“呃，为了弄到一点纸张，我跟您说实话吧，那可得费力！”

“这是因为部长不知他的职责何在。”斯克利亚西纳说，“纸嘛，我可以帮他弄到。”

只要斯克利亚西纳一亮开那个说教的嗓门，谈论起技术方面的问题，那便滔滔不绝。在他得意洋洋、夸口要为法兰西弄到大量纸张的

同时，安娜低声说道：“您知道，我觉得二十年来没有任何一部书像您的作品一样让我动心，这……这正是经历了这四年之后大家都渴望拜读的一部书。它激起了我内心的情感，我激动得几次不得不合上书，出门到街头漫步，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她霍地脸上绯红。“说这些话时，总感到自己愚蠢，可要是不说，也同样愚蠢，说了反正不会让人难过的。”

“不，反而让人高兴。”亨利道。

“您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安娜说，“所有那些不愿忘却过去的人。”她怀着某种激动的心情补充道。亨利富于好感地朝她微微一笑。今晚，她身着苏格兰裙服，显得格外年轻，而且妆化得十分得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看去远比纳迪娜年轻。纳迪娜可从来没有脸上绯红的时候。

斯克利亚西纳稳住了嗓门：

“这本杂志可以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和行动工具，可条件是，它不能只表达某一小宗派的意图。我认为像路易·伏朗热这样的人应该是你们编辑部的成员。”

“不行。”迪布勒伊说。

“知识分子一时失足，并不那么严重。”斯克利亚西纳说，“哪有从不出错的知识分子？”他声音阴郁地补充道：“难道他必须整整一辈子承担他过错的重负？”

“一九三〇年间，在苏联入党，这远不是什么过错。”迪布勒伊说。

“如果没有权利犯错，那这就是罪行了。”

“这跟权利无关，”迪布勒伊说。

“您岂敢以判官自居？”斯克利亚西纳不由分说地高声道，“您了解伏朗热的原因、知道他的理由吗？您肯定加入您队伍的人都比他强吗？”

“我们并不在审判。”亨利说道，“我们是在表明立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伏朗热相当奸滑，并没有真正牵扯进去，可亨利早就发誓决不与他握手言和。再说，当亨利读了路易在自由区撰写的文章，他并不感到惊诧，因为自从他俩中学毕业分手后，他们几乎由朋友变成了死敌。

斯克利亚西纳一耸肩膀，像是看破了一切，然后招呼领班：“再来一瓶！”他再次偷偷地打量着那位年迈的流亡者：“那个脑袋，你们看了不震惊吗？瞧那眼皮底下的眼囊、嘴角的皱纹，全是衰老的征兆。战前，那张脸上还带着傲慢；可他们那个圈子的人的怯懦、荒淫，以及他们的背叛，折磨得他不成人样了。”

他目光呆滞地盯着那人。亨利暗忖：“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他逃离了自己的祖国，故国的人们骂他为叛徒；他的虚荣心无疑可以从中得到解释：他没有祖国，孑然一身，没有任何人为他作证。为此，他无论如何必须保证自己的名字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所表现。

“安娜！”波尔惊叫起来，“多可怕呀！”

安娜正把杯中的伏特加往她的香槟里倒：

“这一来香槟就有劲儿了。”她解释道，“尝一尝，味道好极了。”

波尔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喝？”安娜问道，“一喝酒，人就更开心了。”

“喝酒等于要我头疼。”波尔答道。

朱利安哈哈大笑起来，“您让我想起了那位年轻姑娘，那是在蒙巴纳斯街一家小旅馆门前遇到的一位迷人的少女。她对我说：‘噢！生活，等于要我的命……’”

“她才没有说呢。”安娜道。

“她有可能说过。”

“不过，她言之有理。”安娜像个醉鬼似的用教训人的口吻说道，“生活嘛，差不多等于死……”

“别说了，哎哟！”斯克利亚西纳说道，“倘若您不听，至少得让我听呀！”

乐队刚刚充满激情地奏起了《黑色的眸子》。

“咱们让他的心去碎吧。”安娜说。

“与一颗破碎的心去搏斗……”朱利安喃喃地说。

“你们别吵了！”

他们不再做声。斯克利亚西纳两眼死盯着小提琴手跳动的手指，一副发狂的神态，倾听着昔日的某个回忆。他自以为任性是男子汉的气概，可大家向他让步，是把他当作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大家如此顺从，他本该生疑：这也许是冲着他的……亨利微微一笑，望着轻轻敲击着桌面的迪布勒伊。若对方不过分纠缠不清，那迪布勒伊永远都显得彬彬有礼，可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谦恭姿态也是有限度的。亨利多么渴望安安静静地与他倾心交谈，可是他并不着急；虽然他不喜欢这香槟酒、茨冈音乐和这种虚假的豪华，但这仍不失为清晨两点在公共场所的一次欢聚。“我们重又相聚在一起了。”亨利心里在想。安娜、波尔、朱利安、斯克利亚西纳、迪布勒伊，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朋



友”两字在他心头发发出欢乐的声响，犹如圣诞树上噼啪作响的穗状装饰。

斯克利亚西纳狂热地鼓掌。这时，朱利安拉着波尔步入了舞池，迪布勒伊朝亨利转过身子：

“您在那边遇见的那些家伙，他们都希望来一场革命？”

“他们希望，不幸的是在佛朗哥没有被清除之前，萨拉查不会倒台，而美国人似乎并不着急。”

斯克利亚西纳耸肩膀：

“我明白他们不想在地中海地区建立共产党的基地。”

“难道你因为恐惧共产主义而不惜容忍佛朗哥的统治？”亨利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担心你们不太了解形势。”斯克利亚西纳答道。

“放心吧。”迪布勒伊乐呵呵地说，“我们对形势十分了解。”

斯克利亚西纳张口欲言，可迪布勒伊笑哈哈地挡住了他的话，“知道，您高瞻远瞩。可您总不是诺斯特拉达穆斯 <sup>[3]</sup> 吧，对于五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您并不比我们更有眼光。可以肯定的是，就目前而言，所谓的斯大林危险纯属美国捏造。”

斯克利亚西纳满脸怀疑的神色瞧了瞧迪布勒伊：“您十足一副共产党人的腔调。”

“啊！对不起！一个共产党人决不可能义正词严地大声说出我刚才的那番话。”迪布勒伊说，“要是攻击美国，他们就会谴责您搞第五纵队的勾当。”

“禁令很快就会改变。”斯克利亚西纳说，“您只不过比他们先行了几个星期，仅此而已。”他一皱眉头：“别人经常问我，你们到底在哪些方面与共产党人有所区别，我承认我难以回答。”

迪布勒伊哈哈大笑：“那就别回答。”

“哎呀！”亨利开腔道，“我以为真的严禁谈论正经的事情呢。”

斯克利亚西纳气恼地一耸肩膀，表示无关紧要的闲聊再也不合时宜。“这是一种逃避行为吧？”他以谴责的目光紧逼着迪布勒伊问道。

“噢，不，我可不是共产党人，您完全知道。”迪布勒伊说。

“我一无所知。”斯克利亚西纳脸色骤变，换了一副最为迷人的笑脸，“真的，我真希望了解您的观点。”

“我认为目前共产党人卷了进去。”迪布勒伊说，“我十分清楚他们为何支持雅尔塔协定，他们的目的是想给苏联留下慢慢恢复的时间。可结果呢，世界将分裂成两个阵营，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相互争斗。”

“您责备他们的就这些？只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斯克利亚西纳声色俱厉地问道。

“我责怪他们鼠目寸光，只看鼻子底下的利益。”迪布勒伊一耸肩膀，“重新建设，这十分美好，可不能随随便便采用哪种方式。他们接受美国的援助，可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莫及。法国必定慢慢被美国所控制。”

斯克利亚西纳一口气饮尽了杯中的香槟酒，砰的一声把杯子放在桌上：“这可是一种乐观主义的预言！”他紧接着声音严肃地说：“我不喜欢美国，我也不相信大西洋文明，可我希望美国占有霸主地位，这

是因为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物质丰富的问题，而唯独美国可以给我们以丰富的物质。”

“丰富的物质？为谁？以什么代价？”迪布勒伊追问道。他气愤地又添了一句：“等到我们沦为美国殖民地的那一天就太妙了！”

“您宁愿苏联把我们吞并掉？”斯克利亚西纳反问道。他一挥手，挡住了迪布勒伊：“我知道：您梦想一个统一、自主、社会主义的欧洲。可若它拒绝美国的保护，势必落到斯大林的手中。”

迪布勒伊耸了耸肩膀：“苏联不愿吞并任何地方。”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欧洲决不可能建立。”斯克利亚西纳说。

“这是您说的！”迪布勒伊道。他紧接着激动地说：“无论如何，在法国，我们有着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这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阵线政府。为此，必须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经受住考验。”他朝亨利转过身子。“不应再浪费时间。眼下人们都感到前途已经在望，咱们可不要等着他们失望。”

斯克利亚西纳又灌了一杯伏特加，沉浸在对领班的审视之中，他不愿再和疯子们讲什么道理。

“您刚才说已有个良好的开端？”亨利问。

“已经有了开端，可现在必须继续走下去。我希望您尽早和萨玛泽尔见面。本周六召开委员会会议，我指望您了。”

“让我喘口气吧。”亨利说。他有点惴惴不安地看了看迪布勒伊。要想顶住这亲切而又严厉的微笑的进攻，谈何容易。

“为了您能参加，我已经推迟了讨论。”迪布勒伊带几分责备的口吻说。

“您不该推迟。”亨利说，“我向您肯定，您过高估计了我的水平。”

“而您却过低估计了自己的水平！”迪布勒伊说。他严厉地瞅了亨利一眼：“这四天里，您对整个形势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形势变化极大！您也许已经意识到保持中立再也不可能。”

“可我从来就不是保持中立的！”亨利说，“我向来同意与革命解放联合会一起行动！”

“咱们有话明说：您只不过答应我们用您的名字并参加了几次活动，仅此而已。”

“别忘了，我手头有一份报纸。”亨利不快地说。

“说得正对，我考虑最多的正是您的那份报纸：它再也不能持中立态度。”

“可它绝不中立！”亨利诧异地说。

“那还要怎么才算中立！”迪布勒伊耸肩膀，“站在抵抗运动一边，这不再成其为什么纲领。”

“我没有纲领。”亨利说，“可一旦需要，《希望报》便会表明立场。”

“噢！不，它没有表明立场；再说它与别的报纸没有两样，你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可实际上串通一气，迟迟不表态。”迪布勒伊的话声中带着愤怒，“从《费加罗报》到《人道报》，你们全都是些故弄玄虚的骗人玩意儿；你们对什么都是唯唯诺诺，无论是对戴高乐，还是对雅尔塔协定，无不点头称是；你们假装相信还有什么抵抗运动，相信我们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有一个人在他最近撰写的社

论中简直在胡说八道，那就是您的好友吕克。说真的，我们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已经开始倒退：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胆量披露真相！”

“我还以为您与《希望报》观点一致呢。”亨利说道。他的心开始跳得更快了。他感到震惊，这四天里，他和这份报纸息息相关，就好比与自己的生命密不可分。可《希望报》突然遭到谴责，而且是遭到迪布勒伊的谴责！

“对什么问题观点一致？”迪布勒伊问道，“《希望报》根本没有路线。你们天天抱怨没有实行国有化。可还有呢？真正值得一写的是谁制止了国有化、原因何在。”

“我不愿让自己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亨利说，“当舆论坚决要求之时，改革自然会进行。我正设法鼓动舆论，为此，我决不能让我们一半的读者感到不快……”

“您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吧？”迪布勒伊一副怀疑的神色问道。

“不。”

“那就别来跟我谈什么舆论。”迪布勒伊说，“一方是要求改革的无产阶级，另一方是不要改革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这是因为它不太清楚它的利益何在，可别指望影响它。起决定因素的是形势。”

亨利一时拿不定主意。阶级斗争并未过时，难道这就宣判了对人们的诚意与情理的任何召唤都无济于事？

“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错综复杂。”他说道，“我丝毫不敢肯定能对小资产阶级起到什么作用。”

迪布勒伊示意有话要说，可亨利挡住了他，“还有，”他激动地说，“工人们阅读《希望报》，这是因为他们从《希望报》中读到了与《人道报》不同的东西，是因为《希望报》给他们注入了新鲜空气；若我站在共产党报纸的同一立场，或者我一味重复他们说过的事情，或者我采取反对他们的态度，那工人们都会让我垮台。”他接着用妥协的口吻补充道：“我要打动的人比您要聚集的人多得多。为此，我不得不拥有一个广阔得多的活动范围。”

“对，您打动了许多人。”迪布勒伊说，“可您刚刚亲口道出了其原因之所在！如果说您的报纸让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话，那是因为它不妨碍任何人。它什么都不抨击，什么都不维护，只不过把各种问题都摊开而已。大家读起来津津有味，可就像是在读一份地方小报。”

出现了一阵沉默。波尔又来到安娜身边坐下，她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而安娜则显得尴尬不堪；朱利安已经不见踪影；斯克利亚西纳终于从沉思中醒来，一会儿看看亨利，一会儿又瞧瞧迪布勒伊，一副仲裁的神态；可他们俩并没有争吵不休。亨利面对对方激烈的攻击哑口无言。

“可您到底想干什么？”亨利问道。

“要您表明立场，确定与共产党的关系。”迪布勒伊说。

亨利满腹狐疑地打量着迪布勒伊，迪布勒伊常常满腔热情地参与他人的事情，可人们也往往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干的是自己的事。“说到底，您建议我执行的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纲领。”

“对。”迪布勒伊回答道。

“您总不至于试图让《希望报》成为您那个运动的报纸吧？”

“这很正常。”迪布勒伊说，“《希望报》的弱点就在于不代表任何运动，而另一方面，一个运动若无报纸，就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的目标一致，但方法并不一致。”亨利说。他后悔地想：“迪布勒伊那么迫不及待地要见我，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他满怀的欢悦烟消云散。“朋友之间夜晚相聚，难道就不能不谈政治？”他在心底自问。并没有必要急着谈这些事情，迪布勒伊完全可以推迟一两天，他现在竟变得像斯克利亚西纳一样狂躁。

“问题正在这里，您改变一下方法大有好处。”迪布勒伊说。

亨利摇摇头：“我到时把我收到的一些信件给您看看，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来信，那是些教师、大学生，《希望报》中最让他们喜欢的，就是它的真诚。如果我突出某个纲领的话，那我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

“当然，若有人怂恿他们随波逐流，知识分子总是兴高采烈。”迪布勒伊说，“他们的信任……就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有什么用场？”

“给我两三年的时间，我保证用手拉着他们加入您的革命解放联合会。”亨利说。

“您真相信这一点？那么，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理想主义者！”迪布勒伊说。

“有可能。”亨利微显愠怒地说，“在一九四一年，我也曾被人说成理想主义者。”他以坚定的声音补充道：“我对一份报纸应该如何办自有看法。”

迪布勒伊茫然地一摆手：“我们以后再谈吧。可请您相信我：从现在起六个月后，《希望报》一定会追随我们的政治路线，要不就会成

为废纸一张。”

“得了，我们六个月后再谈。”亨利说。

他突然感到疲惫、慌乱。迪布勒伊的提议逼得他茫然不知所措，他横下一条心，决不答应。可他目前需要单独清静一会儿，以清醒清醒头脑。“我该回家了。”他说。

回家的途中，波尔一直保持缄默，可两人刚一踏进家门，她便开了腔：

“你不会把这份报纸给了他吧？”

“当然不会。”亨利说。

“你真的有把握？”她问道，“迪布勒伊非要得到它，他可是死不回头的。”

“我也一样。”

“可你最终总对他让步。”波尔突然扯开了嗓门，“你为何同意加入那个革命解放联合会？好像你手头的事还不够做似的！你回来都四天了，可我们俩还没有交谈过五分钟，你那部小说也没有写上一行字！”

“我明天早上就动笔。报社已经开始恢复正常了。”

“你可没有理由因此而揽些新的苦差使。”波尔的嗓门越来越高，“迪布勒伊十年前帮过你的忙，他总不能让你报答一辈子。”

“可是，波尔，我跟他共同工作，绝不是为了报答他，这是因为我对他有兴趣。”

她一耸肩膀：“算了吧！”

“我说的是实话。”

“你还相信他们那一套：会爆发新的战争？”她忐忑不安地问道。



“不相信。”亨利说，“在美国也许确实有一帮好战分子，可他们那里并不喜欢战争。真正的情形是世界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变，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变。必须想方设法让世界向好的方向变化。”

“世界一直都在变。战前，你就没有插手，随它怎么变。”波尔说。

亨利步履坚定地登上楼梯，“现在再也不是战前。”他打着呵欠说。

“可为什么就不能像战前一样生活？”

“情况迥然不同了，我也一样。”他又打了一个呵欠，“我困了。”

他困了，可他一躺在波尔的身边，怎么也无法入睡：这是因为香槟、伏特加和迪布勒伊的缘故。不，他决不把《希望报》让给他：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根本用不着任何说明，可他还是想给自己寻找几个充足的理由。一个理想主义者：真的吗？首先，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显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相信人的自由、善良和思想的力量。“您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吧？”不，他并不认为，可他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他仰躺着，想抽支香烟，可又怕吵醒波尔，那样她准会兴味盎然地为他难以入睡而设法逗他开心。他一动不动。“天啊！人是多么无知！”他有些焦虑不安地自言自语。虽然他博览群书，但只不过在文学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知识，而且还远远不足！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安。参加抵抗运动，创办地下报纸，并不需要特殊的能力：他满以为一切都将如此进行下去。他恐怕是错了。何为舆论？何为思想？词语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会产生什么作用？若要办好一份报纸，必须有能力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渐渐地的一切

都产生作用。“人往往不得不在无知中做出决定！”亨利心中在想。即使迪布勒伊，尽管他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也经常盲目行动。亨利叹了口气：他不会安于这次失败；无知具有程度的差别：事实是他对政治生活毫无准备。“我只得去学着干。”他在心底对自己说。可是，倘若他要深入一步，还需几年的努力：经济、历史、哲学，永远没有止境！哪怕想对马克思主义有个粗略的了解，也得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这样一来，就再也谈不上写点什么了。然而，他执意写作。那怎么办？他总不能因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全面的了解而放弃《希望报》吧。他闭上眼睛。这件事中有着某种不公平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和众人一样不得不从事政治，可这不该苛求进行特殊的学习；倘若这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员的专门领域，那就不必要求他涉足。

“我所需要的，是时间！”亨利醒来时想，“唯一的问题，是找到时间。”公寓的门刚刚打开又关上了。波尔已经出过门，又回到家里，正轻手轻脚在房子里走动。他掀掉被子。“若我独自生活，一天就可赢得几个小时的时间！”再不用毫无裨益地闲聊，无需正正规规地进餐：他可以在街角的比亚尔小咖啡馆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阅读报纸，可以一直工作到去报社的时刻，中午饭一个三明治就可以解决问题；报社的事一干完，他可以草草地吃点晚饭，然后一直阅读到深夜。这样，他就可成功地三头并进，编《希望报》、写小说和读书三不误。“今天上午我就跟波尔谈谈。”他下定了决心。

“你睡得好吗？”波尔快活地问。

“很好。”

她哼着小曲在桌上摆好鲜花。自从亨利回来之后，她一直故意显得兴冲冲的。“我给你煮了名副其实的咖啡，还有新鲜黄油。”

他坐在餐桌旁，动手往一块烤面包上抹黄油：“你吃过了？”

“我不饿。”

“你永远都不饿。”

“噢！我吃过了，我向你保证，我吃得很香。”

他咬了一口烤面包片。怎么办？他总不能用导管给她喂食吧。“你起得很早。”

“是的，我再也睡不着了。”她把一本切口涂金的厚厚的相册放在桌上，“我用它摆上了你在葡萄牙拍的照片。”她翻开相册，指着布拉加的石阶：纳迪娜笑咪咪地坐在一级台阶上。

“你瞧我并不试图回避事实真相。”她说。

“我完全清楚。”

她不回避事实真相，却总是绕着弯，这就愈发让人困惑不解了。她翻了几页，说：“甚至在你孩童时代的照片里，你就已经有了这种怀疑的微笑，你跟你小的时候是多么像啊！”他过去曾协助她搜集这些纪念物，可今天在他看来这一切纯属枉然；波尔仍然如此固执地挖掘已经埋葬了的他，把他供奉起来，为他的尸体涂抹防腐香料，亨利对此感到气恼。

“我与你结识的时候，你就是这副样子！”

“我可没有一副精明的模样。”他推开相册说。

“你当时年轻，要求很苛刻。”她说。

她站在亨利面前，陡然充满激情地说：

“你为什么接受了《未来》的采访？”

“啊！最近一期出版了？”

“是的。我带回来了。”她到内屋找到了杂志，扔在桌上，“我们以前谈妥的，你永远都不接受采访。”

“如果必须遵循以前做出的一切决定的话……”

“这可是件严肃的事。你常说一旦开始向记者微笑，那就成熟到可以进法兰西学院了。”

“我说过的东西多了！”

“当我看到你的照片登在报上，我就浑身难受。”她说。

“可当你看到报上登有我的名字，你就满心欢喜。”

“首先，我并不满心欢喜，而且完全是另一码事。”

波尔经常出尔反尔，可这一次尤其让亨利恼火：她巴不得亨利成为世上最荣耀的男人，可表面上却装着对荣耀不屑一顾；这是因为她一味幻想自己能实现亨利昔日对她的梦想，成为一个清高、崇高的女子；可同时，她又没有摆脱尘世，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生活。“这当然不是一种十分得意的生活。”亨利突然怜悯地想，“她自然需要补偿。”

他以随和的口吻说道：

“我想帮那姑娘一把，她刚刚工作，有困难。”

波尔含情脉脉地对他嫣然一笑：“再说你也不会说个不字。”

她的微笑中没有掺杂任何不可告人的盘算。他也不由得笑了：

“我不知道说不字。”

他在面前打开了周刊。首页上，他的照片在微笑。亨利·佩隆访谈录。他对玛丽-昂热对他持何种看法毫不在乎，可面对这一行行印成铅字的文字，他重又获得了几分天真的诚意，犹如农夫读《圣经》一般虔诚：仿佛通过他本人所激发的这些词句，他终于可以得知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在蒂勒城一家药店的昏暗之中，红色和蓝色的短颈大口瓶

显示出魔力……但是，乖孩子讨厌这种平庸的生活，讨厌那药品的气味和故城俗里俗气的街道……他长大了，大城市的召唤愈来愈迫切……他发誓要超越平庸无奇的境况，在他心田某个隐秘的角落，他甚至暗暗希望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天赐良机，他有幸与罗贝尔·迪布勒伊相逢……亨利·佩隆欣喜、不安，既充满崇敬的心情，又萌生了挑战的宏愿，他抛却了少年时代的种种幻想，立下了男子汉真正的雄心壮志；他发奋工作……一部小小的作品问世了，但这足以使荣耀突然降临到他的生活之中：他当时年仅二十五岁。他一头棕发，两只挑剔的眼睛，一张严肃的嘴巴，为人率直、胸怀开阔，却秘而不宣……”他推开了杂志。玛丽-昂热并不愚蠢，她看他看得比较透彻，把他描绘成了单纯而轻佻的城市少女眼中的一个拉斯蒂涅<sup>[4]</sup>二世。

“你言之有理。”亨利说，“应该拒绝对记者说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人的一生，仅仅是个过程而已，而工作只不过是获得成功的手段之一。他们所谓的成功，就是引起轰动，赚取大钱。要让他们醒悟，根本不可能。”

波尔宽容地一笑，“要看到那位姑娘为你的书说了不少好话，不过她和旁人说的没有两样。他们都表示欣赏，却毫不理解。”

“他们并不那么欣赏，你知道。”亨利说，“这是解放后问世的第一部小说：于是他们不得不说些好话。”

渐渐地，这支颂扬的大合奏反倒令人不安；它道出了他作品获得成功的机遇成分，但对作品的实际价值却只字不提。亨利最终甚至认为他的成功应该归于种种误会。朗贝尔觉得他试图通过集体的行动而激发个人主义。拉舒姆则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他是在宣扬个人对

集体的献身精神。所有的人都强调指出了小说的感化特征。然而，如果说亨利把这个故事的时间放在抗德时期，那几乎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他想起了某个人，也想到了某种形势，考虑到了书中人物的过去与他经历的危机之间形成的某种关系以及种种其他因素，但批评家们却没有一个提及。这是他的过错还是读者的过错？读者喜爱的这部书与亨利自以为呈献给他们的那部书迥然不同。

“你今天准备做什么？”他以充满柔情的声音问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还是这样吗？”

她考虑了片刻：“嗯，我要给我的裁缝打个电话，和她一起看看你给我带回来的那些漂亮的衣料。”

“然后呢？”

“噢！我总有事情要做的。”她快活地说。

“这就等于说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亨利说。他严厉地看了波尔一眼：“这个月里，我想你想得很多。你总呆在家中，得过且过，消磨时光，我认为这是一种犯罪。”

“你把这叫做得过且过！”波尔说。她温柔地一笑，这微笑一如往昔，蕴含着世间的所有智慧：“当人有所爱时，就不叫得过且过。”

“但爱并不是什么事务。”

她打断了他的话。

“我请求你原谅，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件让我操心的大事。”

“我重又考虑了圣诞夜我对你说过的话。”亨利接着说，“我肯定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必须重返歌坛。”

“多少年来我一直像现在这样生活。你为什么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了？”波尔问道。

“战争期间，大家可以满足于消磨时光，可现在战争结束了。听我说，”他不由分说地讲道，“你马上就去找老格雷邦，告诉他你想重新开始工作；我一定帮助你选择歌曲，甚至设法为你写几首歌词，另外再向同事们索取几首：噢，这正是朱利安的拿手好戏，我肯定他会给你写出迷人的歌词。布吕热尔会帮我们谱成曲子，从现在起一个月后，看你将会得到一套多棒的歌曲！等你一切准备就绪的那一天，萨布里利奥定会来听你演唱，我保证他一定能帮助你成为四五俱乐部的歌星。到那时，你就扬名了。”

他意识到自己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过分激动。波尔以一副诧异莫名的责怪神情打量着他：“那又怎么样？要是广告上都是我的名字，我在你眼里就会身价倍增吗？”

他一耸肩膀：“你多蠢啊！当然不会。可有所事事总比无所事事强吧。我想方设法搞创作，你也应该去歌唱，既然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我在生活，我爱着你，这并非微不足道。”

“你是在玩弄字眼。”他不耐烦地说，“你为何就不愿试一试？你变得这么懒惰？要么是你害怕？还是什么原因？”

“听着，”她声音骤然变得严厉起来，“即使成功、扬名，这些虚荣的东西对我还有着某种意义，我也决不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去开始一个二流的演唱生涯。当初我为了你而牺牲了去巴西的演出，彻底告别了歌坛。我毫不感到后悔，可咱们别再提它了。”

亨利张嘴欲辩。想当初，她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一时冲动自作主张，做出了那次牺牲，可如今她似乎又把这责任归咎于他！他控制住

了自己，困惑地打量着波尔。他从来就弄不明白她到底是真的蔑视名誉，还是担心扬不了名。

“你的嗓子和过去一样优美。”他说，“你人也一样漂亮。”

“噢，不。”她不耐烦地说，又耸了耸肩膀，“我知道，有那么一小撮知识分子为了讨你的欢心会吹捧我富有天才，可要不了几个月就会道声再见了事。我也许是有可能成为达米娅或埃迪特·皮亚夫，可我已经放弃了机会，我活该，就别提了。”

她很可能成不了大歌星，可只要她获得几分成功，就足以让她心满意足。不管怎样，假若她主动对某事发生了兴趣，那她的生活就不会这么平平庸庸。“这也可给我提供极大的便利！”他暗中思忖。他完全清楚这不仅事关波尔的生活，而且还更关系到他自己的生活。

“即使你触动不了广大听众，也值得一试。”他说，“你有一副好嗓子，有着你得天独厚的天赋。试试看你到底能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什么程度也挺有意思的。我肯定这将给你带来真正的欢乐。”

“我生活中有许多欢乐。”她说，脸上流露出激情，“你好像不理解我对你的爱意味着什么。”

“理解！”他激动地说，紧接着恶声恶气地补充道，“可你就不会为了对我的爱去做我求你做的事情。”

“假若你让我做的事合情合理，我一定去做。”她沉重地说。

“只不过你偏爱你自己的理由，而不理睬我的理由罢了。”

“是的。”她平心静气地说，“因为我的更合情合理。你总是坚持那种限于事情表面的观点跟我谈话，那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时髦观点，并不真正属于你自己。”



“我看不出你自己有什么观点！”他不快地说，然后站起身子。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他还是设法让她面对既成的事实为好：给她带来歌曲，为她定好约会。“行了，咱们别再谈了。可你是错了。”

她笑笑，没有答腔，接着问道：“你去工作了？”

“是的。”

“写小说？”

“是的。”

“那好。”她说。

他登上楼梯。马上又要动笔写作，这让他心里直发痒，一想到这部小说毫无感化人的目的，他感到庆幸，但对即将写些什么，他迄今尚无确切的想法，他唯一的要求，是要表现真诚，无偿地从中获得乐趣。他把手稿摊在面前：近百页。让它们静静地躺上一个月确有好处，现在他就要用全新的目光审阅一番。他一开始便沉湎在欢乐之中，津津有味地从字斟句酌铸成的文字之中追寻种种往事与感慨，可渐渐地，他心底滋生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对这一切他将如何处理？这些凌乱的草稿无头无尾，其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存在着某种氛围：战前的氛围。而恰恰是这一氛围突然使亨利感到惊惶不安。他隐隐约约想到了“要尽量反映我生活的旨趣”。仿佛这是一种注了册的香水，年复一年，其味始终不变。譬如，他叙述的那些关于旅行的事情，总是与一九三五年的他——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息息相关，而与他在葡萄牙所感受到的一切毫无关联。他与波尔的故事同样已经过时。无论朗贝尔、樊尚，还是他熟悉的其他任何一个小伙子，今天都不可能有类似的反应；再说，经历了五年的被占领时期之后，当年那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女人与如今的波尔也已迥然不同。唯有

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毫不掩饰地把小说发生的时间安排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可他无热情去编一部反映一个业已过时的世界的“老掉牙”的小说。当他下笔书写这些词句的时候，他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是要让自己活生生地整个儿跃然纸上。因此，必须用现在时来编写这个故事，对人物和事件加以调整。“调整：多么让人气恼的字眼！多么愚蠢的字眼！”他暗自思量，“如此随心所欲地处置小说中的人物，随随便便把他们从一个世纪拉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国度移到另一个国度，把这个人的现在与那个人的过去拼凑在一起，同时掺入个人的种种怪事，这样做实在荒谬。如果贴近仔细观察，那些人物无一不是魔鬼，整个的艺术手段就在于阻止读者过分贴近地去观看。行，就别调整了，可以东拼西凑地塑造出一些与波尔、路易和我本人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来。我从前就曾试验过，可是这一次，我执意反映的是我自身存在的真实……”他把这叠初稿推到一边。盲目搜集素材，这是一种笨拙的做法。必须像平常一样着手，从总体的形式、明确的意图出发。什么意图？我希冀表现的是怎样的真实？我的真实，这确切地说又意味着什么？他傻乎乎地呆望着白纸，空着双手，一头扎进虚渺之中。这令人望而生畏！“也许我再也没有什么要倾吐的了。”他心里在想。可是问题在于他恰恰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倾吐过什么东西。他和普通人一样，任何时候都有话要说。然而什么都要诉说，这就过分了。他回想起了一只碟子的底部镌刻着的那个已被解开的古老字谜：“进来时呼喊是生活，呼喊出去是死亡。”能补充些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居住在同一个星球，我们都从母腹中降生于世，而最终又将去喂养蠕虫。大家经历的都是同样的命运，为何偏要决定这就是我的命运，非要由我去讲述？他打了个呵欠，他没有睡够，这张空白的稿纸让他头昏目

眩，他跃入了漠然的深渊。谁也不可能在漠然之中写出任何东西，必须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只有在生活之中，一分一秒、一事一物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可是，倘若他在浑噩中惊醒，那他迎来的将又是忧虑。

《希望报》，一份地方小报而已，果真如此？当我试图作用于舆论，难道我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也许不该面对这张白纸想入非非，而应去严肃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对，这刻不容缓，他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开始刻苦钻研。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他唯一可以原谅自己的，就是事情千头万绪弄得他不知所措，只得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可他的所作所为之中也有那么一点无所用心：自解放以来，他一直沉醉在某种欣快的感觉之中，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他站了起来。今天早晨，他无法集中精力干任何事情，他与迪布勒伊的交谈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再说，他昨天的信写到一半丢下了，他必须跟塞泽纳克谈一谈；他也急于知道普莱斯顿是否给他搞到了纸张；另外，老达斯·维埃纳的信还没有交给凯道赛 [5] 。“好！我马上把信送去。”他拿定了主意。

“我是亨利·佩隆，我能见杜尔纳勒先生五分钟吗？我带了一封信要交给他。”

“请您登记一下姓名和来访事由。”女秘书边说边把一份印刷的登记表递给亨利。

他掏出钢笔，什么事由？是出于对某种幻想的敬重。他完全清楚此次造访纯属徒劳。他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机密。“好了。”

女秘书一副宽容的神态接过登记表，朝门口走去。她的笑容及其举止的庄重清楚地表明了办公室主任是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未经事

先安排，不得随意打扰。亨利怜悯地看了看手中拿着的那只装得鼓鼓的白色信封，他丑已经丢尽，可到现在已不能逃避现实：可怜的达斯·维埃纳将遭遇冷酷的答复还是永久的沉默？

女秘书又出现了：“杜尔纳勒先生很乐意尽快跟您约定个时间，您可以把您带来的信留给我，我等会儿就呈给他。”

“多谢。”亨利说。他把信递给了女秘书。这女人年纪轻轻，权力不小，此信竟落入她的手中，他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算了，反正已经完成别人委托他的事情，至于结果如何再也与他无关。他决定去红酒吧，此刻正是饭前饮酒的时间，拉舒姆准在那儿，亨利想对他写的文章表示感谢。他一推开酒吧门，发现纳迪娜坐在拉舒姆和樊尚中间，她气呼呼地说：

“难得见你一面。”

“我忙着工作。”

亨利坐到她的身旁，要了一杯都灵金酒。

“我们正在谈你呢。”拉舒姆开心地说，“在议论你在《未来》的答记者问。你披露真相，这做得对。我是想指有关针对西班牙的同盟国政治。”

“你们为什么就不亲自披露真相？”樊尚问道。

“我们不能这样做，目前不行，可有人这样做当然是好事。”

“滑稽！”樊尚说。

“你什么也不愿明白。”拉舒姆说。

“我明白得很。”

“不，你不明白。”

亨利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饮着都灵金酒。拉舒姆不失时机地解释共产党是如何重新审视和修正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他这样做，谁也不会责备：他年仅二十就在游击队中发现了冒险、友情和共产主义，他的这种狂热劲确实情有可原。“我很喜欢他，因为我曾帮过他的忙。”亨利自嘲地想。亨利曾让他在波尔的公寓里躲藏了三个月，后来又帮他搞到了假证件，分别时，还把自己唯一的一件外套送给了他。

“噢，我感谢你写的文章。”他突然说道，“文章写得真客气。”

“我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拉舒姆说，“再说，所有人的观点都同我一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对，挺有意思的。”纳迪娜说，“就这一次，所有的评论家看法一致：似乎他们在共同埋葬某个人或在颁发一个道德奖。”

“是有这个意思！”亨利说道。“这张小毒嘴，”亨利既高兴又忌恨地想，“她恰好找到了我不愿对自己用的字眼。”他朝拉舒姆微微一笑：“你有一点判断错了：我书中的主人公决不会成为共产党人。”

“那你要让他成为别的什么人？”

亨利哈哈大笑：“呃，成为我所成为的人！”

拉舒姆也笑了：“正是如此！”他两眼盯着亨利，“要不了六个月，革命解放联合会必定不复存在，你终将明白个人主义毫无出路。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亨利摇摇头：“我现在这样对你们反倒更加有利。我替你们披露真相，你不是很高兴吗？要是《希望报》一味重复《人道报》的言论，这于事又有何益呢？我想方设法引导人们思索，提出你们没有提出的问题，道出你们没有明言的某些真相，这样的工作要有益得多。”

“应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去做这项工作。”拉舒姆说。

“他们不会让我这样做！”

“当然会让。确实，目前党内宗派主义盛行，可这是为环境所迫，这决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拉舒姆犹豫了片刻，“别重复了，同志们和我都希望不久能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杂志，一份比较超脱的杂志，可以在上面十分自由地探讨问题。”

“一份杂志，可不是一份日报。”亨利说，“至于力求自由，我倒要瞧瞧。”他友好地望了望拉舒姆。“要是你真具有一份属于你们自己的杂志，那可是一件大好事。你觉得能行吗？”

“很有希望。”

樊尚朝前倾了倾身子，挑衅地瞪了拉舒姆一眼：“如果你真的直言不讳，那就对你的同志明说，张臂欢迎那些所谓改邪归正的混账，这样做实在卑鄙。”

“我们？张臂欢迎附敌分子？你去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说吧，他们听了准会喜笑颜开的。”

“你们暗中为许多混蛋开脱了罪责。”

“别混淆视听。”拉舒姆说，“当我们决定对某人既往不咎时，这是因为那人可以挽救。”

“照你这么说，那怎么知道被干掉的那些家伙就不能挽救？”

“那个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挽救，必须干掉他们。”

“那个时候！我杀他们可不分什么时候！”樊尚狡黠地一笑，“可我要对你进一言：那帮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没有一个例外；至于眼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干掉所有被疏忽的家伙。”

“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纳迪娜问。

“我想说的是应该组织起来。”樊尚答道。他的双眼搜索着亨利的目光。

“组织什么？组织惩治行动？”亨利笑呵呵地问道。

“你知道，在马赛，他们把所有的游击队员都当作刑事犯，正在到处搜捕呢。”樊尚说，“难道应该撒手让他们胡作非为？”

“恐怖手段可不是一剂良药。”拉舒姆说。

“不。”亨利开了腔。他看了看樊尚：“有人告诉我有那么些家伙以扮演执法者为乐。若为了了结私仇，那我还理解。可有些家伙见到附敌分子就杀，这里杀一个，那里毙一个，自以为这样做是拯救法兰西，他们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些蠢蛋。”

“我知道：大脑健全的人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樊尚说。他摇摇头：“你们可骗不了我。”

“那我们就不要你。”亨利声音和蔼地说。

他站起身子，纳迪娜也站了起来：

“我陪你走走。”

她也开始讲究起女人家的化妆打扮来了。她也试着涂抹了一番，可眉毛画得像幼熊的爪子，双眼下方重重几道黑印。她刚出了门，遂开口问道：

“你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不，我报社有事。”

“这时候还有事？”

“什么时候都有。”

“那，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不，我在报社一直要呆到很晚。然后我还要去见你父亲。”

“噢！那份报纸！你嘴里就挂着那个词！那总不至于是世界的中心吧！”

“我没有这么说。”

“没有说，可你是这么想的。”她一耸肩膀，“那，咱们什么时候见？”

他犹豫不决。“说真的，纳迪娜，眼下，我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

“你总要上桌吃饭吧，不是吗？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坐在你的对面。”她正视着亨利，“除非这惹你讨厌。”

“当然不会。”

“那？”

“行。明天晚上九、十点之间来找我。”

“一言为定。”

他对纳迪娜颇有好感，与她相会并不让他厌烦，可眼下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必须最为严格经济地组织自己的生活：确实没有纳迪娜的位置。

“你回答樊尚时为什么那么凶？”纳迪娜紧接着说，“你不该那样。”

“我害怕他干出什么蠢事来。”

“蠢事！只要有人想行动，你们就说什么做蠢事。你认为写书不更蠢吗？他们给你鼓掌，你沾沾自喜，可事后人们便把书往哪个角落一扔，谁也不再想它。”

“那是我的职业。”他说。

“滑稽的职业。”



他们默默无言地又走了一段，等到了报社的门前，纳迪娜硬邦邦地说：“好，我回家去了。明天见。”

“明天见。”

她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呆立在亨利面前：“九、十点之间，这太迟了，干什么的时间都不够。难道就不能早一点一起过个夜晚吗？”

“在这之前我没有空。”

她一耸肩膀：“那九点半见。连生活的时间都没有，成名又有何用？”

“生活！”当纳迪娜猛地转身而去时，亨利心里在嘀咕，“在她们的嘴里，这总是意味着要照顾她们。可生活的方式不只是一种！”他喜爱那陈积的尘埃和新鲜的油墨味。办公室还空荡无人，地下室阒无声息。可大伙儿马上就要在岑寂中出现，他们全是他的创造。“谁也别想夺走《希望报》。”他在心里反复说道。他坐到办公桌前，伸了个懒腰。噢，没有必要心烦意乱。他决不让出《希望报》。再说，他们总能找别的报纸，等他好好地睡上一夜，工作自然就会顺利。

他迅速处理了信函，看了看表，半小时后，他与普莱斯顿有约会，时间还充足，可以先跟塞泽纳克谈谈。“请您把塞泽纳克给我叫来好吗？”他对女秘书说。他端坐在办公桌前。信任他人是件大好事，可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取代塞泽纳克的位置，而且确实比他更有资格。若坚持给这人一个机会，那就势必剥夺了那人的机会，这事有点儿不太好办。“可惜啊！”亨利自言自语。他想起了当初尚塞尔把他领来时，塞泽纳克多有气派，在他干联络员的那一年里，他是最有干劲的一个。也许塞泽纳克需要特殊的环境，如今他脸色苍白，浑身浮肿，两眼无神，总拖樊尚的后腿，再也没有能力写出两行连贯的文字来。

“啊！你来了！坐吧。”

塞泽纳克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亨利突然觉察到自己与他共事已有一年，但对他毫无了解；对其他人，亨利或多或少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生活、旨趣和思想，可是这一位从来都是沉默寡言。“我想知道你以后是不是还想交那些蹩脚文章，是否决定给我们写点别的东西。”亨利说道，他的话声比他原来希望的更生硬了些。

塞泽纳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耸了耸肩膀。

“出了什么事？你很不对劲？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塞泽纳克手中搓着一块手绢，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地板，跟他沟通实在困难。

“到底怎么回事？”亨利重复问道，“我可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塞泽纳克说，“当记者，我不适合。”

“可开始时干得并不那么糟糕。”

塞泽纳克茫然一笑：“尚塞尔帮了我一点儿忙。”

“他总不至于替你写文章吧？”

“不。”塞泽纳克口气并不肯定地说。他摇了摇头：“别费心了，这行当并不中我的意。”

“你该早讲。”亨利有点气恼地说。又出现了一阵沉默，亨利开口问道：“那你想干什么？”

“别担心，我会想办法应付的。”

“到底想干什么？”

“我上点英语课，此外，他们答应让我翻译点东西。”他站起身子，“你挽留了我这么长时间，心真好。”

“万一你一时兴起，想给我们寄篇文章……”

“要是真有趣的话。”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千法郎？”塞泽纳克说。

“这是两千。”亨利说，“可这总不是办法。”

塞泽纳克把手帕塞进衣袋里，平生第一次露出了笑脸：“这是权宜之计，也是最牢靠的办法。”他推开门，“谢谢。”

“祝你走运。”亨利说道。他感到困惑不解：看塞泽纳克的样子，仿佛他早就巴不得逃之夭夭似的。“我可以通过樊尚了解他的踪迹。”他安慰自己。可是他自己无能为力，无法让塞泽纳克倾心交谈，为此他感到快快不快。他掏出钢笔，在面前摊开信笺。普莱斯顿一刻钟之后就要来。他在没有十分的把握之前，不愿多想那份杂志；可他满脑子尽是计划，目前出版的周刊统统都很蹩脚，能推出一本真正有水平的，那该多令人高兴。

女秘书推开了一条门缝：

“普莱斯顿先生来了。”

“让他进来。”

普莱斯顿身着便装，没有一点美国人的派头；只是他的一口法语虽然无懈可击，但仍然让人对他的国籍产生几分怀疑。他刚一坐定，便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

“您的朋友吕克可能已经告诉您，在您离开报社这段时间，我们曾多次见面。”他说道，“我们俩都为法国新闻界的条件感到惋惜，条件之差，确实让人痛心。对我来说，能帮助您的报纸，为您提供部分纸张，是件十分愉快的事。”

“啊！这将大大方便我们的工作！”亨利说，“当然，我们无法考虑改变报纸的版面。”他补充说道，“我们与其他报纸要保持一致。不过，谁也不会禁止我们出一份星期日增刊，这样的话，就打开了通道，展现了许多可能性。”

普莱斯顿微微一笑，那神态让人心安。“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他说，“纸张嘛，您明天就可以收到。”他用黑漆面的打火机等慢慢地点燃了香烟：“我不得不直言不讳，给您提个问题：《希望报》的政治路线会不会改变？”

“不会。”亨利说道，“为什么要变？”

“在我看来，《希望报》恰恰代表了你们国家所需要的领路人。”普莱斯顿说，“正因为如此，我的朋友和我才愿意帮助它。我们钦佩您的独立精神、您的胆略、您的清醒头脑……”

他打住了话头，余音不绝于耳。

“那么？”亨利说。

“我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您就葡萄牙之行写的头几篇报道，可今天上午看到了您的答记者问，感到有点惊诧，您在谈到萨拉查政权时，有意批评了美国在地中海奉行的政策。”

“我确实认为这一政策令人遗憾。”亨利有些生硬地说，“佛朗哥和萨拉查早就应该被赶下台了。”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您完全清楚。”普莱斯顿说，“毋庸赘言，我们十分希望帮助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重新获得民主自由，可要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就是眼下。”亨利说，“马德里的监狱里关着死囚。每一天都很重要。”

“我的看法正是如此。”普莱斯顿说，“美国国务院肯定很快就要接受这一观点。”他微微一笑：“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鼓动法国舆论反对我们不恰当。”

亨利也淡淡一笑：“政客们从来就不紧不忙，我以为逼一逼他们有好处。”

“不要耽于过分的幻想。”普莱斯顿亲切地说，“您的报纸在美国政界备受赏识。可您别指望影响华盛顿。”

“啊！我无此奢望。”亨利说。他又激动地补充道：“我说的只不过是内心的想法，仅此而已。您称赞我保持独立……”

“正是，这种独立，您就要危害它。”普莱斯顿说道，他责怪地看了亨利一眼，“一发起这场论战，您就要扮演那些想把我们说成帝国主义分子的人的角色。”他补充道：“您坚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此我完全赞同，可这种观点在政治上行不通。再给我们一年时间：共和国定将在最好的形势下在西班牙重新建立。”

“我并不存心发起一场论战。”亨利说，“我只不过想点明某些事实真相。”

“可这些事实会被用来攻击我们。”普莱斯顿说。

亨利耸肩膀：“这不关我的事。我是记者，我说实话，这就是我的职业。”

普莱斯顿打量着亨利：“如果您心中有数，知道某种实话将会引起不良后果，您还会说吗？”

亨利犹豫了一下：“若我肯定实话有害的话，那我看只有一条出路：我辞职，我放弃搞记者工作。”

普莱斯顿姿态动人地一笑：

“这岂不是一种十分机械的道德观？”

“我有几个共产党朋友，他们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亨利说，“可我尊重的并不完全是事实真相，而是我的读者。我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说实话有可能装扮门面：也许在苏联情况就是如此。”他微笑着说，“可在法国，在今天，我不承认任何人有这种装扮门面的权利。或许对一个政客来说，并不那么简单；可我并不站在那些摆布别人的家伙一边，我属于那些被别人极力摆弄的人；他们指望我能尽量给他们提供情况，若我保持沉默或说谎话，就背叛了他们。”

他停了下来，为自己如此一番长篇大论感到几分惭愧，他这样说话并不仅仅针对普莱斯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茫无目标地防范着众人的攻击。

普莱斯顿摇摇头：“我们又产生了同样的误会，您所谓的提供情况，我看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我担心您成了法国理智主义的牺牲品。我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不了解杜威 [\[6\]](#) 吧？”

“不了解。”

“可惜。在法国，人们对我们太不了解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普莱斯顿停顿了一下，“要明白我们毫不拒绝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谁也不如美国人这么听得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怎样才能不失去法国人的欢心，我们怀着最大的兴趣洗耳恭听。可是法国所处的位置，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地中海政策。”

“我只是以个人的名义说话。”亨利气恼地说，“不管处于什么位置，人总有权利谈谈他的看法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普莱斯顿终于开口说道：

“您显然明白，如果《希望报》采取反美立场，我再也无法对它保持好感。”

“我明白。”亨利冷冷地说，“您也明白我不能考虑由你们来审查《希望报》。”

“可谁说审查了！”普莱斯顿一副被冒犯的神态说道，“我所希望的，只是您能始终忠实地坚持您奉以为原则的中立立场。”

“正是这样，我始终不渝地忠实坚持。”亨利突然怒气冲冲地说，“《希望报》可不是为了几公斤纸就可以出卖的。”

“噢！要是您用这种口气说话！”普莱斯顿说道，遂站起身子，“请相信我感到遗憾。”

“我可什么也不遗憾。”亨利回敬道。

整整一天，亨利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气恼。不过，他这次发火自有道理。他真愚蠢，把普莱斯顿设想成一个圣诞老人。此人原来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亨利却把他当作知己倾心交谈，表现如此幼稚，实在难以宽恕。他站起身子，向编辑室走去。

“哎，我可怜的吕克，杂志吹了。”他在编辑桌的桌沿上随便一坐，说道。

“不会吧？”吕克说，“为什么？”他面孔浮肿、苍老，简直像一个侏儒。每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泪水马上就像挂在眼角似的。

“因为那个美国佬想禁止我们开口反对美国：他差不多逼着我做出抉择。”

“不可能！他看上去那么善良！”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阿谀奉承的家伙。”亨利说，“我们那么令人垂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迪布勒伊提出的建议吧？他要《希望

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

吕克朝亨利扭过脸来，满脸惊骇的神色：“你拒绝了吧？”

“当然。”

“那些党啊、派啊、运动啊、组织啊，全都死灰复燃了，必须跟它们界限分明。”吕克声音恳切地说。

吕克的信念如此绝对，以致即使赞同他的观点也忍不住想故意惊扰他一下。“抵抗运动的统一确确实实只是徒有虚名了。”亨利说，“应该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是他们破坏了统一！”吕克陡然激动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他们把这也叫做什么组织，分明是在制造新的分裂。”

“不，分裂是资产阶级制造的，如果谁自以为可以超越阶级斗争，那他就有玩世不恭的危险。”

“听我一句，”吕克说，“报纸的政治路线，应由你来决定，你比我更有头脑；可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对这一点，我绝对反对。”他显出了刚毅的神色，“在经费方面，有些具体的困难，我没有向你汇报，可我已经跟你说过，情况并不太严重。要是让一个算不了什么东西的组织牵着鼻子走，那于我们的事业就不利了。”

“你认为还会失去读者？”亨利问。

“显而易见！到那时就完了。”

“是的，看来很有可能。”亨利说。

要是买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小报，那外省人宁愿看他们的地方小报，也不要巴黎的日报。印数已经大大降低了，报纸即使恢复原来的版面，也不一定就能吸引原来的读者。总而言之，它决不可能在危机



之中安然无恙。“显然，我只是个理想主义者！”亨利心想。他曾以信任感、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为由，对迪布勒伊提出了异议，可真正的答案就在数字之中：我们将彻底垮台。这是雄辩的论据，诡辩也罢，道德也罢，对它都无能为力，他急于运用这一论据。

亨利于十时来到伏尔泰沿河大街，可未能按原计划立即发起攻击。安娜如同往常一样，用台式小车推上了一些用作晚餐的食物：葡萄牙红肠、火腿和一冷盘米饭。另外，为了庆贺亨利的归来，还有一瓶默尔索酒。他们东拉西扯，随意交流旅行的观感以及巴黎最近的一些马路新闻。说实在的，亨利没有多少舌战的兴趣。他为置身于这一间书房而高兴：书房里，一本本书全都已用得发旧，大多是作者亲笔题赠的；一幅幅油画都有名家的题名，也都不是花钱买的；一件件小摆设富有异国情调，无一不是旅行的纪念品。这块并不引人瞩目、却得天独厚的生活天地，亨利敬而远之，但同时，这又是他真正的安乐场所。他在这里感到温暖，感到了自己生活的欢悦。

“在你们家里确实十分惬意。”他对安娜说。

“是吗？我一出家门，就有一种失落感。”她乐呵呵地说。

“应该说斯克利亚西纳那天选了一个恐怖的聚会场所。”迪布勒伊说。

“真的，那个低级庸俗的场所！可不管怎么说，那是个美妙的夜晚。”亨利说，他淡淡一笑，“除了快结束的那段时间。”

“快结束的时候？不，我觉得演奏《黑色的眸子》那段时间挺难受的。”迪布勒伊一副无辜的样子说道。

亨利犹豫不决，莫非迪布勒伊成竹在胸，不想操之过急立即发起攻击？此时他如此审慎，只得借机行事，若扫了此刻的兴致，太令人

遗憾了。可是，亨利迫不及待想证实他内心所取得的胜利。

“您太瞧不起《希望报》了。”亨利乐呵呵地说。

“没有……”迪布勒伊微笑着说。

“安娜是见证人！您的责问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亨利补充说道，“不过，我想告诉您，您提出的有关《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合成一体的建议，我重新考虑过，甚至和吕克也谈过，根本就不可能。”

迪布勒伊的微笑骤然消失了：“我希望这不是您最后的答复。因为没有报纸，革命解放联合会就永远一事无成。别跟我说还有其他报纸了。任何别的报纸与我们这一运动都不完全一致，若您也拒绝了，谁还会同意？”

“我知道，”亨利说，“只是您要明白，目前，《希望报》处于危机之中，其境况与大部分报纸一模一样；我想危机最终可以摆脱，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难以解决经费问题。何况我们一旦哪一天决定成为某个政党的机关报，印数立即就会下跌。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

“革命解放联合会不是一个政党，”迪布勒伊说，“它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运动，您的读者不会被吓跑的。”

“不管是政党还是运动，实际上是一回事。”亨利说，“所有那些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工人，上次我跟你谈过，他们在订阅《人道报》的同时，很乐意再买一份新闻性的报刊，可决不会再去买另一份政治性的报纸。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与共产党携手前进，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状况：《希望报》一旦贴上某个标签，就马上会让人怀疑。”亨利一耸肩膀，“等到我们的报纸只有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阅读的那一天，那就只有关门大吉了。”

“一旦我们得到某家报纸的支持，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将无比众多。”迪布勒伊说。

“此间，得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这足以使我们彻底完蛋，这对谁都没有利。”

“对，这对谁都没有利。”迪布勒伊退让道。他一时保持缄默，用手指头轻轻击打着夹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显然，这确有危险。”

“我们不能答应去冒这个险。”亨利说。

迪布勒伊又静静思索了片刻，叹了口气说道：“得要有钱。”

“对呀，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迪布勒伊以困惑的声音承认道。

当然，他并不会如此轻易地承认失败，他的脑中又在萌生新的希望。可这一论据发挥了威力，在继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再也没有提起此事。不过，亨利经常与他见面，尽量向他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与萨玛泽尔会晤了两次，参加了委员会会议，并承诺在《希望报》发表宣言。“只要保持独立，你愿意怎么做都行。”吕克常这样说。

保持独立，这已经争取到了，可还必须寻求答案，如何利用这一独立。九月份，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只要保持一点清醒头脑、表现出几分诚意，也就足够了，事情也可以勉强对付过去。如今，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对过去的一切提出了异议。拉舒姆热情洋溢，对亨利撰写的有关葡萄牙的文章极力宣扬，仿佛《希望报》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有必要辟谣吗？亨利打心眼里不愿意失去那些因《希望报》持公正立场而喜爱它的知识分子读者，但他也不情愿激起共产党读者的反感。不过，他这样谁都不得罪，势必变得无足轻重，他这样做也确实在起着麻醉人的作用。那该怎么办？他一边脑子里翻来覆去

地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向斯克里布饭店走去，朗贝尔正在那儿等着他共进晚餐。不管亨利采取怎样的决定，都是向某种情绪让步，而不是屈服于某一明摆的事实；尽管他下定种种决心，但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他知之不多，什么也不了解。“先了解情况，然后再说，这总归符合逻辑吧。”他暗自思忖。可是，事情并非按此逻辑发展。首先必须表态，这刻不容缓，然后让事情的发展来判别你的是非。“这正是所谓的哄骗。”他不快地想到，“我也一样，在哄骗我的读者。”他曾暗暗发誓，对读者说的事情一定要对他们有所启迪，有助于他们思考问题，总之，要说事实真相。可现在，他却在干哄骗的勾当。怎么办？他总不能关闭编辑室，辞退全体人员，钻进哪个房间呆上一年，闭门不出，只与书本打交道！报纸必须生存下去，为此，亨利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在斯克里布饭店门前停下了脚步。和朗贝尔一起吃晚饭，他感到欢悦。可向他诉说自己的近况，亨利又有点儿心烦，不过，他希望朗贝尔不要过分在意。他进了旋转门，突然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面暖烘烘的，男男女女都身着美国军装，空气里弥漫着黄烟味，橱窗里摆着奢华的装饰品。朗贝尔笑盈盈地迎上前来，他也穿上了一套中尉军服。在用作战地记者饭堂的饭店餐厅里，桌上摆着黄油和棱柱形白面包。

“你知道，在这个饭店里可以喝到法国葡萄酒。”朗贝尔乐呵呵地说，“我们马上就要跟德国战俘吃得一样好了。”

“美国佬好生喂养他们的俘虏，你气愤吗？”

“并不完全为吃的事，尽管法国人填不饱肚子而他们却有吃有喝，让人无法容忍。丑恶的是整个的情况：他们对德国佬，包括纳粹分子都手下留情，可对集中营里的人却那样对待。”

“我很想知道他们禁止法国红十字会进入集中营，是否确有其事。”亨利说。

“这件事，我首先就要去弄个水落石出。”朗贝尔说。

“很明显，眼下，我们对美国并不热乎。”亨利一边往盘子里装罐头猪肉和面条，一边说道。

“没有必要热乎！”朗贝尔一皱眉头，“可惜这叫拉舒姆那么开心。”

“我来时还琢磨这个问题呢。”亨利说，“你只要说一句反共产党的话，你就是在干反动的勾当！可你一批评华盛顿，你又成了共产党。除非怀疑你属于第五纵队。”

“还好，事情越辩越明。”朗贝尔说。

亨利耸耸肩膀：“不应过分乐观，你还记得吧，圣诞节前夜，我们说过《希望报》决不容忍他人网罗。噯，这可不那么简单。”

“那就继续凭我们自己的良心说话好了！”朗贝尔说。

“你要明白！”亨利说，“每天上午，我都在向成千成万的人解释他们应该开动脑筋，可我自己又凭什么指导自己呢？凭自己良心的声音！”他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这是欺骗！”

朗贝尔微微一笑：“你给我举几个比你更认真的记者的名字。”他深情地说，“你亲自处理每一封来函，对一切都躬亲过问。”

“我每天都尽量做到正直。”亨利说，“可问题正在这里，我因此而没有一分钟的闲暇去深入研究我所提出的问题。”

“行了吧！你的读者对这样就已经很满意了。”朗贝尔说，“我认识一伙大学生，他们说话总是以《希望报》起誓。”

“我因此而更感到有罪！”亨利说。

朗贝尔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他：“你总不会去整天研究那些统计数字吧？”

“这正是我应该做的！”亨利回答说。出现了片刻沉寂，亨利突然打定了主意：还是赶紧了结了那件麻烦事吧。

“我把你写的小说稿带来了。”他说道，朝朗贝尔微微一笑，“真怪，你富有亲身经历，体验也极为真切，而且你也经常跟我谈起，是那么动人，你写的专题报道内容极为丰富。可在你的小说稿里却什么也没写进去。我在琢磨其中的原因。”

“你觉得不行吧？”朗贝尔说，他一耸肩膀，“我早跟你说过了。”

“问题在于你丝毫没有把你的真情实感写进去。”亨利说。

朗贝尔犹豫不决：“有的东西真正触动了我的心，可对别人来说却毫无意思。”

亨利微微一笑：“可人们反而强烈地感觉到你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没有打动你自己的心。仿佛你写这些故事时，像是在受罚，像小学生在做额外的作业似的。”

“噢！我完全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这种天赋。”朗贝尔说。

他微笑着，可一副窘迫的神色。亨利感觉到他实际上对这些小说看得是很重的。

“谁有天赋？谁又没有天赋？实在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亨利说，“不。你错就错在选材，你选的都是些与你毫不相干的题材，问题就在这里。下一次，你要尽量把自己摆进去。”

“我不会。”朗贝尔说。他淡然一笑：“我是那种地地道道可怜的小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成为一个作家。”

“别胡说八道！”亨利说，“这些短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初次失利是正常的事。”

朗贝尔摇摇头：“我了解自己，我永远办不成任何大事。一个知识分子一事无成，够可怜的。”

“只要你坚持下去，就能有所作为。再说当知识分子，这又不是什么毛病！”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朗贝尔说。

“我就是个知识分子，你就很乐意对我表示敬重。”

“你，情况不一样。”朗贝尔说。

“不对。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人把这个字眼当作一种侮辱，我真气愤：他们好像以为脑子空空就了不起似的。”

他搜索着朗贝尔的目光，可朗贝尔一个劲地只看着碟子，他说道：“我在琢磨当战争真正结束后我该怎么办。”

“你不愿意继续干记者这一行吗？”

“战地记者，这是不可能的了；可和平记者，也当不成。”朗贝尔说。他声音激动地补充道：“像你这样干记者这一行，还值得：这是一种真正的冒险生涯。可当编辑，哪怕在《希望报》，没有任何意思，除非我不得不以此谋生。可是，这寄生的生活，我又良心不安。”他犹豫了片刻，“我母亲给我留下的钱太多了，我怎么都良心不安。”

“所有的人都这样。”亨利说。

“噢！你，你拥有的全是你劳动所得，没有这个问题。”

“谁也不可能永远问心无愧。”亨利说，“比如，我在这儿吃饭，同时又禁止自己上黑市饭馆：这就很幼稚。各有各的高招。迪布勒伊故意把金钱当作一种身外之物，他钱多极了，可他并不为赚钱而赚钱。

谁需要钱，他也从不拒绝，任安娜去管理使用。安娜呢，她也不把这钱当作自己的财产，应付自如：她是为丈夫和女儿而花钱，她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同时自己也得到了享受。至于我嘛，帮了我大忙的倒是手头拮据、入不敷出：这样，我总感到自己拥有的一切没有一点是多余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

“可情况完全不一样。”

亨利摇摇头：“当处境不公平，你就不可能正派地处世。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不得不搞政治：目的在于改变处境。”

“我有时想该不该拒绝那笔钱。”朗贝尔说，“可拒绝又有何用？”他犹豫了一下，“再说，我承认贫穷让我害怕。”

“还是想办法尽量把钱用到有益的地方吧。”

“呃，问题正是这样：怎么用？我用这钱能做些什么？”

“总有你喜欢的东西吧？”

“我想……”朗贝尔支支吾吾地说。

“你有喜欢的东西吗？你什么也不喜欢？”亨利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我很喜欢同事们，可解放以来，大家争吵不休；女人吧，她们要么愚蠢透顶，要么无法容忍；书嘛，我讨厌；至于旅行，地球上到处都一样凄惨。再说，近段时间来，我连善恶都分不清了。”他下结论道。

“怎么回事？”

“一年前，一切就像是埃皮纳勒 [\[7\]](#) 的图片一样简单明了；可现在，发现美国人跟纳粹分子一样，是些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他们对



别人继续在集中营活活死去根本不在乎；传说苏联也有集中营，情况好不了多少；有的附敌分子给枪毙了，可有的家伙一样混账，却给他们大献鲜花。”

“你之所以义愤填膺，那是你还相信某些东西。”

“不，老实说，一旦开始提出疑问，那任何一切都抵挡不住。有许多道德原则，大家都以为是一致公认的：可到底以什么名义？说到底，为什么要自由，又为什么要平等？公正又有什么意义？又为什么要爱别人胜于爱自己呢？一个像我父亲那样一辈子只知道寻求享乐的人，他难道就那么错吗？”朗贝尔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惹你生气了吧？”

“不，必须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

“尤其得有人回答这些问题。”朗贝尔说道，声音愈来愈激动。“他们大谈什么政治，把我们烦死了；可为什么非要这种政治，而不要那种政治？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一种道德，一种生活的艺术。”朗贝尔带着几分挑衅瞅了瞅亨利，“这就是你应该赋予我们的，这比帮助迪布勒伊起草宣言更有意义。”

“一种道德，它必须包含一种政治态度。”亨利说，“反言之，政治是活生生的。”

“我并不这么认为。”朗贝尔说，“在政治方面，人们关心的只是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什么前途啦，集体啦，可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现实的时刻，是一个个单个的人。”

“可单个的人参与群体的历史。”亨利说。

“不幸的是在政治领域，永远不谈个人的历史。”朗贝尔说，“人在共性之中消失，至于个性，谁也不在乎。”

朗贝尔的口气如此强烈，亨利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他：“比如？”

“呃，比如，就以犯罪问题为例。从政治上抽象地看，一个跟德国佬共过事的人就是一个混蛋，人人咒骂，这不成问题；可要是更深入地去目的地看到某个特殊的情况，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

“你想到了你父亲？”亨利问道。

“是的，有时我想求你出出主意：我难道真的有必要继续与他势不两立吗？”

“去年，你谈起他时是那么一副腔调！”亨利诧异地说。

“因为那时我以为是他告发了罗莎，可在这一点上，他说服了我：他爱莫能助。所有的人都知道罗莎是个犹太人。不，我父亲在经济上与敌合作，这已经够卑鄙的了，而他肯定就要受法庭审判，十有八九要判刑，可他那么大年纪……”

“你见过他了？”

“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写了很多信。我承认，那些信引起了我心里的极大震动。”

“如果你想与他和解，你是完全自由的。”亨利说。“我还以为你们的关系很糟呢。”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认识你的那段时间是这样。”朗贝尔吞吞吐吐，最后鼓了鼓勇气说道：“是他把我哺育成人。我觉得他很爱我，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只是他容不得我违抗他。”

“在认识罗莎之前，你从来没有违抗过他？”亨利问道。

“没有。他之所以气得发疯，原因正在于我竟敢斗胆与他作对。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与他作对。”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这一来，我便索性认为他告发了罗莎。不用说，那时我真恨不得亲手宰了他。”

“可你怎么会怀疑是他告发的呢？”

“是一些朋友给我灌输了这个念头，其中有樊尚。可我后来又跟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绝对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我父亲以我母亲的坟墓发誓，绝没有这回事。如今，我冷静下来了，我肯定他绝不会干出这等事来。绝不会。”

“这看来挺可怕的。”亨利说。他犹豫不决。两年前，朗贝尔毫无证据便怀疑他父亲是个罪人，可现在又希望他无辜，手头同样也没有证据。看来没有任何办法了解事实真相。

“樊尚动不动就钻进惊险小说出不来。”亨利说，“听我讲，如果你不再怀疑你父亲，你本人也不再责怪他，你就不必扮演执法者的角色。去看看他吧，做你自己高兴的事情，别顾忌别人。”

“你真认为我可以这么做？”朗贝尔说。

“谁又阻止你？”

“你不认为这是幼稚病的一种表现？”

亨利惊诧莫名地打量着朗贝尔：“幼稚病？”

朗贝尔的脸霍地红了：“我是想说，是不是怯懦？”

“不。自己怎么感觉，就怎么生活，这并不怯懦。”

“是的，你说得在理。我马上给他写信。”朗贝尔说。“我跟你谈这事是对的。”他充满感激之情说道。

他朝碟中伸出勺子，那团红乎乎的浆糊似的东西在碟中晃动。“你可以帮我们的大忙。”他喃喃地说，“不仅仅是我，有许多年轻小伙子都处在我这种状况。”

“帮你们什么忙？”亨利问道。

“你富有实在感。你应该教我们一天一天实实在在地生活下去。”

亨利微微一笑：“建立一种道德观，一种生活的艺术，这可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

朗贝尔朝他抬起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噢！我表达不当。我指的不是什么理论著作。可你热爱某些东西，信仰某些道德准则。你应该向我们指明这地球上哪些是可爱的东西。同时也应该再写一些优美的作品，使这个地球更加适于人类居住。我以为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所在。”

朗贝尔一口气发表了这番高论。亨利感到他事先是有准备的，仿佛多少天来一直等待着这一机会似的。“文学可并不一定就快乐。”他说道。

“不，必定快乐！”朗贝尔说，“一旦成为艺术，即使悲伤的东西也会变成快乐。”他迟疑了一下，“快乐，也许这词用得不太妥当，可不管怎么说，这是有道理的。”他突然打住话头，脸色发红，“噢！我不愿意强迫你写书。只不过你不该忘记你首先是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

“我并没有忘记。”亨利说。

“我知道，可是……”朗贝尔变得局促不安，“比如，你关于葡萄牙的报道，写得确实很好，可我想起了你昔日写的有关西西里的文章。在你的报道里没有读到那样的笔墨，真有点遗憾。”

“若你有机会去葡萄牙，你也不会有兴致去描绘那花红似火的石榴树的。”亨利道。

“啊！我希望你能重新激起这份兴致。”朗贝尔声音咄咄逼人地说，“为什么就不行？人们完全有权利漫步海滨而不去关心沙丁鱼的卖价。”

“问题是我无法激起兴致。”亨利说。

“不管怎样，”朗贝尔言辞激烈地继续说道，“人们搞抵抗运动是为了维护个人及其保持个性、获得幸福的权利。收获劳动果实的时刻已经到了。”

“不幸的是，还有数十亿人，对他们来说，这种权利仍然是一句空话。”亨利说道。他耸了耸肩膀：“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关心他们的命运，所以不能半途而废。”

“那么，每个人都应该等到他人幸福才能想办法让自己获得幸福？”朗贝尔问道，“艺术和文学，就被打回了黄金时代？可是，人们现在恰恰需要文学和艺术！”

“我并不是说没有必要再写作。”亨利说。他迟疑不决。朗贝尔的责备切中了他的要害。确实，关于葡萄牙，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可以写，将它们排斥在外，他心里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遗憾。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这正是他的夙愿，永远不能忘记。从前，他立下了宏图大志，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刻了。少年得志，碰运气出了一部作品，被人乱加吹捧，他需要的是别的东西。“实际上，”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中你心意的小说，一部没有任何写作动机的小说，仅仅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叙述一些事情。”

“真的？”朗贝尔问道。他脸上显出了喜悦的神色：“你还没有写完吧？进展顺利吗？”

“开头嘛，总是有点儿难产，可还顺利！”亨利回答道。

“噢！我高兴极了！”朗贝尔说，“要是你让人给吃了，那该多遗憾啊！”

“我决不让人把我吃了。”亨利说道。

“你那部欢快的小说有进展吗？”波尔问道。

“有，有进展。”亨利答道。

她躺在他身后的床上，亨利隐隐约约感到她深沉的目光落在自己的颈背。一束目光并不发出声响，他实在不忍心把她赶走，可这目光却沉重地压迫着他。他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小说上来。这个月，他打定了主意，还是把小说发生的时间安排在一九三五年，这也许是着错棋。这几天来，他笔触干涩、词语枯竭。

“对，是着错棋。”他在心底肯定地说。他执意谈谈自己，可是，他与一九三五年的他已经判若两人，毫无相同之处。他当时对政治的淡漠态度、他的好奇心、他的勃勃雄心，以及个人主义的偏见，是多么短浅、多么幼稚！他设想的是一个一帆风顺、毫无坎坷的前程，进步有着保障，人与人之间很快就会产生博爱，世世代代将和睦相处：可这种设想尤其意味着自私和麻木。噢！他也许能为自己找到借口。可是，他写这部书的目的在于尽量表现他生活的真实，而不是为了解释什么过错。“必须用现在时去写。”他打定了主意。他重又阅读了最后几页。初来巴黎；与迪布勒伊最早几次交谈；去杰尔巴旅行：一想到这段往事就要被彻底埋葬，实在遗憾。“噢！我已有过亲身经历，这就足够了！”他自言自语道。但是倘若照此逻辑，那么现实经历也就足够了，人活着也就满足了。事实是人仅仅活在世上并不够，因为人迫切需要写作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哎，管它呢，不管怎样，谁也不可能拯救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今天自己要说什么。“我处于何种境况？我需要得到什么？”真是咄咄怪事：人之所以那么迫切要求表现自我，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却又无从说起。“我是怎样一个人？”过去，他从不向自己提出这种问题。他总认

为其他人全都已经定型，他们的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可唯独他不同。他的作品和生命远远没有终结，这使他得以原谅别人对他的种种评价，并尊重他人，哪怕对迪布勒伊也是如此，只不过处在他日后的作品将获得的高度，带着几分俯就的姿态对迪布勒伊表示敬意罢了。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定了型的成年人：年轻人把他尊为长者，成年人把他视作同辈，有的人甚至对他表示敬重。定了型，有了限度，到了终点，这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然而他又是谁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的作品决定了他的存在；可反过来说，要想写出作品，他又不得不了解自己的真实所在。乍一看，他刚刚度过的这几个月，意义相当明显，可要是进一步细看，一切便模糊不清。帮助人们更好地思索、更好地生活，这果真是他的心愿，或只不过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而已？他真的关心他人的命运，或只是寻找良心的平静？而文学，这对他来说又成了一种什么东西？当没有迫切的东西急需表达，而硬着头皮去写作，必定流于抽象。他举着笔，想到波尔肯定发现了他没有在写，心中好不气恼。他转过身子：“你明天上午就去找格雷邦吧？”他问道。

波尔莞尔而笑：“你呀，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便抓住不放。”

“听我讲，那支歌你唱合适极了，你说你喜欢，布吕热尔的曲子优美动人，萨布里利奥随时就会来听你演唱，不管你愿意哪一天，你自己呢，也完全可以积极配合！不要总躺在床上昏昏沉沉了，还是去练练嗓子，这样没有坏处，我向你保证。”

“我并不昏昏沉沉。”

“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经为你约定了时间，你去不去？”

“我十分乐意去找格雷邦，好好地学唱你那支歌。”她说道。

“可你肯定通过不了试唱，你是想说这个意思吧？”

她嫣然一笑：“是有这么点儿意思。”

“你真让我泄气！”

“你得承认我可从来没有给过你什么鼓励！”她又微微一笑，“你别为我操心了。”她含情脉脉地说。

他多么希望为她操点心，了却这门心事，再也别像现在这样总感觉到她在身后窥望着他。也许她已经有所察觉。亨利跟萨布里利奥谈了此事，他又定了两首歌词，挑选了整整一套歌曲，然后又给格雷邦打了电话，凡是她能够为她做到的，他全都做了。她十分乐意为他歌唱，甚至还过分地以此来投他所好，但是，他安排的一切，她却死活不接受。亨利又开始毫无兴致地爬起格子，写下一行行死气沉沉的文字。

就这样，他心烦意乱地对着纸笔呆了两个小时。突然，有人使劲地敲门。他看了看表：零点十分。“有人敲门。”

波尔在床上昏昏欲睡，支起身子：“我去开门吗？”

敲门声又响了，他们听到一个欢快的声音：“我是迪布勒伊，打扰你们吗？”

他们一起下了楼梯，波尔打开了门：“没发生什么事吧？”

“指谁呀？”迪布勒伊笑眯眯地说道，“我看见了灯光，我想可以上来看看。刚刚过十二点，你们就要上床睡觉了？”他早已坐到了平时坐的那把扶手椅上。

“我正想喝一杯呢！”亨利说，“我又不敢独自空饮。是我那个邪恶的魔鬼把您召来的吧。”

“来点儿白兰地？”波尔打开壁橱问道。



“非常乐意。”迪布勒伊朝亨利转过脸去，脸上神采焕发，“我给您带来了一条最新消息，您肯定很感兴趣。”

“什么消息？”

“考虑到可能引起资金困难，我们或多或少放弃了那个把《希望报》办成革命解放联合会机关报的想法……”

“是的。”亨利说道。他接过波尔递给他的酒，呷了一口，心里隐隐约约感到不安。

“呃，我刚刚从一个钱多得发烂的家伙那里出来，他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接济我们。您没有听说过一个叫特拉利奥的吧？那是一个经营鞋的大老板，他搞过一点儿抵抗运动。”

“我好像有一点儿印象。”

“他拥有数百万家产，对萨玛泽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真是幸运的巧合，这最终促使他下决心要帮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大忙。今天晚上，萨玛泽尔领我到了那人家里。他准备赞助六月的集会，如果《希望报》成为联合会的报纸，他也一定提供必要的资金。”

“萨玛泽尔的关系可真不赖。”亨利说。他一口饮尽了杯中的酒。迪布勒伊过分喜形于色，他感到有点儿气恼。

“萨玛泽尔是那种城里晚宴少不了的家伙。”迪布勒伊笑哈哈地说，“可对您和我来说，这种事谁也别指望让我们去干，我还不如到广场上去募捐呢。不过，这事正合他的胃口，他高兴着呢。也好，反正这样他可以弄到钱：在财务方面，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我们会落到什么地步。他是在被德占领期间与特拉利奥结识的，并对他产生了影响。”

“那个腰缠万贯的鞋老板也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

“您奇怪吗？”

波尔坐在迪布勒伊的正对面抽着香烟，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他，一副敌对的神态。她正欲张嘴，亨利便隐约感觉到了她那愤怒的声音，于是抢在她前头说道：

“我可不会对您说，您的建议让我激动万分。”

迪布勒伊耸耸肩膀：“您知道，所有报纸或迟或早都不得不接受私人赞助。新闻自由：这又是一种漂亮的无稽之谈！”

“《希望报》已经恢复了正常。”亨利说，“倘若我们保持现状，自己完全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你们自己存在下去，还有什么？”迪布勒伊生气地说道，“我完全理解：您独自一人创办了《希望报》，您也希望单枪匹马办下去，我理解。”他重复说道，“可您还是想想您应该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月里，您已经意识到革命解放联合会多么迫切需要一份报纸，是不是？”

“是的。”亨利答道。

“您也承认我们行动的重要性。那么？”

“如果那位先生为《希望报》提供资金，他肯定也要插上一手。”亨利说。

“啊！这绝对不可能！”迪布勒伊说道，“他绝对不会干涉报社的领导。实际上，跟那么一个赞助人合作，您会比现在还独立得多，因为说到底，您现在由于害怕失去您的读者，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您的那个好人，我总觉得像是个古怪的慈善家。”

“要是您见了那人的面，您马上会明白的。”迪布勒伊说。

“他决不会向我提出任何条件，我总难以相信。”亨利说。

“决不会提任何条件，我向您打保票，这是确定无疑的。”

“这一切不会是空话吧，您完全有把握？”

“听我说，您自己跟他谈去！”迪布勒伊说道，“您只需给他打个电话，他已经准备明天签字。”

迪布勒伊口气如此轻松，亨利不禁淡淡一笑：“还是等一等吧！我首先得见见吕克。再说，即使我们决定宣告支持革命解放联合会，我们也要尽可能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我更乐意这样做。”

“以我个人之见，我坚信《希望报》不会失去它的读者。”迪布勒伊说，“我完全赞同不要特拉利奥帮助，自己去解决困难。”他犹豫了一下：“不过，他还是希望您跟他谈谈为好。”

“他已经跟您谈过了，跟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亨利说，“只要我有办法，我决不会要求他向我提供资金。”

“随您的便。”迪布勒伊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求您了，尽早做出决定。我们已经丧失了那么多时间！”

“您知道，您向我提出的这些要求事关重大。”亨利说，“涉及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还是您尽可能耐心等一等吧。”

“我是无可奈何，不得不耐着性子啊。”迪布勒伊叹了一口气说道。他站起身子，朝波尔咧嘴一笑：“您不跟我去转一圈？”

“上哪儿？”波尔问道。

“随便哪儿，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个真正的仲夏夜。”

“不，我困了。”波尔怏怏不乐地说。

“我也困了。”亨利说。

“那算了，我就独自一个人去漫步。”迪布勒伊边朝门口走去边说，“星期六见。”

“星期六见。”

亨利插上门，当他转过身，波尔迎面站着，满脸惊骇不安的神色：“真发疯了！他想抢走你的报纸！”

“听我讲，这谈不上什么抢。”亨利说道。他故意打了呵欠。波尔实际上跟他观点一致，可就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去和波尔讨论，他最受不了。他心里也恼火：简直是要鬼花招！迪布勒伊只要想得到这份报纸，就会自以为有权利得到它。“我个人表示的反感，他才不顾忌呢；一旦他决定利用你，他的友情就没有什么分量了。”

“你应该让他滚蛋。”波尔说，“他决不会认真待你的，你永远都是他帮助在文学界扬了名的年轻小伙子，一切全都亏了他。”

“可说到底，他并没有苛求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亨利说，“我是革命解放联合会成员，我主编《希望报》：这两件事合二为一倒是自然的。”

“那你将再也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将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波尔气得声音发抖。“再说，你必定一头扎到政治中去，再也没有一分钟可自由支配。你已经抱怨缺少时间写你的小说了……”

“你就别恐慌不安了，一切都还没有定局。”亨利说道，“我绝对没有说我接受。”

他听着波尔的异议，心中的积恨渐渐烟消云散。她抗议如此激烈，反倒显示了其理由的无足轻重。实际上，这都是亨利在自己心底反复思考的那些理由。“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我担心被政治吞没了，恐惧承担新的责任，希望有空暇时间，特别是希望当家做主。”总而言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理由。第二天，当他来到报社，他打心眼里希望吕克能给他提供更为充足的理由。

但是，吕克已经无力应付局面。显然，拉舒姆给《希望报》帮了倒忙，人们私下议论亨利被共产党人所控制，这实在让人生气，更何况亨利近来在许多方面对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如共产党人把抵抗运动和他们的党混为一谈，搞竞选宣传蛊惑人心，不知廉耻地一味纵容他人，但对与敌人合作过的人却一律严加惩罚。可是，右派报刊幸灾乐祸，对这种误解大加利用。读者纷纷抱怨，朗贝尔要求采取措施，报社的大部分人心情不舒畅，吕克也不例外。“反正都是标签，”当亨利向他阐明了形势，吕克说道，“那与其说让人当作共产党，还不如代表革命解放联合会为好。”这几乎是大家的一致看法。“可我既不相信革命解放联合会，也不相信共产党，这两家都是一路货色。”樊尚说，“照你的想法做出决定吧。”

“说到底，他们都是同意的。”亨利独自回到办公室后，下了这样的结论。“他们看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他心头一揪：他马上要不得不接受。革命解放联合会迫切需要一份报纸，而他又具体代表了一种机会，人们没有权利拒绝。世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动荡不定，前途也许就取决于某个难以估料的因素：不为实现和平而做出一切努力无异于犯罪。亨利看了看写字台、扶手椅和四壁，听了听轮转印刷机的隆隆声，猛然感到自己从一个毫无意义的长梦中惊醒。迄今为止，他一直把《希望报》看作某种玩具：小印刷工的一套用具——一套形状与实物一模一样的精美的玩具。然而，它是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人们有权利询问这件武器使用得如何。他向窗户走去。噢！他有点夸大其辞了。他并非那么毫无意义。九月的欢乐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事关这份报纸，可他总认为有必要向自己做出交代，他完全错了。“真怪，”他心里琢磨道，“一旦做了件有用的事情，人们赋予你的不是权利，反

而是义务。”他创办了《希望报》，可这导致他整个儿扎进了政治的旋涡之中。他脑中已经想象到了萨玛泽尔擅自闯入家门，高谈阔论，迪布勒伊接二连三地打来电话，以及形形色色的会议、商谈、争论和交易。他曾经向自己发誓：“我决不让人把我吃了。”哎，命运已定：他就要被人吞噬。他走出办公室，下了楼梯。城市笼罩在茫茫雾霭之中，在这黑夜里宛如一个巨大的车站：他过去多么喜欢雾霭和车站。可如今，他再也没有任何爱，他已经让人给吃了。正因为如此，在他企图表达自己的一刻，他寻觅不到任何要倾诉的东西。“你爱着某些东西，请告诉我是哪些！”哪些？他既不爱波尔，也不爱纳迪娜；旅行，这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他再也没有兴致去读书、漫步、听音乐；他再也不为了自己的乐趣去做点什么；他再也不能驻足街头；再也不能欢乐地回忆往事。有许许多多人要接待，有一大堆事情要着手去做：他就像一个工程师生活在工具的天地里。他的心变得比鹅卵石还硬，这就不足为怪了。他加快了脚步。这副冷酷的心肠，让他自己也感到恐惧。在圣诞之夜，他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恢复自我，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寻觅到。相反，他整天感到心情不舒畅，总是处于守势，始终紧紧张张，动辄生气，满肚子恼火。他心里十分清楚难以承担这些自找的麻烦事，它们只能给他带来烦恼。“我学识疏浅、目光短浅、处事轻率，我没有时间，将永远没有空暇。”这种老生常谈，令人厌烦。但是，他将永无休止地听下去，一切都将愈来愈糟，糟上加糟。被吃，被吞噬，被剥得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再也不可能写作。写作，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正在选择另一种方式生活，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与任何人交流。“我不愿意。”他内心发出了反抗的呼声。不，他不乐意接受并非毫无道理。恰恰相反，倘若他还有几分激情，他完全

可以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事关他作家生命的存亡，他必须抗争。“不管怎么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手中并不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他心里想，“而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也并非掌握在我的手中。”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人们对自己实在太认真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举止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并没有多少分量：它多纤、多孔，并不坚固。”行人在雾中匆匆行走，仿佛他们提早几分钟抵达此处或彼处事关重大似的。可最终，他们都有一死，我也在所难免：这又减轻了多少生命的负担。人们对死亡无能为力，因此对任何也无能为力。因此谁也就不欠任何人的债，人活着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抛弃《希望报》和革命解放联合会，离开巴黎，隐居到南部的某个偏僻角落，集中精力去写作。“自己播种，自己收获。”朗贝尔经常这样说。还是想方设法争取自己幸福地生活，不要去等待普天下的人都幸福的那一天了。为什么就不行？亨利想象着孤零零的农舍、松树，想象着丛林的气息。“可我将写些什么？”他大脑空空，继续向前走去。“陷阱早已设下。”他心里在想，“正当你以为脱险的时刻，它却落到了你的头上。”用词语寻觅过去、拯救现在，多美啊！可只有将话语向他人倾诉，这才能实现；只有当过去、现在和生命举足轻重，这才富有意义。如果这个世界无足轻重，他人微不足道，写作又有何用？那不只有无所事事、厌烦得尽打呵欠了？生活，是无法割裂的，必须整个儿占取它：要么拥有它，要么便失去它。可惜人们没有时间去拥有一切，这就是悲剧之所在。亨利的脑中骤然间又混乱不堪。他珍爱这份报纸，他对于战争、和平和公道的种种忧虑并非毫无意义，决不能把这一切统统抛到脑后。但是，他又是一个作家，他想要写作。到目前为止，他勉勉强强总算把这一切凑合过去

了：应该说比较糟。倘若他向迪布勒伊让步，那他将永远无法摆脱困境。那又怎么办？让步？不让步？行动？写作？他回家上了床。

几天过去了，亨利仍然感到犹豫不决。“行，还是不行？”这问题始终缠绕着他，最终扰得他心情烦躁。突然，他发现门洞处露出了拉舒姆那副笑嘻嘻的面孔，他更加意识到了自己情绪的恶劣。“你能给我五分钟吗？”拉舒姆问道。

拉舒姆常来报社看望樊尚。每当他来到亨利的办公室，亨利总对他表示欢迎，可这一次，亨利声音极为生硬地说道：“我想还是明天再说了，我手头有篇文章要赶写。”

“可我想今天跟你谈谈。”拉舒姆说道，没有一点窘迫的样子，一屁股坐了下来。

“谈什么？”

拉舒姆带着某种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亨利：

“据樊尚说，《希望报》要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

“樊尚那张饶舌嘴，”亨利说，“纯属无稽之谈。”

“啊！这我就放心了！”拉舒姆说。

“为什么？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亨利带有几分挑衅的口吻问道。

“不然就会铸成大错。”拉舒姆说。

“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亨利问道。

“我考虑到你不了解情况。”拉舒姆说，“正因为如此我想提醒你注意。”他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起来：“在党内，大家认为革命解放联合会正逐渐蜕变成一个反共组织。”

亨利张口哈哈大笑：“果真如此！我自己可永远不敢这么想！”



“没有什么可笑的！”拉舒姆说。

“你笑口难开！”亨利说道，戏弄地瞥了拉舒姆一眼，“你对《希望报》大唱赞歌，对我的胃口来说，甚至有点儿过分。迪布勒伊宣传的跟我说的完全一样，可你却说他反对你们！发生什么不测风云了？”他补充道，“上个星期，拉福利不是友好得很吗？”

“像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样一个运动，态度极为暧昧。”拉舒姆口气稳重地说道，“一方面，它把人们引向左派，这确有其事；可另一方面，一旦它吞并了某家报纸，组织联合，其用心无非是为了打入我们的核心。开始时，共产党希望达成联合，可当对方公开反对我们，那我们就不得不与他们斗争。”

“你是想说倘若革命解放联合会是一个可有可无、默默无闻的小组，紧紧追随你们，老老实实在地活动，那你们就会容忍它的存在，甚至给予鼓励？可如果它开始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神圣的同盟就再也无从谈起？”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它是企图打入我们的核心。”拉舒姆说，“因此，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神圣同盟。”

“对，你们就是这样推断的！”亨利说，“呃，我也向你进一言：别去攻击革命解放联合会。你们决不可能让任何人相信你们那一套，说这是个反共组织。相反，你们倒会使那些认为民族阵线是个骗局的人显得理直气壮。怪不得除了你们之外，你们不容忍一个左派的存在！”

“目前还不可能公开反对革命解放联合会。”拉舒姆说，“只不过看它不顺眼，仅此而已。”他神情严肃地看了看亨利，“一旦它到了拥有报纸的那一天，它就会构成危险。别把《希望报》让给他们。”

“哼，是讹诈吧。”亨利说，“如果它放弃拥有一份报纸，它就可以平平安安跟着别人转，是不是？”

“讹诈！”拉舒姆责怪道，“若革命解放联合会安分守己，那就彼此仍以朋友相待；不然，决不客气。这是合乎逻辑的。”

亨利耸肩膀：“当斯克利亚西纳向我断言无法与你们共事时，我还不愿相信呢。唉，他言之有理。大家只有服从你们的指挥，按你们的眼色行事的义务，别无权利。”

“你是不愿意明白！”拉舒姆说，紧接着以咄咄逼人的声音补充道：“为什么就不保持独立？这是你的力量所在。”

“即使我和革命解放联合会一起行动，我要说的也将与从前的一模一样。”亨利说道，“说的都是你们赞同的东西。”

“但是，你将以某个派别的名义说话，意义也就截然不同了。”

“而迄今为止，人们也许都以为我赞同共产党的整个路线？这给你们提供了方便？”

“你确实是赞同的。”拉舒姆热情洋溢地说，“若你讨厌再扮演自由射手的角色，那就跟我们一块儿干。不管怎么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毫无前途：他们绝对不可能争取到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内，若你讲话，听你的人很多，你在里面可以担当一项名副其实的工作。”

“可那工作不中我的意。”亨利说道。他恼火地想：“他们不折不扣地把我给吞并了。”拉舒姆继续进行诱导，可他应该明白这类废话决不可能激起人们向他们靠拢的欲望。他是作为朋友先来给亨利报个信，还是前来诱骗他？十有八九，这两种目的兼而有之，而这正是最卑鄙的行径。亨利突然开口说道：

“我们在浪费时间，我得把文章写完。”

拉舒姆站了起来：“你要牢记，若迪布勒伊掌握了报纸，这只对他有利，于你并无好处。”

“请相信我会维护我自己的利益的。”亨利说。

他们相当冷淡地握了握手。

迪布勒伊已经获悉共产党变卦的消息。拉福利彬彬有礼，劝他放弃集会的主意。“他们害怕我们力量过分壮大。”迪布勒伊说，“他们企图吓唬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坚决顶住，他们却不敢轻举妄动、攻击我们。”他做出了决定，决不妥协，亨利极为赞同。可总得把问题提交委员会讨论一下：这纯粹是走走形式，委员会最终总是赞成迪布勒伊的意见。“浪费了多少时间啊！”亨利听着那慷慨激昂的、乱哄哄的声音，心里这样在想。他透过窗户望了望美丽的蓝天：“我还不如去散步呢！”他自言自语道。这是初春的第一天，又是和平后的第一个春天，可他却抽不出一分钟的空暇去享受这美好的春光。上午，他向美国战地记者做了报告，继而又和北非人进行了秘密交谈；中午，他匆匆吃了一个三明治，边吃边浏览了报纸；现在，他又被关进了这间会议室。他看了看别人：没有一个想开一开窗户。勒诺瓦既激动又羞怯，声音颤抖，几乎在结结巴巴地说：“如果这次集会会被视为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话，那我认为是有害的。”

“若不揭露共产党的专横，那才有害呢。”萨维埃尔说道，“正是因为这样怯懦，左派才渐渐走向灭亡。”

“我不认为我是个懦夫。”勒诺瓦说道，“可是，我想争取自己的权利，当我的同志们点燃节日篝火的那个夜晚到来时，能与他们同声高唱。”

“哎哟，我们大家意见实际上都是一致的，只是个策略问题。”萨玛泽尔说。

他一开口说话，众声便戛然而止，只要他亮开嗓门，就没有他人说话的位置。他嗓门大，而且充满欢乐，当他从嘴中发出洪亮的声音时，那架势仿佛在咕嘟咕嘟大口地喝红葡萄酒。他振振有辞地解释说集会本身构成了独立于共产党的一种宣言，因此集会讲话的内容就不偏不倚，甚至友好为妥。他讲得如此机智，以至萨维埃尔都以为这是一种策略的行动，其目的在于保证与共产党人决裂的同时又把错误推到他们头上，可是勒诺瓦却理解成这是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同盟。

“可是，这种灵活的手段又有何用？”亨利心想，“只是掩盖了我们的分歧，而并未消除。”眼下，迪布勒伊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众人接受他的决定。“但是，倘若形势紧张起来，比如共产党人向我们发起攻击，那每个人的反应将会怎样？”勒诺瓦已被共产党人所迷惑，只是他的文学旨趣和对迪布勒伊的友情才使他暂时没有加入共产党。恰恰相反，萨维埃尔作为一个社会党积极分子，昔日的积恨难以平息。至于萨玛泽尔，亨利对他到底想些什么不甚了解，心里隐隐约约地对他有点儿不信任。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客典型。由于他长得腰圆膀宽，加之声音热烈达到了嘶哑的地步，像是深深扎根于大地，让人觉得他对人、对物有着强烈的爱。可实际上，世间的人与物只不过用以补充他那狂热的活力：他恰恰因此而飘飘然。他是多么喜欢讲话！不管对谁都是滔滔不绝！到城中参加晚宴对他来说是多么合适！可是，当一个人不关心自己说话的含义而更注重自己说话的声音时，那他还有什么诚意可言？布吕诺和莫兰是真诚的，可总是犹豫不决，正是拉舒姆所说的那种存有幻想、感到自己有所用处却从不牺牲自身利益的知识分

子。“跟我一样，”亨利暗自思量。“也和迪布勒伊相同。只要能够和共产党人一起行动而又不与他们为伍，那就行。可万一他们决定把我们排斥在外，那就会提出令人大伤脑筋的难题。”亨利举目遥望蓝天。妄想今天就解决这道难题，实在没有必要，众人心中甚至还无法具体地提出这道难题呢：只要共产党的态度一变，所有的前景就会跟着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必须坚决不畏恫吓。大家实际上对此观点一致，这些无休无止的争论纯属废话。“眼下，有人正在悠闲地垂钓呢。”亨利心里在想。他并不喜爱垂钓，可垂钓者却乐此不疲，他们真有福气。

当委员会终于一致同意举行集会后，萨玛泽尔走到了亨利身旁。

“这次集会无论如何必须成功！”他说道。他的话中隐含着某种责备。

“为此，发展成员的速度必须大大加快。”萨玛泽尔说道。

“但愿如此。”

“您明白，如果有份报纸，那我们保证能引起公众更为广泛的兴趣。”

“我知道。”亨利说。

他毫无兴致地打量着这张总是笑盈盈的、结结实实的面孔。“如果我继续走下去的话，那我便要跟他打交道，至少不比迪布勒伊少。”他暗自在想。萨玛泽尔一活动起来，往往不知疲倦。

“迫切需要了解您的回话。”萨玛泽尔说。

“我已经事先告诉迪布勒伊，必须给我几天考虑的时间。”

“是的，还有几天时间呢。”萨玛泽尔说。

“我显然不喜欢他。”亨利在心底再次这样想。可他紧接着责备自己：“这恰恰又是一种个人主义者的反应！”一个同盟者并不一定非是一位朋友。“再说，朋友是什么？”他一边和迪布勒伊握手，一边自问，“作为朋友：要掌握哪种分寸？要付出什么代价？如果我不让步，这一友情将会变得怎样？”

“您没忘记一些稿件还在《警觉》杂志社等着您处理吧？”迪布勒伊说。

“我马上就去。”亨利说。

他对这份杂志更有兴趣，他可以帮助迪布勒伊组稿、选稿，其乐无穷。可还是那个老问题：得有时间仔细阅读稿件，给作者复信，与他们交谈。绝对不可能。那些无名氏的书稿，他只能匆匆地浏览一下。“我什么都是在穷对付。”他一边坐到黑色小车的方向盘前，一边在想。这美妙的一天，他也是在马马虎虎地打发。若这样一天天混下去，最终必将稀里糊涂地了却一生。

“你是来取你的稿件的吧？”纳迪娜问道。她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态，递给他一只鼓鼓的牛皮纸袋。她对待自己的秘书工作态度极为认真：“这是征稿新闻，你愿意看一眼吗？”

“改天吧。”亨利说。他富于同情心地打量着堆在桌上的那一叠叠稿件，有黑色、红色、绿色的笔记本，有扎得乱七八糟的纸包，也有装订成册的稿件：稿件如此之多，然而对它们各自的作者来说，每一部稿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请你把要取走的稿件清单给我。”纳迪娜一边忙着整理卡片，一边说道。

“我把这包取走。”亨利说道，“还有这一件，像是挺好的。”他指了指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第一页引起了他的兴趣。

“小珀勒维的作品？他样子挺可爱的，那个红棕头发的小伙子，可他年纪才这么大点儿，能写出什么来？他最多不超过二十二岁。”她不由分说地用手按住了本子，“先给我留下吧。我今晚给你送去。”

“我并不肯定这就是部好东西……”

“我想看看。”纳迪娜说。这种贪婪的好奇心是她表现的唯一的激情。“今晚咱们见面好吧？”她用怀疑的口吻接着问道。

“行。十点钟，街头的那个小酒吧见。”

“在这之前你不去马尔科尼饭店吗？柏林被攻克了，大家要在那儿庆贺一番，朋友们都会去的。”

“我没有时间。”

“听说马尔科尼饭店有不少最流行的唱片，我可不在乎，可你口口声声说喜欢爵士乐。”

“我是喜爱爵士乐，可我有事要忙。”

“在五点至十点之间，你就不能腾出一分钟时间？”

“不行。七点钟，我要去见杜尔纳勒，他终于给了我约会的时间。”

纳迪娜耸肩膀：“他准会对你大加嘲笑！”

“我有所准备。可我想这就可以给可怜的达斯·维埃纳写回信了，告诉他我已经当面跟杜尔纳勒谈过了。”

纳迪娜一声不吭地签好清单：

“行，那今晚见。”她抬起头说道。

亨利对她微微一笑：“今晚见。”

他将于十点与她相会，十一点左右，两人一块儿上报社对面的小旅馆去：是她坚持一定要再跟他睡觉。想到再过几个小时这枯燥的一天就将迎来一个温馨的玫瑰色的夜晚，这是一种慰藉。亨利钻进了小车，向报社驶去。夜晚尚还遥远，下午将要在无欢无乐中消逝。听听新的爵士乐，跟同事们一块儿喝喝酒，对女人频频微笑，这一切，他是多么喜欢。可他的时间以分来计算：在报社，已经有人在计算他的每一分钟。他恨不得把小车停在沿河马路边，倚着栏杆，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或者驾车驶向巴黎四周羞涩的乡野。他喜欢的东西多着哩。可是不行。今年，巴黎的古老城垣又将在他身旁悄悄地披上绿装。“一切都永不停息：存在的只有未来，然而它却无限制地往后推移。而这就是所谓的行动！”永无休止的讨论会、报告会：这一个又一个小时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现在，他又要动笔撰写社论，去见杜尔纳勒，十点钟之前勉强能腾出时间写完那篇文章，送去排印。他把车子停在报社的大楼前。得到了这辆小车算是运气，要是没有它，他永远也无法做完该做的事情。他打开车门，目光掠过了仪表盘。2327。他诧异地又看了一遍里程数。他清楚地记得昨晚计程表上指的是“2102”。掌握车库钥匙的只有四人：朗贝尔现在在德国，吕克上午一直在报社，从夜里十二点到中午十二点这段时间，樊尚怎么开了二百二十五公里？他可不是那种带着妓女四处兜风的家伙，他对妓院的想法极为独特。再说，他从哪儿弄到了汽油？他也该先打个招呼，大家有事向来都是先说一声的。亨利登上楼梯，走到办公室门口时，一动不动地呆立住了。这里程数的事使他感到蹊跷。他举步朝编辑室走去，把手搭在樊尚的肩上：

“嗯……”



樊尚转过身来，微微一笑，亨利一时犹豫不决。这根本谈不上什么怀疑，可刚才在读《法兰西晚报》头版下部的短文时，脑中浮现出樊尚在红酒吧露出的那副笑脸，现在樊尚脸上挂着微笑，亨利不禁又想到了那则短文。他暂时没有发问，改口道：“你来喝一杯好吗？”

“向来不拒绝。”樊尚答道。

他们上楼到了酒吧间，在门边的一张独脚小圆桌前坐下来，门正对着平台。亨利要了两杯白葡萄酒，这才开口问道：“你说，今天上午是你用的车子吧？”

“车子？没有用。”

“真怪了，要么除了我们，还有别的人掌握钥匙。我昨晚十二点把车开进了车库，此后有人开了二百二十五公里。”

“你可能看错数字了吧。”樊尚说。

“不，我肯定没看错，我记得清清楚楚，刚刚超过2100。”亨利稍停了片刻，“今天上午吕克一直在这里。若不是你开了车，我在纳闷到底是谁。我必须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这又关你什么事？”樊尚问道。他的话中带有某种恳求的口气，亨利一时默默地打量着他：

“我可不喜欢这个谜团。”他说。

“这可是一个小小的谜。”

“你以为？”

又出现了一阵沉默，亨利问道：

“是你开的车吧？”

樊尚微微一笑：“听我说，我正要求你帮忙呢。你就忘了这件事吧，彻底地忘了它。车子自昨晚以来没有开出去过，要说的就这些。”

亨利举杯一饮而尽。二百二十五公里，阿蒂希距巴黎约一百公里。《法兰西晚报》的那篇短文报道说，被怀疑与盖世太保同流合污的波马尔大夫刚刚获得不予起诉的特惠，可次日拂晓在阿蒂希他的家中发现被人杀害。亨利又细细地审视着樊尚。这件事简直就像是一部连载小说。可樊尚微微而笑，有骨有肉，实实在在。亨利站起身子。在阿蒂希，有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然而，有骨有肉的凶手不知去向。

“到平台上去谈也许更好。”亨利说。

“是的，今天天气很好。”樊尚边说边向栏杆走去，从栏杆上方望去，巴黎城的屋顶宛如一面镜子，闪闪发光。

“你昨天夜里在哪儿？”亨利问道。

“你执意要知道？”樊尚问道。

他得意地盘算着。亨利突然迸出一句：

“你在阿蒂希。”

樊尚脸色骤变，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手并没有颤抖。他猛地朝亨利抬起眼睛：

“你凭什么这么说？”

“再清楚不过了。”亨利说。

实际上，亨利话说出口时，连自己也不相信，可这突然成了事实。樊尚是其中一个团伙的成员，昨天夜里，他是在阿蒂希。

“真有那么清楚？”樊尚声音不快地问。他为自己如此轻而易举就被识破感到懊恼，至于其他，他似乎根本无所谓。

亨利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你好像还没有醒悟：这类事情卑鄙啊，卑鄙极了。”

“那个波马尔大夫，”樊尚平心静气地说，“每当小伙子们被打得昏迷过去，都是把他从拉蓬普街喊来，由他把他们弄醒，然后，又让他们经受严刑拷打。这勾当，他整整干了两年。”

亨利更紧地抓住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是的，他是个大混蛋。这又怎么样？地球上少一个混蛋又有何益？若在一九四三年杀附敌分子，这我完全同意。可现在，这没有任何益处，干这事用不着冒什么风险，不是什么英雄壮举、伟大事业，甚至连体育运动也算不上：仅仅是一种有害的行径而已。总有更有益的事情要做吧。”

“你认为肃奸运动是一出卑鄙的闹剧吧。”樊尚说。

“可你的所作所为确实是一出闹剧，卑鄙。”亨利说道。“你想要我把话对你挑明吗？”他气恼地补充道，“冒险结束了，这让你伤心，你极力维持假象，让冒险继续下去。可见鬼去吧！重要的不是冒险，是要捍卫的东西。”

“人们捍卫的东西总是一成不变。”樊尚声音平静地说。他仿佛在争论一个完全抽象的问题，死钻牛角尖。“你知道，”他继续说道，“这些小小的社会新闻对清醒清醒别人的头脑大有好处。他们极为需要。噢，上星期，我碰到了朗贝尔，他正和他父亲一起散步：这有点过分不知趣了，不是吗？”

“是我劝他如果真想再见他父亲，就不妨去看看他。”亨利说，“这只是他个人的事。清醒清醒别人的头脑！”他一耸肩膀继续说道，“非得疯了才会相信这能改变什么。”

“谁要改变什么，改变什么东西？”樊尚用讥讽的口吻反问道。

“你知道为什么工作停滞不前吗？”亨利愤怒地说，“因为人手不够。都是因为你，因为你的伙伴，因为所有那些小伙子的过错，只知

道以干蠢事为乐，不干正事。”

“你要我加入革命解放联合会吧？”樊尚以揶揄的口气问道。

“即便这样也要好得多！”亨利说，“你终要明白：去杀那些谁都不屑一顾的什么混蛋，这有什么意义？右派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损失。”

樊尚打断了他的话：“拉舒姆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是为反革命服务，而迪布勒伊则说共产党背叛了无产阶级。你去明辨是非吧！”他大模大样地朝落地窗走去，“忘了这件事吧：我向你保证再也不用车子了。”他冷冷一笑，补充说道。

“我才不在乎车子呢。”亨利说。

樊尚劈头说道：“至于别的，你就别管了。”他们穿过了酒吧间，樊尚问道：

“你等会儿去马尔科尼饭店吗？”

“不去。我事情太多了。”

“遗憾！大家能够欢聚一堂，庆祝同一件喜事，就这么一次机会了！我们多么希望你在大家中间啊！”

“我也同样。”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下楼梯。亨利多么想再讲点什么，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可他搜索枯肠，一无所获。他感到极为沮丧。樊尚身后已经留下十二具尸体，他企图继续杀人，以忘掉这一具具尸体。此间，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他马上又要去马尔科尼饭店酗酒。决不能让他继续这样下去。可该怎么阻止他呢？“准是某个地方什么东西腐败不堪了。”亨利心里在想。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可又有多少人不知做什么为好！这种矛盾本来是应该解决的，却总是悬而未决。“我马上派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搞一次长时间的采访。”他拿定了主意。可这不

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必须给樊尚提供某种强有力的东西。倘若革命解放联合会进展比较顺利，真正代表了某种希望，那亨利也许可以对他说：“我们需要你。”可眼下，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步。

两个小时后，亨利来到了凯道赛，心里闷闷不乐。杜尔纳勒的友好接待和谨慎的微笑，亨利早就预料到了。

“请转告你的朋友达斯·维埃纳，他的来信一定会受到重视，可劝他要耐心等待。”杜尔纳勒说道，“我负责通过信使递送你的回信。”他补充说道，“你只需把信交给我的秘书，可还是要小心才是。”

“当然，那个可怜的老家伙已经够受怀疑的了！”亨利带着几分责备看了看杜尔纳勒，“那些幻想家们，他们对事情不了解，可他们想把萨拉查赶下台总有道理吧。”

“他们当然有道理啰！”杜尔纳勒说道，话中隐含着某种积恨，亨利更加专注地打量着对方。

“那你不觉得应该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设法帮助他们吗？”他问道。

“什么方式？”

“我可不知道，这是你的职权范围。”

杜尔纳勒耸耸肩膀：“你对局势跟我一样了解。法兰西无能为力，自身难保，你怎能要求它给葡萄牙或哪个国家做什么事情！”

亨利惴惴不安地看了看他那张恼怒的面孔。杜尔纳勒是最早组织抵抗运动的人之一，他对胜利从未有过任何怀疑，如今轻易自认失败，不像是他呀。

“我们总归有点威望吧。”亨利说。

“你相信这种东西？你是那种为法兰西应邀参加旧金山会议而引以为骄傲的人？你到底想象了些什么？事实是我们已经无足轻重。”

“我们并不十分重要，这我同意。”亨利说，“可我们总可以发表意见，坚持自己的观点，施加压力……”

“我记忆犹新。”杜尔纳勒声音苦涩地说道，“过去，大家想挽回面子，以便法兰西能高昂着脑袋与盟国对话，有不少人因此而丢了脑袋：这血完全是白流。”

“你总不会对我说当初不该抗敌吧。”亨利说。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好处！”杜尔纳勒把手搭在亨利的肩头，“不要去传我跟你说的这番话。”

“当然不会。”亨利说。

杜尔纳勒的唇间陡然浮现出上流人士的微笑：“我高兴能有这机会再见到你！”

“我也一样。”亨利说。

亨利快步走出走廊，穿过院子。他心情沉重。“可怜的达斯·维埃纳。可怜的老天真汉们！”他仿佛又看到了他们的硬领、圆顶礼帽和他们眼睛里情有可原的怨恨。他们常说：“法兰西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可任何地方都再也不存在希望，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地方，希望都已化为泡影。他穿过马路，倚着河畔的栏杆。从葡萄牙遥望，法兰西仍然闪烁着那毁灭的星星经久不熄的光芒，亨利被迷惑了。突然，他发现他居住的是一个已经垂死渺小的国家的首都。塞纳河在河道里继续流淌，马德莱娜教堂、众议院大厦，还有方尖碑仍然高耸在原来的位置：人们满以为战争神奇地免除了巴黎的灾难。“我们大家都乐意这么想。”亨利暗暗思忖，一边把车子驶上圣日耳曼林荫大道。大道上，栗

树像往昔一样，花朵盛开，人们都甘心情愿受这些房屋、树木和长椅的迷惑，它们如此一丝不差地仿造了过去。但实际上，这座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经毁灭。亨利从今之后只不过是一个五等小国的无足轻重的子民，而《希望报》仅仅是一份类似《小利穆赞人》的地方小报。他有气无力地踏上报社的楼梯。“法兰西无能为力。”给无能为力的芸芸众生提供消息，激起他们的愤慨和热情，这又有何用？想当初撰写那篇有关葡萄牙的报道，亨利一丝不苟，仿佛会掀起震动世界两极的舆论。可华盛顿对此不屑一顾，而凯道赛又无能为力。他坐到办公桌前，重又从头读起他的那篇文章：这顶什么用？众人读完后，点点头，然后往废纸篓一扔了事！《希望报》保持独立与否，读者是多是少，甚或彻底关门又有什么关系？“我如此固执实在不值得！”亨利突然闪出这个念头。迪布勒伊和萨玛泽尔认为这份报纸有点用场，他们也相信假如法国不继续孤立下去，还能起到某种作用。一切的希望全在他们一方，而敌对一方则虚无一片。“那么？为何不打电话说我同意？”亨利暗自思量。他久久地盯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可他的手就是不动。他又开始读起他那篇文章来。

“喂，亨利！我是纳迪娜。”她话声颤抖，流露出几分惊慌，“你没有忘了我吧？”

他大吃一惊，看了看表：“没有，我这就下楼。还没有到十点一刻，对吧？”

“十点十七分。”

“唉，我刚才忙着呢。”

他慌忙放下电话。她干这等事真是富有天赋：她总是想方设法扫他俩幽会的兴致。在这枯燥无味的一天，亨利常常想起将紧紧搂抱着

她那光滑、温馨的躯体的时刻。他终于就要享受到他的这份春光。可刹那间，积恨又吞没了他的欲望。“又是一个自以为对我享有权利的女人？”他一边走下楼梯，一边在想，“波尔就已经够受的了……”他推开小咖啡店的门，纳迪娜正神态庄重地读报，还一边喝着矿泉水。

“怎么？你二十分钟都等不及了？”

她扬起脑袋：“原谅我，我本不想催你。可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只要我一开始等某个人，就仿佛觉得再也见不到他的面似的。”

“决不会就这样消失的。”

“你以为？”

他有些羞愧地扭过脑袋。他猛然回想起她虽然才十八岁，但已经负载着沉重的记忆。

“你是否已经点了点儿什么？”

“点了，今晚有牛排。”她随和地笑了笑，补充道，“你没有去马尔科尼饭店，做得对，那里没有什么意思。”

“樊尚又喝醉了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总是醉得不成人样，你应该设法劝劝他。”

“噢！樊尚！他有他自己的一切权利。”纳迪娜若有所思地说，“他跟别人是那么不同：他是位大天使……”

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亨利：“怎么样？你见过杜尔纳勒了？”

“见到他了。他说无能为力。”

“我早就料到了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纳迪娜说。

“我也知道。”他说。



“那就根本不必费这个力气！”纳迪娜说。她脸上又浮现出赌气的神色，把那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递给了亨利：“我把稿件给你带来。”

“有什么价值吗？”

“他说的是一些有关印度支那的事，很有意思。”纳迪娜以公允的口吻说道。

“你觉得可以摘几章在杂志上发表吗？”

“噢！当然。我呀，什么都愿意发表。”

她带着某种积恨看了看书稿：“得寡廉鲜耻才会有胆量这样谈论自己，我永远也做不到。”

亨利朝她淡淡一笑：“你从来没有写作的欲望吗？”

“从来没有。”纳迪娜带着夸张的口吻说道，“首先，有人根本没有这份天赋，却硬着头皮要写，我实在费解。”

“有时，我感到写作也许对你有所帮助。”亨利说。

纳迪娜脸色一沉：

“对我有所帮助？有什么帮助？”

“帮助你设法好好过日子。”

“我过得挺好，谢谢。”她一边张嘴吃起牛排，一边说道。“你们真滑稽。”她接着补充道，“比吸毒的人还滑稽。”

“怎么跟吸毒的人比？”

“吸毒的人想让大家吸毒，你们要让众人都写作。”

亨利打开书稿，那用打字机打得清清楚楚的词句重又在他脑中回响，发出清脆、硬朗、欢乐的声音，犹如雨点击打着小巧玲珑的鹅卵石。

“出自一个二十二岁小伙子的手笔，真出色。”他说道。

“是的，真出色。”她说道，接着一耸肩膀，“你怎么会因为一个你甚至素不相识的家伙而浑身激动？”

“我没有激动，我只是发现他富有才气。”

“那又怎么样？天底下有才气的作家不够多吗？你给我解释解释。”她一副执拗的神态继续说道，“爸爸和你还有什么必要发现一些尚未成熟的杰作？”

“如果有人写作，那是因为他相信文学。”亨利说道，“世上多一本好书，这让人高兴。”

“你是想说这会影响你们自己的活动，并证实你们活动的合理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她用自鸣得意的声音说道，“你们对年轻人的关心，实际上是自私自利。”

“噢！多么廉价的恬不知耻啊！”

“人就从来不会出于私心而行动？”

“这么说吧，不管怎样，有的自私形式对他人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比较愉快的。”

他尤其不愿意争论。此刻，她正用一截火柴棒剔着牙齿，他实在感到气恼。她把火柴棒往方砖地上一扔：“你也认为我做这秘书工作错了吗？”

“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你干得很出色。”

“我讲的不是秘书处的利益，而是出于我自己的利益考虑。我到底对了还是错了？”

说实在的，他基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管纳迪娜多么恬不知耻，若她知道他对她的事情无动于衷到这种程度，也会大吃一惊的。

“显然，你本来可以继续就学的。”他有口无心地说。

“我想要独立。”

在她父亲的杂志部工作，这真是一种滑稽的独立。实际上，她抱定宗旨要鄙视，甚至仇视她的父母，可要是他们的生活与她的生活断然分开，她又受不了，她需要当面嘲弄他们。亨利从容不迫地说：“你自己是最好的裁判。”

“那你觉得我做得对啰？”

“你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当然有理。”他违心地说，因为他知道纳迪娜喜爱的是谈论自己，而别人对她的任何评价，哪怕出于善意，也是对她的伤害。说真的，今天晚上，他没有兴致去谈论任何东西，他所希望的，只是和她上床睡觉。

“你知道要是你够好的话，会做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情？”

“你会跟我一起穿过街道。”

纳迪娜脸上霎时布满阴云：“你见我，总是为了这事。”她恼恨地说。

“我并不以为这会侮辱你。”

她哀怨地说：“我想谈谈。”

“那就谈吧！来杯白兰地？”

“你明明知道我不喝。”

“总是像圣母会的修女一样滴酒不沾。烟也不抽？”

“不。”

他要了杯白兰地，点了一支香烟。

“你想谈点什么？”

他的声音并不和蔼，可纳迪娜一点也不因此而张皇失措：

“我想加入共产党。”

“那就入呗。”

“可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急促地说道，“你想干的事情，你自己最明白不过。”

“可我有点犹豫，这并不那么简单。正是因为这，我才想咱们谈谈。”

“谈归谈，可决说服不了任何人。”

“跟别人，你谈得起劲。”纳迪娜声音突然变得尖刻起来，说道，“可跟我，你从来就不乐意，我猜想是因为我是个女人的缘故吧。女人，只配亲嘴。”

“我每天都用到了扯淡上。”他说，“要是你知道这最终会腻烦透的。”

确实，若对樊尚或朗贝尔，他决不会推脱。纳迪娜跟他们一样需要帮助。可惜对她不利的是，亨利死死记住了这一点，那就是若帮女人一次忙，无异于赋予她一项权利。她们往往把一件微不足道的赠品当作一种诺言。为此，亨利始终戒备着。

“我想，即使你入了党，你也在党内呆不了多久。”他鼓了鼓勇气说道。

“噢！你知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的重重顾虑，可不会把我吞吃掉。可以肯定的是，”她充满激情地说，“假使我入了党，当时在葡萄

牙见了那些饿得要死的孩子，我心里不会那么内疚。”

他保持缄默。对，一劳永逸地彻底摆脱内心的一切悔恨，确实颇有吸引力，可是，假如仅仅为这一点而入党的话，那必定失望无疑。

“你在想什么？”纳迪娜问道。

“我在想如果你真渴望入党，那就请去入。”

“可是你，你宁愿呆在革命解放联合会，也不愿加入共产党？”

“我为什么非要改变主意？”亨利反问道。

“那么，你认为当一个共产党员，这对我是好事，而对你就不然？”

“在他们那里，有许多事情我可忍受不了；要是你能忍受，就去吧。”

“瞧你，不愿谈吧！”她说。

“我是在谈呀。”

“口头上这么说说而已。你跟我在一起好像不耐烦透了！”她嗔怪地补充道。

“噢，不，我才不烦呢。可是，今天晚上，我真的昏昏沉沉的。”

“你一见到我总是昏昏沉沉的。”

“那是因为我见你的时候总是晚上，你明明知道我没有别的空闲时间。”

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纳迪娜开口说道：“听我说，我要向你提点要求，可你肯定会拒绝的……”

“什么？”

“你下一个周末跟我一起过。”

“可我不能。”他说道。仇恨再次涌上他的胸口。他渴望这个躯体，她拒绝了他，却一个劲地要求给她时间，给她关心……“你完全知道我不能。”

“因为波尔？”

“正是。”

“一个男子汉怎么就能一辈子当他再也不爱的女人的奴隶？”

“我从来就没有跟你说过我不爱波尔。”

“你怜悯她，可你满怀悔恨。这套感情的把戏，是多么卑鄙。要是再也没有兴致去见别人，那就拉倒，干脆点。”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任何时候都不要要求任何人帮任何忙。”他傲慢地瞅了她一眼说道，“只不过当别人回答你‘不行’的时候，千万别生气。”

“如果你不唠唠叨叨地跟我大谈你的什么职责，而坦率地告诉我说‘我不想跟你一起过这周末’的话，我不会生气的。”

亨利淡淡一笑。“不，”他心里想，“她要求说实话，就乖乖地实话相告，这一次，我才不上这种坦率把戏的当呢。”亨利高声说道：“假设我坦率地跟你这么说呢？”

“那你根本用不着跟我说两遍。”

她一把拿起桌上的坤包，猛地一合。“我才不是蚂蟥一类的东西。”她说道，“我才不想缠着你不放呢。另外，你放心好了，我并不爱你。”她默不作声地打量了他片刻，“怎么会爱上一个知识分子呢？你们的心脏换成了天平，尾巴尖上长着个小脑。实际上，”她下结论道，“你们都是些法西斯分子。”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

“你们对人从来不一视同仁，只凭着你们所谓的良知指使别人。你们的慷慨，就是专横，你们的公允，就是自负。”

她若有所思地说道，一点也不生气。她站起身来，干脆地冷冷一笑：

“噢！别这副受气包的样子。你对见我感到厌烦，实际上，这也并不怎么让我高兴，没有什么要紧的。大家相遇了，交谈交谈而已。没有什么积恨。”

她消失在夜色笼罩的街道。亨利要求结账。他对自己颇为不满：“我为什么对她这么凶？”她常惹他生气，可他还是挺爱她的。“我动不动就生气。”他独自思忖，“一切都惹我恼火：准有什么东西玩不转了。”他一口饮尽杯中的酒。这不足为怪：他整日价干的都是些自己不愿干的事情，从早到晚活得都不顺心。“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乍一看，他在解放后所制定的那个恢复战前生活、用新的活动丰富这一生活的目标，并不显得怎么雄心勃勃。他满以为自己可以领导《希望报》，同时在革命解放联合会做事，而且并不因此而放弃写作和幸福的生活：可他未能做到。为什么？并非是时间问题，若他真的坚持，今天下午完全可以想办法到街头漫步或去马尔科尼饭店。就是眼下，他也还有时间工作，可以向侍者要点纸张，可这一念头让他感到恶心。“古怪的职业！”纳迪娜常这么说。她言之有理。俄国人正在蹂躏柏林城，大战接近结束，或者说另一场战争正在开始。怎能以编造一些未曾发生过的故事为乐呢？他一耸肩膀：这也是写作不顺利时常给自己编造的一类遁词。当时，战争威胁着人们，继而战争爆发了，他都可以以讲故事消遣取乐。现在为何就不行？他走出咖啡馆。他回想起了另一个夜晚，那是一个大雾迷茫的黑夜，他预言政治就要把他吃

掉：这下完了，他被吞噬了。可他为何就不能更好地自卫呢？内心枯竭，使他陷入瘫痪，这到底是为什么？他手头拿着那位小伙子的书稿，那位小伙子为何能寻觅到东西叙述，而偏偏他就不行？他也有过自己的二十二岁，也有过许许多多东西要倾吐，他经常在这些街头漫步，梦想着自己的书。书……他放缓了脚步，脚下行走的再也不是往昔的那些街道。从前，街头灯火耀眼，一条条街道纵横交错，布满这座世界的首都。如今，路灯闪着亮光，渐渐向远方延伸，刺透了黑夜，让人清晰地看到这条马路是多么狭窄，这些房屋又是多么破烂。光明之城熄灭了，即使它哪一天还能重放光芒，那巴黎也会像威尼斯、布拉格、死城布鲁日等城市一样一落千丈、黯然失色。这不是以前的那些街道、以前的那座城市、以前的那个世界。在圣诞节前夜，亨利曾暗自许下诺言，要用词句来歌颂和平的温馨，可这种和平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奉献给他，蓝色的天空和吐绿的树芽墨守着四季更迭的常规，看不到任何希望。“谈一谈我生活的乐趣。”可这生活再也没有乐趣，因为万物再也没有意义。正因为如此，写作的意义也不复存在。在这一点上，又是纳迪娜说得对。特茹河畔灯光闪烁，可一旦知道这灯光照耀的是一座在饥饿中死亡的城市，那内心就无法腾起乐趣去描绘。那些饿死的人决不是一个让人去摇唇鼓舌的借口。往昔仅仅是虚幻的景象而已，幻景一旦破灭，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只有灾祸、危难和不明确的任務，唯存一片混沌。亨利失去了一个世界，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无处栖身，两手空空，无足轻重：他再也不能谈任何东西。“唉，我只有闭嘴了。”他想到，“若我真的打定主意，就不会再四处分身了。我兴许能相当自得其乐地干一些不得不干的苦差事。”



他在红酒吧前停住了脚步，透过窗玻璃，他发现朱利安独自坐在一张高脚圆凳上。他推开门，听到有人在低声议论，说起他的名字。若在前一天，他也许还会因此而激动一番，可当他迈步穿过嘈杂的人群时，他暗暗责备自己又被一片可怜的幻景迷惑了：当一个危地马拉或洪都拉斯似的弹丸之国的大作家，多么不足挂齿的胜利！昔日，他自以为居住的是世界上一方得天独厚的天地，每一个词都从这里传遍整个地球，可现在，他深知他的一切话语都在自己的脚下渐渐失去了生命。

“太迟了！”朱利安说。

“什么太迟了？”

“那场厮打，你没有看见。噢！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补充道，“他们甚至都再也不知道该怎么规规矩矩地打。”

“是因为什么缘故？”

“有一个家伙称呼贝当 [\[8\]](#) ‘元帅’。”他声音含混不清地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扁扁的瓶子：“你想要点儿真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吗？”

“我要。”

“小姐，请您再拿只杯子，另加一杯苏打水。”朱利安说道。他给亨利斟了半杯威士忌。

“好酒！”亨利赞叹道，举杯痛饮了一口，“我正需要来点刺激剂。我这一天安排得这么满，真不可思议！你没有发现紧张忙碌了一天之后会感到多么空虚？”

“每天都满满的，从来都没有一小时的空闲，可惜酒瓶不一样，总是空空的。”

朱利安碰了一下亨利放在柜台上的本子：“这是什么玩意儿？是秘密文件？”

“一个年轻小伙子写的小说。”

“告诉那位小伙子，让他把这玩意儿给他小妹妹包东西玩吧，劝他像我一样当个图书管理员，这是个诱人的职业，再说也比较安全。你肯定注意到了：要是你把黄油或大炮卖给德国佬，人们可以原谅你，拥抱你，授予你勋章；可若你在这里或那里多写了一个字，那就瞄准！放！你该就这一方面写篇小文章。”

“我考虑过。”

“你什么都考虑，嗯？”朱利安把瓶中的苏格兰威士忌全倒进了杯中。“说来你可以整栏整栏地大写特写，要求国有化！就业与公道，你认为这有什么意思吗？狗屁的国有化，什么时候实行？”他举起杯子，“为柏林城的大屠杀干杯！”

“大屠杀？”

“你以为那些棒哥萨克人今天夜里在柏林会干出什么好事？屠杀和强奸！简直是乱七八糟。这就是胜利，嗨！我们的胜利。你不感到自豪吗？”

“啊！你总不至于也让我沾一身政治屎吧？”

“啊！不。去他的狗屎政治！”朱利安说道。

“要是你言下之意是这个世界不太有意思的话，”亨利说，“那我想的跟你一样。”

“是的。瞧这个烂地方，还叫什么酒吧。连醉鬼也口口声声说要振兴法国。还有女人！这个区没有一个快活的女人，尽是些扰得人心不安的女人。”

朱利安离开了高脚圆凳：“噢！跟我去蒙巴纳斯走走吧，那里至少找得到迷人的少女，也许不是真正的正儿八经的少女，可都很顺从，一点也不烦人。”

亨利摇摇头：“我要回家睡觉去。”

“你这人也不够意思。”朱利安厌恶地说，“没意思。这战后，实在是没劲！”

“没劲！”亨利说道。他目送着朱利安尊严十足地朝门口走去。这人也没有意思，差不多变得尖酸刻薄了。可说到底，这战后为什么就非得要特别有意思？对，在被德占领期间，古老的故事确实美妙。未来的赞歌唱得够多了，明天已变成了今日，再也不用歌唱了。实际上，巴黎已经被摧毁，所有人都在战争中死去了。“我也一样。”亨利自言自语道。以后呢？假如放弃苟活在人世，那死也就不痛苦了。结束写作，结束生活。唯有一个要求：行动。集体行动，不再关心自己。播种，再播种，永远不要收获。行动、团结、效劳，服从迪布勒伊的号令，向萨玛泽尔微笑。他就要去打电话：“报纸属于你们了。”效劳、团结、行动。他又要了份双杯白兰地。

---

[1] 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1932至1968年任葡萄牙总理。

[2] Djerba，突尼斯岛屿，旅游胜地。

[3] Nostradamus（1503—1566），法国医生、星相学家。

[4] Rastignac，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为复辟王朝时期青年野心家的典型。

[5] Quai d'Orsay, 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6] John Dewey (1859—1952) ,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 实用主义者。

[7] Epinal, 法国城镇, 以其图片制造艺术闻名。

[8] Henri Philippe Petain (1856—1951) , 法国元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战役的英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维希傀儡政府的元首。

## 第四章

苟安人世，停歇在生命的彼岸，说到底，如此活着极为惬意。从此，无所期待、无所畏惧，所有的时光都酷似往日的记忆。这就是纳迪娜不在身边时我的发现。多么安宁啊！寓所的门再也不叮咛作响，我可以与罗贝尔倾心交谈，而不使任何人失望，我可以独自消受夜晚，直到深夜，而没有任何人叩响我的房门。我充分利用这一切机会。我喜爱潜入每一时刻中去，突然捕捉住过去。哪怕一分钟的失眠也足够发生奇迹：一扇敞开的窗户，迎着三颗星星，这竟会使过去的一个个寒冬、圣诞节和冰封的原野重又显现在眼前。在垃圾桶的翻动声中，巴黎城的每个清晨从我孩提时代起一一苏醒了。罗贝尔的书房永远笼罩着那片熟悉的岑寂，他总在奋笔疾书，熬得双眼通红、双耳发聋，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然而，那些激动的低语声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他们一个个都新换了一副面孔，他们今天的名字叫勒诺瓦、萨玛泽尔。可是，那灰色烟草的气味，那激烈的话声，那和解的笑声，我一一全都认出来了。夜晚，我静听罗贝尔的故事，凝望着永恒的小纪念品、书籍、油画，我经常自言自语，死神也许比我猜想的要更宽容。

想当初，我不得不把自己牢牢地囚禁在自己的墓穴中。如今，潮湿的街道上，迎面常常遇见身着条纹睡衣裤的男人：这是首批返回家园的流放者。墙上、报上，许多照片向我们表明了在那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甚至都没有预感到“恐怖”一词的含义。一批批新的死者又扩

大了被我们的生命背叛了的死者的队伍。在我的诊室里，我经常看见一些苟延残喘的幸存者找上门来，他们一个个都被过去的岁月搅得没有片刻安宁。“我多么希望好好地睡上一夜而不回忆往事啊。”一位双颊气色尚好，但头发已经花白的大姑娘这样哀诉道。一般说来，我善于保护自己。所有神经症患者在战争期间都抑制住了内心的发作，今天，他们一个个都疯狂地进行报复，而我给予他们的只能是职业性的关怀。但是，面对这些重返家园的受难者，我感到羞愧：为自己康健的体魄，为自己居高临下地准备开导他们感到羞愧。啊！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一个个问题在我看来显得毫无意义。不管世界前途如何，必须帮助这些男女忘却过去、自我拯救。唯一的问题是我虽然连晚上都搭了进去，但每日的时间仍然太短暂了。

更何况纳迪娜又回到了巴黎。她身后拖着一只大水手包，里面装满了诱人的红肠、火腿、食糖、咖啡、巧克力。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了粘着糖粒的鸡蛋糕点、长袜、鞋子、披巾、衣料、烧酒。“你们得承认我混得不错吧！”她自豪地说。她身着一件苏格兰花呢裙，一件裁剪得体的红色衬衫，外着一件轻柔的裘毛大衣，脚穿皱胶底鞋。“赶紧让人给你做一件裙服，我可怜的母亲，你确实也太寒酸了。”她向我怀里扔过一种呈绚丽秋色的、毛茸茸的衣料，对我说道。整整两天，她情绪激昂地向我们描述葡萄牙的情况。她叙述得差劲极了，每当遇到词语难以表达时，她使用手比画着凑合。她的话声中躁动着某种强烈的不安情绪，仿佛迫切需要迷惑我们，以便从往事回忆中觅得乐趣。她傲慢地对住房进行了一番视察。

“你要明白：要擦这么些门窗玻璃！这么些地板！现在病人都涌来了，这些事情，你独自一人再也无法应付了。”

罗贝尔也坚决主张请个帮手。可是，我实在有点厌恶让人侍候，纳迪娜却说这纯属小资产阶级的顾虑。她第二天就给我找来了一位年轻的女用人，此人衣着讲究，做事勤快，名叫玛丽。可是，我却差点在第一个礼拜就辞退了。这些天，罗贝尔经常突然出门，那天，罗贝尔出门时，桌上乱七八糟扔着一些文稿。我听到他的书房里窸窣作响，打开门缝一看，见玛丽正弯着身子在看那些书稿。

“您是在干什么名堂？”

“我在整理。”玛丽平静地回答说，“我趁先生不在家整理整理。”

“我早已跟您说过，绝不要动这些书稿，您不是在整理，而是在看！”

“我看不懂先生写的字。”她遗憾地说，朝我微微一笑。她娇小的面孔，脸色阴郁，即使咧嘴也露不出笑容。“见先生整日价地在写，真有意思。他这些玩意儿都是从脑袋里取出来的？我想看一看这在纸上到底像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有碰坏。”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放弃了那个念头。她整天尽打扫卫生、整理东西，多厌烦啊！尽管她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看上去并不愚笨。我理解她是在设法消遣消遣。

“算了。”我说，“可以后别再动。”我又补充了一句：“读点东西，这让您开心吗？”

“我从来没有时间读。”玛丽回答道。

“您今天的活不是已经干完了吗？”

“我家里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大。”

“她不能学一个真正的职业，真可惜。”我心里在想。我隐隐约约地总想跟她谈谈，可我几乎看不透她，她十分内向。



“朗贝尔没有打电话来。”纳迪娜回家几天后，有一天对我说道，“可他明明知道亨利回家了，我也一样。”

“你行前跟他说过不下二十遍，说回来后你给他打招呼。他是害怕惹你烦。”

“噢！要是他赌气，那是他的事。你瞧见了，他完全可以不要我过日子。”

我没有答腔。她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说道：

“我想跟你说：你对亨利的事完全想错了。要爱那么一个家伙，让别人去爱吧！他对自己那么自信，再说，他感到厌倦。”她生气地下结论道。

确实，她对亨利没有丝毫的柔情。可是，每到该与他见面的日子，她都特别精心打扮一番，而回到家里，脾气总比平时更坏，这说明问题不可小视，一有什么借口，她便火冒三丈。一天上午，她一副复仇的模样，手中挥舞着一份刊物，气冲冲地闯进罗贝尔的书房：

“瞧瞧这！”

《未来》的头版上，斯克利亚西纳朝罗贝尔在笑，而罗贝尔一脸怒气，直视前方。

“啊！他们骗了我！”罗贝尔一把抓过周刊说道，“这是前几天在伊斯巴饭店的那个晚上。”他对纳迪娜解释说，“我让他们别缠着我，他们到底还是骗了我！”

“他们把你和这个坏家伙照在一起。”她气得声音发哽地说，“他们是故意这么拍的。”

“斯克利亚西纳不是一个坏家伙。”罗贝尔说。

“大家都说他已经被美国收买了。真可恶。你该怎么办？”

罗贝尔一耸肩膀：“你要我怎么办？”

“起诉。要是别人不答应，他们就没有权利拍照。”

纳迪娜双唇颤抖。她父亲是位名流，这向来让她讨厌。每当一位新的教授或一位主考官问她“您是不是罗贝尔·迪布勒伊的女儿”时，她便恼羞成怒，一声不吭。她为他而自豪，但是她希望他声名显赫而又鲜为人知。

“起诉，这会造成太大的反响。”罗贝尔说，“不行，我们没有武器。”他把刊物一扔，说道：“你那天说的事太对了，对我们来说，露脸就算裸体。”

他总是那么准确地向我提起我早已彻底忘却了的一些话，我对此感到惊讶，他对这些话赋予的意义往往比我赋予的更为深刻，他总是给所有人的话都赋予更深刻的意义。

“裸体从露脸开始，而诲淫始于多言。”他继续说道，“他们规定我们只能是雕像或亡灵，一旦发现我们有血有肉地活在地世，他们便谴责我们欺世盗名。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都会轻而易举地酿成丑闻：笑、说、吃，这都是现行犯罪。”

“那么，您就设法不要让人发现。”纳迪娜声音激怒地说。

“听我讲，”我说道，“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噢！你呀，那当然！即使有人从你的脚上踩过去，你都会以为别人是偶然碰到你的脚。”

实际上，他们围绕着罗贝尔的这番大吹大擂并不让我高兴。尽管他自一九三九年以来什么也没有发表——除在《希望报》写点文章之外——可人们吹起他来比战前还起劲得多。人们强烈要求他设法进入法兰西学院、争取荣誉勋位，记者们围追着他，报上刊登了有关他的

成堆成堆的谎言。“法国在吹嘘其地方特产：文化与时装。”他常对我这样说。他为围绕着他的这些胡言乱语也感到恼火，可又有什么办法？我尽管给纳迪娜百般解释，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可她每次在报刊上读到有关罗贝尔的消息或见到他的照片，总大怒一场。

现在，家里的门又叮咣作响，家具又东倒西歪，书籍又蹦蹦地往地板上乱丢一气了。这骚乱劲儿打一清早便开始。纳迪娜睡眠很少，她认为睡觉就是浪费时间，尽管她并不太知道怎么利用时间。一旦要去从事哪项职业，她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牺牲许多东西，因此，在她眼里，做任何事情都是白搭。她实在拿不定主意做什么事情。当我见她闷闷不乐地坐在打字机前时，我常问她：“有进步吗？”

“我还是学化学好，可我又怕通不过。”

“那就好好学你的化学吧。”

“可总得有个秘书会打字啊。”她一耸肩膀，“脑子里要记那么多公式，太荒诞了。这跟真正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

“要是那么烦，你就丢了化学呗！”

“你总对我谆谆教导。不要像风标那样行事。”

她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小时候，我常教她该如何如何，她厌烦透了，如今，她反过来又用那些话来对我。

“有的情况下，固执己见就是愚蠢。”

“可你别慌张！我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无能。这次考试，我会成功的。”

一天下午，她叩响了我的房门：“朗贝尔来看我们了。”

“来看你的。”我说。

“他后天又要出发去德国，他一定要跟你道个别。”她声音激动，又嘀咕了一句：

“来呀，不来就不太客气了。”

我随她来到了起居室。可我清楚，朗贝尔实际上并不太喜欢我。纳迪娜争强好胜、缺少诚意、执拗任性，这刺伤了他的心，他无疑——不无道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我猜想他也一心想找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妇人作为他心目中的母亲，却坚决抑制住这一幼稚的欲望。他鼻子微翘，双颊有些虚肿，这张面孔暴露了一个归顺之梦经常萦绕的精神和肉体。

“你不知道朗贝尔跟我谈了些什么吧？”纳迪娜激动地说，“十个流放者，美国人没有把他们送回去一个，全都被活活地拖死在集中营了。”

“开始几天，就有一半丧了命，因为让他们猛填红肠和罐头。”朗贝尔说，“而现在，早上就给他们一个汤，晚上一点咖啡，外加一截面包，他们都得了斑疹伤寒，像苍蝇一样一群一群地死去。”

“必须把这一切公布于世。”我说，“必须起来抗议。”

“佩隆会去做的，可他需要确凿的事实，这很难，因为他们禁止法国红十字会去集中营。正是为此事我才又要出差。”

“带我一起去吧。”纳迪娜说。

朗贝尔微微一笑：“我求之不得。”

“我的要求有什么可笑的吗？”纳迪娜声音不快地说。

“你完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朗贝尔说，“他们只给战地记者放行。”

“也有女的战地记者。”

“可你不是。再说，现在为时已晚，再也不接受任何人了。不过，别懊悔。”他补充道，“我可不劝你去干这种职业。”

他说的是他自己，可纳迪娜却以为从他的话中感觉到了几分以恩主自居的意思。“为什么？你做过的事，我也能做吧，不行吗？”

“你想看看我带回来的照片吧？”

“拿出来瞧瞧。”她贪婪地说。

他把照片扔在桌上，我更希望不看，可别无选择。尸体堆的照片，还能忍受，这一堆堆尸体太多了，可怎么给这些尸骨投以同情呢？面对活人的形象我们自己又该怎么办呢？所有这些眼睛……

“我见过的还要更惨。”纳迪娜说。

朗贝尔没有答腔，收起照片，然后用勉励的口吻说道：“你知道，若你真的渴望搞通讯报道，那也不难，你只需跟佩隆说说。就是在法国本土，也可能有一大堆调查工作要搞。”

纳迪娜打断了他的话：“我所向往的，是见见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副样子。一行行地爬格子，这对我来说可没有意思。”

“我肯定你能成功。”朗贝尔热情地说，“你富有胆识，善于诱导别人开口说话，你对一切都应付自如，准会到处畅通无阻。至于涂篇文章，很快就可学会。”

“不。”她神态固执地说，“只要一动笔写，就决不会讲真话；佩隆有关葡萄牙的报道：竖的全都成了横的。你的通讯，我肯定也是这么回事，我才不信呢。正因为如此，我才想亲眼见见是什么东西。可我决不会想办法将它们制造成谎言，然后拿去兜售。”

朗贝尔的面孔布上了阴云。我遂说道：“可我认为朗贝尔的文章极有说服力。达豪集中营的卫生所，让人感到就像亲自参观过一样。”

“你的感觉，这又证明了什么？”纳迪娜声音不耐烦地说。出现了片刻沉默，她开口问道：

“玛丽到底送不送茶来？他妈的，”她专横地喊叫，“玛丽。”

玛丽出现在门口，身上穿着蓝色的工作罩衫，朗贝尔笑盈盈地站起身来：

“玛丽-昂热！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脸色霍地变红，转过脚跟，我挡住了她：“您可以回答嘛！”

她目光直直地盯着朗贝尔说道：

“我是女用人。”

朗贝尔也闹了个大红脸。纳迪娜疑惑地打量着他们俩：“玛丽-昂热？你认识她？玛丽-昂热姓什么？”

一阵尴尬的沉寂降临了。她突然说道：

“玛丽-昂热·比塞。”

我感到怒火直蹿双颊：“记者？”

她耸耸肩膀：“是的。”她说，“我走，我马上就走。用不着您赶我。”

“您是到家里来探我们的？没有比这更卑鄙的勾当了！”

“我不知道你认识那么多记者。”她瞟了朗贝尔一眼说道。

“你还愣着不扇她干什么！”纳迪娜吼叫道，“她偷听了我们的全部谈话，到处搜查，读了我们的信件，马上就要把这一切公布于众……”

“噢！您，凭您这副大嗓门，可不会吓着我。”玛丽-昂热说。

我一把抓住纳迪娜的手腕，算是拦住了她，要不，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玛丽-昂热打翻在地板上。不过跟我她还缺乏胆量，不敢猛地

挣脱开身。玛丽-昂热朝门口走去，我随她走到前厅，她冷静地问我道：

“我还是把门窗玻璃擦完吧，您不乐意？”

“不用了。我倒想知道是哪家报社派您来的。”

“谁也没有派我来，是我自己来的。我想准可写篇精彩的东西，轻而易举就可脱手。您知道，这就叫他们所说的侧影。”她以职业的口吻说道。

“知道。呃，我这就去通知各家报社，若哪家买下您的瞎话，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噢！去卖，我甚至都不想去试一试，现在已经完蛋了。”她脱下蓝罩衫，穿上外套，“我这八天用人就算白当了。我讨厌做用人！”她绝望地补充道。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可她无疑感觉到了我的怒火在渐渐熄灭，因为她斗胆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微笑：“您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篇披露隐私的文章。”她声音像个小丫头似的说道，“我只是想寻觅一种气氛。”

“是为了这您才翻寻我们的文书？”

“噢！我翻寻是为了找乐趣。”她用赌气的腔调补充道，“当然，您骂我是应该的，我有错……可您以为出人头地容易吗？您，您是一位显赫人物的妻子，一切都是现成的。可是我，我得自己去闯荡。请听我一句，”她说道，“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明天把文章给您送来，您不中意的地方尽管删掉好了，行吗？”

“然后您又一字不删地送出去？”

“不，我向您起誓。若您愿意，我可以给您提供反击的武器：一份卑躬屈膝的悔过书，签上名，这样您就把我掌握在了您的掌心。说呀，请接受吧！我是给您家当保姆的。不过我胆量还是有的吧，是不是？”

“这胆量您还会有的。”

我犹豫不决。若是别人跟我讲这般怪事，对这样一个侵犯了我们私生活的恬不知耻的女人，我在梦中也会抓住她的头发，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可现在她近在眼前，这位黑发棕肤的小姑娘，瘦骨嶙峋，没有一分姿色，却那么渴望出人头地。我最终说道：

“我丈夫从不接受采访。他决不会接受的。”

“请您问问他吧：既然事情已经做了……我明天上午打电话来。”她遂又补充道，“您不责怪我吧，对吗？我讨厌别人责怪我的时候。”她尴尬地淡然一笑，“我怎么都无法去责备别的人。”

“我也不怎么会！”

“啊，真绝了！”纳迪娜与朗贝尔突然从走廊冒了出来，喊叫道，“你竟让她发表她的文章！你对她投以微笑！跟这个女探子……”

玛丽-昂热打开了大门，砰的一声迅速关门离去。

“她答应把文章给我检查的。”

“这个女探子！”纳迪娜尖声骂道，“她偷看了我的日记，读了迪埃戈给我的信，她……”她连嗓子都喊破了。纳迪娜就像儿时发怒那样，怒火满腔，浑身颤抖：“还给她报答！该揍她一顿！”

“她勾起了我的怜悯心！”

“怜悯！你总怜悯别人！凭什么权利？”她带着一种仇恨瞪着我，“实际上，那是蔑视。别人与你之间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衡量的标



准！”

“消消气，没有这么严重。”

“噢？我知道，我有错，这自然，你从不原谅我。你总是有理！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那是位好姑娘，你知道。”朗贝尔有点见风使舵，但也挺客气地说。

“那么，你也去祝贺她好了，跑去呀。”

纳迪娜突然朝她卧室奔去，咣当一声关上了房门。

“我感到抱歉。”朗贝尔说。

“这不是您的错。”

“今天的记者，都有一股警察耳目的劲头。纳迪娜发火，我理解。处于她的位置，我也会气得面红耳赤的。”

他犯不着冲着我来护她，可这似乎出于善意。“噢！我也理解。”我说。

“那，我走了。”朗贝尔说。

“一路顺风，”我说道，紧接着补充道，“您该多来看看纳迪娜，她对您情谊很深，您是知道的。”

他神色尴尬地微笑道：“这再也没有多少意义了！”

“您没有早点儿跟她联系，她感到失望，正由于这一点她才不太客气了。”

“可是她对我说不要先打电话的。”

“要是您先给她打电话，她还是高兴的。她需要对友情确实有很大的把握时，才会全心全意去追求。”

“她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的情谊。”朗贝尔说。他突然又补充道：“我非常爱纳迪娜。”

“那您就设法让她意识到这一点。”

“我尽力而为。”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向我伸过手来，“不管怎样，我一回国就来。”他说道。

我回到自己卧室，没敢敲纳迪娜的房门。她多不讲理！确实，对别的人，我总想方设法为他们寻找借口，这样宽容反而使心肠变硬。如果说我对她总是严格要求的话，那是因为她不是我所关心的病人。在她与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在我胸口作响的内疚的声音、焦虑的声音。

当小比塞那篇微不足道的文章发表时，纳迪娜原则上嘀咕了几句。打从《警觉》杂志部的办公室开门办公以来，她的脾气变得好多了。她埋头于一件件明确的工作，显示出了当秘书的出色才华，为此而感到自豪。杂志的创刊号获得成功，罗贝尔和亨利十分满意，并劲头十足地准备下一期。自从罗贝尔说服了亨利，把《希望报》的命运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以来，他对亨利充满友情，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说到底，亨利是他唯一的挚友。与朱利安、勒诺瓦、佩勒迪埃夫妇、康热夫妇等在一起，可以欢度美好的时光，但交情并不太深。过去的社会党朋友中，有的与敌合作，有的死于集中营，夏尔利埃正在瑞士养伤，而至今对社会党仍然忠贞不渝的旧友对罗贝尔大加谴责，罗贝尔也针锋相对，予以反击。拉福利为罗贝尔成立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感到失望，因为非但没有与共产党人结成同盟，两家的关系反而降低了热度。罗贝尔与他同辈人差不多断绝了往来，是他主动这样做的。他把这场战争归咎于他的同辈人，是他们没有设

法阻止这场战争。他认为对自己的过去过分眷恋了，因而，他希望与年轻人一起共事。政治与行动如今有了新的眉目，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他希望尽量适应。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也觉得应该有所改变，正因为如此他才再三声称自己的作品尚未完成。他眼下正在撰写一篇评论，他在该文中企图把自己旧的思想与新的世界观融为一体。他的目标一如既往，革命解放联合会除了最近目标之外，一定要坚持给人们带来希望，发起一场与其人道主义思想相符合的革命。但是，罗贝尔深知眼下若不做出痛苦的牺牲，这场革命将难以完成，未来的人将不再是饶勒斯以过分乐观的态度所描绘的人。那么，真理、自由、个人道德、文学、思想等这些旧的社会准则将保持何种意义，存在何种希望？若要拯救这些准则，就必须重新创造。而这正是罗贝尔的企图所在，他为此而激奋。我满意地暗自思忖，他终于获得了写作与行动之间和谐的平衡。显而易见，他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喜欢这样生活。我也同样，我的生活很充实。我每天忙着与罗贝尔、纳迪娜、病人、书籍打交道，懊悔与热望已经没有存在的位置。如今，那位满头白发的年轻姑娘睡眠正常，再也没有噩梦缠绕，她加入了共产党，找到了情人，可惜她找的情人太多了，同时又无节制地饮酒，这谈不上是平衡产生的奇迹，但她总算能安心地睡眠了。那天下午，我真打心眼里感到幸福，因为小费尔南终于画出了一幢带着门窗的别墅，铁栅栏随之消失了。我刚给他母亲打了电话，门房又送来了信件。罗贝尔和纳迪娜都在杂志社，这天是他们的接待日。我独自一人等在家中。我拆开了罗米欧的信，我害怕极了，仿佛有人突然把我抛入空中。原来是一次精神分析讨论会将于一月份在纽约举行，他们邀请我参加，届时可以在新英格兰、芝加哥、加拿大组织报告会。我把来函

摊在壁炉上，又激动万分地阅读了一遍。我过去是多么喜爱旅行！在世间，我除了爱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外，最喜爱的也就是旅行了。可是，这是我以为一去不复返的事情之一，现在竟又有人邀请我去比利时、意大利，甚至去纽约漫游一番！我的目光难以离开这荒唐的字眼！对我来说，纽约一直是一座传奇般的城市，而我早就不再相信奇迹发生了。没料到就这一小片纸头，竟轻而易举地搅乱了时间、空间与常理。我把来函放进手提包，大步离开家门来到街上。纽约有人在嘲弄我，正在跟我耍鬼花招，我需要罗贝尔帮助我戳穿这场骗局。我急匆匆地登上莫瓦纳房子的楼梯。

“噢，是你？”纳迪娜带有某种责怪的口吻说。

“你没看错。”

“爸爸正忙着呢。”她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她高高地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办公桌居中放在这间当作候见室的大办公室里。等待接见的人数甚多：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一片嘈杂。这该让他感到高兴，因为来的人中年轻人居多。当然，不少人是带着好奇心，或者因为无所事事，或者怀着某种投机的心理来到这里，但也有许多人是真正喜爱罗贝尔的书，关心他的行动。噢，罗贝尔决不是在茫茫荒漠里白讲一场，他的这些同时代人尚有眼睛读他的书籍，尚有耳朵听他讲话。

纳迪娜站起身子：“六点了！关门了！”她声音粗暴地高喊道。她把失望的来访者送向门外，然后转动了锁眼中的钥匙。

“乱哄哄的！”她笑哈哈地说道，“好像他们在等着白吃一顿饭菜似的。”她打开了接待室的门：“道路通了。”

罗贝尔在门口朝我微微一笑：“你给自己放假了？”

“是的，我想转一圈。”

纳迪娜朝她父亲转过身子：

“瞧你这副举行祭礼似的样子真滑稽：活像个教父呆在告解座上。”

“我更像是个算命者的形象。”

突然，纳迪娜咯咯大笑起来，仿佛猛地揷了某个笑的按钮似的。她愉快的情绪很少突发，但每次总伴着刺耳的大笑：“瞧这玩意儿！”

她用手向我们指了指一只四角已经磨损的手提箱，发旧的箱子表面贴着一张标签：《我的一生》，约瑟芬·米埃弗著。“看上去像是一份手稿！”她打着嗝说道，“那是她的真实姓名。你不知道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吧？”在她那两只激动得湿乎乎的眼睛里，闪现着一种胜利的光芒。笑是她的报复手段。“她对我说：‘我呀，小姐，我是一部活的材料！’她已经六十岁了，家住奥利亚克。她一五一十，什么都说。”

她一脚踢开了皮箱的盖子。里面装满了一叠叠玫瑰色的文稿，纸上一式绿色墨水笔迹，没有任何涂抹之处。罗贝尔捡起其中一页，快速浏览了一遍，随手扔掉：“没有什么趣味。”

“说不定有刺激的段落呢。”纳迪娜满怀希望地说道。她蹲在手提箱前。多少页文稿，多少分时光！在弥漫着外省气息的餐室里，在壁炉旁的灯光下，度过了多少温馨的时光。这时光是多么充实，又是多么空虚，过得多么欢快，又浪费得多么愚蠢。

“不，没什么意思！”纳迪娜不耐烦地站起身子，她的脸上，欢乐的表情荡然无存……“那就搁起来了？”

“等五分钟。”罗贝尔说。

“快点儿走，这儿散发着文学味。”

“什么味？文学味？”

“一辈子不修边幅的老头儿味。”

这不是一股什么味。但是，整整三个小时里，整个空气中充盈着希望、担忧与恼恨。空空热闹一场过后，透过这无声的沉默，感觉到了这无形的悲楚。纳迪娜从抽屉里拿出一件酱紫色的毛衣，煞有介事地编织起来，编针嘎吱直响。平常，她从不怜惜自己的时光，可一旦要她拿出几分耐心，她就赶紧装出一副样子，仿佛她的光阴一刻也不该浪费。我的目光落在她的办公桌上，只见一个黑色的封面，一行鲜红的大字煞是诱人：《诗选》，勒内·杜斯。我打开本子。

“秋日里，牧场可敬而美丽……”

我翻了一页。“您是否知道，我突然发现了神奇的佛罗里达……”

“纳迪娜！”

“什么事？”

“这家伙寄来的东西，署着他的名字，却是阿波里奈尔、兰波、波德莱尔等人的诗句……他总不至于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吧。”

“啊！我知道他搞的是什麼名堂。”纳迪娜冷淡地说，“那个可怜的混蛋给了塞泽纳克两万法郎，让塞泽纳克卖给他一些他写的诗。你知道，塞泽纳克才不会舍得把自己未发表的诗作送给他，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可等那人再来时，怎么也得把事实真相告诉他吧。”我说。

“没关系，塞泽纳克耍了花招，那人要敢抗议才怪呢。首先一点，他已经没有退路，他自己也实在太可耻了。”

“塞泽纳克，他也会耍这类把戏？”我诧异地问道。

“你以为他是怎么混的？”纳迪娜说。她把毛衣往抽屉里一扔。“有时，他的鬼花招可真好玩。”

“付两万法郎，在不是出自自己手笔的诗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真叫我困惑不解。”

“为什么一心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呢？”纳迪娜说道。接着，她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用钱去买与不顾头痛屁股热地拼命去写，是一码事。”这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若是当着她父亲的面，她就该得清理清理自己的脏话。

等下了楼梯，纳迪娜以疑虑的神气问道：“我们像那个星期四一样，到对面小酒店去喝一杯好吗？”

“当然可以。”罗贝尔回答道。

纳迪娜脸上一亮，往大理石独脚小圆桌前一坐，开心地说：“得承认我护你护得怪好的吧！”

“是的。”

她忐忑不安地瞧了她父亲一眼：“怎么，你对我不高兴？”

“噢！我呀，我为你感到欣喜，我倒为自己感到不悦，因为这到头来对你没任何的益处。”

“任何职业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纳迪娜突然硬邦邦地说。

“这要因事而论。你前几天跟我说朗贝尔建议你当通讯记者；在我看来，这就比较有意义。”

“噢！如果我是个男的，那就没有什么说的了。”纳迪娜说道，“可一个女人当通讯记者，千分之一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她一挥手，挡住了我们的异议。“我说的成功，不是你们那个意思。”她傲然地说，“女人呀，总是不顺当。”

我贸然插了一句：“不尽然吧。”

“你觉得？”她冷冷一笑，“就瞧你吧，你干得不错，你有不少病人，这不假，可说到底，你永远成不了弗洛伊德。”

她早就养成了这副孩子气，每当她父亲在场，她总是习惯于恶声恶气地攻击我。我开腔道：

“成为弗洛伊德或无所事事，在这两者中间能做的事多着哩。”

“我可是有所事事的，我是秘书。”

“若你这样挺满足的，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罗贝尔急匆匆地说道。

我常为罗贝尔嘴巴太快，白白败了纳迪娜的兴致而感到遗憾。我曾多次开导他，可他怎么就下不了狠心，扔不下对女儿的一片雄心。纳迪娜口气咄咄逼人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命运在今天是多么微不足道！”

“你的命运在我眼里可非常重要，”罗贝尔微笑着说道。

“可它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我。正因为如此，那些一心想出人头地的小人全都让我笑掉大牙。”她轻轻咳了一声，瞧也不瞧我们一眼，继续说道，“等到我有勇气做点艰难的事情的那一天，我就投身于政治。”

“那你还不赶紧到革命解放联合会去工作，还等什么？”罗贝尔问道。

她一口饮尽杯中的维泰勒矿泉水：

“不，我不同意。你们说到底是反共产党的人。”

罗贝尔耸了耸肩膀：“要是拉福利认为我是反对他们的，你以为他还会这样友好吗？”



纳迪娜微微一笑：“听说拉福利就要来要求你别举行那个集会。”

“谁跟你说的？”罗贝尔问道。

“拉舒姆昨天说的。他们很不满意，他们认为革命解放联合会走了邪路。”

罗贝尔耸肩膀：“也许拉舒姆和他那帮子小左派分子确实大为不满，可他们要自以为是党中央，那就错了。我上个星期还见到拉福利呢。”

“拉舒姆前天见了你。”纳迪娜说，“我向你保证，这是正经话。他们开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决定必须采取措施。拉福利会来跟你谈的。”

罗贝尔一时沉默不语，接着开口说道：“若真是如此，那该让人绝望透了！”

“是真的。”纳迪娜说，“他们说你领导的革命解放联合会非但不与他们一起共事，反而鼓吹与他们背道而驰的政治，还说这次集会就是敌对行动的宣言，说你分裂了左派，他们不得不向你宣战。”纳迪娜的话中含着几分得意。她大概还不知道她这番话的轻重。平时，每当我们遇到真正的麻烦，她往往惊慌失色，可若只是些不顺心的小事情，她总是从中取乐。

“不得不向我宣战！”罗贝尔说道，“这真叫绝！是我分裂左派！啊！他们没有变。”他愤怒地补充道，“他们永远变不了！他们所希望的，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对他们服服帖帖，一看到独立的征兆，他们就斥责我们抱有敌意！”

“要是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他们必定认为你有错。”纳迪娜通情达理地说，“你也是这样的。”

“不同观点可以有，但也可以保持行动的统一。”罗贝尔说，“这就是国民阵线的意思。”

“他们视你为危险分子。”纳迪娜说，“他们说你鼓吹极恶政治，说你想破坏重建大业。”

“听着，”罗贝尔说道，“掺和不掺和政治，是你的自由，可你别扮演鹦鹉学舌的角色。若你用的是自己的脑子，那你就会明白真正可能引起灾难的，是他们的政治。”

“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纳迪娜说，“要是他们试图夺取政权，那美国马上就会干涉。”

“他们有必要争取时间，这我同意。可是，他们也可以采取别的方式。”罗贝尔耸耸肩说道，“我完全承认他们处的位置很难，他们或多或少是两头受夹。自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垮台以后，他们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一会儿当左派，一会儿又当左派的右派。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应该希望另一个左派党的存在呀！”

“怎么！他们就是不希望。”纳迪娜说道。

她猛地站了起来，为自己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影响感到满意，可并不乐意卷入她显然占不了上风的争论中去。“我去逛逛。”她说。

我们也起了身，沿着河畔徒步回到家里。

“我马上给拉福利打电话。”罗贝尔对我说，“唉，手挽着手团结一致是多么有必要啊！他们明明知道这一点！可他们却怎么都不容忍在他们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左派党。社会党已经算不了什么，这个国民阵线，他们倒是乐意要的。但是，出现一个新的运动，看上去很有起色，那就大逆不道了……”

他继续气愤地讲着，我一边听一边想：“我不愿离开他。”昔日，我离开他时并不感到痛苦，因为我们活在世间，彼此永远相爱。可是，我现在知道我们俩只有一个生命，且它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前途充满威胁。罗贝尔并非攻不破、击不倒。相反，突然间，他在我看来甚至是脆弱的。他一直指望共产党人怀着诚意，可他大错特错了。面临他们的敌意，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得了，这条死胡同到了。”我心里在想。可他既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也不能坚持反对共产党人：任何两全的办法都不存在。也许事情会顺利解决的，条件是共产党人拿定主意，容许举行集会。罗贝尔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捏在他们的掌心。想到这些，我感到心悸。他们一个字就可摧毁罗贝尔苦心经营起来的美好的平衡。不，这不是我离他而去的时候。一走进工作室，我就以讽刺的声音说道：

“瞧瞧我收到了什么东西！”

我把罗米欧的信递给了他，他遂变了一副面孔，我从中辨出了欢乐，这本该是我的欢乐。“这可是美事！你为什么对我一声不吭？”

“我不愿一走就是三个月。”我说。

“为什么？”他惊诧地看了看我说，“这可是一次美妙的旅行啊！”

我喃喃地道：“我这里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你到底怎么了？从现在到一月份，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纳迪娜已经长得够大了，用不着你照管，我也一样。”他微笑着添了一句。

“美洲太遥远了。”我说。

“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他一副挑剔的神态细细打量了我一番，说道，“你走动走动，这对你大有好处。”

“我们今年夏天骑自行车去转转。”

“要想欣赏异国风光，骑自行车可走不了多远！”罗贝尔说，他淡然一笑，“我可问心无愧！若是别人通知你旅行计划泡汤了，你准会蹦起来。”

“有可能。”

他说得在理：我对这次旅行看得已经很重。正因为如此，这又成为一块心病扰得我心绪不宁。所有那些往事、所有那些欲望，一一苏醒过来，这多么令人不安！为什么有人要来扰乱我这行尸走肉般的规规矩矩的平安日子？这天晚上，罗贝尔和亨利对拉福利大为恼火，他俩相互鼓励，要坚决挺住：如果革命解放联合会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那共产党人也得被迫买它的账，到那时，就可能重新获得统一。我静静地听着，对他们所讲的一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在我的脑瓜子里却充斥着一个个乱七八糟的愚人形象。第二天情况没有好转，我兀自坐在办公桌前，整整呆了一个时辰，向自己发问：“我接受？还是不接受？”最终，我站起身来，拿起电话，没有必要装着工作的样子。我曾答应波尔，这几天去看看她，现在去正好。不用说，她正独自一人等在家中。我向她家走去。我很爱波尔，可同时，她又使我有点害怕。每日清晨，我经常感觉到身上笼罩着令人窒息的阴影，一个灾难正在渐渐苏醒，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她。我一睁眼，她也紧接着睁开双眼，然而在她的心底，却漆黑一团。我暗自思忖：“若处在她的位置，我可容忍不了这种生活。”我完全明白，相比之下，她处这种位置比我处着要容易一些。波尔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闭门不出，看不到任何人而不感到烦闷，她甚至成功地向自己否定了亨利

已经不再爱她这一事实。可是总有一天将真相大白，到时会发生什么不测？能给她出什么主意？去唱歌？可这不足以给她慰藉。

我渐渐靠近了她的家门，心里也愈缩愈紧。居住在这群命运不济之人的小区里，对她来说倒挺合适。我不知他们在被德占领期间都躲到了什么地方。如今春天到了，他们的破衣烂裳，甚至甲状腺肿和枪伤刀痕又都一一出现了。有三个人背靠街心公园的栅栏而坐，旁边是一块大理石板，石板上装饰着一束已经凋谢的花，其中一男一女正在抢夺一只黑漆布袋，他们脸色通红，是因为喝酒和愤怒的缘故，他们俩猛烈地向对方吐着脏话，但四只紧抓着布袋不放的抽搐的手却几乎拧着不动，而另一个人在旁开心地观战。我钻进了一条小街，油漆斑驳的木门守着一座座废物库，每日清晨，捡破烂的都把废纸和废铜烂铁往这边送；几扇玻璃门微微露出一条小缝儿，候诊室里坐着一些妇女，膝盖上蹲着小狗。我曾从一些小册子上看到在这些动物诊所里，人们医治或者毫无痛苦地杀死“鸟和小动物”。我在一张广告纸前停下了脚步：房间备有家具出租。我按响了门铃。楼梯口总是放着一只巨大的垃圾桶，只要一抬步登楼，便有那么一只黑狗没命地狂吠起来。波尔富有导演的情趣，每当她向新来造访的客人打开这间简易寓所的房门时总会轻而易举地获得戏剧性的效果。我也不例外，每次总对她那出人意料的光彩感到惊讶，我也为她那非同一般的服饰感到惊异：她生来讨厌千篇一律，性喜美妙多变，因此任何时候都显得经过一番悉心打扮。她给我开了门，只见她身着一一条宽松的塔夫绸内裙，淡紫的色泽闪烁变幻，脚穿一双大高跟锯齿状鞋，鞋带缠在腿上。她拥有各式各样的鞋子，说不定哪位视鞋如命的收藏家也相形见绌。

“快来暖和暖和。”她边说边把我往燃着柴火的炉子边拉。

“天并不冷。”

她朝缝隙堵得死死的窗子瞥了一眼。

“大家都这么说。”她坐了下来，既严肃又关切地朝我俯过身子，问道：“你身体怎么样？”

“挺好。可我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再也用不着每天担惊受怕了，可是他们便重新开始自己折磨自己。”

“你的书呢？”

“正在写。”

出于礼貌，她怎么问，我便怎么答。我清楚地知道她对我的工作从来就不感兴趣。

“你真觉得有意思？”她问道。

“喜欢极了。”

“你真有福气！”波尔说。

“是因为我干的是我感兴趣的工作？”

“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的自我感觉并非如此，可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我。我满怀热情地说：

“你不知道自从我在圣诞节听到你唱歌后心里想些什么吧？我想你该利用你的歌喉做点儿事。你对亨利忠贞不渝，这固然十分美好，可说到底，你自己也重要呀……”

“噢！我曾就这个问题与亨利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呢。”她漠然地说，摇了摇头，“不，我再也不登台歌唱了。”

“为什么？我肯定你会走红。”

“这对我又有何益？”她问道，继而微微一笑，“广告上写满我的名字，报刊上登的尽是我的照片，我对此真的不感兴趣。如果想要的话，这一切我早就可以得到，可我不想要。你误解了我。”她补充道，“我不希望任何个人的荣耀。在我看来，伟大的爱情远比成功的事业要重要得多。我所遗憾的，只是爱情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我。”

“可你没有被强迫做出抉择呀。”我说，“你完全可以继续爱你的亨利，同时唱你的歌。”

她神情严肃地看了看我：“对一个女人来说，伟大的爱情不允许她享有任何自由。我知道罗贝尔和你之间有多么默契，”她补充道，“可那并不是我所说的伟大的爱。”

我并不愿意就她的字眼或我的生活争辩一场。“可你在这里独自一人一天天过日子，你该有的是时间工作呀。”

“这并非时间问题。”她以责怪的神态朝我微微一笑，“你想我十年前放弃歌唱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明白了亨利需要我整个身心……”

“你说他自己也曾劝你重新工作。”

“可要是我真的按他的话去做，他准懊丧不堪。”她乐呵呵地说，“哪怕我有一个念头与他不符，他都受不了。”

“多么自私！”

“爱并不自私。”她深情地抚了抚柔软的衣裙，“噢！他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的牺牲不仅对他的幸福，而且对他的写作事业及其成功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为什么他的成功在你看来那么重要，而你自己成功与否却无关紧要呢？”

“噢！他名声大小，我才不在乎呢。”她情绪激烈地说，“这事关别的东西。”

“是什么？”

她猛地站了起来：“我给你备了点热酒，你要喝吗？”

“乐意。”

我听着她在厨房里走动，心里很不舒坦地想：“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口口声声说对个人荣耀不屑一顾，可为什么偏偏在亨利开始名声大振、人们称颂他为抵抗运动的英雄和年轻文学的希望时，重又摆出一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面孔呢？我清楚地记得一年前，她是多么死气沉沉、心灰意懒，她又是怎么感觉到这种爱的呢？她为何拒绝通过工作摆脱这种爱的纠缠呢？她是怎样看待周围世界？我和她一起关在这红色的四壁之间，望着炉火，交换着言语，可我怎么都琢磨不透她脑中发生的一切。我站起身子，朝窗户走去，掀开了窗帘。夜幕降临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手牵一条高贵的丹麦狗在游逛。在那块写着“专营撒克逊珍奇鸟类”几个字的神秘的牌子下，一只被系在窗栏上的猴子仿佛也在困惑不解地察看着苍茫暮色。我又放下窗帘。我曾有过什么希望？希望能用波尔的双眼看一看这熟悉的环境？希望在这环境中捕捉住她每日生活的色彩？不，小卷尾猴绝不可能用人的眼睛去观察，我也绝不可能潜入另一个人的心底。

波尔从厨房回来，庄重地端着一只银托盘，盘上两只碗在冒着腾腾热气。“你喜欢甜一点的，是吗？”

我嗅了嗅这浓浓的红酒溢出的那股又热又香的气味：“看来很可口。”



她沉思着喝了几口，仿佛在品味这是不是真正的春药，“可怜的亨利！”她喃喃地说。

“可怜？为什么？”

“他正在经历一次艰难的危机，我担心他在摆脱危机之前遭受过多的痛苦。”

“什么危机？他看去体魄康健，最近的几篇文章也是他从未写过的好文章。”

“文章！”她带着一种愤懑瞧了我一眼，“从前，他对搞报纸嗤之以鼻，认为只不过混碗饭吃吃而已，他离政治也远远的，希望独处。”

“可现在环境变了，波尔。”

“环境又有何妨！”她有些激动地说道，“他不应该变。战争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是伟大的举动，可今日，逃避尘世才是伟大之所在。”

“这又为何故？”我问道。

她一耸肩膀，没有答腔。我有些气恼地添了一句：“他肯定已经给你解释过他为何搞政治。我呀，我可是绝对赞同。你不认为应该给他以信任吗？”

“他正在闯入并不属于他的道路。”她以不容置疑的腔调说，“我很清楚，我甚至可以给你证据。”

“这倒叫我吃惊。”我说。

“证据，”她夸张地说，“就是他已经变得没有能耐写作。”

“也许目前他是没有动笔，”我说，“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从今之后再也不写。”

“我并不吹嘘自己永远不会错。”波尔说，“可你要知道，亨利，是我造就了他，我创造了他，一如他塑造了他书中的人物，我对他就像他对他书中的人物一样了若指掌。他正在背叛自己的使命，该由我指引他重返正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考虑照顾我自己。”

“你知道，人们除了自己赋予的使命之外，别无其他使命。”

“亨利可不是一位混同于他人的作家。”

“他们大家各不相同。”

她摇了摇头：“若他仅仅是一个作家，那就不会让我感兴趣了。作家何其多呀！当二十五岁，我与他在一起时，他一心只想文学，可我马上就发现我完全可以让他攀登更高的境界。我让他明白了一点，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应该浑然一体，获得成功。是多么纯洁而又绝对的成功，可成为世人的楷模。”

我心里不安地在想，若她用这副腔调跟亨利说话，那他真该受不了。

“你是想说一个男人应该像珍惜自己的作品一样珍惜自己的生活？可并不能因此而禁止他发生变化呀。”

“除非他顺应自身而变化。我发生了许多变化，可我顺应的是自己的生命。”

“谁也没有预先划定的道路。”我说，“世界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世界，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必须设法适应。”我朝她微微一笑，“我也同样，在多少个星期里，一直幻想可以重新获得战前的时光。可这是愚蠢的念头。”

波尔神态执拗地细观着炉火：“时间并没有用。”她说。突然，她猛地朝我转过身子：“噢！想一想兰波，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什么？”

“对，你看见了他的什么形象？”

“他年轻时的形象。”

“瞧！只有一个兰波、一个波德莱尔、一个司汤达，他们在世的时间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可他们每个人的一生只构成了一个形象。亨利只有一个，我也永远是我自己，时间对此无能为力，背叛并非源于时间，而是因为我们自身。”

“啊！你把一切都混为一谈了。”我说，“等你年届七旬，你还永远是你，可你与人与物却会形成不同的关系。”我又添了一句：“与你的镜子也同样。”

“我从不在镜中多照自己。”她带着几分疑惑审视了我一番，“你想证明什么？”

我一时保持缄默。否定时间，大概谁都有这种企图，我也常常这样做。对波尔这般固执的信念，我隐隐约约产生了几分羡慕。

“我所说的，是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必须安于天命。你应该放手让亨利去做他乐意做的事。你嘛，也应该照顾一下自己。”

“你说这话，仿佛亨利和我是两个彼此完全独立的人似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也许这之间有一种无法彼此交流的体验。”

我满怀希望，试图说服她，如今这一希望完全落空了。还能怎么办呢？我一无所知。不过，我还是对她说道：

“你们是彼此独立的，其证据就是你在批评他。”

“确实，表面上我们是有不同之处，我也在为消除这种不同而斗争。”她说，“可实质上，我们只是一个整体。我过去经常感觉到这一点，我甚至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认识到这种情况时的情景：我几乎感

到害怕。彻底地融入在另一个人之中，你知道，这很怪。但是，当一个人在自身中发现了另一个人时，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她那激动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接着说道：“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的时光必将重现。亨利必将完完全全地化为我，我也一定将原原本本地归还给他。”

她的话语中有着某种近乎绝望的声嘶力竭的劲头，我只不过是放弃，不想再深谈下去，我轻快地说：“可不管怎样，走动走动、见见人对你有好处。下个星期四，你不愿陪我到克洛蒂家走一趟？”

波尔的目光落到地板上，看她的样子，仿佛她又控制住了体内的某个组织，重新获得了解脱，变得轻松起来。她朝我嫣然一笑：

“噢！不，我不愿意。”她说，“上个星期，她来看过我，我这几个月对克洛蒂够烦了。她已经把斯克利亚西纳安置到了她家，你知道吗？我在纳闷他怎么会同意的……”

“我猜想他手头没有一个子儿了。”

“你说那里像是个后宫！”波尔说。

她哈哈大笑，这笑声足足使她年轻了十岁。以前，她跟我呆在一起时就是这副样子。可一旦亨利在场，她就摆出架子。如今，人们觉得她似乎总感觉到亨利的目光在跟着她。如果她有勇气为自己而活着，她也许能够重新恢复昔日的欢快。“我不善于与她交谈，我太笨了。”我离开她时，心里这样责备自己。她过这种生活很不正常，有时，甚至干脆就不合情理。可是，我今天未能好好开导开导她。正常的生活，还有比这更不正常的吗？为了能循规蹈矩，打发日子，有多少事情不得不放弃，有多少往事不得不忘记，又有多少事实真相不得不回避。“我害怕离去的原因正是在此。”我心里在想。在巴黎，在罗

贝尔身旁，我不费多少气力就可避免陷阱，因为我能识别陷阱，警钟时刻向我提醒面临的危险。但是，当我孤独一人置身于陌生的苍天之下，将有怎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将有怎样的明摆的事情突然使我眼花缭乱？又会有怎样的鸿沟突然出现在面前？不过，鸿沟终将平合，明摆的事情也会消失，这是确凿无疑的。我见过的何其多。我们就好比蚯蚓，任凭他人斩为两截，或好似龙虾，折断了爪子会再生长。但是，当我想起那徒劳的垂死挣扎的时刻，想起那不愿苟延残喘、恨不得立即死去的时刻，我不禁心悸。我试图让自己服从于理智：我为什么会出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就不会出任何事情呢？偏离前人踏平的道路，从来就没有好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我感到有些窒息，这是事实；可人们渐渐也会习惯于窒息的，不管怎么说，形成习惯并不是坏事。

“你怎么了？”几天以后，纳迪娜满腹狐疑地问我。她身着我的浴衣，躺在我卧室的长沙发上。平时我回家时，总发现她这副样子。在她眼里，唯有他人的服饰、摆设，他人的生活才有价值。

“你希望我怎么样？”我反问道。

我没有跟她谈起罗米欧的来信。可是尽管她对我不了解，但对我的任何情绪变化她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好像困倦得连站着也能入睡似的。”她冲着我说。

确实，在平日里，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询问她每日做些什么，可这天晚上，我却默默地脱去外套，戴上睡帽，没有说一句话。

“我在圣安娜度过了整个下午，我想我是有点疲倦了。”我回答道。“你呢？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对此感兴趣吗？”她忌恨地反问道。

“当然。”

纳迪娜脸上一亮，她心里有高兴的事情，不愿再多赌气。“我刚才遇到了我终身的伴侣！”她以挑逗的声音说道。

“当真？”我笑咪咪地问道。

“对，当真。”她严肃地回答道，“他是拉舒姆的一个伙伴，棒极了。他可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写书匠，而是一个活动分子，名副其实的活动分子。他叫若利。”

在这之前不久，她与亨利闹了一场：她的反应如此明显，要是她自己竟意识不到我才感到奇怪呢。“那这一次，你肯定登记入党了？”我问道。

“他对我还未入党气愤极了。啊，你知道，他这个人，办事可不拖泥带水。他说干就干。一个男子汉嘛。”

“我早就认为你最终也该经历一番了。”

“道理很明白，这是因为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经历而已。”她声音尖刻地说，“现在入党，以后再退出来。年轻时代得经历经历。是这个意思吧？”

“噢，不。我没说过这种话。”

“我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你要明白，若利的力量在于他相信真理。他从不以经历为儿戏：他是在行动。”

一连几天，她咄咄逼人地对若利大加颂扬，我只管听着，没有任何表示。她把《资本论》摊在书桌上的化学教科书旁，目光阴郁地在两部书之间来回移动。她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在这料峭的初春，街上的乞丐比比皆是，若我施舍给他们一点

儿钱，她便冷冷一笑：“你以为给这种可怜的废物施舍一点儿钱，就可以改变世界的面貌了？”

“我并没有如此奢望，只是让他高兴高兴，这就够了。”

“如果你良心得到安宁，那对大家都有好处。”

她总以为我内心有多少阴险的谋划。

“你以为拒绝涉足上流社会、待人粗野，就可以摆脱你那个阶层了？这样一来，你只不过成了一个没有教养的资产者而已。”

实际上是很不乐意去克洛蒂家。大战期间，她曾从勃艮第的那座城堡给我寄过许多包裹，现在她不由我推却，非要我参加她每个星期四的聚会，我无论如何得去一次。可是，当我在五月一个春雪霏霏的夜晚跨上自行车的时候，心里是多么不情愿啊。时值仲春，然而任性的寒雪又突然出现，天空白茫茫一片，阒无声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落在地上，看似温暖如春，但落到身上却冰冷刺骨。我恨不得顺着这种棉絮裹着似的道路径直向前飞驰，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上流社会的沉重应酬对我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怖。尽管罗贝尔四处躲藏，对记者、勋章、科学院、沙龙和将军夫人一律退避三舍，但也无济于事，人们正在把他奉为一座公共的丰碑，我也因此而成为公共人物。我慢步登上豪华的石阶。我讨厌众人把目光霍地投向我的那一时刻，只需迅疾的一瞥，他们就可识别我，把我撕成碎片。于是，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内心也因此而永远不得安宁。

“真想不到有幸与您相见！”洛尔·玛尔娃说着，“您那么忙！都不敢再请您大驾光临了。”

我们至少谢绝了她三次邀请。来客乱哄哄的，在我相识的人中，我很少对谁有过什么负罪感。他们有的认为我们高傲，有的认为我们

孤僻，也有的认为我们拿架子。我猜度在这些贪婪地来此寻找无聊的人中，谁的脑子里也没有掠过这样的念头：上流社会实在激不起我们的兴致。对我来说，无聊简直就是灾祸，打从我孩提时代起，就吓得我丢魂落魄。我小时候希望赶紧长成大人，以对无聊的回避为中心构筑起自己的整个生活，这样做首先正是为了摆脱这种灾难。可是，那些我与之握手交往的人也许对无聊已经习以为常，觉察不出这一点。他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空气也可能会产生另一种气味。

“罗贝尔·迪布勒伊未能陪您同行？”克洛蒂问道，“请代我告诉他，他在《警觉》上写的那篇文章实在令人赞叹！我全都记到了心上，无论在餐桌、浴室还是在床榻，我都默默地背诵，夜晚我与之同眠，而白昼，它是我心中的情人。”

“我一定转达。”

她目光灼热地盯着我看，我感到好不自在。自然，我不喜欢有人说罗贝尔的坏话；可是当有人对他大唱赞歌时，我也感到别扭。我感觉到自己的唇间露出一个笨拙的微笑，不知如何是好，沉默不语吧，可能被视为矫揉造作；而一旦开口说话，似乎就可能有失稳重。

“这本杂志的问世是一件重大的事。”画家佩尔莱纳说道。他才是克洛蒂心中的情人呢。

吉埃特·旺达杜尔凑了过来，她写过一些巧妙的小说，自感是沙龙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衣着装饰，她的一举一动，无不表明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并不年轻，同时也表明她对自己昔日的花容月貌过分眷恋了。她以略带灵气的声音说道：“迪布勒伊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对艺术有极为深刻的执著追求，同时又善于对今日的世界投入无比的热情。既爱文又爱人，诚为难得。”



“您对他的生活是否记日记？”克洛蒂问道，“您可给世人提供多么珍贵的资料啊！”

“我没有空暇。”我说，“再者，我并不认为他喜欢我这样做。”

“令我惊诧的是，”于盖特·伏朗热插话道，“您生活在一个气度盖世的人身边，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份职业。我根本做不到。我可爱的夫君吞噬了我的所有时间，不过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欲张嘴——给予反驳，可我还是按捺住自己，尽可能平淡地回答道：

“这是个安排问题。”

“可我安排得很好。”她神色愠怒地说，“不，这不如说是个道德环境问题。”

他们以各自的目光对我任意宰割、清算旧账。情形历来如此：他们把我团团围住，一个个露出狡黠的神色，向我问这问那，仿佛我早已成为寡妇。但是罗贝尔明明活在世上，我决不帮助他们把他当尸体用防腐香料保存供奉起来。他们四处搜集他的真迹，拼命争夺他的手稿，把他留有题献的全集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自己的木书架上；可是我呢，我手中只有他的两三部书。我大概是存心不去索回别人向我借走的那些书。我也是故意没有将他的信分门别类，反而或多或少四处乱丢：这些信是专门写给我的，并不是暂时由我保管、有朝一日将由我转交的东西。我并非罗贝尔的继承人，也不是他的见证人：我是他的妻子。

也许吉埃特猜出了我内心的不适，她俨然一位君主，以为到处都是她的王国，她镇定自若地将她那只温柔的小手往我手腕上一搭：“哎呀，他们什么吃的也没给您送！让我领您去酒菜台。”她一边拉着我，

一边以同谋似的神情朝我微笑。“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俩能好好谈一谈。与才女相会多难得啊！”瞧她这口气，仿佛刚刚在这济济一堂的来客中发现了这唯一的一个能够理解她的人。她紧接着说：“您知道什么事情让我高兴吗？那就是哪一天您和罗贝尔光临寒舍吃顿晚餐。”

最为艰难的时刻莫过于他们或以漫不经心、或以高人一等的神态要求约会了。当我照例报以“罗贝尔眼下那么忙”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往往感觉到他们那严厉的目光在谴责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罪。我是他的妻子，这不错，可我又有什么权利？再说，也没有理由去独占这种权利：一座公共的丰碑，这可是属于大家的。

“噢！我知道被作品缠得脱不开身是怎么回事。”吉埃特说，“我也一样，从不出门。您在这里见到我，纯属偶然！”她哈哈大笑，这意味着我被好好地捉弄了一番！她的真实意图并不在此。“可是，共进一次小范围的晚餐，那就大不一样了，晚餐上，我只邀几位男友。”她添了一句，向我透露道，“我不喜欢女人作伴，我在她们中间总有一种失落感。您不是吗？”

“不，我和女人很合得来。”

她以惊讶而责怪的神色瞧了我一眼：

“真奇怪，真太奇怪了。也许是不正常了……”

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公然宣扬她所属的女性如何低下，她自以为可通过她那阳刚之气十足的才华摆脱女性，她也因此而超越了男性，因为她具备了与男性同样的品质，此外，她还具有作为一个女人而特有的魅力之价值。这种狡黠的心计令我不快。我以行家的口吻说道：

“您并非不正常。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偏爱男人。”

她的目光突然变得冰冷，毫无掩饰地故意向于盖特·伏朗热转过身去。可怜的吉埃特！她意欲摆脱恋己癖的罪名，同时又渴望别人承认她的价值，为此而备受折磨，于是，她想方设法，试图让别人说出她所希望的对她的评价。可是，倘若别人不说怎么办？要不要甘于寂寞？这是个痛苦的抉择。克洛蒂发现我独自呆着，便以其堂堂女主人的身份，硬把一个人往我怀里推。

“安娜，您从未见过吕茜·贝洛姆吧？她过去与您的女友波尔很熟。”她边说边飞快地朝一个新的来客迎去。

“啊！您熟悉波尔？”我向这位身材颀长的妇人问道。她满头棕发，身着一件黑色粗横棱纹衣服，全身珠光宝气，朝我勉强笑了笑。

“对，我跟她很熟。”她高兴地说，“我曾无偿帮她选择做广告用的服饰，当时，我已经为阿玛丽莉时装店扬了名，可她刚刚在瓦勒古尔公司起步。她长得漂亮，可不善穿戴。”吕茜·贝洛姆朝我投来一个冰冷的微笑。“应该说她在审美方面还不太成熟，可她却听不进任何劝告。那个可怜的瓦勒古尔和我为此吃尽了苦头。”

“波尔有她自己的风格。”我说。

“她当时可没有寻觅到自己的风格。她自我欣赏有余，没有自知之明，这对她的职业是有害的：她有一副漂亮的嗓子，可根本不知怎么使用。她绝对不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因此从未超越应有的水准。”

“我从未听过她唱歌，可听说她当时很走红，她曾签过去里约 [\[1\]](#) 演出的合同。”

吕茜·贝洛姆哈哈大笑起来：“她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因为她长得漂亮，可她很快便一落千丈。唱歌，这和别的一样，需要付出努力，

这可不是她的长处。去巴西演出，我还记得这回事，我还不得不为她制作衣裙呢。让小伙子感兴趣的并非她的演唱技巧，她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她并不像她试图显示的那样疯狂。她装出一副马利布朗 [2] 似的轻狂样子，可实际上，她内心所渴望的，是寻找一个能体贴她的正经的小伙子，目的达到之后，其他的一切很快也就抛弃了。她做得对，不然，她在事业方面也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她现在情况如何？”吕茜突然以充满善意的声音问道，“听说她的那位伟人正在甩她，确有其事？”

“绝对没有，他们倾心相爱。”我以权威的口吻说。

“啊！这就好。”她说道，但话语中流露出百分之百的怀疑。“她期待的时间够长了，可怜的丫头。”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吕茜·贝洛姆厌恶波尔，我可不接受她向我描绘的波尔形象：一个盛气凌人、生性懒惰的小娼妓，以歌唱为手段，寻觅保护人。可是我意识到了波尔几乎从未跟我谈过她初来巴黎那几年的情况，也从未跟我提起她的少年时代和童年时代。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我能向您道声日安吗？您不再恨我了吧？”

玛丽-昂热故作尴尬地朝我微微一笑。

“您是自作自受！”我同样对她微笑着说，“您可逼得我好苦啊！”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她说道。

“请告诉我实话，您可没有六个兄弟姐妹吧？”

“我确实是个姐姐，”她声音诚恳地说，“可我只有一个弟弟，他在摩洛哥。”她的目光贪婪地向我发问：“告诉我，旺达杜尔到底跟您谈

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谈。”

“您可以告诉我。”玛丽-昂热说，“什么都可以跟我说。它从这里进，又从这里出。”她分别指了指耳朵和嘴巴。

“我担心的正是这点。还是您跟我谈谈有关这位泼妇的事情吧。”我指了指吕茜说道。

“噢！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玛丽-昂热道。

“怎么了不得？”

“她虽然已经这副年纪，可想要什么男人就有什么男人：有利可图的、相处愉快的，她设法两者兼得。眼下，有三个男的都想要娶她。”

“那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要娶她？”

“不。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知道还有两个男的想娶她。”

“她又不是个维纳斯。”

“听说她二十来岁时还要更恶劣呢，可她想方设法不让别人识别她的真面目。靠两条大腿走运的恶女人，比比皆是。”玛丽-昂热一副见多识广的神态说道，“不过，她们总得吃点苦头，差不多到了四十岁，她才靠布洛托老爹的资本帮阿玛丽莉时装店扬了名。到大战爆发时，她正开始发大财。现在，又时来运转，蒸蒸日上，可她已经腻了。”玛丽-昂热以同情的口吻说道。她又加了一句：“正因为如此，她才那么坏。”

“我明白了。”我打量着玛丽-昂热，问道：“那您到这儿来有何企图？搞点耸人听闻的新闻？”

“我来此是为了自得其乐。我很乐意赶鸡尾酒会。您不是吗？”

“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乐趣，倒要请您给我解释解释……”

“呃，可以见到许许多多不愿见到的人。”

“这显而易见。”

“再就是不得不自我表现。”

“为什么不得不呢？”

“如果想要惹人注目的话。”

“那您想惹人注目吗？”

“噢！当然。我特别喜欢的，是让人给我拍照。”她轻轻咬了咬手指头，“这不正常吗？您认为我该不该让人给我做做精神分析？”

“我明白了！是这里头乱了套。”

“什么？有情结？”

“有这么一点。”

“可是，若消除了我的这些情结，我心头还能留下什么？”她抱怨道。

“请到这边来。”克洛蒂喊道，“现在那些讨厌鬼走了，咱们可以好好欢乐一番了。”

每次在克洛蒂家，总少不了宣布讨厌鬼离去的时刻，尽管每一次先后离别的次序有所不同。我开口说道：

“抱歉，我得跟他们一块儿走。”

“怎么？您得留下吃晚饭。”克洛蒂说道，“咱们等会儿分成几张小桌用餐，气氛会挺亲切的。还有一些人要来，我想把您介绍给他们。”她把我往边上一拉，客气地说道：“我打定主意要好好照顾您。孤僻一人，独自生活，这真荒谬。谁也不认识您：我是指那些有钱可赚的圈子里。请让我帮您扬扬名吧。我领您去时装店，让您好好露露脸，一年以后，您就会有一批巴黎最富有的顾客。”

“我的顾客已经太多了。”

“其中有一半不付钱，剩下的一半付得很少。”

“问题不在这里。”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遇到可以付十倍的钱的顾客，您就可以少干十倍的活，您便有了空暇，可以出门走走，讲究讲究穿戴。”

“我们以后再谈吧。”

她对我如此不理解，我不胜惊讶；可说实在的，我也并不更理解她。她认为工作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成功与发财的一种手段。我内心曾隐隐约约有个感觉，以为所有这些冒充高雅的人会不惜以自己的社会地位换取几分才智和几分成就。在我孩提时代，一位小学教师在我眼里远比公爵夫人和亿万富翁伟大，这种等级区分标准至今也未有过多少变化。然而在克洛蒂的脑子里，她想象对爱因斯坦来说，最高的奖赏莫过于在她的沙龙里受到款待。因此，我们俩就难以有什么心灵的契合了。

“请坐这儿，我们马上做‘说实话’游戏。”克洛蒂说道。

我讨厌这种游戏。在这些人中间，我向来只说假话。看到这些搭档一个个竞相显露内心的秘密、互不中伤、认真而又狡黠地互相提问，我感到很不自在。

“您偏爱的是什么花儿？”于盖特问吉埃特。

“黑蝴蝶花。”她在一片虔诚的肃穆中答道。

她们各自都有偏爱的花卉、季节、书籍和专门的时装师。

于盖特瞧了瞧克洛蒂：

“您有过多少情夫？”

“我记不清楚，二十五六个吧。等一等，我到浴室去看一看名单。”她返回时得意洋洋地高喊道：“二十七个。”

“就现在这一刻，您有何想法？”于盖特向我发问。

没想到我也突然憋不住说了实话：

“我想到别的地方去。”我站了起来。“说真的，我有件急事要处理。”我对克洛蒂说，“您千万别麻烦。”

我走出沙龙，一直有气无力地躺在一张沙发上的玛丽-昂热紧跟着我出了门。

“您真有急事？不是吧？”

“我手头总有事。”

“我邀您吃晚饭。”她朝我投来哀求而又鼓动的一瞥，这目光旋即熄灭了。

“不，我真的没有时间。”

“那就改日吧。我们不能经常见见面？”

“我忙得不可开交！”

她神情不满地向我递过她的指尖。我跨上自行车，径直朝前骑去。跟她一起吃晚饭，这倒挺让我高兴，可我实在不太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恐惧男人，扮演着小姑娘的角色，说不定很快就会把她的那颗心和她那副柔弱的身子交给我。我谢绝了她，并非客观情况让我害怕，而是因为我预见到了她的命运，无心从中取乐。有一天，纳迪娜曾责怪我：“你呀，永远都不合群。”这话切中要害：我总是以医生的目光看人，我因此很难与他们建立人际关系。我很少发火，也难得记仇。可别人对我的美好情感也几乎触动不了我的心：这都是我的职业造成的。我不得不漠然地经受我所做的精神分析移情的后果，并



在适当的时刻予以消除，甚至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也保持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病人犯了病，我很快诊断出该病人患的是幼稚精神混乱症，我清楚地看到了我自己在病人幻觉中的形象：母亲、祖母、姐姐、孩子、宠儿。我实在不太喜欢他们对我的形象如此大施魔法，可我却不得不忍受着。我不由得设想假若哪一天真有一个正常人感情冲动，依恋于我，我准会马上向自己发问：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谁的形象？他企图满足何种受压抑的欲望？这样一来，我十有八九冲动不起来。

我可能已经骑出了巴黎城区。此刻，我沿着塞纳河行进在一条狭窄的马路上，右边是栏杆，左边是低矮的房子，房子歪歪斜斜，远处亮着一盏破旧的路灯。路面泥泞，可人行道上积着白雪。我朝着灰暗的天空微笑。这时光是我逃避克洛蒂的沙龙获得的，不属于任何人。大概是这一缘故，这寒冷的空气中竟洋溢着如此的欢乐。我还依稀记得，昔日，我常被自己的呼吸所陶醉，欢乐往往突然涌至心间。此时，我不禁自问，若这样的时刻不复存在，活在世间又有什么必要？这样的时刻还会重现吗？有人邀我穿越大西洋，去发现一个崭新的大陆，可我只知道回答：“我害怕。”到底害怕什么？我以前可不是胆小如鼠的人。在巴伊约利弗树林或格莱齐涅森林，我经常头枕背袋，身裹一床毯子，独自一人睡在满天星斗之下，睡得是那么安然，就像在自己的床榻上酣睡。在我看来，不要向导、独自冒险、攀登覆盖着滑动粒雪的高山，再自然不过了。对所有谨慎的劝告，我一概嗤之以鼻。我常常孤身坐进勒阿弗尔或马赛嘈杂的咖啡馆，或穿过卡比利亚的村寨，悠闲漫步……我突然掉转车头。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硬

要骑向天涯海角，若我真的想重获昔日的自由，那最好还是赶紧回家，连夜给罗米欧回话：同意。

可是，我没有回话，过了几天，我仍然心神不定地请人出主意，仿佛是一次去地球中心的历险。

“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亨利诧异地说。

正是在这天夜里，巴黎的上空灯光闪烁，划出一个个巨大的V字。他们带来了香槟酒和唱片，我准备了吃的，家里也到处插上了鲜花。纳迪娜借口有急事，独自呆在房间：她是因为这节日而赌气，在她眼里，这节日只不过是死亡的周年纪念日。“古怪的节日。”斯科利亚西纳说道，“这不是结尾，而是开端，是一出真正的悲剧的开端。”

在他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前已经爆发了。我乐呵呵地冲着他说：“别扮演您的卡桑德拉<sup>[3]</sup>角色了。圣诞节前夜，您就向我们预言灾难在即，我想您打赌打输了吧。”

“我们根本就没有打赌。”他说，“再说，一年还没有过呢。”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现在并没有对文学失去兴趣。”我让亨利作证，“《警觉》收到的稿件，多得不得了，是吧？”

“这证明法国选择了亚历山大城的命运。我宁愿《警觉》不怎么走运，而像《希望报》这样一份大报不要有被清查的危险。”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亨利生气地说，“《希望报》一切顺利。”

“有人告诉我您将不得不去找私人赞助。”

“谁跟你说的？”

“啊！我记不得了。都在这么传。”

“这是谣传。”亨利冷冷地说。他心情显得不怎么舒畅，这真有点怪，除了他，大家都这么开心，包括波尔在内，连斯克利亚西纳也没有一点忧郁，尽管他总是周期性地产生绝望。罗贝尔讲述着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一些故事，那是二十年代的一些往事，勒诺瓦和朱利安跟他一起回忆着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时光。两个谁也不熟悉的美国军官在低哼着一支美国西部叙事曲，一个美国陆军妇女队队员躺在长沙发上酣睡。尽管有着那一个个业已消失的悲剧和一个个即将降临的灾难，这个夜晚仍然不失为一个节日的夜晚。我可以肯定，这并非因为歌声和焰火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心中憋不住想笑，也想哭。

“咱们去看看外面的热闹！”我说，“然后再回来吃晚饭。”

大家兴高采烈，全都表示赞同。我们没费多大劲便到了协和广场那一站的地铁口，可想要进入广场，就是另一码事了。台阶上人山人海，为了避免走散，我们彼此紧挽着胳膊。可正当我们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突然发生一阵骚动，来势如此凶猛，竟把我从罗贝尔的胳膊中冲了出来：只留下了我和亨利，背朝着我们本来打算去的香榭丽舍大街方向。人流裹挟着我们朝杜伊勒利宫涌去。

“不要硬想抵挡了。”亨利说，“我们等会儿反正都要到您家聚合。只有随着人流去了。”

在一片歌声、笑声中，我们涌到了歌剧院广场。广场披着红色的盛装，映着红色的灯火，整个儿一个红色的世界。这真让人有点心悸，若不小心，跌倒在地，那十有八九要被踩死，可这也令人心潮激荡。一切都还没有定局，过去不会再现，将来也捉摸不定，可是现在却一片辉煌，让我们空荡的脑袋、干渴的嘴巴和激烈跳动的的心脏全都随着这辉煌的现在时刻而去吧。

“您不喝一杯吗？”亨利问道。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费尽周折，终于慢慢地一条通向蒙马特尔的大街上摆脱了人群，来到了一家小酒店。小店里挤满了身着军装的美国人，他们哼着歌曲。亨利要了香槟，我又渴又累加之心头激动，因此而嗓子发干，一口气连喝了两杯。

“这是节日，是不是？”我说。

“当然是。”

我们友好地相互凝望。我与亨利呆在一起，感到心情舒畅，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俩之间隔着的人太多了，有罗贝尔、纳迪娜、波尔。可在这个夜晚，他在我眼里显得十分亲近，香槟酒也给了我几分勇气：

“您今天晚上好像并不开心。”

“开心。”他递给我一支烟。他确实显得闷闷不乐。“可我在纳闷，到底是谁到处放风，说《希望报》陷入困境。很可能是萨玛泽尔。”

“您不喜欢他吗？”我说，“我也一样。那些不戴假面具便不登场的虚伪家伙真叫人讨厌。”

“可是迪布勒伊倒很看重他。”亨利说。

“罗贝尔？他是认为他有所用处，但对他并无友情可言。”

“这又有什么区别？”亨利问道。

他的语调在我听来就如他的提问一样奇怪。“您想说什么意思？”

“眼下，迪布勒伊已经整个儿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了，以致他对别人表示的友情多少，要视其用处而定。”

“这可绝对不是实际情况。”我气愤地说。

他一副揶揄的神态看了我一眼。“我在揣摩，若我不把《希望报》向革命解放联合会敞开大门，他还会对我有何友情。”

“他会失望的。”我说，“出于种种原因，最终迫使您接受了，他显然会因为种种原因感到失望。”

“噢！这我同意，这类假设是愚蠢的假设。”他过于激动地说道。

我思忖罗贝尔是否给亨利造成了一种感觉，仿佛是逼他成交。确实，当罗贝尔想要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可能会十分粗暴的。若他伤害了亨利，我只能感到遗憾。眼下，他已经相当孤立了，他千万不该失去这份友情。

“罗贝尔对人爱得愈深，要求就会愈高。”我说道，“比如对纳迪娜吧，我就发现了这一点：每当他对她的期望不那么过分时，他对她就比较宽容。”

“啊！可为他人的利益和为自身的利益而要求严厉，完全不是一回事；若是为了前者，那才是爱的表示……”

“可对罗贝尔来说，两者是合在一起的！”我说。

平常，我讨厌谈论罗贝尔，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要清除我从亨利心中感觉到的这种积恨。“《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结合在他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您应当承认这一点。”我用目光询问着亨利。“您以为他用您用得过分随便了？不，那是出于敬重。”

“我知道。”亨利微笑着说，“他自己明白的事情总是动不动就强加于人，得承认这是一种带有几分帝国主义色彩的敬重方式。”

“不管怎么说，既然是您自己同意的，他也就没有多少过错了。”我说，“我不太明白您到底责怪他什么。”

“难道我说过我责怪他什么了吗？”

“没有，可这感觉得出来。”

亨利迟疑了片刻：“噢！这是件微妙的事情。”他一耸肩膀说道，“若迪布勒伊能处在我的位置上看待问题，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会感激的。”他十分和蔼地朝我微微一笑：“您就能做到。”

“我可不是一位干事的女人。”我说。“不错，”我紧接着补充道，“罗贝尔时不时故意蒙上自己的眼睛，可这并不妨碍他真正关心别人，并具备无私的情操。您实在是错怪他了。”

“也许。”亨利开心地说，“您知道，当人违心地接受了一件事情，心里对逼他接受的人总是有点怨气的。我承认这并不十分恰当。”

我带着一种负疚的心情打量了亨利一番：

“《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建立的那些新关系，对您来说是很重的负担？”

“噢！现在就谈不上什么负担了，”他说，“我已经参与了。”

“可您当时并不渴望参与。”

他淡淡一笑：“不那么狂热。”

他不知说过多少遍政治搅得他头痛，可他如今却整个儿陷了进去。我叹息道：“斯克利亚西纳的话总有一点道理吧，政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一样吞噬人。”

“迪布勒伊那个魔王可不容吞噬。”亨利带着某种羡慕的口吻说道，“他写得还跟从前一样多。”

“一样多。”我说道。我犹豫了一下，不过，对亨利我真的有一股子信赖感。“他写得一样多，可并不如以前自由。那些回忆文章，您曾读过其中的片段，哎，他已经放弃发表了，他说别人可以从中找到很

多的武器来对付他。一想到成了社会活动家，就再也不能像作家那样保持百分之百的诚实，真令人心寒，不是吗？”

亨利沉默了片刻：“写作的某种非理性，显然是消失了。如今迪布勒伊发表的一切东西都得从他不得不考虑到的环境中去解读，可我并不认为这会减少他的诚意。”

“事实是那些回忆录永远不可能问世了，这真让我懊恼！”

“您错了。”他友好地说，“一个毫无保留、但也不负责任地忏悔的人，较之一个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完全负责任的人，其作品并不会更真实、更全面。”

“您这么看？”我问道，接着我又添了一句：“您对自己也会提出这类问题吗？”

“不，根本不会提出这种问题。”他答道。

“那总会提出一些问题吧？”

“问题总会不断出现的，是不是？”他支吾搪塞道。

我追问道：“您那部欢快的小说进展如何？”

“噢，我已经不写了。”

“小说写得凄凄惨惨了吧？我早就有话在先。”

“我再也不写了。”亨利抱歉地微微一笑道，“一点也不写了。”

“算了吧！”

“文章嘛，那当然，因为文章看完也就完了；可名副其实的书，我再也没有能耐写了。”

他再也不能写了：波尔的胡言乱语中也含有真情。他过去是多么喜爱写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了什么？”我问道。

“您知道，不写作是很自然的事。反过来倒不正常了。”

“对您来说不一样。”我说，“您不写作意味着失去生命。”

我苦恼地凝视着他。我曾对波尔说，“人都在变”，然而尽管知道他们都在变化，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又有一颗恒星在我的天际旋转起来了。“您是否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作纯属枉然？”

“噢！不，”亨利说，“倘若有人还保持其写作的灵感的话，那是他们的造化。就个人而言，我已经毫无创作的欲望，事情就是这样。”他淡然一笑，“我向您和盘托出吧：我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或者这么说吧，我想要写的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这种心境很快就会消失的。”我说。

“我不相信。”

我心里揪得紧紧的，放弃写作，这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痛苦。我既遗憾又带着几分责怪的口气说道：“我们经常见面，可您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事！”

“没有机会。”

“确实，跟罗贝尔在一起，你们除了政治就无话可说！”我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您不知道做点什么有趣的事情吗？罗贝尔和我要在这个夏天骑自行车外出旅行，你们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上一两个礼拜吧。”

“这可能很有意思。”他犹豫不决地说。

“肯定很有趣！”我这回却迟疑起来了，“只是波尔不会骑自行车。”

“噢，不管怎么说，我度假并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说，“她到时去图尔，到她妹妹家去。”

出现了片刻沉默，我劈头问道：



“波尔为什么不愿再想办法重返歌坛？”

“要是您能跟我说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这段时间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失望地说，继而一耸肩膀，“她也许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机会以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真是您内心的愿望？”我问道。

“是的。”他冲动地说。“又有什么法子呢？”他补充说道，“我早就已经不爱她了，尽管她拼命说什么也未曾改变，这她自己心里完全清楚。”

“我感觉到她同时生活在两个平面上。”我说，“她头脑完全清醒，可同时却又欺骗自己，认为您疯一般地爱着她，而且认为她自己本可望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头脑最终会占上风的，可到时她又该怎么办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愿像个混蛋那样行事，可我也没有当牺牲品的天职。有时，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一旦不再相爱，那也就不爱了。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不再爱波尔是我的过错，波尔还是以前的波尔呀。”

“我想爱同样也是过错。”

“那怎么办？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他问道。

他真的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我再次暗自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与男人打交道遇到的问题要少得多。

“无论如何波尔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说，“不然，您就没有出路了。任何人都无法在良心不安中过日子，但也不可能总是违心地生活。”

“也许得学会违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说道。

“不！我认为不行！”我说，“若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我简直不明白该如何证实这种生活的意义。”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这一问倒把我卡住了。我刚才只不过以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信念来说话，可我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还守着这一信念呢？连我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尴尬地说：“我反正没有不满。”

他审视了我一番，问道：“只要没有不满，您也就满足了？”

“这就已经不错了。”

“您变了。”他客气地说，“您过去对自己的命运是那么心满意足，简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为什么非要我一个人保持不变呢？”我说。

可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追问。“我有时觉得您的职业不像以前那样让您感兴趣了。”

“我当然感兴趣。”我说，“可您不认为目前医治灵魂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您医治的人来说，事关重大。”他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一样重要，不然区别何在？”

我犹豫了片刻说：“区别在于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说，我以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医治一个病人，是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赋予其生活以意义。”我耸了耸肩膀，“只有对前途充满信心才会相信生活会具有意义。”

亨利微微一笑，两只眼睛在询问着我。“前途并非那么黑暗。”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我过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于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哑然一笑，“正是在这方面我变化最大，我对什么都害怕。”

“这，您就让我惊奇了！”他说。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噢，几个星期前有人建议我一月份去美国参加一个精神分析讨论会，我至今还拿不定主意。”

“为什么？”他诧异地问。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时我又害怕。您不会害怕吗？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他回答道，“您以为会出什么事情？”

“不会出任何特别的事。”我迟疑了一下，说道，“相互见见面，特别是见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该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义。”他对我微微一笑，以鼓励的口吻说道，“您准能有不少小小的发现，要是这会扰乱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觉得怪呢。无论是什么事情落到了我们头上，还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从来就不那么重要……”

我垂下了脑袋。“是的。”我心里想，“事情总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会回来的，一切都会顺利，决不会出任何问题。”面对面的倾心交谈结束了，该回家去吃晚饭了。这亲密无间、充满信任的时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续到拂晓，也许可以超过拂晓。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该这么做。真不该？反正我们没有试图这样做。

“该去和别人相聚了。”我说。

“对，”亨利说，“是时候了。”

我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铁，去和别的朋友相聚。

罗贝尔和拉福利争论激烈但不失礼貌，他们俩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可谁都谴责对方是战争罪人。拉福利声音悲切地做出了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发起攻击。”这并没有阻挡住罗贝尔，他仍然充满激情地筹备定于六月份举行的集会。可与萨玛泽尔及亨利一席长谈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头问我：

“我组织这次集会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惊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请你回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远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放弃集会，这是否就意味着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

“当然。”

“您与拉福利争辩之后，曾反复向我解释您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现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问题？”

“什么也没有发生。”罗贝尔回答道。

“那么，您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人同意？”

“当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们有可能不拆桥。”罗贝尔一时打住了话头，犹豫了片刻，继续说道：“我是就全局考虑这个问题。”

“就运动这个全局？”

“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欧洲，我有时不禁自问，是不是一种空想。不过，任何没有实现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总认为什么都没有可

能，那就永远办不成什么大事，除非世上已经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个无形的对手争辩，为自己辩护。我纳闷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这么些疑虑。他叹息了一声：“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与梦想，谈何容易。”

“列宁不是说过‘应该梦想’吗？”

“说过，可条件是必须当真相信自己的梦想。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当真。”

我惊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说什么意思？”

“我如此固执不是出于挑衅、出于高傲、出于对自己的纵容吧？”

“您居然有这种顾虑，真奇怪。”我说，“平常您从来不怀疑自己。”

“我对自己的习惯也是有过怀疑的！”罗贝尔说。

“那您就对这种怀疑表示怀疑吧。也许是担心失败或害怕事情复杂化您才试图让步的。”

“也许。”罗贝尔说。

“我猜想您挂记着共产党人要向您发起攻击，心头不舒畅吧？”

“是的，是不舒心。”罗贝尔答道，“为了达到相互理解，做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们非要造成最可恶的误解不成。是的，”他补充道，“也许是我心头的那个作家在怯懦地劝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罢休算了。”

“瞧您。”我说道，“若您开始严格地检查起您的思想动机，那就永远没个完。还是像斯克利亚西纳所说，脚踏实地吧。”

“可惜！这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实地！”罗贝尔说，“特别当我们只掌握片面的情况的时候。对，我相信欧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坚信它必要的缘故吗？”

罗贝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真让我困惑不解。他愤然责备自己过分幼稚地相信了共产党人的诚意，可是这也不该气得他对自己怀疑到这个程度。自从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试图采取一种偷懒的解决办法。

“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我问道。

“噢！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想过。”罗贝尔回答道，“我只是这么问问自己而已。”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问自己的？”

“两三天了。”罗贝尔说。

“没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只是因为您累了缘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说。

突然，这在我眼里显得—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两眼发红，脸上虚肿，皮肤没有一点光泽。“因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还没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这么干，甚至还加倍地拼命工作。也许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还年轻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联合会、《警觉》杂志和他的书外，他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函、处理电话，谁都有紧急的事情非要向他汇报，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也有提出的问题。若不接待他们，若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就无异于使他们经受饥饿与干渴，无异于逼他们去遭受贫困，去发疯，去死，去自杀。凡来客，罗贝尔一概接待，这占去了他夜晚的时间，他几乎从不睡觉。

“您干得太多了！”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干下去，那您就要没命了。总有一天您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而我却好好的！”

“还是要挤出一个月来，不能再多挤了。”他说。

“您以为休假一个月就足以恢复健康？”我思索片刻，说道，“应该想法子找幢郊区的住房。您每个星期去巴黎城两三次，其余时间不得接待来访、处理电话，要安心休息。”

“凭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罗贝尔含讥带讽地问道。

跑住房介绍所、看房子，我实在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空暇。但是看到罗贝尔那样劳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经拿定主意，集会如期举行，然而他心里却很不安：只有取得惊人的成功，共产党人才可能买账；万一他们过河拆桥，革命解放联合会该怎么办？我也一样，心里总挂念着能否成功。与罗贝尔相比，我对个人、对生活的各种财富，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为珍视。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也一定会完善自己，而不会否认自己的这些财富。

感谢老天爷，纳迪娜不再向她父亲吹风，说她的那些共产党员同志对他如何谴责了；她也不再冲着我们大加讽刺，严厉抨击美帝国主义了，她的那部《资本论》也永远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没头没脑地对我说：

“实际上共产党人和资产者是一码事。”

我并不感到惊奇：

“怎么回事？”

我当时正在卸妆准备睡觉，她坐在我卧室沙发的边沿上。她往往选择这种时刻跟我谈盘桓在她心中的事情。

“他们都不是革命者。他们都赞成秩序、工作、家庭和理智。他们的公道是将来的事情，眼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勉强忍受着不公。再说，他们将来的社会，也只不过是社会而已。”

“显然如此。”

“也许等上个五百年，世界还没有变化，我对这不感兴趣。”

“你总不至于想象一个季节就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吧。”

“你说话的口气就像若利，真好笑。看你说话的样子，仿佛我对他们那套玩意儿了如指掌似的。可实际上，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那个党跟别的党没什么两样。”

“又坏事了。”我卸了妆，遗憾地在想，“她多么需要成功一次啊！”

“最好是像樊尚那样独来独往。”她说，“他呀，是个纯洁的人，是个天使。”

一个天使，她过去谈起迪埃戈时常用这个词。她也许从樊尚身上发现了曾拨动她心弦的那种宽宏大量，那种别具一格。不同的是，迪埃戈只将疯狂的爱倾注于作品之中，而樊尚恐怕就会在生活中发泄自己的爱了。他常跟纳迪娜睡觉吗？我并没有这样猜度，可这些时日他俩频繁幽会。我为此而庆幸，因为纳迪娜在我看来虽然显得狂躁，但也很开心。所以，当清晨五点听到这阵门铃声，我心里并没有半点担忧。纳迪娜夜里没有归家，我猜想是她忘带钥匙了。可一开门，我见是樊尚。他对我说：

“您别担心。”

他这么一说，倒使我马上局促不安起来。我急忙问道：“纳迪娜是否出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他说道，“她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他果断地朝起居室走去。“连纳迪娜也是个弱女子！”他以厌恶的神态说道。他从夹克衫的口袋里掏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简单说吧，她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着您。”他指了指尚蒂伊西北角两条小道的交会处说道，“您必须弄辆车子，马上到那儿去接她。佩隆肯定会把报社的车子借给您的。可不要跟他解释什么，只向他借车，别的不要说，更不要提到我。”

他一口气交代了情况，声音沉着而又严厉，我怎么也放不下心来。我断定他心里充满恐惧。“她在那儿干什么？是否出了事故？”

“我告诉您没有。她脚坏了，没什么关系，只是走不动了。可您必须及时赶去。那地方您看明白了吧？我画个十字。您到了那里只要按喇叭或喊一声，她就在公路右侧的小树林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要弄清楚。”我说。

“职业秘密。”樊尚说，“您最好还是马上给佩隆打电话吧。”他补充道。

我讨厌他这张苍白的面孔、两只血红的眼睛和这副漂亮的侧影，可这仅仅是一种毫无力量的愤懑而已。我拨了亨利的电话号码，听到了他那惊诧的声音：

“喂！是谁呀？”

“是安娜·迪布勒伊。对，是我。我有件急事请您帮忙。请您别多问了。我马上需要用一辆车，需要行驶二百公里的汽油。”

极为短暂的一瞬沉默。“正巧，昨天车子加满了油。”他声音极为自然地说，“我这就去开车，半小时后车子就到您家门口。”

“请把车子开到圣安德烈艺术广场吧。”我说道，“谢谢。”

“啊！好极了！”樊尚咧嘴大笑道，“我看佩隆看得很准。真的放心吧。”他补充道，“纳迪娜没有任何危险，要是您快一点就更好了。暖，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她向我起誓可以完全信任您。”

“可以。”我跟着他向门口走去，说道，“可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向您发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真恨不得在他走后马上猛地把门关上，可我还是轻轻地关上门，免得吵醒了罗贝尔，幸亏他此时正在酣睡，我听见他上床睡觉还不到两个小时。我急匆匆穿上衣服，脑中浮现出过去的那两个黑夜：我焦急地等待着纳迪娜，罗贝尔则在巴黎城四处寻找，多么可怖的等待啊。今天，情况更是糟糕。我肯定他们做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樊尚充满恐惧。也许是干了偷盗或抢劫那等事，上帝知道。可是，纳迪娜无法徒步去车站，必须让我在事情败露、纳迪娜被人发现之前赶到那里。纳迪娜孤独一人，已经在黑夜、寒冷和恐惧中等待了我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初夏的清晨，散发着柏油和草木的气息，再过几个小时，天气就要炎热起来。此时，河畔寥无人迹，鸟儿在清晨的凉爽与岑寂中歌唱。这是一个晴朗爽快的清晨，然而却笼罩着焦灼不安的气氛，犹如逃离巴黎的那个早晨。

我刚到了几分钟，亨利便抵达了广场。

“车子到了。”他乐呵呵地说。他手握方向盘没有挪位：“您不愿意我陪您走一趟？”

“不，谢谢。”

“真的？”

“真的。”

“您很久没有开车了。”

“我知道我自己会开的。”

他下了车，我坐到驾驶位上。他问道：

“是因为纳迪娜的事吧？”

“是的。”

“啊！他们利用她向我们下手！”他声音愤怒地说。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

“多少知道一点儿。”

“那快告诉我……”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只是猜测。听我说，我整个上午都在家，如果用得着我，不管什么事，就打电话来。”

“千万不要出车祸。”我叮嘱自己，驱车向拉沙佩勒城门驰去。我极力强迫自己谨慎驾车，尽量安下心来。“亨利似乎猜测樊尚撒了谎：也许他们好几个人在等着我，也许纳迪娜压根儿就没跟他们在一起。”但愿如此！我宁愿疑心自己上当受骗，也不愿去想象纳迪娜在漫长的黑夜中被冻僵，被吓呆，经受恼恨的煎熬。

大公路上寥无人迹。我向右转弯，驶上了一条小公路，继又行驶在另一条小公路上。十字路口也空荡无人，我按了按喇叭，仔细看了看地图：我没有走错。是不是樊尚搞错了？没有，他指点得很精确，根本不可能有错。我又按了按喇叭，接着熄了马达，走下车子，进了右侧的小树林，呼喊着：“纳迪娜。”开始轻轻地呼唤，继而越喊越响。沉寂。死一般的沉寂：我终于明白了这些词的真正含意。“纳迪娜！”没有回音，仿佛我呼唤的是迪埃戈。她也一样，已经化作了一团气息，无影无踪。她应该就在这儿，完全应该在这里，可她却不在

了。我急得团团转，折断了枯枝，踩着新鲜的苔藓，不再呼喊了。“他们肯定把她抓起来了！”我恐惧地想。我回到了车边。也许她等得太累，等得不耐烦，鼓足勇气独自一人找附近的车站去了。必须追上她，无论如何必须追上她，此时呆在空荡的月台上，别人会认出她来的。去尚蒂伊，她可能不被发觉，可那儿太远了，我路上也会碰到她的呀。她也许选择了克莱蒙站。我紧紧地盯着地图，仿佛可以从中挖出答案。去克莱蒙有两条路可走，她很可能抄了近路。我拨了点火开关钥匙，启动汽车，心脏开始绝望地怦怦跳动起来：马达竟没有发动起来。车子终于启动了，在公路上颠簸着向前奔驰。我湿乎乎的双手在湿漉漉的方向盘上滑动。我的周围仍然笼罩着沉寂，可阳光已经不可阻挡，村庄里各家各户很快就要开门。“他们就要逮捕她了。”沉寂、空荡，这份宁静显得多么恐怖。公路上，克莱蒙的街道上，车站里，都不见纳迪娜的踪影。她可能身边也没有地图，对这一地区也不熟悉，正在村野里漫无目标地乱闯呢，他们就要抢在我的前面把她抓住了。我掉转车头，准备抄另一条路回到十字路口去，然后再设法在周围的大路小路上寻找，直到油箱用干为止。然后该怎么办？不要再问自己了，大路小路都得找个遍。车下的这条公路伸向一座高丘，两旁是绿油油的庄稼。突然，我瞥见纳迪娜向我迎来，唇间挂着微笑，仿佛我们早就安排了这次约会似的。我猛地停下车子，她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了过来，声音十分自然地问道：

“你是来找我的吧？”

“不，我是自己在兜风玩儿呢。”

我打开了车门：“上车。”

她坐在我的身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搽了粉，好似已经休息过了。我脚踩油门，双手过分有力地紧握着方向盘。纳迪娜露出一半讥讽、一半宽容的微笑，问道：“你生气了吧？”

涌上眼角的那两滴酸楚的泪水，确实是气愤的眼泪。车子突然偏了一下，我怀疑是自己的手在颤抖。我放慢了车速，尽量放松手指，克制住自己的声音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在小树林里呆着？”

“我呆烦了。”她脱掉鞋子，往座位下一塞，“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她补充道。

“你就这么傻？我不是来了吗？”

“我当时不知道你会来。我想去克莱蒙乘火车，我怎么也会设法走到那里的。”她向前倾着身子，揉着双脚，“我可怜脚啊！”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她没有答腔。

“行，那就保守你的秘密吧。”我说，“今晚就会见报的。”

“就会见报的！”纳迪娜遂挺起身子，大惊失色，“你觉得门房已经发现我昨天夜里没有回家？”

“她没法证实的，必要时，我还会发誓证明你在家。可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你反正怎么都会知道的！阿赞库尔有个臭女人，”她声音忧郁地说，“她告发了藏在一家农场的两个犹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丢了命。谁都知道是她的罪过，可她死活不认账，想逃脱追究：这又是一个卑鄙的行径。樊尚和他的那些伙伴决定惩治惩治她。这事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也清楚我想帮他们。这次他们需要一个女的，我便陪他们来

了。那个臭女人是一家小酒店的老板娘。我们一直等到最后几个顾客离开，正当她关门时，我央求她让我进去喝一杯酒，稍微休息一下就走，她给我上酒时，其他几位走进了酒店，一起向她扑去，把她拉到了地窖。”

纳迪娜打住了话头。我连忙问道：“他们没有把她……”

“没有。”她赶紧说，“他们把她的头发剪光了……我还不怎么孬，那场面还经受得住。”她突然以自愿承担责任的口气说道，“我关上了门，灭了灯，只是我觉得时间太长了，我边等边又喝了一杯白兰地。显然，我没有牵扯进去，我是清白的。由于从克莱蒙出发就走了许多公里路，他们还要再去尚蒂伊，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他们把我扶到小树林，让我等着你。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慢慢恢复……”

我打断了她的话：“你要么跟我发誓与这帮家伙一刀两断，要么今天晚上就离开巴黎。”

“不管怎样，他们再也不会要我了。”她带着某种积恨说道。

“这还不行，我要你发誓，要么我告诉你，你明天就得走得远远的。”

我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了，她用一副乖顺而又哀切的神态看了看我。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也别对爸爸说。”

纳迪娜干的那些蠢事，我很少瞒着罗贝尔。可这一次，我想他实在没有必要增添新的忧愁。“你答应我就答应。”我说。

“你要我答应什么都行。”她神态悲伤地说。

“那我就什么也不说。”紧接着，我局促不安地问了一句：“你肯定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樊尚说他什么都防备了。”她恐慌地问道：“要是抓到我，会有什么事？”

“不会抓你的。你说到底只不过是同谋犯，而且你年纪也很小。不过，樊尚危险就大了。要是他在牢房了却一生，那活该。”我气愤地说，“这事，真恶劣，又蠢又恶劣。”

纳迪娜没有答话。一阵沉默过后，她问道：“亨利借车的时候什么也没问？”

“我想他心里清清楚楚。”

“樊尚嘴巴也太不严了。”纳迪娜说，“像亨利或你，知道了没关系。可塞泽纳克那样的家伙就危险了。”

“塞泽纳克没有参与？真不可思议！”

“他没有参与，樊尚毕竟也知道对一个吸毒的家伙得提防着点儿。不过他俩挺要好的，总是在一起。”

“必须跟樊尚谈谈，无论如何要说服他洗手不干……”

“你说服不了他，”纳迪娜说，“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都说服不了他。”

纳迪娜上床睡觉去了，我告诉罗贝尔我出门玩儿了一圈。这些天来，他心事重重，因此对此事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我给亨利打了电话，三言两语含糊其辞地请他放心。把心思用到我的那些病人身上去，这谈何容易。白天里，我一直等着晚报出来，报上还好，只字未提。可夜里，我还是基本上没有合眼。“再也不可能去美国了。”我心里在想，因为纳迪娜处于危险之中。她已经答应我洗手不干了，可上帝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我痛苦地想到，自己呆在她的身边也纯属枉然，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保护她。只要她感到幸福，感到有人

爱她，也许她就会停止自己毁灭自己。可是我既不能给予她爱，也不能给予她幸福。我对她来说毫无用处！对别的人，对那些外人，我可以诱导他们开口讲话，理清他们记忆的乱麻，打开他们的情结，最后把一些一清二楚的小难题交给他们，由他们各自去解决，去清理。有时，这于他们确有帮助。可纳迪娜，我虽然不费气力就可看透她的内心，却不知能为她做些什么。过去，我常常对自己说：“一想到心爱的人正在把自己不朽的生命当作儿戏，怎么还能安心呼吸呢？”信教者可以祈祷，也可以跟上帝做交易。对我来说，世上决不存在什么圣人，我暗自在想：“此生乃是她唯一的机遇，世上除了她最终认识的真理之外，别无真理；除了她最终信仰的世界之外，也不存在别的世界。”第二天早上，纳迪娜两只大眼睛带着浓浓的黑圈，我心底仍然经受着煎熬。整个白天，她呆呆地坐着，空对一篇化学论文。到了夜里，我卸妆时，她垂头丧气地对我说。

“这化学简直是个噩梦，我肯定这次过不了关。”

“可你每次都过了考试关……”

“这次不行。再说，过还是不过，都是一码事。我决不会以化学为职业。”她思索了片刻，“我干什么都一事无成。我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且做起事来又总泄气。我是毫无用处了。”

“在《警觉》杂志社，你干得很好，而且一干就会。”

“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爸爸说得很在理。”

“一旦找到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我坚信你一定干得很出色，你定会找到的。”

她摇摇头：“我怀疑自己说到底是个生来嫁人生孩子的命，跟所有的女人没有两样。我一定把锅勺擦得亮亮的，每年生个崽子出来。”



“要是你为结婚而结婚，那也不会幸福的。”

“噢！放心吧！没有哪个男人那么蠢会娶我。他们爱跟我睡觉，可睡完觉就了事。我可不讨人喜欢。”

我对她的这一套十分了解，再不愉快的事情轮到她自己身上，她说起来总是一副再自然不过的口气，仿佛她通过这般洒脱便消除了不愉快，便超脱了那辛酸的事实似的。不幸的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那是你自己不愿讨人喜欢。”我说，“即使有人一个心眼爱着你，你也不肯相信的。”

“你又要跟我唠叨朗贝尔爱着我了。”

“整整一年来，除了你，他没跟一个姑娘出过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他显然是同性恋。”

“你疯了。”

“既然他只跟小伙子出门。再说，他爱着亨利，这再清楚不过了。”

“你忘了罗莎。”

“噢！罗莎那么漂亮。”纳迪娜带着怀念之情说道，“哪怕搞同性恋的也会爱上罗莎的。你不明白，”她不耐烦地补充道，“朗贝尔对我怀有友情，这不错，可这就像他对男人一样。再说，这样也很好。我可不愿当替代品。”她叹息了一声，“小伙子们机遇多极了，他就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涉及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的振兴及其他问题。他买了一辆摩托车。瞧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当他骑着那堆烂铁到处乱窜，他还自以为是劳伦斯上校呢。”她气冲冲地添了一句。

她的话语中含着多少嫉妒，我顿时生出一个念头。第二天下午，我到了《希望报》报社，要求见朗贝尔。

“您有事要跟我谈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如果您有一分钟空暇的话。”

“您愿意到楼上酒吧间去吗？”

“上楼吧。”

酒吧招待刚把一杯柚子汁放到我的面前，我便开门见山问道：“听说您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

“是的，我下周就出发，骑摩托车去。”

“没有可能带纳迪娜一块儿去吗？”

他带着某种责怪的神态瞥了我一眼：

“纳迪娜想陪我一块儿去吗？”

“她想得要命，可她决不会先开口问您的。”

“我没有提出来，是因为她要是同意才怪呢。”他声音不自然地说，“我跟她提什么事情，她都难得同意。再说这些日子我很少见到她……”

“我知道，”我说，“她常跟樊尚和塞泽纳克一起混。那些人对她来说不是应该结交的好朋友。”我犹豫了一下，很快接着说道：“甚至是危险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找您。既然您对她怀有友情，那您就带着她离那帮家伙远远的吧。”

朗贝尔遂变了一副面孔，他突然间显得十分年轻又十分温和：“您言下之意，不是说纳迪娜吸毒了吧？”

他的这种怀疑恰巧帮了我的忙。我以迟疑不决的口气说道：“我不知道，我想不会吧，可纳迪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眼下她正经受危

机。我有话对您直说吧：我真害怕。”

朗贝尔一时缄默，然后他显得很激动地说：“若纳迪娜跟我一起走，我是多么幸福。”

“那就试试吧。不要灰心，我猜想她一开始会拒绝，她向来就是这个德性。要再三坚持，也就是您会救她一命。”

三天后，纳迪娜漫不经心地对我说：

“你想想，那个可怜的朗贝尔想带我跟他一起去旅行！”

“搞全法国范围的大报道，是吧？这倒挺累人的。”我说。

“噢！累我不在乎。可我不能整整半个月把杂志丢下不管呀。”

“你有权利休假，这不成问题。可要是你不乐意，那就算了。”

“要知道那是很有意思的。”纳迪娜说，“不过，跟朗贝尔一起呆三个星期，代价可大了。”

我千万不能显出催促她去旅行的样子。“他真的那么讨厌？”我以幼稚的口吻问道。

“他一点儿也不讨厌。”她不快地说，“只是他那么胆小，那么拘谨，对什么都大惊小怪的。要是我穿带窟窿的袜子进小酒店，那他非大骂我一顿不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少爷。”她接着说，“你知道他跟他父亲又妥协了吗？多没骨气啊！”

“我的上帝！你这么快就下定论！”我说，“你对那件事到底了解多少？你对朗贝尔的父亲，对他们父子的关系又知道些什么？”

我说话的情绪如此激烈，以致纳迪娜一时目瞪口呆。当我自己对某事真正确信无疑时，我往往有办法说服她，我正是这样影响了她的整个童年。平常，每次向我让步后，她总对我存着莫大的积恨，我不

得不避免施加我的影响。可今天，看她这般固执任性，跟她自己作对，我实在恼火。

她以捉摸不定的口吻说道：“朗贝尔离不开他那个可爱的爸爸：这简直是幼稚病。如果你想知道，告诉你吧，他身上惹我生气的就是这点：他永远都成不了男子汉。”

“他二十五岁了，青少年时代过得很坎坷。你也完全清楚，一开始就靠自己的翅膀起飞很不容易。”

“啊！我呀，可不一样，我是个女的。”

“那又怎么样？做男的，并不容易。如今要求男的可高了：你就是一个。他们往往乳臭未干，就不得不扮演英雄的角色。这真让人泄气。不，你没有权力对朗贝尔那么苛刻。说你跟他不合，对这次旅行不感兴趣，这是另一回事。”

“噢！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旅行对我来说都有意思。”

两天后纳迪娜一副一半怒不可遏、一半受宠若惊的神态对我说：“那家伙，真出奇！他竟然吓唬我。他说当和平年代的记者，这职业让他讨厌透了，要是我不跟他去，他就不干了。”

“那？”

“那你怎么想？”她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

我一耸肩膀：“他可真会开摩托？那玩意儿危险。”

“一点儿也不危险，太棒了。”纳迪娜说。接着她补充道：“如果我同意去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摩托车的缘故。”

出乎众人意料，纳迪娜的化学考试通过了。笔试勉强通过，可口试，她凭自己的那份口才和那般从容，轻而易举地把考官们唬住了。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家露天餐厅要了香槟酒，摆了丰盛的晚餐，对这次

胜利通过庆贺了一番。然后，她便和朗贝尔走了。这是个好机会。第二周，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大会如期举行，家里人来人往，来客不断。罗贝尔少有几分空暇，可我为能同他人分享、独自享受这几分珍贵的空暇感到十分幸福。亨利热情地协助他的工作，使我深受感动，何况我知道亨利本来对这类事情缺少热情。他俩都说大会兆头很好。“如果他俩都这么说，那可能确实不错。”我在瓦格拉姆大街上边走边想。不过，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罗贝尔多年未公开讲过话，他能否像过去那样触动听众的心？我越过沿人行道一字摆开的警车，继续向双三点广场走去，提前到了会场。十年前，普莱耶尔集会的那个晚上，我也是独自一个人提前赶到会场，围着广场转了很长时间后，到洛林酒家喝了杯葡萄酒。这次，我没有进酒家的门。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蓦然间，我感到揪心的遗憾，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噢！十有八九是因为过去的缘故吧。我返身沿着凄凉的人行道信步走去。我想起了当年罗贝尔登上主席台时，自己内心陡然而生的那份痛楚，仿佛别人把他从我手中夺走了似的。今天这个晚上，一想到他就要登台，离着我远远的，我不禁感到恐惧。会场里人还不多。“大队人马往往都在最后一分钟赶到会场。”康热夫妇告诉我说。我尽量装出冷静的样子跟他们聊天，可两只眼睛却焦灼不安地盯着入口。人们到底是不是跟着罗贝尔走，就要见分晓了。当然，即使他们跟着他走，也谈不上什么胜利；可话又说回来，倘若会场空空荡荡，那就彻底失败了。会场上人越来越多。当演讲的人们在一片掌声中上讲坛时，整个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主席台上，那一张张亲切的脸庞突然变成了一副副严肃的面孔，让人看了真不习惯。勒诺瓦那副强装的姿态，生硬得像块木头，简直跟桌子椅凳难以分辨；与此相反，萨玛泽尔独占了整个主席台的

光彩，这里是他最自然的场所。亨利开始讲话，那亲切的话语旋即使巨大的会场缩小，仿佛成了一间私人的卧室：他眼前看到的不是五千听众，而是五千个单个的人，他拿出几乎像在倾心交谈的声调，亲切地对大家讲话。透过他的字字句句，他渐渐向我们奉献出了友情，这是不容置疑的友情：人生来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仇恨，要打仗。我们听着听着，对此愈加坚信不疑。听众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梅里科讲了有气无力的几句话，继而轮到罗贝尔。场上欢声雷动！他刚站起身子，人们便鼓掌跺脚，齐声欢呼。他神态冷静地等待着。我心中自问此时他是否激动：反正我已经心潮激荡。这些天来，我见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红红的双眼，弓着腰，显得孤独，对自身缺乏把握。此时，五千人欢呼的正是这同一个人。他们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警觉》委员会和反法西斯集会的领袖，是一个献身革命而又不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对老一辈来说，他代表着战前；对年轻一代，他又代表着现在，代表着他们的希望。他实现了过去和未来的统一……他无疑还是其他种种的化身，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爱戴着他。人们继续在鼓掌，掌声在我心间扩大，响亮无比。名声、荣誉，平常我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可今天晚上，它们在我眼里是多么值得羡慕。我心中在想：“能够正视其生活的真实并从中汲取乐趣的人是多么幸福，能够从朋友的脸庞上看到自己的生活之真实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终于平静下来了。罗贝尔刚一张开嘴，我的双手早已湿乎乎的，额头挂满了汗珠。尽管我知道他善于言辞，可我还是提心吊胆。幸好，我很快就被他吸引住了。罗贝尔讲话毫无夸张之处，其逻辑步步逼紧，犹如暴风雨一般不可抵挡。他没提出什么纲领，而是向我们下达任务。这些任务是如此紧

迫，不能不去立即完成。完成这些任务的必要性本身就是胜利的保障。我的周围，人们脸上洋溢着微笑，眼睛闪闪发亮，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信念。不，这场战争并非枉然，人们终于从中悟到了安于自私自利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他们将要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手中，获得和平的胜利，在整个地球上取得自由和幸福。这是清楚、明确、再也简单不过的常理：人类只能需要和平、自由和幸福，又有什么阻挡人类实现自己的希望呢？在地球上统御的只有人类。透过罗贝尔的一字一句，这个明显的道理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他一讲完话，掌声大起，经久不息，我们是在为真理鼓掌。我用手绢揩了揩双手。和平有了保障，前途有了保证，最近的和遥远的结成了一体。我没有听萨莱夫的讲话。他和梅里科一样讨厌，可这无关紧要。胜利已经在握，不仅仅是这次集会，而且包括这次集会所意味的一切。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萨玛泽尔。他很快开始叫喊，开始吆喝，俨然集市上的一个叫卖者。我重又坐在座椅上，周围的人跟我一样难以自己，傻乎乎地被这些话语所陶醉。这不是什么希望，也不是什么先兆：仅仅是话语而已。在普莱耶尔会场，我曾在那一张张全神贯注的脸上看见过同样的光芒，但这并没有阻挡华沙、布痕瓦尔德、斯大林格勒、奥拉杜尔悲剧的发生。是的，大家都知道安于天命与自私自利的代价。可是，大家虽然早已明白，但也毫无用处。人们从来就没有成功地阻止过灾祸的降临，也不可能朝夕之间可望获得成功，至少在我们活着的这一代已经不可能了。至于这一漫长的史前时代之后将发生什么，不得不承认根本无法想象。前途并没有把握，近的与远的一切都毫无保障。我瞥了罗贝尔一眼。所有这一双双眼睛反映出的难

道真的就是他说的道理？人们也在别处审视着他：从美国、从苏联、从遥远的过去审视着他。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只是一个老梦幻家。做梦向来缺乏严肃性。也许他将来就会这样来看待自己。他将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毫无益处，或者更糟，只是起到了蒙骗人们的作用。若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宣布世间没有真理可言就好了！可是，真理确实存在。我们的生活分明存在着，犹如石块一般沉重，有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面，这是多么可怕啊。我肯定自己这一次说的不是胡话，我一滴酒也没喝，黑夜也尚未降临，然而恐惧感却使我窒息。

“你们满意吗？”我一副超脱的样子问他们。亨利是满意的。“这是一次成功。”他快活地告诉我。萨玛泽尔说：“这是一次胜利。”可是罗贝尔却咕嚕道：“一次集会，这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十年前，他从普莱耶尔会场出来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然而，我们都考虑到战争也许最终将要爆发：这种清醒的认识来自何处？啊！我们面前时间还长。透过战争的威胁，罗贝尔隐约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最终要被消灭，这将付出何种牺牲，他已经彻底超越。如今，他感觉到暮年已至：他需要短时期内的明确信念。后来几天，他一直抑郁不欢。本来，当夏尔利埃告诉他自己已经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时，他应该喜笑颜开的，可是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谈后那样沉默寡言。不过，我心里是理解他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夏尔利埃那副外貌的缘故：夏尔利埃出了集中营后，头发虽然还没有长起来，皮肤发红、粗糙不平，可他总归又长了十公斤，还配了假牙；也不是他讲的那些事情的缘故，对集中营的那种恐怖我们已经再也清楚不过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应该说是夏尔利埃说话时的那种腔调。他原本



是最温和、最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当他回忆起遭拳打、挨耳光、受酷刑、经受饥饿、肠绞痛等忍辱负重的日子时，却付之一笑。这谈不上什么厚颜无耻的笑，可这是幼稚的笑，还是看破红尘的笑，是超脱的笑，还是愚蠢的笑，谁也不甚清楚。他耻笑社会党人想入非非，期待他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对共产党人他则始终存着内心那份由来已久的厌恶。革命解放联合会吸引了他，他许下诺言，答应要把聚集在他身后的一大班人马一起带来。等他离开后，罗贝尔对我说：

“你那一天对我犹豫不决还感到奇怪，可现在你明白了吧，今天，参与行动时，最可怕的一点是大家对错误付出的代价都一清二楚。”

我知道他认为他的同辈人及他本身对这场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是头脑最清醒、行动最积极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之一。可是，他失败了，于是便把自己视为罪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与夏尔利埃的会面竟唤起了他内心的痛楚。一般来说，他往往对集体而很少对个人做出反应。

“不管怎样，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本身就是个错误，也不会造成大难。”我说。

“小灾小难也是难。”罗贝尔说。他迟疑了一下，“只有比我现在年轻的人才会轻信前途可以拯救一切。我深感自己的责任比过去更加有限，但同时也更加明确、更加重大了。”

“怎么回事？”

“呃，我的想法与你颇为相似，一个人的死亡或灾难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噢！我是在逆流而行。”他补充道，“现在年轻人的心肠比我们过去要硬得多，甚至连廉耻心也荡然无存了，而我倒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反过来不正可以说明您变得比以前更加实在了吗？”

“我没有把握：什么地方实在？”罗贝尔问道。

毫无疑问，他比以前更加脆弱易击了。幸亏集会见了成效，每天都有人来登记入会。共产党人最后也没有向革命解放联合会宣战，他们言谈之中虽然带着恶意，但掌握一定分寸，并不过火。整个运动可望真正得到发展。唯有一点不利，就是《希望报》因此而失去了许多读者，不久将被迫使用特拉利奥的资金。

“您肯定他准会出钱？”我问道，一边在镜中很不满意地端详着自己。

“当然肯定。”罗贝尔回答道。

“那您为什么要去赴这次晚宴？为什么还要拖着我去？”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他保持兴头的好。”罗贝尔说道，一边遗憾地在系着领带。“对一个准备从他身上挖出八百万的家伙，怎么也得吹吹他的癖好。”

“八百万！”

“对！”罗贝尔说，“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吕克的过错。多固执！可他们将不得不拿特拉利奥的钱。萨玛泽尔亲自去调查了一番，认为他们无论如何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那我从命。”我说，“为了《希望报》，去城里吃顿晚饭，值得！”

我们笑盈盈地步入宽畅的书房兼沙龙，萨玛泽尔夫妇已经先到了。萨玛泽尔身着淡灰色法兰绒套装，更显得肥胖。特拉利奥也满脸堆笑，他的妻子不在场，只见一位姑娘身材颀长，头发黯无光泽，令我想起了中学时代那些虔诚的女同学。在黑白方格地面的餐厅，为我

们摆了一席丰盛美味的佳肴。饭后用咖啡时，特拉利奥只招待饮料，没有敬雪茄烟。萨玛泽尔肯定更喜欢来支雪茄，他一边品味着陈酿白兰地，一边谈笑风生，倒也没有在一旁私下盘算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踏进真正的资本家的门槛了，这样做，我觉得是种慰藉。有时，我在心里想，我认识的知识分子全都有点靠不住的地方，可一与资本家打交道，马上发现他们更没有值得我们羡慕的东西。纳迪娜确实古怪，我任她随心所欲地生活也非同寻常。可面前这位已经憔悴的少女，给客人上咖啡时那副备受压迫的神态在我看来要更为可怕得多。我敢肯定，若我将她安顿在我的长沙发上，她准有许多伤心事儿要向我诉说。好一个特拉利奥！尽管他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可我觉得他心术不正。他那难以遮掩的自负与他表面上对萨玛泽尔热情过头的赞美极不协调。他们俩共同回忆起抵抗运动的往事，大谈特谈了一阵之后，转而对集会成功表示祝贺。萨玛泽尔说道：“好兆头，我们正在向外省发展。一年之内我们就可拥有二十万会员，要不我们就会失败。”

“我们失败不了！”特拉里奥说道。他转身朝向罗贝尔，罗贝尔至此一直保持沉默，他平常可不是这副样子。“我们这个运动的大好机遇在于它创建得正是时机。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明白共产党人背叛了他们真正的利益。许多头脑清醒的资产者也和我们一样看清了消灭资产阶级是大势所趋，如今已经非接受不可了。”

“可这也难免我们一年后还是拥有不了二十万会员，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保证不失败。”罗贝尔快快不乐地说，“我们自己骗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只满足于一点点成绩，那就难以取得巨大的胜利。”特拉利奥说，“但是我们处处限制自己的雄心壮志，也绝对没有任何好处。”

“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限制自己的努力。”罗贝尔说。

“啊！请允许我向您进一言，我们远远没有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特拉利奥不容置疑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领导机构目标定得如此之低，《希望报》的印数如此微不足道，真让人遗憾。”

“印数低是因为《希望报》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缘故。”我说。

特拉利奥一副不满的神态瞪了我一眼，我心想他要是妻子，若不让她开口，那她决没有权利多说话。“不，”他近乎粗鲁地说，“是因为缺少干劲。”

“事实是在这之前，《希望报》拥有很多的读者。”罗贝尔生硬地说。

萨玛泽尔平心静气地说：“刚解放，大家都有一股子热情，《希望报》当时就借了这个光。”

“必须正视事实。”特拉利奥说，“我们大家都相当钦佩佩隆，所以都有权利直言不讳地谈谈对他的看法。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可没有政治头脑，也不善经营，吕克在他身边也无济于事。”

我心里清楚罗贝尔对这种看法并没有多大分歧，可他摇摇头说：“佩隆与革命解放联合会携手共进，因此而失去了右派和共产党读者。他目前财力很有限，难以扭转情况。”

“我绝对肯定，如果由萨玛泽尔这样的人来领导《希望报》，那要不了几星期，印数就会成倍增加。”特拉利奥一板一眼地说。

罗贝尔扫了萨玛泽尔一眼，只说了一句：“不行！”

特拉利奥沉默了片刻，继续说道：

“如果我建议佩隆让我为萨玛泽尔买下报纸，多加点钱，怎么样？”

罗贝尔耸肩膀：“那就试试看。”

“您认为他不会同意？”

“您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

“好。如果我只要求买下吕克的那一股呢？或者只买下他们俩的三分之一？”

“那是他们的报纸，您要明白。”罗贝尔说，“这报纸是他们一手创办起来的，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当家做主的。”

“遗憾。”特拉利奥说。

“也许。可谁也无能为力。”

特拉利奥在沙龙里踱了几步：“我可不是一个安于天命的人。”他以打趣的声音说道，“若有人告诉我这事办不成，我马上憋不住要证明能办成。我补充一句，在我看来：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利益比个人的情感要重要得多，哪怕那是最令人崇敬的情感。”他严肃地说道。

萨玛泽尔神色不安地说：“您想一想前天订的计划，我对您已经有言在先，鄙人难以苟同。”

“可我也曾对您明言相告，我欣赏您的认真。”特拉利奥微微一笑说道。他带有几分挑衅的神态看了看罗贝尔：“我偿还《希望报》的所有债务，迫使佩隆做出抉择：要么与萨玛泽尔合作，要么就逼他关门。”

“佩隆宁肯关门也不会向讹诈让步。”罗贝尔以蔑视的口吻说道。

“那么，他就关门吧。我再办一家报纸，由萨玛泽尔领导。”

“不行！”萨玛泽尔咕噜了一声。

“您完全明白革命解放联合会与您要办的那种报纸毫不相干，采取这一种手段只能导致您立即被开除出去。”

特拉利奥打量了罗贝尔一番，仿佛想看看对方抵抗的堡垒是否坚固。看来他很快被镇住了，因为他急忙往后退缩：

“我可从未想过要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他笑呵呵地说，“我只想以此来吓唬吓唬佩隆。不管怎么说，这份报纸的成败可是您的一块心病。”他责怪地补充道，“增加一倍印数，就等于您增加了一倍人马。”

“我知道。”罗贝尔说，“可我再跟您重复一遍，依我之见，佩隆和吕克的唯一过错是财力那么有限，却仍然固执地勉强维持。一旦哪一天您慷慨解囊，他们得到您的资金，那您就会看到情况将大不一样。”

“当然。”特拉利奥微笑着说，“因为在得到资金的同时，他们将被迫接受萨玛泽尔。”

罗贝尔面孔一沉：“对不起！您四月份曾亲口对我说过，您准备无条件支持《希望报》。”

我用眼角观察着萨玛泽尔，他毫不显得尴尬，他的妻子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可她从来就是这种可怜相。

“我没有说过这话。”特拉利奥说，“我只是说在政治上报纸的领导显然属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负责人，我决不会插手。根本就没有涉及别的事情。”

“那是因为别的事情当时似乎与此无关。”罗贝尔声音不快地说，“我已答应佩隆保持完全独立，正是鉴于这一许诺的可信性，他才冒了巨大的风险将《希望报》交给革命解放联合会。”

“就当作我没有要受您的许诺的约束吧。”特拉利奥和和气气地说。“另外，我也不明白佩隆为何会拒绝这种结合，萨玛泽尔是他的朋友呀！”

“问题不在这里。倘若他想我们在他背后密谋，强迫他接受，那他一定很固执，决不会答应的。我十分理解他。”罗贝尔口气激烈地说。

他显得十分恼怒，我也满脸不悦，尤其是因为我深知亨利对萨玛泽尔的真实情感。

“我也一样固执。”特拉利奥说。

“若违背佩隆的意愿，让萨玛泽尔进入《希望报》，那萨玛泽尔的处境就会十分不妙。”罗贝尔说。

“我也这么认为！”萨玛泽尔说道，“当然，我认为，若在其他情况下，我完全有可能一显身手，使正陷于困境的《希望报》重新得到发展。可我决不答应把我强加给佩隆，违背他的意愿。”

“请您原谅我把这视作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大事。”特拉利奥以揶揄的口吻说道，“我并不试图发什么大财，可我也绝对拒绝白白扔掉几百万，我要求能有所成果。如佩隆拒绝与您合作，”他对萨玛泽尔说，“或您拒绝与佩隆合作，我就算了。若我认为事情必败无疑，我决不贸然投入。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切都难以让我改变这种观点。”他冷冷地说。

“既然您还没有跟佩隆谈过，我觉得这样争论毫无益处。”萨玛泽尔说，“我坚信他会合作的。说到底，我们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运动的成功。”

“对，佩隆一定会明白做出某些让步是妥当的，特别是如果您坚持让他明白这一点的话。”特拉利奥对罗贝尔说。

罗贝尔耸耸肩膀：“别指望我。”

双方的讨论又拖延了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后，当我们下了楼梯口后，我说道：

“这事情感觉太糟糕了！四月份时，特拉利奥到底跟您说了些什么？”

“当时只谈了报纸政治方面的问题。”罗贝尔说。

“您对亨利是否承诺太多了？您是否有点过分了？”

“也许是。”罗贝尔答道，“当时哪怕我有半点犹豫，就无法让亨利做出决定。有时候不得不过分一点，不然就什么都干不成。”

“那您刚才为什么不迫使特拉利奥做出决定？”我问道，“他要么无条件遵守诺言，要么他翻脸，您就把他开除出革命解放联合会。”

“那又怎么样？”罗贝尔说，“如果他决定翻脸呢？等到亨利急需用钱的那一天，他该怎么办？”我们继续默默地行走。罗贝尔突然开口说道：“若亨利因为我而失去了这份报纸，那我决不会饶恕自己。”

解放胜利之夜亨利的笑容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问他：“您就不想投入行动吗？”他回答说：“不那么狂热。”他为投入行动而付出了代价，把《希望报》交给了革命解放联合会领导。他热爱这份报纸，热爱自由，不喜欢萨玛泽尔。落到他头上的这一切真够丑恶的。可是，罗贝尔显得忧心忡忡，我只能把这些想法藏在自己心底，嘴上只是说：“我不明白您为何信任特拉利奥，我对他可没有丝毫信任感。”

“我错了！”罗贝尔只说道。他思索了片刻，“我去向莫瓦纳要钱。”

“莫瓦纳不会给的。”我说。

“那我就再向人要。有钱的人多着呢，终能找到愿意给的吧。”



“我觉得谁如果要给钱，那必须既是亿万富翁又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我说，“这两者差不多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我设法去找。”罗贝尔说，“与此同时，我通过萨玛泽尔向特拉利奥施加影响。萨玛泽尔决不会同意把自己强加于人的。”

“好像他对此并不那么不好意思。”我说，继又一耸肩膀，“总要去试试吧。”

第二天罗贝尔见了莫瓦纳。莫瓦纳抱有兴趣，但显然没有承诺。罗贝尔又找了另一些人，可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丝兴趣。我十分不安，心里总挂念着此事，可我没有跟罗贝尔谈起。就我来说，我总避免像别的女人那样，说是给丈夫分忧解愁，实际上反倒使他忧上加忧。“罗贝尔不该做出这种事。”我心里老这么想。于是便下了这样的结论：“若在过去，他决不会这样干的。”这想法真古怪，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常说 he 担负的责任对他来说比过去更加有限，但也更加沉重了，因为他再也无法将前途用作托词。这样一来，他便更加急于求成，因此致使他变得不如以前那样一丝不苟。这念头我实在不喜欢。像我这样就生活在罗贝尔身边，而且如此贴近，若去评判他，那无异于背叛他。

几天后，纳迪娜和朗贝尔回来了。对我来说，他们这次归来倒是件好事，可让我暂时安下心。他们俩皮肤晒得黑黑的，显得既开心又拘谨，好似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

“纳迪娜完全可以当一名一流的记者。”朗贝尔说，“她畅通无阻，并善于引导别人说话，在这些方面，她真棒极了！”

“这职业有时确实有趣。”纳迪娜神气活现地退让说。

可是，她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她在旅行期间在距巴黎城三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座乡村别墅。几星期以来，我一直梦想找到这样一座别墅，可惜没有着落。我很快喜欢上了那开着蓝色百叶窗的黄色门面，杂草丛生的草坪，小巧玲珑的屋子和四处盛开的野玫瑰。罗贝尔也被迷住了，我们签了约。屋内破败不堪，户外的小径荨麻蔓延，纳迪娜声明修复工作全由她承担。她突然对自己秘书的岗位失去了兴趣，让替代她秘书工作的人再继续干一段时间，自己和朗贝尔住进了这座乡村小屋：两人一起写书，同时拾掇院子，粉刷墙壁。朗贝尔黑黑的皮肤，双手终日不离摩托车把，已经疲乏无力，加之那头经常被纳迪娜搞得乱蓬蓬的头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副十足的花花公子派头了，但也没有一点干体力活儿的模样。不过，我也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信任。

纳迪娜时不时回巴黎看看，可直到我们出发去奥弗涅的前夕才答应让我们去圣马丁。她在电话里故作庄重地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饭。

“告诉爸爸有蛋黄酱吃，这是朗贝尔的拿手菜。”

可是，罗贝尔却谢绝了邀请。“朗贝尔一见我的面，不攻击我心里就不安宁。我也只得反击，叫人烦透了，首先我就受不了。”他遗憾地说。

事实的确如此，只要罗贝尔在场，朗贝尔就显得咄咄逼人。面对罗贝尔而认为没有必要装出另一番姿态的人确实也寥寥无几。“实际上，他是多么孤单啊！”我心里想。人们与之对话的绝不是真实的他，而是一位死板、冷漠的大人物，这位人物除了显赫的名声之外，与真正的他别无共同之处。想当年，他是多么喜欢默默无闻地与众人并肩行进，然而，这显赫的名声不可避免地在他和众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屏

障。人们无情地使他感觉到了这里障碍的存在。至于对罗贝尔这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对他的喜怒哀乐，对他的彻夜难眠，谁也不注意。离家去乘车时，我还是坚持让他陪我一道去。

“我告诉你，我要去的话，晚上肯定不欢而散。”他说，“不过，得明白我对朗贝尔并不反感。”

“对纳迪娜，他可是有功劳的。”我说，“她平生第一次同意与他人合作。”

罗贝尔微微一笑：“她过去是那么蔑视文学，如今看到书上印了自己的大名又多么自豪！”

“这就好！”我说，“这鼓励她继续努力。这种工作对她正合适。”

罗贝尔把手搭在我的肩头：“现在对你女儿的命运有点放心了？”

“是的。”

“那你还等什么，还不给罗米欧写信？”罗贝尔热烈地说，“你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犹豫了。”

“从现在起到一月份，还可能发生不测。”我连忙说。

罗米欧接二连三来信让我回话，可我总是担心，害怕做出彻底的答复。

“听我说，你自己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你，纳迪娜混得也很好。”罗贝尔说，“再说，你也经常这么对我讲，教会她脱离我们生活，再也没有比这于她更有益的了。”

“确实。”我毫不冲动地说。

罗贝尔困惑地打量了我一番：“你到底想不想去做这次旅行？”

“当然想！”我说。可我又惊恐不安地说：“我不想离开巴黎。我不想离开您。”

“你多傻，我可爱的小傻瓜。”他含情脉脉地说，“你离开时我是这个样，回来时我还是这个样，不会变的。你不是还跟我说过你并不想我嘛。”他笑哈哈地补充道。

“那是过去。”我说，“可现在，您揽了那么多麻烦事，我不放心。”

罗贝尔神色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你不放心的事太多了，昨天对纳迪娜，今天又对我。是否成了怪癖了？”

“也许是。”我答道。

“肯定是。你也一样，无事自扰，神经不正常。你过去可不是这副样子。”

罗贝尔脸上挂着温柔的微笑，我以为自己不在家可能给他造成痛苦，可他却觉得这种想法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他完全可以一连几个月用不着我在他身边，最起码三个月。他的名声、年岁和别人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孤寂的境地，我无法跟他分担这份孤寂，更没有能耐消除这份孤寂：它并不会因为我分担或不分担而有所减轻或加重。

“你那些顾虑全都给我抛掉吧！”罗贝尔说，“赶快写信回答，不然这次旅行的机会就要在你鼻子底下白白溜掉了。”

“要是一切都很好的话，我从圣马丁回来就写。”我说。

“即使不好也写。”罗贝尔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说道。

“到时看吧，”我又犹豫起来，“您跟莫瓦纳谈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他外出度假了，他十月份给我最后答复。可钱嘛，他差不多已经答应我了。”罗贝尔微微一笑，“他也一样，很想留在左派队伍中。”

“他真的答应了？”

“对。莫瓦纳只要答应，会算数的。”

“这就减了我的一件心事！”我说。

莫瓦纳不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我心里真的感到踏实了。我问道：“您就不打算跟亨利谈谈？”

“谈了又有何用？他会有什么法子？是我让他走入了困境，该由我来帮他摆脱。”罗贝尔耸耸肩膀，“再说，有可能惹他发火，他会什么都不顾的。不，等我有了钱再跟他谈。”

“好。”我说道，站起了身子。

罗贝尔也跟着起身，对我微微一笑：“别不放心，去过一个美妙的夜晚吧。”

“我尽量努力。”

罗贝尔肯定有理，这种无依无傍的忧虑感打一解放便产生了。我与许许多多的人一样，难以适应新的生活。圣马丁的夜晚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新的东西。我犹豫不决，迟迟没有答复罗米欧，并不是因为纳迪娜和罗贝尔的缘故。我内心的这份焦虑只与我自身有关。在乘公共汽车去圣马丁的路上，我自问最终能否消除这种不安的心情。我推开了院子的栅栏门。餐桌早已摆在楸树下，屋内传出来阵阵话声。我径直走进厨房。纳迪娜站在朗贝尔身旁，朗贝尔脖间围着一块餐巾，正疯一般地搅拌一种稀稀的调味汁。

“你来得不巧！”她幸灾乐祸地对我说，“蛋黄酱没有做成功！”

“您好。”朗贝尔神态阴郁地说，“对，这次蛋黄酱没做成功，可我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跟你说过这次也许会成功的，继续做吧。”纳迪娜说。

“不，这次又完蛋了！”

“你搅得太狠了。”

“我告诉你已经完蛋了。”朗贝尔怒气冲冲地重复道。

“啊！我来教您到底该怎样重做蛋黄酱。”我说。

我说着把做坏了的蛋黄酱扔进垃圾桶，又递给他两个鸡蛋：“您自己做去吧。”

纳迪娜嫣然一笑：“你有时主意就是不错。”她以不偏不倚的口吻说道，接着一挽我的胳膊，问道：“爸爸怎么样？”

“噢！他多么需要休假！”

“等你们在国内转一大圈回来，这房子就修好了。到时你来看看，我们干得有多棒！”纳迪娜说。

将来准备用作起居室的房间里拥挤不堪，放着踏梯和油漆桶，仍然一副工地似的凄惨样。可我卧室的四壁已经涂上了一层暗红色，罗贝尔的房间也刷上了淡淡的赭石色，布置得十分得体。

“真妙。是谁布置的？他还是你？”

“我们俩。我是下令的，他管执行。他憋着一股子劲，可他十分听使唤。”她神采飞扬地说。

我笑了，“你这就省劲多了。”

纳迪娜需要指挥别人以获得自信：一旦用心思去让别人听她使唤，她便不再给自己打问号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她这般兴高采烈了。扮演女当家的角色，这给她带来了莫大乐趣。在色拉和冷盘中间，朗贝尔放了一大碗油腻发硬的蛋黄酱。我们俩当着纳迪娜的面一口气把一瓶白葡萄酒喝了个精光。他俩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起了他们的

计划：先去比利时、荷兰、丹麦等所有被占领过的国家，然后再去欧洲其他国家。

“别提我还曾决定放弃通讯报道工作了。”朗贝尔说道，“没有纳迪娜，我确实早就放弃了。她比我要富有才华，要不了多久，她就只需要我当她的陪同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你才不让我驾驶你那辆破摩托车吧。”她抱怨道，“开车又不难！”

“折了脖子也不难，疯丫头。”

他从心底对她深情地一笑。在他看来，她具有我绝对没有发现的另一番魅力。我从来只是从一个方面去认识她：她是我的女儿。对我来说，她平平常常，并无特别的魅力。朗贝尔又打开了一瓶白葡萄酒。他根本就不会饮酒，两只眼睛已经闪闪的，颧颊通红，额头上渗出些许汗珠。

“别喝过量。”纳迪娜说。

“啊！别扮演女当家的角色了。你知道一旦你玩女当家的把戏就会出什么事吗？”

纳迪娜脸色一沉：“别说蠢话。”

朗贝尔脱掉了外衣：“我太热了。”

“你会生病的。”

“我从不会生病。”他朝我转过身子，“纳迪娜就不愿相信：我长得并不壮实，可我很有抵抗力。在有的方面，我肯定比儒安维尔的教练还更有毅力。”

“等骑摩托车穿越撒哈拉沙漠时再瞧吧！”纳迪娜乐呵呵地说。

“准能穿过去！”朗贝尔说，“摩托车到处都能过！”他看了看我，“您认为这不行吗？”

“我说不准。”我说。

“不管怎样，试试吧。”他坚决地说，“必须尝试着去干事情！不能因为是知识分子就有理由养尊处优。”

“答应你了。”纳迪娜笑着说，“咱们一定能穿过撒哈拉，越过西藏高原，然后再去亚马孙河畔的丛林探险。”她一把挡住了朗贝尔伸向酒瓶的手，“不行，你喝得已经太多了。”

“一点儿不多。”他站了起来，走了两步，“我跌跌撞撞了吗？稳得很呢。”

“那就等着瞧你耍把戏吧。”纳迪娜说。

“耍把戏是我的特长之一。”朗贝尔说。他抓起三只橘子，向空中抛去，有一只没接着，自己却整个儿跌趴在草坪上。纳迪娜咯咯大笑起来：

“多蠢的家伙！”她含情脉脉地说，她撩起围裙的一角，擦着朗贝尔汗水淋漓的额头，朗贝尔乖乖地任她擦拭，一副幸福的神情。“他真的富有社交的才华。”她说，“他唱的一些歌真滑稽！你想让他给你唱一支吗？”

“我给您唱首《猪猡的心》吧。”朗贝尔干脆脆地说。

他唱着歌，纳迪娜连泪水都笑了出来。可是，我却发现在朗贝尔的欢快之中隐含着一种近乎悲怆的痛楚，仿佛也想借助这笨拙的跳跃摆脱这份痛苦，可它却紧紧地依附着他。他装扮着鬼脸，发出小丑似的声音，双颊流淌着汗水，双眼射出焦灼不定的光，叫我看了心里好



不难过。当他最后跪倒在纳迪娜脚下，纳迪娜一副占有者的神态，幸福地抚摸他的脑袋的时候，我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你是个好小伙子。”她说，“现在安静安静，休息一下！”

她喜欢扮演护士的角色，他也乐于让她爱抚。他们俩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有着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年轻时代，他们都憎恨空想与废话，幻想冒险，雄心勃勃，虽然这勃勃雄心还变化不定。他们也许能够相互给予信任，共同创造事业，取得成就，获得幸福。一个年方十九，一个才二十五岁：前程才刚刚展现！他们不是苟延残喘的幸存者。“可我呢？”我思虑着，“难道我真的已经被活活地埋葬在过去了吗？没有！”我激动地回答，“没有！”纳迪娜、罗贝尔完全可以没有我而生活，他们只不过是我的一些托词而已，而我只是我本身怯懦的牺牲品，突然，我为之感到羞辱。眼前映出一架将我带走的飞机，一座巨大的城市，整整三个月间，我唯一的任务将只是学习、玩乐：多么自由，多么新鲜啊！这正是我希冀得到的一切！我已经在爱神木下构筑了自己的安乐窝，却到活人的世界中四处游荡，这无疑是疯狂的不慎：管它去呢！我不再去抵挡这份从心头升腾而起的欢乐。对，今天晚上我就答应去。不管怎么说，幸存，就意味着不断地重新开始生活。我希望自己还能获得再生。

---

[1] Rio，即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2] Maria Malibran（1808—1836），西班牙裔法国女低音歌唱家。

[3] Cassandre，特洛伊公主，预言家。

## 第五章

亨利又在床上翻了个身。风呼呼地吹，透过碎石砌成的墙壁。他身上尽管穿着羊毛套衫，还盖着毯子，可还是冷得难以入睡。唯有他的脑袋发热，嗡嗡作响，仿佛发了高烧。他也许是发热了。这是因为疲惫，由于阳光和红葡萄酒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舒坦的热。他到底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他正置身于一个任何人都不该处的地方：这地方是多么闲适。他并不感到遗憾，也不追究自己。这份无眠如同没有噩梦缠扰的酣睡一般宁静。他放弃了许多事情，不再写作，而且也不每日游玩，但以此为代价获得的，是自我存在的意识，而这已是巨大的收获。他远离尘寰，避开风寒，摆脱了缠身的难题，脱离了疲乏的躯体，在一种纯洁的氛围中逍遥。纯洁，这可以像快感一样令人心醉。他抬了一下眼帘，瞥见了昏暗的桌子，烛光，还有那个正埋头笔耕的人，他心满意足地想：“原来我处在中世纪！”然而，黑夜重又锁住了这一欢乐的光芒。

“我没有做梦吧？我明明看见您昨天夜里在写作？”

“我是工作了一会儿。”迪布勒伊回答道。

“我把您当作了浮士德博士。”

他们裹着毯子，坐在这间高山小屋的门槛上，风吹打着他们身上的毯子。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太阳悄悄地升起来了，天空蔚蓝，在他们的脚下展开了一条云彩铺就的大道。有时，风将云道撕裂，隐约可见一小片平原。

“他每天都工作。”安娜说，“至于工作环境，他不计较，可以在牲畜棚，在雨下，也可以在广场；可写作时间，每天无论如何需要四个小时。其余时间，他做他想做的事情。”

“咱们现在想做点什么？”迪布勒伊问。

“我觉得往山下走走不错，可以看到更妙的全景。”

他们在欧石南丛中穿行，往山下走去，一直来到了黑人村寨。寨子里，一些老妪已经早早地坐在门前，双手挥动着纺锤，膝上架着垫子，垫子上插满了针。他们在一家食品百货铺兼小酒店喝了一种黑乎乎的饮料，接着骑上了寄存在这家店铺里的自行车。这些老爷车饱经战争的风雨，样子着实难看：油漆呈鳞片状剥落，护车板伤痕累累，轮胎鼓着奇形怪状的大包。亨利的那一辆更是难骑，他惴惴不安，怀疑能否坚持骑到晚上。迪布勒伊夫妇终于在一条小溪边停车歇脚，亨利见了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条小溪可能就是卢瓦尔河。河水冰冷，不可能下河沐浴，他从头到脚洒了些河水，然后继续上车赶路。上车时，他发现不管怎样，这车轮还是转动的，实际上，最不灵活的是他的身体。要恢复身体的状态，着实要花一番气力，不过，尽管折腾得腰酸背痛，但亨利为重新获得了一件如此方便的工具感到十分幸福。他早已忘记了人身体的用途竟会如此之大。车链和车轮固然使车子力量倍增，可驱使车子前进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力量、勇气与生命。车子令人满意地跑着它该跑的路程，眼下正勇敢地向山口攀登。

“好像被拽住似的。”安娜说道。她裸露着双臂，皮肤晒得黑黑的，秀发迎风飘动，显得比在巴黎时年轻多了。迪布勒伊人变黑了。也瘦了。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双腿肌肉结结实实，晒得黝黑的脸膛刻着条条皱纹，看去俨然一个甘地的门徒。

“比昨天要好多了！”亨利说。

迪布勒伊放慢车速，在亨利身边骑着。

“应该说昨天并没有怎么用劲。”他开心地说，“您还什么都没有跟我谈呢。自我们走后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天气炎热。”亨利说，“上帝！天太热了！”

“那报纸呢？您一直没有见特拉利奥？”

迪布勒伊的话声中充满了某种好奇，这种好奇心显得如此迫不及待，像是一种焦虑。

“没有。吕克认为只要再坚持两三个月，就可以自己摆脱困境。”

“值得试试。只是不要负更多的债。”

“我知道，我们没有再借钱。吕克打算多搞点广告。”

“我承认当初并没有考虑到《希望报》的订数会下降得这么厉害。”迪布勒伊说。

“噢！您完全清楚，”亨利微笑着说，“即使最终不得不接受特拉利奥的资金，我也不会难过的。为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胜利，这一代价并不太大。”

“事实上，若它取得了胜利，那是全亏了您。”迪布勒伊说。

他的话声比他的话本身还更有保留。他对革命解放联合会并不满意，这是因为他抱负太大了。谁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建立起一个像前社会党那样强大的运动。与他相反，亨利大喜过望，对集会的成功感到格外的高兴。一次集会并不说明什么大的问题，可那朝他抬起的五千张面孔他决不会很快忘怀。他朝安娜微微一笑：

“自行车自有它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比小汽车还更妙。”

车子骑得不像开始那样快了。野草、欧石南、冷杉馨香四溢，山风温柔清凉，沁人心脾。周围的风光远远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背景。他们以自己强大的力量，征服了一片又一片风光。无论在上坡的疲惫中，还是在下坡的欢乐中，他们无不与起伏不平、气象万千的山色融为一体，与其共同存在，息息相通，而不只是将它作为风景加以欣赏。在第一天，亨利便满意地发现了一点，这就是这种生活足以使你感到充实。脑子里是多么静谧啊！高山、牧场和森林取代了他的大脑而存在。他不禁暗暗赞叹：“与睡眠不同的宁静是多么珍奇啊！”

“你们这地方选得很好。”晚上，他对安娜说，“真是个美妙的地方。”

“明天也肯定一样，准不错。您愿意从地图上看看明天的行程吗？”

在下榻的小客栈里，他们一起用晚餐，喝着一种气味呛人的白酒。迪布勒伊在一张铺着油漆布的桌子一角摊开了地图。

“指给我瞧瞧。”亨利说道。他目不转睛地乖乖顺着铅笔头，看着那红的、黄的和白的线条。

“这许许多多小路，您怎么能选准呢？”

“这才叫有趣嘛。”

第二天亨利心里想，真正有趣的是亲眼看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与原来的计划是多么吻合，丝毫不差。每一个转弯，每一道山坡，每一道下坡，以及每一座山冈无不处在预定的位置上。多么让人放心啊！仿佛感到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然而，那一个个标记变成了一条条真

正的路，一座座真正的房屋，这种变化会给你带来任何创造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如这帘瀑布，虽然在地图上已经打上了一个蓝色的标记，但当你在这弯弯曲曲的峡谷深处猛然发现那水花飞溅的大瀑布时，仍会不胜惊讶。

“观赏是多么令人满足啊。”亨利说。

“对，只是永远都看不够。”迪布勒伊遗憾地说，“这匆匆一瞥，既给予你一切，又不给予你任何东西。”

他并不是什么都看，可一旦他对某件东西着了迷，那可真叫没完没了。亨利和安娜无奈，只得跟在他的身后，爬过一处又一处悬崖，来到飞泻的瀑布边。他赤脚走进翻腾的小潭中，直到运动裤的下部被水淹没。等他回到深潭边的平地上坐定，他以权威的口吻说：

“这是我们见到的最美丽的瀑布。”

“您总是偏爱眼前的东西。”安娜笑着说。

“整条瀑布呈黑白色，”迪布勒伊说，“这才叫美。我寻找别的颜色，结果没有见到一丝色彩的痕迹。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黑与白原来是一回事。您应该走到水中去，一直走到那块巨石边。”他对亨利说，“这样，白中的黑与黑中的白，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相信您的话。”亨利说。

一到了迪布勒伊的嘴里，河畔的一次漫步可以说成北极的一次探险，亨利和安娜常常报之以大笑，因为他对看见与发现这两者根本不加以区别，仿佛在他之前，谁也没有亲眼欣赏过瀑布，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水，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假如亨利一个人，那他肯定观察不到这水雾与飞沫嬉戏的万千景象，这变幻无穷、时隐时现的千姿百态，这数不胜数的细小旋涡。迪布勒伊细细地察看着这一切，仿佛想了解

每一滴水的命运。“谁对他都可能生气，”亨利深切地看着他想，“却不能没有他。”在他的身边，世间的一切都变得举足轻重，仿佛存在着巨大的生活乐趣，于是大家都加倍地生活。经他一变，这次漫游法国乡村竟成了一次探险游历。

“您会叫读者们吃惊的。”亨利微笑着对迪布勒伊说，迪布勒伊正一副入迷的神态，静观落日的最后几抹色彩。

“为什么？”迪布勒伊以愤愤不平的声音问道。每当谈论起他，他往往拿出这副口气。

“读了您的书，谁都以为您感兴趣的只是人，而大自然则微不足道。”

“人不是在大自然中生活吗？”

对迪布勒伊来说，一片风光，一块石子，一抹色彩，都是人的某种真实存在。任何事物都无法通过回忆、梦幻，通过投其所好或通过这些事物在他心中唤醒的激情打动他的心，唯一能使他动情的，是他在其中捕捉到的真实意义。不用说，较之于光秃秃的牧场，他更乐意在刈割牧草的农夫面前驻足。当他穿过一个村庄，他的好奇心变得更难以满足。他什么都想了解个一清二楚，诸如村民们吃什么，怎样参加投票，乃至他们劳作的具体细节和内心想法的具体色彩等等。为了能到农庄走一走，他不惜编造各种借口：买鸡蛋，要杯水喝，而且一旦有可能，他便进行长谈。

第五天的傍晚，安娜在一次下坡时车胎爆了。徒步行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看见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面住着三位年纪轻轻却掉牙缺齿的妇人。她们每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有的胖一点儿，有



的瘦一点儿，但都很脏。院子里到处是粪便。迪布勒伊坐在院子中间修车内胎，他一边用橡胶补胎，一边贪婪地环顾四周：

“就三个女人，没有一个男的，真怪，是不是？”

“男人都在地里。”安娜说。

“这时还在地里？”他把锈色的内胎浸入水盆，水面上立即泛起一个个水泡。“还有一个洞！你说，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同意让我们在谷仓里睡一夜？”

“我去问问他们。”

安娜消失在房子里，不过几乎立刻就出来了：“咱们要在牧草堆睡觉，她们很惊奇，可她们并不反对。只是她们坚持非要先喝点儿热的东西不可。”

“我很乐意在这儿借宿！”亨利说，“本想离一切都远远的，果真如愿以偿。”

借着一盏冒着黑烟的油灯的光亮，他们喝着大麦茶，一起试着闲谈起来。这三个妇女是妯娌，那三兄弟共同租种了这块贫瘠的土地。十天前，他们一起到下阿尔代什打短工，采熏衣草去了，撇下她们度日如年，终日一声不哼地喂牲畜、看孩子。她们还勉强知道微笑，可怎么说话几乎全忘了。对这个世界，她们就知道：这边的农庄里，长着栗树，夜间清冷；下阿尔代什那边长着熏衣草，要挣几个法郎，就得流血流汗。对，他们远离了一切。离得是那么遥远，以至当亨利一钻入牧草堆，顷刻间便被储存在干草中的阳光和各种气味所包围，头脑发昏，梦见道路与城市全都不复存在，从此不可能返回巴黎。

一条小道在栗树林间蜿蜒，弯弯曲曲地向平原方向延伸。他们兴高采烈地进了一座小城，城内的梧桐树已经预示着南方炎热的天气就

要到来，滚球游戏又要兴起。安娜和亨利坐在一家最大的咖啡店的露天座上，露天座空空荡荡。迪布勒伊一个人去买报纸，他们俩要了点儿面包片。他们看见迪布勒伊和报贩交谈了几句，然后慢悠悠地穿过广场，边走边读着报纸。回到露天座，他顺手把报纸往独脚小圆桌上放，亨利一眼看清了头版醒目的大标题：美国人在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他们默默无言地读完了文章，安娜声音惊恐不安地说：

“这十万个死难者，到底是为了什么？”

日本显然就要投降，大战就要结束，《小塞文山人报》和《阿尔代什回声报》欢欣鼓舞，可他们三人唯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恐惧。

“他们难道就不能先威胁、恫吓一番？”安娜说，“比如在偏僻的荒漠投放一次，我说不清楚……那颗炸弹，他们真的非投不可吗？”

“他们当然可以先设法给政府施加压力。”迪布勒伊说，继又一耸肩膀，“对德国城市、对白人，我怀疑他们还敢不敢放！只对着黄种人！他们憎恨黄种人！”

“整个一座城市化为乌有，他们心里总该有点不安吧！”亨利说。

“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迪布勒伊说，“他们很高兴能让全世界看一看他们有多大能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施行他们的政策，任何人都不敢哼一哼。”

“可他们为此而杀了十万条性命！”安娜说。

他们呆呆地对着奶油咖啡，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恐怖的文字，一个个重复着这些毫无作用的话。

“我的上帝！要是德国人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多危险啊！”安娜说。

“美国人掌握了原子弹，我也并不高兴。”迪布勒伊说。

“报上说他们可以炸毁整个地球。”安娜说。

“据拉尔盖给我解释，”亨利说，“要是发生了不幸的意外，引发了原子弹，地球倒不会爆炸，只是造成大气膨胀：整个地球变成月球一般。”

“这并不让人开心多少。”安娜说。

不，这并不开心。只是当他们重新蹬车行进在一条阳光灿烂的道路上时，这一纠缠不清的恐怖难题便失却其一切意义。一座四十万人口的城市连同周围自然界的一切就这样化为乌有、销声匿迹了：这一切再也引不起任何回响。这一天依然如故、井然有序——天是蓝色的天，叶是绿色的叶，干渴的土地仍然焦黄一片——时光一分一秒地悄然流逝，凉爽清新的黎明迎来了噼啪声四起的正午，地球围着注定由它陪伴的太阳旋转，对它负载着的漫无目的的匆匆过客无动于衷：怎能相信这静如亘古的苍穹下，这些匆匆过客今日已经拥有能力，可将地球改变成古老的月亮？若在大自然中接连漫游数日，不难发现这大自然中带有几分疯狂。无论是云彩变幻无穷的壮观景象、高山静止不动的愤怒与抗争，还是昆虫不绝于耳的喧闹鸣唱，或是植物如疯似狂的迅猛繁殖，其中无不包含着过分的怪诞，但这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温和的狂热。万万想不到它一旦进入人的大脑，便会变成残杀人类的疯狂。

“您还有勇气写作！”他们一起坐在一条河畔，亨利见迪布勒伊从背袋中掏出了纸笔，惊叹道。

“这是个魔鬼。”安娜说，“即使在广岛的废墟中也照写不误。”

“他不就在广岛的废墟中写吗？”

“那怎么就不行？”迪布勒伊说，“反正总有什么地方会成废墟的。”

他握起钢笔，双目茫然地久久呆了一阵。在这新添的废墟之中写作也许并不那么轻松。他没有弯腰去写，突然说道：

“啊！要是他们不把我们逼上绝路，逼得我们当不成共产党！”

“他们是谁？”安娜问道。

“共产党人。你们知道，这原子弹，是种多么恐怖的威胁手段！我并不认为美国佬明天就会朝莫斯科扔一颗，可说到底，他们有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人忘记的。他们之间再也难以相互了解！当务之急，必须携起手来，不然，我们就无异于重蹈覆辙，重犯大战前的错误！”

“您说我们？”亨利说，“可首先制造不和的不是我们。”

“对，我们问心无愧。可以后呢？”迪布勒伊说，“这对我们毫无好处！若发生分裂，我们和共产党人都要自食苦果，我们甚至会更深受其害，因为共产党人势力更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亨利说。

“他们卑鄙，这我同意，可对我们来说，这无碍大局。然而，一旦他们把我们视为敌人，那我们就成为仇敌了。不用说，这是他们的过错。可不管错还是不错，我们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第一大政党的仇敌。这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那么，就不得不向他们的讹诈让步？”

“我从不认为凡宁死不屈的人都是精明的人。”迪布勒伊说，“不管是不是讹诈，我们必须维护团结。”

“他们挖空心思实现的所谓的团结，是解散革命解放联合会，让其全体成员加入共产党。”

“有可能落到这一步。”

“那您有可能加入共产党？”亨利惊奇地问道，“可您和共产党人之间隔着多少障碍啊！”

“噢！会设法消除的。”迪布勒伊说，“如有必要，我可以保持沉默。”

他拿起笔，开始写起字来。亨利从包里掏出书，凌乱地放在草地上。他放弃写作以来，读了许多书，这些书把他带往世界各地，尽情地神游。这些天，他发现了印度和中国：这并不是快活的事。每当他想到那千百万饥饿的人，许多事情便变得无聊和无意义。也许他对共产党的保留态度也毫无价值。他最责怪的一点，是把人当作物来看待。倘若对人们的自由、对人们的见解、对人们的善良意愿都不相信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关心他们的命运，结果也确实很糟。这种忧虑只有在法国、在欧洲才有意义，在这里，人们终归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准，至少有了一点儿自主，有了一点儿觉悟。对那些贫穷、迷信、愚昧的大众来说，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又有什么意义？必须给他们吃的，别无要求。美国人称霸，其结果就是东方各国食不果腹，永远遭受压迫。东方各国的唯一希望是苏联：摆脱饥饿、奴役和愚昧的人类的唯一希望是苏联。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帮助苏联。当千百万人不如牛马，挣扎在死亡线上，那人道主义便是一种讽刺，个人主义就是一种卑鄙的行径。人们还怎敢要求获得诸如思想自由、选择自由、言论自由这些高等权利？亨利拔了一截草，慢慢地咀嚼着。既然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如意生活，何不干脆放弃？消失在一个大党之

中，将自己的意志与巨大的集体意志融为一体，这该是多么安宁，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一旦开口，就以整个地球说话，前途便成了你个人的事业，为此而忍受许多事情，值得。亨利又拔了一截野草。“可尽管如此，我渐渐地又会难以忍受。”他心里想，“真不敢设想从此没有自己的思想，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要想做一个优秀的活动分子，必须要有烧炭党人的那份忠诚，可我没有。再说，眼下遇到的也不是这个问题。”他不快地自言自语道。诚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我加入又有何用？这是唯一的具体问题。显然，不会因此而给一个印度人带来一粒白米。”

迪布勒伊不再给自己打问号，他在专心地写作。他一如既往，每日笔耕。在这个领域，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他动摇。一天下午，他们正在艾瓜勒山脚的一个村寨吃午饭，突然，暴风雨骤起，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行车被掀翻，两只包被刮走，迪布勒伊的手稿吹落在湍急的泥水之中。当他好不容易抢回手稿，稿子上已涂了一层黄泥浆，上面的字全都沥成了一条条长长的黑道。他冷静地让人帮助晾干稿子，损坏得最惨的段落自己又重抄了一遍，那架势仿佛如有必要，他会泰然自若地不惜从头写起。毫无疑问，他如此执著自然有其道理。道理总是能找到的。有时，看着他的笔在纸上滑动，亨利不禁想起自己那只执笔的手，一股怀旧之情在心头油然而生。

“能不能拜读几页您的手稿？您到底写到哪儿了？”亨利问道。这天下午，他们在瓦朗斯一家咖啡店的阴凉处，坐着等肆虐的酷热慢慢败下阵去。

“我正在写有关文化观念的一章。”迪布勒伊说，“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决定以别人的名义

说话？换言之，一个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他们这种抉择是否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种类？人类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自身赋予的形象中认识自己？”

“您做出的结论是什么？”亨利问道，“是不是文学具有一定意义？”

“当然是。”

“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有理而写作！”亨利笑着说，“这真奇妙。”

迪布勒伊好奇地看了看他：“哎，那您最近哪一天是否又将重新开始写作？”

“噢！反正今天不。”亨利答道。

“今天或明天，又有什么区别？”

“呃，无疑明天也不会。”

“为什么？”迪布勒伊问道。

“您写散论，那还可以；可眼下作小说，得承认这让人泄气吧。”

“我并不承认！我从来就不明白您为何放弃写那部小说。”

“这是您的过错。”亨利微笑着说。

“怎么是我的错！”迪布勒伊气愤地朝安娜转过身子，“你听清楚了吧？”

“您鼓动我参加行动，行动使我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亨利朝招待打了个手势，那招待正倚着柜台昏昏欲睡。“我想再来一杯啤酒，你们要不要？”

“不要，我太热了。”安娜回答说。

迪布勒伊点了点头。“请您再解释一下。”他继续问道。

“对我内心的想法或感觉，别人会在乎吗？”亨利说，“我个人的一些琐事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而伟大的历史却又不是小说的主题。”

“可是，我们每天都有别人不感兴趣的小事。”迪布勒伊说道，“正因为如此，可从邻人的经历中重新发现自己。如果他善于讲述，他最终能使大家都感兴趣。”

“我开始动笔写时正是这么想的。”亨利说。他呷了一口啤酒。他没有心思多加解释。红色长椅那头，两个老头儿正在玩掷骰子跳棋游戏，亨利看了看他们。这咖啡厅里是多么宁静：又是一个假象！他打起精神继续往下说：“麻烦的是经历中有着个人的成分，那都是些失误，是些幻景。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再也没有诉说的欲望了。”

“我不明白您想说什么。”迪布勒伊说道。

亨利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假设您夜里在水边看见了灯火，那真美，可一旦您知道在那灯火照耀的城镇里人们被饿死，那灯光立刻就会失却其诗情画意，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景象而已。您会对我说，可以讲述别的东西，比如说说那些饿死的人。可是，我更喜欢在文章里或集会上说这些。”

“我可不会跟您说这些。”迪布勒伊有力地说，“那些灯光，它们为众人而闪烁。显然，首先该让人有饭吃。可是，若剥夺了你构成生活乐趣的各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有饭吃又有何用？我们为何要旅游？因为我们认为这风光并非虚假的景象。”

“就算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重新获得意义吧。”亨利说，“可眼下，更为重要的事情有多少啊！”

“这一切今天就有意义。”迪布勒伊说，“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那在我们的书中也应该举足轻重。”他突然气恼地补充道：“仿



佛左派就命中注定只能搞宣传文学似的，每一个字都得感化读者。”

“噢！我对这类文学并无兴趣。”亨利说。

“我知道，可您又不愿试试别的事情。要干的事情何其多！”迪布勒伊神态逼人地看了看亨利，“当然，要是对那些灯光赞叹不绝，忘记它们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个混账。可问题正在这里：要去寻找一种有别于右派美学家的方法，谈谈这些灯火，让人们既感觉到其中有美的一面，也有城镇灯光中贫穷的一面。左派文学正是应该以此为已任。”他声音激动地继续说道，“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事物，让它们置于各自应有的位置，但是我们切不要使世界贫困化。被您称之为幻景的个人经验，这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亨利并不自信地说。

迪布勒伊也许有理。莫非真的有机会重新获得一切，也许文学仍然具有意义。然而眼下在亨利看来，理解这个世界比用词语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更为迫切。他更乐意从包中掏出现成的书籍，而不是空白的纸张。

“您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迪布勒伊激烈地说，“右派分子的书最终比我们的要更有价值，年轻一代最终将到伏朗热之流那儿得到满足。”

“噢！伏朗热决不可能拥有年轻一代。”亨利说，“年轻人不喜欢战败者。”

“可很快给人以失败者形象的，有可能是我们。”迪布勒伊说。他紧盯着亨利：“您不再写作，我感到遗憾。”

“我也许会重新写作。”亨利说。

天气实在太热，难以再深谈下去。可是，他心里清楚自己不会很快重新执笔。放弃写作的好处在于他终于有了学习的空暇。四个月里，他填补了不少空白。三天后，一返回巴黎，他就要制定一个详尽的学习计划，说不定这一两年时间里能构成一个政治文化的大致框架。

“但愿波尔还没有回家。”次日上午，他一边默默地在想，一边在林中蹬着车子。树荫稀疏，阳光的酷热勉强有所缓解。他让迪布勒伊和安娜在前面骑着，自己只身进入了林间的一块空地。一圈圈阳光在绿草间颤动，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心头缩紧。究其原因，不会是这座烧毁的木屋，它与许许多多别的废墟一样，在淡漠与岁月的侵蚀下渐渐消失。也许是因为这片沉寂，没有鸟唱，也没有虫鸣，唯能听见车轮在沙砾上滚动的沙沙声，这是一种多余的声响。安娜和迪布勒伊已经下了自行车，正在看着什么。亨利来到他们身旁，发现是一些十字架。白色的十字架，不见人名，没有鲜花。韦科尔。这个含着茅草、灰烬、焦土色彩的名字，这个听似咖里哥宇群落 [\[1\]](#) 般冷酷、干燥，但也透溢出一股深山清凉气息的名字，再也不属于传说。韦科尔。就是在这个山之国，湿润却枯黄的植被，稀疏透明的森林，无情的太阳竖起了一个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们默默地离去，道路很陡，不得不推车行走。酷热侵入淡淡的树荫中，亨利感到汗流满面，安娜的额头和迪布勒伊古铜色的面颊早已大汗淋漓。每一个人心间呼唤的无疑都是同一的声音：在这绿茵茵的草场上搭起一个帐篷。昔日，令人神往的正是这种纯净、神秘的所

在。至少在这里，战争与仇恨永远都无法渗入。可是现在已经知道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所谓的避难处。这里竖着七个十字架。

“山口到了！”安娜喊了起来。

亨利就喜欢这样的时刻，瞎子似的攀登一阵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大片耕作的土地，田园、篱笆、道路、村寨一一映入眼帘；阳光仿佛给板岩瓦洒下晶莹的露珠，给玫瑰色的平板瓦陡添了一抹闪光的色彩。然而，亨利首先瞥见的是一道山的屏障，它紧倚着天际，继而是辽阔的高原，在太阳下赤裸裸地经受着炙烤。如同法国的其他高原，这儿有农庄、村落、小寨，可没有平板瓦，没有板岩瓦，根本不见屋顶的影子，唯有高低不一的断壁残垣，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遮蔽不了任何东西。

“知道了又有何用？”安娜叹息道，“尽管认为都知道了，这有何用。”

他们一时呆立着一动不动，接着开始顺着阳光猛烈抽打着的沙砾小路，小心翼翼地下山。八天来，他们谈论广岛，列举数字，交换意义可怖的话语，可心底却激不起一丝涟漪，但突然间，只需匆匆的一瞥，恐惧便悠然而至，他们的心便开始抽搐。

迪布勒伊猛地刹住了车子：“出了什么事？”

一只军号在紧吹，穿透了村寨上空飘忽的薄雾。亨利停下车子，发现脚底的大公路旁一溜军用卡车、运输用履带装甲车、汽车和推车。

“是纪念会！”他说，“我没有留心，可我听旅店的人说什么地方有个纪念会。”

“是个军队纪念会！我们可怎么办？”迪布勒伊问道。

“头顶着太阳，不能返身上山，也不能停下不走，进退两难是不是？”安娜急得直问。

“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迪布勒伊口气沮丧地答道。

他们继续往山下走。被烧毁的村庄左侧，有一个土坛，竖着一个白色的十字架，上面摆满了红色的花束。一些塞内加尔士兵迈着正步向前行进，头上的小圆帽闪闪发亮。军乐声又起，遮住了公墓的寂静。

“看样子要结束了，我们运气还算好。”亨利说。

“向右骑。”迪布勒伊说。

士兵们冲锋似的上了军用卡车，人群四下散开。男女老少全都穿着黑衣，被那漂亮的丧服闷得几乎要窒息。他们乘汽车，坐推车，骑自行车、摩托车或徒步，来自周围的所有村落、小寨，足有五千甚或万人。此时，他们正挤撞着向枯树和烧焦的断壁拥去，争夺那仅有的一点点阴凉。他们有的蹲在路旁的排水沟里，有的半倚着汽车，纷纷拿出圆形大面包和红葡萄酒。死者已经安排妥当，被填饱了悼词、鲜花和军乐，活人们便大吃起来。

“我琢磨着什么地方可以歇个脚。”安娜说。

上午这段艰苦的行程之后，他们渴望在阴凉处躺一躺，喝点冰凉饮料。他们顺着公路，伤心地推着车子走去，路上挤满了寡妇和孤儿。下山向谷地开去的大卡车卷起漫天的白色尘土。“到哪儿找阴凉去？哪儿？”安娜直问。

“那边有些桌子摆在阴凉处。”迪布勒伊说，边指着紧靠一座木屋摆开的几张长桌，可桌旁的位子好像全被占了，几个妇女轮流端上一盆盆土豆泥，用勺子分给各位。

“是在聚餐还是个饭店？”安娜问道。

“咱们去瞧瞧。老是煮鸡蛋，我宁愿吃点别的东西。”迪布勒伊说。

原来是个饭店，人们差不多挤坐在一起，以腾出更多的位子。亨利坐在迪布勒伊正对面，身旁是一位妇女，她戴着沉甸甸的黑面纱，两只患麦粒肿的眼睛红红的。一勺白花花的东西倒进他的盘子，紧接着一个男人用叉子叉上一块血乎乎的肉。面包篮和酒瓶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大家一声不吭地只管吃着，那副尴尬的贪婪相令亨利想起了自己儿时参加的葬礼上村民们的样子，只是眼下服丧的是数以百计的孤儿寡妇和亲朋好友。阳光下，他们内心的痛苦和身上汗水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坐在亨利另一侧的老人递给他一瓶红葡萄酒。“给她倒一点儿喝喝。”老人指了指那位眼睛红红的女人说道，“她是那位在圣但尼被活活吊死的男人撒下的媳妇。”

一位女的隔着桌子问道：“那位被他们倒悬着活活吊死的是她丈夫？”

“不，不是那位，她的那位两只眼睛被掏了。”

亨利给寡妇倒了一杯酒，他不敢看她。突然，他感到薄薄的衬衫下汗在流淌。他向老人转过身子，问道：“是那些空降下来的大兵烧了瓦西厄？”

“对，他们来了四百号人，您可以想象，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死人最多的是瓦西厄，所以他们才有进大公墓的权利。”

“那是整个韦科尔地区的公墓。”他对面的女人自豪地说，“您是大热纳的叔叔吧？”她问道，“就是跟他儿子费弗里耶一起在山洞里给找到的那位？”

“对，我是他叔叔。”老人回答道。

餐桌边，话匣子全打开了，人们一边呷着葡萄酒，一边回忆起那恐怖的往事：在圣罗克，德国人把男女村民关进教堂，烧起一把大火，后来才允许女人出来，其中有两个就没有逃出来。

“我老毛病又犯了。”安娜突然站起身子说，“我……”

她刚走了几步，整个身子便往木屋的墙壁倒了过去，迪布勒伊慌忙跑去，亨利紧跟着他。她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头上涔着汗珠。“心里不舒服，”她用手绢捂着嘴打了个嗝，含糊不清地说。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眼睛：“过去了，是红葡萄酒的缘故。”

“是因为喝了酒，加上太阳晒，身子疲乏。”迪布勒伊说。他是在帮她寻找借口，可心里肯定清楚她的身子壮实得像匹佩尔什马。

“您得到阴凉处躺下来歇一歇。”亨利说，“咱们去找个安静的角落。您可以骑个三五分钟吗？”

“可以，可以，现在好了，对不起。”

昏厥、哭泣、呕吐，女人们生就有这份能耐。可是，这也无济于事，面对死去的人们，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他们又跨上了自行车。整个空气在燃烧，仿佛村庄再次燃起熊熊大火。每个草垛、每丛灌木边都躺满了人，男的把礼服扔在一边，女的挽起了袖子，敞开了紧身上衣。耳边传来了歌声、笑声和逗弄的欢叫声。不喝酒，不笑闹，不逗乐，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既然他们还活着，他们必须生活。

他们骑了约摸五公里，发现了一截半枯的树干，有那么一丁点儿树荫。安娜在茅草和石子上铺上了雨衣，侧弓着身子躺在上面。迪布勒伊从背包里掏出纸张，那纸张一股子淤泥味儿，看似被泪水打湿过一般。亨利坐在他们身旁，头倚着树身，他睡也睡不着，事情也干不

起来。突然，他感到一心想着学习是多么愚蠢。法国的政党，顿河流域的经济，伊朗的石油，苏联当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这个正在展开的新的纪元在书中并没有被预见到。面对原子能，这扎实的政治文化学又有什么分量？革命解放联合会、《希望报》、行动，多么苍白的玩笑！所谓善良的人们尽可放心发动罢工，学者和技术人员却在制造炸弹、反炸弹、超炸弹，手中掌握着前途命运的是他们。一个欢乐的前程！亨利合上双眼。瓦西厄。广岛。一年来情况有了发展。这将导致下场战争。那下一个战后又是怎么样呢？无疑比眼下还要严峻。除非根本就不再有战后。除非战败者以炸毁整个地球为乐。这很可能发生。假设地球没有被炸成碎片，还继续绕着自己旋转，但已冰冷一片，阒无人迹：设想这种结局并不更令人好受。死亡这个意念从未让亨利痛苦过。可突然，这片月球似的死寂使他心惊肉跳：人类从此灭绝！面对这无声无息的永恒世界，爬格子、开大会又有什么意义？还是默默地等待世界的灭顶之灾或个人的末日到来吧。一切都是虚无。

他睁开眼睛。地上酷热难当，天上阳光闪耀。安娜在睡觉，迪布勒伊在写着写作有理的字样。两个戴孝的乡下女人匆匆地向村子赶去，手里抱着红红的玫瑰，鞋子上沾满白色的尘土。亨利定睛目送着她们。莫非是圣罗克的女人为她们亡夫的尸骨献花？有可能。她们应该成为受人尊敬的寡妇。也可能有人在戳她们的脊梁骨骂？她们在心底又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她们是否已经忘却了过去的许多东西，或者只是忘却了一小部分，甚或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一年的时间，既短暂又很漫长。死去的战友已经被忘却了，那八月的时光所预示的前程已经被忘却了：幸好如此。固执地陷入过去，这有害无益，可一旦发

现自己或多或少否认了过去，心里也并不那么自豪。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创造了这种两全之计：纪念。流血的过去与掺和着辛酸的泪水的红葡萄酒的今天。这个两全之计使多少人心头获得安宁。可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也许显得丑恶。假设这些妇女中的一位深深地爱着她的夫君，那么，这军乐、悼词对她来说会有什么意义呢？亨利双眼定定地看着橙红色的山峦。眼前映现出那位妇女，她站在衣橱的镜前整理着黑面纱，军乐不停地吹奏，她突然喊叫着：“我不能去，我不愿去！”旁人把红色的玫瑰塞到她的手中，恳求她以全村寨的名义，以法兰西的名义，以所有死难者的名义去参加纪念会。外面，纪念会正在召开。她掀去面纱。后来呢？视线一片模糊。“哎哟，”亨利在心底对自己说，“我已经决定不再写作。”可是，他全身纹丝不动，目光仍然像僵住了一般。他无论如何需要确定这位妇女后来所经历的一切。

亨利在波尔之前回到巴黎，他在报社对面租了个房间。由于时值酷夏，整个《希望报》低速运转，所以，他有暇伏案一写就是几小时。“写剧本真有趣！”他自言自语道。美酒、鲜花、酷热、鲜血，那个充斥着这一切的沉重的下午写成了一部剧本，他的第一部剧本。对，废墟向来就存在，放弃写作的理由也总是存在，可是，一旦写作的欲望在你心头重又升腾而起，这些理由便显得无足轻重。

波尔没有吵闹，默默接受了亨利关于从此在红色公寓和旅馆分居的念头。可当他在外面单独过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发现波尔的眼睛一圈黑晕，颜色那么深，以至他不禁暗暗发誓，从今以后不再分居。尽管如此，他时不时还是到他那个房间住上一宿，这使他感到多少有了点自由。“不应该过分要求，”他常对自己这样说。知足者常乐，生活中不乏小小的乐趣。



不过，《希望报》的处境岌岌可危。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他发现金柜空了，这时，他心里可真的焦灼不安了。吕克对他大加讽刺。他责备亨利在钱的问题上完全是一副小店主的思想。这也许是实情。不管怎么说，早已有言在先，财务问题由吕克全权负责，这一权力亨利当初也是主动给他的。果然，到了星期六，吕克就弄到了钱，给报社人员发了工资。“从广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了部分费用。”吕克解释说。后来再也没有重新发生恐慌。《希望报》的订数没有上升，却神奇地维持了下来。另外，革命解放联合会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大的群众组织，可在外省赢得了地盘。更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共产党方面不再对它进行攻击：持久团结的希望重又闪现。领导委员会在十一月份一致决定支持多列士，反对戴高乐。“一旦感到与朋友、盟友和自身团结一致，生活就轻松多了。”亨利一边思忖，一边与萨玛泽尔随便交谈。萨玛泽尔是来给他送一篇有关危机的文章的。轮转印刷机轰轰作响，外面，是一个美丽的秋夜，樊尚不知在什么地方唱歌，声音失真却欢快。说到底，连萨玛泽尔也有他好的一面。大家估计他那部关于游击队的书会大获成功，《警觉》正在发表其中的一些章节，他对即将取得的巨大成功高兴得到了幼稚的地步，那副热忱的姿态也因此而显得诚实可信了。

“我冒昧给您提一个问题。”萨玛泽尔说道，继而咧嘴一笑，“有人说从来就没有冒昧的提问，只有冒失的答复。您不一定非要回答我。有一件事我感到纳闷，”他继续说，“《希望报》订数这么有限，它是如何得以维持下去的？”

“我们并没有秘密资金。”亨利开心地说，“原因嘛，就是我们的广告比过去做得更多了，其中的小广告，就是一个巨大的来源。”

“我想我对你们广告收入的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萨玛泽尔说，“呃，据我计算，你们很明显处于亏损状态。”

“我们是负了相当一大笔债。”

“这我知道，可我也知道从七月份以来这笔债没有增加。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

“您的估算可能有误。”亨利以轻松的口吻说道。

“只得这么想了。”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好像并不十分信服。等客人离去，亨利又独自一人呆着时，对自己感到恼火。他完全可以列举准确的数字。“惊奇”，当吕克从空空的金柜中又拿出了支付工资的钱时，涌到他嘴边的正是这个词。“从广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了部分费用。”亨利竟满足了这种解释，太轻率了。什么合同？提前多少时间支取？吕克说的是不是实情？亨利重又感到不安。萨玛泽尔手中确实并不掌握所有数据，可他善于计算。吕克到底是怎么应付的？谁知道他就不会以个人名义偷着借款？他从未搞过不清不白的交易，可总得了解清楚这钱到底从何而来。当办公室的人全都离开之后，清晨两时许，亨利走进编辑室。吕克正在算账。他往往很迟才走，一直等到亨利离开报社，他要清理账目。

“喂，如果你有空，咱们一起看看账目。”亨利说，“我还是想弄清有关我们财务的某些事。”

“我正在算账呢。”吕克说。

“我可以等一等。我这就等着。”亨利边说边往桌沿上坐。

吕克上身只穿件衬衫，系着背带，亨利定睛地看了久久一阵：黄颜色的背带。吕克抬起脑袋：“你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掺和这些钱的事情？”他说道，“请信任我吧。”

“让我看看账本，这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却要求我信任你呢？”亨利反问道。

“你什么都看不明白的。会计学，那是个新天地。”

“过去有几次你给我解释，我不是明白了吗？这总不是什么妖术吧。”

“要白白浪费许多时间。”

“这并不叫浪费时间。我不清楚你是怎么应付困境的，心里不踏实。喂，就给我看看这些账本吧。你为什么不肯呢？”

吕克挪了挪桌子下的双腿。一只大皮垫子支撑着他那痛苦的双脚。他恼怒地说：

“账目上并不是什么都记。”

“我所感兴趣的，”亨利激动地说，“正是账上没有记上的东西。”他微微一笑，“你瞒了我什么？你借钱了吧？”

“你不是禁止我借款吗？”吕克以抱怨的口吻说。

“那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敲诈了什么人？”亨利半开玩笑地说。

“我！我会把《希望报》弄成一份敲诈勒索的报纸！”吕克摇了摇头，“你没有睡够吧。”

“听着，”亨利说，“老是猜谜，我可没有这份兴趣。我不愿《希望报》东拼西凑过日子。你就保守你的秘密好了，我明天一早就给特拉利奥打电话。”

“这才叫讹诈呢。”吕克说。

“不叫讹诈，叫慎重。特拉利奥，我知道他的钱是什么货色。可上个星期六落到金柜的那笔钱，我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吕克犹豫道：“是……自愿赞助的。”

亨利满腹狐疑地打量了吕克一番：他有一个丑陋的妻子和三个儿女，微微发福的腹部，背带，痛风病，一张硕大的无精打采的面孔，这一切显得令人十分放心，可谁料到一九四一年一股狂风偶然穿透了这具肉体，甚至连《希望报》也借此应运而生。莫非这股怪诞的狂风重又吹起？

“你是否从什么人那儿勒索了钱？”

“我可没那个能耐。”吕克叹息着说，“不是的，是捐献，纯粹的捐献。”

“谁也不会白白给这么多钱。是谁捐的？”

“我答应保密的。”吕克说。

“答应谁？”亨利微笑着问，“哎哟，你是哄我，慷慨的捐献者，这可不存在。”

“我向你发誓是存在的。”吕克说。

“恐怕不是朗贝尔吧？”

“朗贝尔！他根本不顾报社死活。除了来找你，平时从不踏报社的门。朗贝尔！”

“那是谁？快说呀。”亨利不耐烦地追问道，“要不我就打电话了。”

“你不会张扬是我告诉你的吧？”吕克声音嘶哑地说，“你答应我？”

“我以我自己的脑袋向你发誓。”

“呃，是樊尚。”

亨利惊愕地看着吕克，吕克低头盯着自己的脚。

“你没有疯吧？你就不怀疑樊尚的钱是怎么弄来的？你多大岁数了？”

“四十岁。”吕克不快地说，“我知道樊尚是从那些曾和德国人合作过的牙科大夫那儿抓来的钱，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要是你害怕被指控同谋罪，请你放心，我已经有所预防。”

“那樊尚呢？我猜想他也小心至极吧！他说不准就会在这些混蛋伎俩中掉了脑袋！你就不明白？你满脑子是水还是什么东西？等到那个疯子被逮住的那一天，你就会感到了不起了。”

“我可没有求他什么。”吕克说，“要是我拒收他的钱，他就送给一家狗诊所。”

“难道你就不明白收了他的钱，等于怂恿他再干？他接济我们多少次了？”

“三次。”

“你还指望继续这么下去？你跟他一般疯！”

亨利站起身子，向窗口走去。五月里，当他得知樊尚把纳迪娜也拉进了他们一伙，他曾狠狠地对他敲了警钟，还派他到非洲工作了一个月。樊尚回来后曾夸口已经改邪归正了，可他又故态复萌！

“我得找个法子吓唬他。”亨利说。

“你答应我保守秘密的。”吕克说，“他曾让我发誓决不告诉你，千万不能让你知道。”

“那当然！”亨利回到桌旁，“不管怎样，我能不能跟他说点什么，反正都是一回事。”

“再过十天，有一笔款要付。”吕克说，“可我们付不出。”

“我明天就跟特拉利奥谈去。”亨利说。

“要是能再赢得一两个月就好了，困境差不多就摆脱了。”

“差不多，这可不够。”亨利说，“再固执又有何用？订数没有回升，日子一长特拉利奥就有可能改变主意。”亨利把手搭在吕克的肩头，“只要能像以前一样自由，这又有何妨？”

“到时就再也不一样了。”吕克说。

“肯定完全一样，只是再也用不着为钱的事烦心了。”

“这是最好不过了。”吕克叹息道。

一想到钱的问题就要彻底解决，亨利轻松了许多。两天后，他心底坦然地走进了特拉利奥的办公室：里面摆满了书籍，表明主人是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个商人。可特拉利奥本人身材颇长，风度翩翩，加上一个半秃的脑袋，十足一副大企业家加富豪的派头。

“在整个被德占领期间，我们工作紧密配合，可竟没有见过一面！”他有力地握着亨利的手说，“您与维尔朗德很熟，对吧？”

“当然，您当时在他的联络网？”

“对，那是个非凡的人物。”特拉利奥稍带忧伤的口气说道。继而是一个自豪的微笑天真地显现在他的脸上，脸也因此变得圆了：“正是通过他我才结识了萨玛泽尔。”他示意亨利就座，自己也坐了下来，“那个时候，重要的是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

“那已经很遥远了。”亨利搪塞着说。

“幸亏能使用金钱来维护人的某些价值，这倒也是个安慰。”特拉利奥以一副动人的神态说。

“迪布勒伊把情况跟您说了吧？”亨利问。

“大概说了说。”

特拉利奥的目光里含有一种迫不及待想了解情况的意思。实际上，他对情况了若指掌，可为了从容地对亨利考察一番，他必须耍一下手腕。亨利并不自信地开始谈了起来。他也仔细观察着特拉利奥。特拉利奥和蔼可亲地聆听着，但可亲之中又带有几分俯允的神态。他确信自己享有特权，但口头上却声明放弃，为此而洋洋得意，自认为比那些一无所有但内心又不甘心被剥夺的人高出一头。根据迪布勒伊的介绍，亨利想象中的特拉利奥并不完全是这副姿态。在他的脸庞上，没有一丝软弱、忧虑的表示，也没有慷慨、大度的印记。如果说他属于左派的话，那只能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行径。

“这里，我打断您一句！”他突然说，“您说订数下降是必然的。”他定睛看了看亨利，仿佛就要揭示一个危险的真理，“我并不相信什么必然性，甚至可以说这是阻止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因之一。我个人的经历与您不同。我是个生意人，是个实干家，这一经历告诉我事物发展的进程可能会因为一个偶然因素的偶然介入而改变。”

“您的意思说有可能避免订数下降？”亨利口气有些生硬地说道。

特拉利奥停顿了片刻：“反正我确信今日有可能使订数回升。”他说，“我绝不把这看成是个钱的问题。”他打了个有力的手势说道，“可鉴于《希望报》所代表的使命，我认为它重新争取广泛的读者事关重大。”

亨利饶有兴趣地从中听出了萨玛泽尔的腔调。他开口说道：“我和您一样希望能这么做，是资金短缺造成了我们的困难。如有资金，我可负责搞通讯报道和调查报告，这可以给我们赢得大量的读者。”

“通讯报道、调查报告，这当然。”特拉利奥声音冷漠地说，“可这不是主要的。”

“那什么是主要的？”亨利问道。

“我这就直言相告。”特拉利奥说，“您是很有名气，甚至深孚众望的人。可请允许我向您进一言，您的朋友吕克微不足道，没有一点儿名气。另外，我也读过出自他的一些文章，明显笨拙。”

亨利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吕克是位优秀的记者，报纸属于他和我，如果您想过排斥他的话，那就请您再也不要考虑了。”

“难道就不能促使他自行退出？比如以对他有利的价格买下他的一股，再给他提供一个好的职位？”

“不行！”亨利说，“他决不会答应的，再说我也不会要他这样做。《希望报》就是吕克与我。您要么给我们提供资金，要么不提供，没有两全的办法。”

“显然，对一个共同投入一项事业的人，有时要分道扬镳，这比对外人要更困难。”特拉利奥以打趣的口吻说道。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没有任何法律限定一家报纸的领导委员会只有两个成员。”特拉利奥说道，接着微微一笑，“鉴于你们之间的友谊，我确信让萨玛泽尔当您的助手不会有任何难处。”

亨利缄默不语。怪不得萨玛泽尔那么关心《希望报》的命运！他终于冷冷地开口说道：“我看没有必要。萨玛泽尔如有兴趣，可在我们报上写点什么，这对他来说也许足够了……”

“希望如此合作的不是他，而是我。”特拉利奥傲慢地说，声音紧接着生硬起来，“我认为在您的大名旁边，还需要另一个同样深孚众望的名字。眼下，萨玛泽尔的影响正在飞快地扩大，保准明天谁都会谈论他。亨利·佩隆与让·皮埃尔·萨玛泽尔，这是社会利害关系的结合。



再说，必须给你们的报纸注入新的活力。萨玛泽尔，这是一股自然的力量。我向您建议的就这些。我负责偿还全部债务，买下《希望报》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具体条件容我们再商量，吕克与萨玛泽尔各占百分之二十五，您占另一半。采取何种决定，以得票多数为准。”

“我十分敬重萨玛泽尔。”亨利说，“可我也对您直言不讳：萨玛泽尔个性太强，在他当家的地方，我感到难以做主，而我却坚持要感到我是报社的主人。”

“这纯粹是个人之见。”特拉利奥说。

“也许。可不管怎么说，这关系到的是一份属于我个人的报纸。”

“那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报纸。”

“这两者并不相互排斥。”

“问题正在这里。”特拉利奥说，“我给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报纸提供资金，我希望保证它具有最大的成功的可能性。”他固执专横地继续说：“《希望报》是一个非凡的创造，请相信我对它的价值有正确的评价。可我们面临新的困难，问题是要取得更大范围的成功，因此，单枪匹马就再也不够了。”

“我向您重复一遍，我并非单枪匹马。”亨利说，“我觉得与吕克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新的处境。”

特拉利奥摇摇头：“说句自吹的话，我对一个人的能力向来有比较正确的评价。眼下要逆流而上，十分艰巨，您需要萨玛泽尔这样的人来帮您一把。”

“这并非我的看法。”

“可这是我的看法。”特拉利奥突然出言不逊，“任何人都无法使我改变。”

“您是想说如果我拒绝您的办法，您就不给《希望报》提供资金？”亨利说。

“您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特拉利奥又显出温和的气色。

“您许诺过无条件支持我。”亨利说，“正是据此诺言我才让《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

“瞧，我没有强加给您任何条件。毋庸赘言，报纸的政治路线保持不变，我只是请您采取必要的措施，扭转困境，我想这是你我都同样希望的。”

亨利站起身子：“我这就去找萨玛泽尔谈个清楚！”

“萨玛泽尔肯定不会答应在违背您意愿的情况下进入《希望报》。”特拉利奥说，“为此，这次谈话最好只限于我们俩。他拒绝，还是您拒绝，这无关紧要：只有让他参与报纸的管理，我才会提供资金。”

“我总要让他知道此事吧。”亨利说，他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因为我听信了您的诺言，危及了《希望报》的安全，把它引到了倒闭的边缘。可是您却乘人之危，肆意讹诈。像这样一个能够干出如此不仁不义勾当的人，无论如何，我还是不用他帮忙为好！”

“您没有权利谴责我讹诈！”特拉利奥也站了起来，说道，“我干任何事情都光明磊落，这件事和别的事一样。我从来就不隐瞒，在我看来，进行某些调整，对《希望报》的良好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迪布勒伊对我说的可不是这样。”亨利说。

“他对您说的话不用我来负责。”特拉利奥提高了嗓门道，“我知道我对他说了些什么，若产生误会，那太遗憾了，我表达的可是一清二楚。”

“您跟他谈过您的对策吗？”

“当然。我们谈得还相当详细呢！”

他的话中包含着如此令人信服的诚意，亨利一时沉默不语。“他总不至于理解成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吧。”他终于开口说道。

“我猜测他想要理解的都理解了。”特拉利奥带着几分敌意说道。“哎，”他紧接着以妥协的口吻说，“我的建议在您看来为什么就那么不可接受？您之所以恼火，是因为您自以为是一次卑鄙的勾当的受害者。您只要跟迪布勒伊谈一次，就可对我的诚意深信不疑，您到时肯定就会明白我的建议对您来说是个多么重要的机遇。请您相信，任何人都不会以偿还六百万债务为代价，冒险买下《希望报》。只有像我这样对革命解放联合会忠心耿耿的人才会冒这个风险。要不，别人肯定会强加给您与我截然不同的条件：政治条件。”

“我决不泄气，一定要找到无私的支持。”亨利说。

“可您已经找到了！”特拉利奥说。他淡然一笑，“我把这次交谈只当作初次接触。就我这方面而言，谈判的大门总是敞开的。您好好考虑考虑吧。”

“谢谢您的忠告！”亨利说。

他气呼呼地答了一句，可他责怪的并不是特拉利奥，而是迪布勒伊的乐观主义！他那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不，这里谈不上什么乐观主义，迪布勒伊不会幼稚到这个程度。突然，事实真相在亨利面前暴露无遗。“他耍了我！”他瘫坐在马尔索大街的一张座椅上，他脑子里、躯体内充斥着如此强烈的嘈杂声，感到就要昏厥过去。“他存心欺骗了我，因为他想得到《希望报》，我中了圈套。”子夜时分，他前来敲门，满脸堆笑，说什么可得到无条件的资金，说什么夜色如此美

妙，要一起去转转，原来在这微笑之中，他张开了圈套。亨利重又站起来，大步走去，若他走得再慢一些，说不定就会踉踉跄跄跌倒在地。

“他能回答什么话呢？他准无言以答。”亨利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穿越了巴黎城，来到迪布勒伊的房前。他在平台上停了片刻，以便使心脏的激烈跳动平静下来。此时，他还没有十分的把握能肯定嘴里可以发出清晰的声音来。

“我可以跟迪布勒伊先生谈谈吗？”亨利问道。他为自己的声音感到诧异，这声音竟十分正常。

“他不在家。”伊维特说，“家里没有人。”

“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清楚。”

“我等着他。”亨利说。

伊维特让他进了那间书房。也许不到天黑迪布勒伊回不了家，亨利有许多事情要做。可对亨利来说，除了迪布勒伊之外，诸如《希望报》、革命解放联合会、特拉利奥、吕克等等全都已不复存在。打从他爱上了波尔的那个古老春天以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地需要某个人的出现。他在平时常坐的那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可今天，这里的家具、书籍无不在嘲弄着他：全是同谋！安娜推着小推车，送来火腿、色拉，朋友间开心地一起聚餐：纯粹是一出闹剧！迪布勒伊有的是盟友、门徒和工具，可没有一个朋友。他对别人是多么洗耳恭听！他讲起话来，又是多么洒脱！可他早有准备，一有机会便朝你身上踏来。他热忱诚挚，笑容可掬，目光迷人，可这一切只是反映了他对整个世界不可抑制的私心。（“他完全清楚我对这份报纸是多么爱惜！可

他却从我手中夺了过去！”）也许就是他出谋划策，让萨玛泽尔取代吕克的。他一再劝告：去见见特拉利奥。这样一来，他就隐蔽了自己，在暗中给特拉利奥下指令。“一个阴谋，一个陷阱。一旦落入圈套，我如何摆脱？在萨玛泽尔和倒闭这两者之间，我应该选择前者，对此他准会大吃一惊。”亨利在寻找激烈的措辞，准备冲着迪布勒伊宣布自己的决定。然而，这滔滔怒火激不起任何精神。相反，他感到精疲力竭，甚至隐隐约约地感到害怕，感到羞辱，仿佛经过数小时搏斗之后，有人刚刚把他从流沙中救起。门咣当一声，亨利的指甲深深地嵌入座椅的扶手：他绝望地希冀能让迪布勒伊分担这后者给他造成的恐惧。

“您等我很久了吧？”迪布勒伊边问边朝他伸过手去。亨利机械地握了握手：还是昨天那同一只手、同一张脸。即使心里有谱，也难以看透这副面具。他嗫嚅着说：

“不太久。我必须跟您谈谈，一刻也不能拖。”

“出了什么事？”迪布勒伊问道，那假作关切的声音，惟妙惟肖。

“我刚从特拉利奥那儿来。”

迪布勒伊脸色骤变。“啊！成了？您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特拉利奥有否作难？”他声音急切不安地问道。

“我明白了！您口口声声向我保证，他准备无条件支持《希望报》，可他非要我找萨玛泽尔合作。”亨利死死盯着迪布勒伊，“听说您知道这事。”

“我七月份就知道了。”迪布勒伊说，“于是，我马上到别处去弄钱。我以为莫瓦纳就要给我资助，他差不多已经答应我了。可我方才

去看他，他刚旅行归来，看来再也不像当初那样坚决了。”迪布勒伊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您还能支撑个把月吗？”

亨利摇摇头，“不行。您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他愤怒地问道。

“我一直指望莫瓦纳。”迪布勒伊说。

他耸了耸肩膀，“我事先也许是该跟您通个气。可您知道我向来不愿承认失败。您陷入这般困境，完全是我的过错，我发誓要让您摆脱出来。”

“您说是七月份，可特拉利奥断言他从来没有承诺给我们以无条件的支持。”亨利说。

迪布勒伊愤愤地说：“四月份，谈的只是报纸的政治路线问题，他是完全同意的。”

“您给我的保证实在过头了。”亨利说，“特拉利奥在任何领域都不会白白介入的。”

“啊！听着，就四月份的情况来说，我没有任何值得责备的地方！”迪布勒伊说，“我当时曾劝您马上亲自去和特拉利奥谈一谈。”

“可您当时跟我说话时那么自信，让人觉得去谈也是白搭。”

“我只是谈了我的想法，谈了我是怎么想的。”迪布勒伊说，“我可能错了。谁也不可能永远不出错。可我也没有强迫您相信我的话。”

“您通常可不会错到这般明显的地步。”亨利说。

迪布勒伊忽然微微一笑：“您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存心对您撒谎？”

这话从他自己的嘴里说了出来，只需以一“是”字相答，这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实在难以启齿，在这副笑盈盈的面孔前，在这间书房

里，实在说不出口。“我怀疑您把自己的欲望当成了现实，而毫不顾忌我的利益。”亨利克制住自己的声音说道，“特拉利奥拿钱，至于什么条件，这于您来说根本无所谓。”

“我也许是把自己的欲望当成了现实。”迪布勒伊说，“可是，我向您发誓，要是我当时对特拉利奥的盘算有丝毫怀疑，我就会让他连同那几百万法郎见鬼去。”

他的话声充满令人心动的热忱，可亨利还是不能信服。

“我今晚找特拉利奥谈谈去，”迪布勒伊说，“也找萨玛泽尔谈谈。”

“这无济于事。”亨利说。

啊！话不投机。要把心里想的高声说出来，这谈何容易。“一个阴谋！”这话突然显得那么过分，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当然，迪布勒伊绝没有搓着双手自言自语说过“我策划了一个阴谋”。倘若亨利胆敢冲着他骂出这个字眼，那迪布勒伊说不定会笑得更凶。

“特拉利奥很难对付，但萨玛泽尔可以争取。”迪布勒伊说。

亨利摇摇头：“您争取不到他的。不，只有一个办法：我洗手不干了。”

迪布勒伊耸肩膀：“您完全清楚您不能这样。”

“对此，您是会大吃一惊的。”亨利说，“可我一定要这样做。”

“您要毁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您要知道，对面的人会怎样幸灾乐祸！《希望报》倒闭了，革命解放联合会被清除！这够瞧的！”

“我可以把《希望报》卖给萨玛泽尔，到阿尔代什买家农庄。革命解放联合会决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损害。”亨利忧楚地说。

迪布勒伊神情痛苦地看着他：“您恼火，这我理解。我有罪。我不该如此轻信特拉利奥，我在七月份就应该告诉您。可是，我将尽一切努力弥补这一切。”他的话声愈来愈恳切，“我求求您，别固执了，咱们一起去寻找办法，摆脱困难。”

亨利默默无语地打量着他。承认过错，这是巧妙之策，是减轻罪过的最好办法。可其中最严重的过错，迪布勒伊却避而不谈。实际上，他的过错在于无度滥用了他人的信任。他往往在要求你为友情做出牺牲的同时，假装给你以友谊，可事实上却一点也不给。必须对他明言：“您是在耍我，耍所有的人。为了追求真与美，您会不惜牺牲任何人。可所谓的真，是您内心所想，所谓的美，是您内心所求。您把整个宇宙视作您的创造，在人这个创造物与您之间无法相比。当您耍弄慷慨之举，也只是为了给您自己增添荣耀。”对他，还可以指责一千条，一万条。可是，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愤然关门离去，永远再别打开这扇门扉。“我必须这么做。”亨利思忖。关于报纸，不管他做出何种决定，他都该立即与迪布勒伊决裂。他站起身子，他看了看小推车、书籍、安娜的照片，不禁感到心软。整整十五个春秋，这间书房对他来说始终是世界的中心，是他温暖的所在。在这里，真理仿佛是可信的，幸福显得至关重要，保持自我又似乎是一种伟大的特权。他无法想象自己踟躅街头，身后的这扇大门从今以后向他永远关闭的情景。

“没有用了，已经进退维谷。”他以平淡的声音说道，“我并不固执。只是在目前的处境下，我再搞《希望报》已经毫无意义。肯定能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使我离开不至于给报纸和革命解放联合会造成损失。”



“听我说，再给我两天时间。”迪布勒伊说，“如果两天后我一无所获，您再考虑您的决定。”

“那好。可我什么都已经考虑过了。”亨利说。

亨利刚一跨出门外，脑袋里便旋转起来。他朝报社方向迈了几步，这是他想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当面找吕克说清，也许吕克会感到痛心，抑或会建议到哪位牙科大夫处再敲一笔，亨利实在感到没有这个勇气。至于波尔那里，一想到她那没完没了的预言，那絮絮叨叨的陈词滥调，根本就不能去。然而，他需要道出事实真相。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仿佛刚刚观看了一场魔术表演，狡猾的魔术师给你亮了他的绝招，却又是虚晃的一招。迪布勒伊在作弊，眼看着就要抓住他的把柄：可是说变就变，那张偷摸的牌已不在他手中，也不在他的兜里。他撒谎撒到了何种程度？他是否也对自己撒谎？在厚颜无耻与存心欺人这两者之间，他的背信弃义到底偏向哪一端？毫无疑问，背叛之举确实存在着，却又无法抓住他的把柄。“我又被耍弄了。”明摆的事实再次使他头脑发昏：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阴谋，迪布勒伊冷笑着在幕后牵线。亨利在桥中心停下脚步，双手紧握着栏杆。他是否在胡思乱想？还是因为怀疑迪布勒伊耍阴谋诡计致使自己陷入愚蠢的深潭？不管怎样，倘若他还继续一意孤行，在一个又一个明摆的事实中颠簸晃动，那他的大脑马上就会爆炸。他无论如何必须要跟别人谈一谈。他想到了朗贝尔。“要是我当初接受了他的忠告，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思忖道。朗贝尔不喜欢迪布勒伊，可他向来以保持公正而自鸣得意。他是亨利可以进行一次慎重交谈的唯一人选。他穿过了桥，走进了比亚尔咖啡店的电话间。

“喂！我是佩隆。我能上楼跟你随便谈谈吗？”

“当然。这念头倒怪好的！”

朗贝尔热烈的话声中交织着几分惊奇：“你怎么样？”

“不错。马上见。”亨利说。

对方话声中的惊奇与热烈使他心头平静了下来。朗贝尔的热情显得有些笨拙，可至少对他来说，亨利决不是他棋盘上的一个卒子。亨利快步登上楼梯。怪诞的一天，白白用来上楼下楼，仿佛他是法兰西学院的候选人似的。

“你好。请走这边。”朗贝尔兴高采烈地说，“请原谅这地方乱七八糟的，我实在没有空暇整理。”

“哎哟，你住得还怪舒适的！”亨利说。

宽敞明亮的房间杂而不乱，摆着一架电唱机、一个唱片柜，精装的图书按作者归类，摆得整整齐齐。朗贝尔身着一件黑色毛线衫，系一条黄色真丝围巾。面对眼前的一切，亨利感到有点不太自在。

“白兰地、威士忌、矿泉水还是果汁？”朗贝尔打开唱片柜下方的一格，问道。

“来一杯浓威士忌。”

朗贝尔走进了一间淡绿色的浴室去取水，亨利瞥见里面有一件大毛巾浴衣，刷子和肥皂等用品也一应俱全。

“这个时候，你怎么会不在报社？”朗贝尔问。

“报社有了麻烦。”

“什么麻烦？”

说朗贝尔对报社不关心，这并不确切，应该说他和吕克之间有着深深的对立情绪，只要他们俩站在一起，看上一眼，这种相互之间的

反感情绪就不难理解。他全神贯注地听亨利一五一十地对他讲，越听越气。

“这当然是个阴谋！”他说，继而思虑片刻，“你不认为迪布勒伊会想尽办法和萨玛泽尔一起进报社？或代替萨玛泽尔进报社？”

“不，我不这么认为。”亨利说，“他对记者这一行不感兴趣。不管怎么说，他是以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名义控制着《希望报》。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任何改变，他照样还给我设了一个卑鄙的圈套。”他打量着朗贝尔，“若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办？”

“要是你愿意，让他们也没有好果子吃。”朗贝尔说，“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报纸乖乖地卖给他们，他们正求之不得。”

“我不愿意发生丑闻。”亨利说，“我可以好聚好散，把报纸放弃算了。”

“这无异于你承认失败，他们会得意忘形。”朗贝尔说。

“你总是劝我不要搞政治，这就是一个摆脱政治的良机嘛。”

“《希望报》与政治交易有别。”朗贝尔说，“你亲手创办了这份报纸，它是你的命运……不，你不能这样。”他冲动地说，“要是我有钱的话！可我手头所剩无几，不知如何派上用场。”

“我什么地方都弄不到钱，他们完全清楚。”

“接受萨玛泽尔吧。你跟吕克好好合作，争取抵消萨玛泽尔的作用。”

“若他与特拉利奥结成一伙，那就与我们势均力敌了。”

“萨玛泽尔怎么会有钱买股份？”朗贝尔问道。

“提前支取他那部书的稿酬，要么特拉利奥帮他忙。”

“他为何那么看重萨玛泽尔？”

“我怎么知道？我甚至都弄不明白那家伙怎么会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人。”

“必须找到反击的手段。”朗贝尔说。他一副沉思的神态，在房间来回踱着步。突然响起两声急骤的门铃声，朗贝尔脸霍地红了，一直红到头发根：“是我父亲！我没想到他来得这么早！”

“我避一避吧。”亨利说。

朗贝尔神情尴尬，恳切地看着他：

“你就不愿意跟他打个招呼？”

“噢，当然愿意。”亨利急忙说。

打个招呼并不碍事，可眼下这个人，也许就是他断送了罗莎的性命，至于德国人，他肯定竭诚为他们效过力。亨利见他向自己走来，好不容易强装出一个笑脸，嘴巴直哆嗦。只见他一头灰发，浮肿发黄的脸上闪烁着一双蓝得像瓷器般发亮的眼睛。如此柔和、鲜艳的色泽竟闪现在这张衰竭的面孔上，令人不胜惊讶。朗贝尔先生等着亨利向他伸过手来，可最终还是他先开了口。

“我很想和您见上一面，”他说，“热拉尔老跟我提起您！”他露出一个微笑，旋即收了起来，“您多么年轻！”

对他来说，朗贝尔叫做热拉尔，仍不过是个孩子。这很自然，同时也很奇怪。父子俩长得并不相像，可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人们对他们俩会是一对父子并不感到惊奇。

“朗贝尔才年轻呢，我不年轻了。”亨利活跃地说。

“对于像您这样一位十分知名的人士来说，您确实很年轻。”朗贝尔先生坐了下来，“你们刚才在交谈……我本不想打扰你，”他朝儿子

转过身子说道，“可我提前处理完了事情，不知去哪儿好，于是我便上了楼……”

“您来得对！想喝点什么吗？果汁？矿泉水？”朗贝尔的热情中透出慌乱，使亨利愈发感到不自在。

“谢谢，不喝了。这五层楼对我这把老骨头来说真有点够呛，可这里是多么安静。”他环顾四周，一副赞许的神态说道。

“对，朗贝尔住得很好。”亨利说。

“这是家里的传统了。我承认对他古怪的穿着就不怎么欣赏。”朗贝尔先生添了一句。他声音畏畏缩缩，可双眼朝那身黑色的毛线衫投去了严厉的一瞥。

“各有所好嘛。”朗贝尔并不自信地嗫嚅道。

出现了片刻的沉默，亨利乘机站起身子：“对不起，您敲门时我正要告辞。我有急事要做。”

“对不起的是我。”朗贝尔先生说，“您写的全部东西，我都十分认真地读了，有些事情我多么想跟您讨论讨论。可我猜想这种讨论也许只对我有益。”他重新收起了笑容，补充了一句。在他平和的声音、矜持的微笑和举止之中仍然保持着一股已经倦怠的魅力，可他仿佛拒绝使用这股魅力，这种持重的姿态给他陡添了一副既高傲又不可捉摸的神态。

“我们后会有期，肯定可以更从容地谈谈。”亨利说道。

“并不那么肯定。”老人说。

说不定几个月后他就会被捕入狱，他也许不能活着出来。这个曾与敌合作的大老板，在他作威作福的年代，准是个大混账，他超越了

限度，不仅仅有罪，而且是一个要被审判的罪人。这一次，亨利自然地朝他一笑，一边同他握手告别。

“我明天可以来见你吗？”朗贝尔陪亨利来到前屋，问道，“我倒有个主意。”

“是不是好主意？”

“那由你看了。可千万先等我跟你说了，你再做决定。我明晚十点左右去，行吗？”

“行。可不能再迟了，因为我要和斯克利亚西纳出门。”

“好。”朗贝尔说，“我下午的时间答应给纳迪娜了，可十点前我一定到。”

无论怎样，亨利也不打算今天就做出抉择，他甚至再也不想花费心思想该怎么办，更不用谈去找人商量了。他无奈又回到报社，冷静地告诉吕克他与特拉利奥的交谈已经延期，然后又埋头起草起通讯来。对波尔，他再不能以实情相告。当他把钥匙插入寓所的锁中转动时，他打心眼里希望波尔已经入睡。可是不管他几时回家，她总是等着不睡。波尔坐在长沙发上，身着变色丝裙，脸上还涂着脂粉，朝他伸去嘴巴，亨利匆匆地碰了一下。

“白天过得好吗？”她问道。

“很好，你呢？”

她莞尔一笑，没有直答：“特拉利奥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同意。”

“这事你真的就不烦恼吗？”她深沉地瞥了他一眼，问道。

“什么事？”

“接受他的资金？”

“不，这事早就解决了。”他生硬地说。

她犹豫不定，最后什么也没有说。两天来她一直迟疑不决。亨利知道她的心思，可不愿意帮助她道出心里话。波尔这般谨小慎微，实在让他气恼。“她对我小心翼翼，下了决心不再触犯我，等着自己的最后命运。”亨利没好气地想。“六个月前，”他尽量公允地想，“她开心快活，争强好胜，我又对她不满。”他思忖：“实际上她让我恼火的，是她的一些举动。”她自知身置险境，企图自卫，这合情合理。但是她耍的那些可怜的诡计，反倒害了她自己，弄得自己成了仇敌。亨利再也不跟她提唱歌的事。她看透了他的把戏，因此为她定下的约会，她一概拒绝。可是，她在这点上又错算了一着，亨利怨恨她如此执拗。如今他下了狠心，从此不要她的协助，非要把她休了不可。

“蓬斯莱的信。”她递给他一只信封，说道。

“我猜想他拒绝了。”亨利说。他把信浏览了一遍，递给波尔：“对，不用说，他拒绝了。”

他的手稿已经退回两次，并附上诚惶诚恐的溢美之词：一部十分伟大的作品，但争议大，不适时宜，难以冒如此风险，等以后公众之激情平静之后再议。显而易见，对那些想忘却过去，以及企图随心所欲地改变过去的人来说，这个剧本并不惹人喜爱。但是，亨利多么希望该剧能够公演，他对这个剧本的爱远甚于对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一部小说不能一读再读，那词会蒙住眼睛；但是剧中的对话，一旦哪天化为活的声音，他就能远距离欣赏，犹如画家朝自己的作品投去默契的一瞥，一股欢悦的超脱感会油然而生。

“你的剧本无论如何得演。”波尔声音激动地说。

“我也求之不得。”

“是否轰动，我并不比你更在乎。”她继续说，“但是我感觉到你一天不摆脱这部剧作，就一天不能再动笔写小说。”

“什么念头！”亨利惊诧地说。

“你不是还没有开始写小说吗？”

“没有，可这剧本与此毫不相干。”

“那又是因为什么？”她细细察看着亨利问道，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

他淡淡一笑：“就算是因为懒惰吧。”

“可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懒惰。”她严肃地说，又摇了摇头，“这显然是内心的抵触。”

“这部小说头没有开好。”亨利说，“我想从头重写，可我知道这是个大工程，因此不怎么着急。情况就是这样。”

她摇了摇头：“我从来就没有看见你在困难面前退缩过。”

“呃，那这一次我就退缩了。”

“你为什么一直不把草稿给我看一看？”波尔问道，“我也许能给你出个主意。”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的草稿还不成形。”

“你是对我说过。”她一副沉思的神态说道。

“我的剧本就给你看了。”

“不错，底稿也不成形，你却给我看了。”

他没有答话。在这部小说初稿中，他对自己、对她写得过分随便了，他日后将尽力重写的小说也许不会这般冒昧。波尔只需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他打了个呵欠：



“我困了。明天我不回这儿了，我要在旅馆那边睡，因为斯克利亚西纳不到天亮不会放我走的。”

“不管天亮还是天黑，我就不明白旅馆有什么好处。反正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他站了起来，波尔也跟着起身。这是个危险的时刻：每到这个时刻，他往往在她额头上匆匆亲一下，旋即转身靠着墙壁，假装马上就要昏睡过去似的。可是有的时候，她紧紧勾住他，浑身战栗或喘息不止，唯一能使她恢复平静的办法就是与她睡觉。他往往难以满足她，而且也总是感到勉强。对此波尔不可能觉察不出。正是为了抵消这种冷漠，她使出浑身招数，其一举一动无不令人怀疑她是否真的为了乐趣。亨利恨她丧心病狂、鲜廉寡耻，但更为痛恨的，是她虚情假意、低三下四。幸好，这天夜里她没有发作：她也许预感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亨利面颊紧贴着清凉的枕头，两眼睁得大大的，反复思索着白天的事情，心里并不怎么恼火，只是感到几分痛楚。错的不是他，而是迪布勒伊。迪布勒伊悔恨也罢，发誓也罢，怎么都无法洗刷这一过错。它重重地压在亨利的心头，仿佛比他自己铸成的大错还更为沉重。

全扔下不管，这是亨利醒来时闪出的第一个念头。他没有给迪布勒伊去电话。整个白天里，他翻来覆去地想着这几个字，犹如一支令人心静、百唱不厌的小曲。这份报纸是他无可争辩的领地，却要去谈判，去退让，去缔约。不，这种后果让他感到厌恶。他更想隐居乡间，重操写作旧业，开始创作那部小说，至于《希望报》，他将静静地呆在火炉旁，以消遣的目光去读。这一打算是如此诱人，以至当他

在晚上十时看办公室的门打开时，反倒暗暗地希望朗贝尔给他出的不是好主意。

“昨天你留下呆了一会儿，真太好了！”朗贝尔说道，那声音与其说在道谢，勿宁说是表示歉意。“我父亲是多么高兴！”

“与他结识，我也同样有幸。”亨利说，“他看上去已经衰老，但可以感觉到他过去富有魅力，如今仍不失某种风度。”

“魅力？”朗贝尔惊诧地问，“他特别专横。专横，而且瞧不起人，实际上至今未改。”

“噢！他不会是个随和的人，这不难想象！”

“一点儿也不随和。”朗贝尔说，接着一挥手，仿佛想驱除不快的回忆，“关于报纸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

“没有。”

“那就听我给你出主意。”朗贝尔说道。突然他又感到窘迫，“你也许不愿意听吧。”

“只管说吧。”

“若你和吕克对付萨玛泽尔和特拉利奥，你们有被吃掉的危险，可假设我在里面？”

“你？”

“我有足够的钱，萨玛泽尔能买几股，我也能买几股。这样一来，如果决定的通过以得票多数为准，那我们三比二，就赢了。”

“你不是犹犹豫豫、考虑再干不干记者这行当吗？”

“这行当跟别的一样，再说《希望报》也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朗贝尔假装自嘲地说。

亨利微微一笑：“我们在政治上并不总是一致。”

“我才不管什么政治。”朗贝尔说，“我只想要你保住报纸。无论怎样，你保准能得到我这一票。此外，我也能看到你会变化，对此并不丧失信心。”他乐呵呵地说，“唯一的问题是特拉利奥是否同意。”

“他该为留住这么一位优秀的记者而高兴。”亨利说，“幸好你还没有厌倦通讯报道这一行。”他补充道，“你关于荷兰那些文章棒极了。”

“多亏了纳迪娜。”朗贝尔说，“她对此的兴趣之大，竟让我也产生了乐趣。”他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亨利，“你觉得特拉利奥会答应吗？”

“据我猜测，如我走，他们会感到事情不好办；若我接受萨玛泽尔，他们也许会向我做出一次让步。”

“你好像并不特别高兴？”朗贝尔神情有些失望地说。

“啊！这件事整个儿让我厌烦！”亨利说，“我不知道做些什么……你摩托车在吗？”他故意岔开话头问道。

“在。你想让我带你去什么地方吗？”

“去里尔街。斯克利亚西纳住在贝尔琼斯老太家。”

“他跟她睡觉吗？”

“我不知道。克洛蒂家总住着一大堆作家和艺术家，我弄不清她跟哪些人亲过。”

“你常见他，斯克利亚西纳？”他们下楼时，朗贝尔问他。

“不。”亨利答道，“他时不时召我去一次，实在逃不掉。我一推再推，最后没有办法还得去。”

他们跨上了摩托车，顺着塞纳河畔行驶，留下一路噪音。亨利望着朗贝尔的颈背，心间陡然生出几分内疚。他的建议十分恳切。他并不是非要往报社挤，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帮亨利一把。“可我却没有好好谢谢他。”亨利心里在想。可实际上，亨利一点儿也不感激他。“最好

还是什么都别管。我宁愿甩手不管，绝对愿意。”他反复思忖。保住报纸，留在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意味着继续与迪布勒伊携手工作。可心中要是谁有了这么多积怨，还能与之携手工作吗？他没有勇气公开决裂，可他也不喜欢玩弄表面和好的把戏。“不，全完了。”当摩托车在贝尔琼斯的府邸前停住时，亨利对自己这么说道。

“呃，我先走了。”朗贝尔失望地说。

亨利犹豫了一下。刚才对他的诚心帮助反应那么冷淡，现在又这么匆忙地让他走，亨利感到过意不去。

“你乐意跟我一块儿去吗？”亨利问道。朗贝尔顿时面显喜色，他特别喜欢见名人：“我很乐意。可这是不是冒昧？”

“噢，一点儿也不。我们一起上那家茨冈夜总会喝点伏特加，要是斯克利亚西纳来了兴头，他会把在夜总会演奏的乐手请个遍。跟他在一起，用不着拘束。”

“我感觉到他并不十分喜欢我。”

“可他很爱跟他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来吧。”亨利诚心诚意地说。

他们绕过那座巨大的楼房，房子的窗户全亮着灯，耳边传来了爵士音乐声。亨利敲响了一扇侧门，斯克利亚西纳开了门，热情地迎出门外，朗贝尔的到来看来没有引起他丝毫的惊异。

“克洛蒂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真可怕，屋子里挤满了小白脸，简直就像是在自己住处了。从这边走，等会儿咱们还要悄悄地溜。”他大敞着衬领，目光呆滞，像是蒙着一层雾。他们登上几级楼梯。走廊的尽头，一扇门正朝着一间灯光明亮的屋子，可听见里面嘀嘀咕咕的讲话声。

“你有客人？”亨利问道。

“让你吃一惊。”斯克利亚西纳得意洋洋地说。

亨利跟着他，心里忐忑不安。当他看见屋里的客人时，不禁往后一退：伏朗热和于盖特。路易热情地向他伸过手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额头的皱纹比以前稍深了些，下巴的棱角也更加分明：好一尊留给后代的精心雕凿的漂亮雕像。忽然，亨利想起过去读路易在自由区写的那些奉承之作时，曾暗暗发誓，哪日见了面非揍烂他的下巴颏儿不可。他也给对方伸过手去。

“见到你真高兴，老兄。”路易说，“我从不敢打扰你，知道你忙得不可开交，可我还是经常渴望能与你聊聊。”

“您可一点儿也没有变。”于盖特说。

她也没有变样，金色的秀发，白皙的脸庞，风韵不减当年，连那微笑也如过去那般温馨。她永远不会变老：可当哪一天手指轻轻对她一弹，她也许即刻就会化为粉末。

“因为我谁也不见。”亨利说，“我像个傻瓜似的只顾干活。”

“对，你的生活该很艰苦。”路易怜悯地说，“可是你已经占据了第一流的文学地位。实际上，这不足为怪，我向来坚信你定会成功。你的那本书在黑市差不多要价三千，你知道吗？”

“目前，什么书都和香肠一样畅销。”亨利说。

“对。可是，对你的书评价非同一般。”路易以鼓励的口吻说道，接着淡淡一笑，“应该承认，你选择了一个黄金主题，你为此而增添了光彩。一旦掌握了这样一个主题，书自然就可成功。”

路易还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可他话中有股献殷勤的味道，与他过去那种不容置辩的口气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今你情况如何？”亨利问道。

亨利隐隐约约地感到羞辱，可不太明白到底是因为路易还是因为自己。

“我希望在不久就要问世的一本周刊里见到对我的文学批评文章。”路易一边看着自己的指甲一边答道。

“咱们离开这儿。”斯克利亚西纳不耐烦地说，“这音乐让人难以忍受。走，上伊斯巴去喝点儿香槟。”

“我以为他们把你的钱又刮光后，你再也不登那个破地方的门了。”亨利说。

斯克利亚西纳狡黠地一笑：“刮钱是他们的行当，防止被刮是顾客的事情。”

亨利犹豫不决，若不去就会失礼，可他们为什么想出这种点子来逼他呢？他绝对不愿意与路易一起消受夜晚。“我实在不能陪你去了。”他说，“我刚才跑着来，是因为我答应过你一定来，可我现在必须回报社去。”

“我讨厌夜总会。”路易说，“咱们还是在这里安安静静呆一会儿吧。”

“随你们！”斯克利亚西纳说。他一副遗憾的神态看了看亨利：“你总有点儿时间喝一杯吧？”

“当然。”亨利答道。

斯克利亚西纳打开了壁橱，拿出一瓶威士忌：“剩下不多了。”

“我不饮酒，于盖特也不喝。”路易说。

克洛蒂突然出现在门口：“干得真够劲的！”她手指着斯克利亚西纳说，“他喝得半醉跑到我的鸡尾酒会上，侮辱我的客人，还暗地里煽动一些引人注目的人与我作对！我家里再也不收俄国佬了……”

“别这么大喊大叫的。”斯克利亚西纳说，“克利就要来了，那可是只到处做广播的喇叭。”他叹息着补充了一句。

克洛蒂关上门，果断地说：“我留下跟你们在一起。让我女儿去当女主人。”

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路易给各位一一递上美国烟。

“你目前在干什么？”他关切地问亨利。

“我在考虑写另一部小说。”亨利答道。

“安娜告诉我您写了一部很好的剧本。”克洛蒂说。

“我是写了一个剧本，可已经有三位经理给我退了稿。”亨利乐呵呵地说。

“我得安排您见见吕茜·贝洛姆。”克洛蒂说。

“吕茜·贝洛姆？那是谁？”

“您真非同一般，谁都认识您，可您谁也不熟悉。人人皆知的阿玛丽莉大时装店就是她经营的。”

“我不明白。”

“吕茜是利舍代尔的情妇，利舍代尔的妻子与丈夫离了婚，嫁给了维尔依，是第四十六演出厅的经理。”

“我还是不明白。”

克洛蒂噗嗤一笑：“维尔依对他妻子服服帖帖，为的是让他妻子饶恕他跟一些男人结交，因为他是个搞同性恋的；儒莉埃特跟她前夫仍旧亲亲热热，她前夫对吕茜确实言听计从。您这下明白了？”

“清楚了。可是您的那个吕茜对这事有什么兴趣？”

“她有个女儿，风姿迷人，她想让她当演员。您剧中有否女角色？”

“有。可是……”

“总是可是可是，那就一事无成。我告诉您那位姑娘长得楚楚动人。您哪天到我家来，我把她介绍给您。我每周四举行聚会，您总是不参加，现在我有事求您，您可千万别拒绝。”克洛蒂侃侃而谈，“我搞了个儿童膳宿公寓，全是进了集中营的人的子女。经济上我一个人负担实在太重了，我组织了一系列报告会，属义讲性质。有些附庸风雅的人会不惜掏出两千法郎来见见您有骨有肉的模样，来的人肯定很踊跃，我很放心。我把您列入了首批报告名单。”

“我讨厌那种乱哄哄的场面。”亨利说。

“为了那些孩子，您不能拒绝，就是迪布勒伊也会同意的。”

“您的那些慈善家们就不会白白掏出两千法郎而不找别人的麻烦？”

“他们掏一次是可能的，掏十次当然不行。慈善，这事很美，可必须赚点。这是慈善募捐会的原则。”克洛蒂哈哈大笑起来，“瞧斯克利亚西纳这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他觉得我把您独占了！”

“对不起。”斯克利亚西纳说，“可我真的想跟佩隆谈点事。”

“那就谈吧！”克洛蒂说。她走到大沙发旁，坐在了于盖特的身旁，两人开始低声聊了起来。

斯克利亚西纳站在亨利面前：“前几天你曾坚持认为《希望报》虽然隶属于革命解放联合会，但并不放弃讲真话的原则。”

“是的。”亨利说，“怎么了？”

“我急着想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我给你提供一些有关苏联制度的确凿事实，而你又不表示怀疑的话，你能否公布于众呢？”

“噢！《费加罗报》肯定会抢在我们前头发表。”亨利笑着说。



“我有个朋友刚从柏林来。”斯克利亚西纳说，“他向我透露了一些有关俄国人为扼杀德国革命所采取的手段的确切情况。发这些消息，必须是一家左派报纸。你准备发吗？”

“你的那个朋友谈了些什么？”亨利问道。

斯克利亚西纳扫了大家一眼：“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柏林的一些郊镇，共产党势力一直十分强大，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也是如此。”他说道，“在柏林之战期间，克珀尼克和红色威丁区的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升起了红旗，组织了一些领导委员会。这本来可以成为一场群众大革命的发端，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进展顺利。领导委员会已经准备为新政权输送干部。”斯克利亚西纳停了一下，“可是情况并没有这样发展，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从莫斯科来了大批官僚，解散了领导委员会，清除了基层组织，安置了一部国家机器：那是一部占领机器。”斯克利亚西纳的目光落在亨利身上，“这不说明问题？这是典型的鄙视民众、官僚专制！”

“你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亨利说，“只是你忘了说那些官僚就是逃亡苏联的一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早就在莫斯科创建了自由德国委员会：与在柏林被攻占期间揭竿而起的人相比，他们的资格总要强一点。是的，工人中确有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可当六千万纳粹德国人都为自己辩护，断言向来就是反对纳粹政权时，看你如何去辨别真伪！俄国人持怀疑态度，我表示理解。这并不证明他们就整个蔑视基层组织。”

“我早就料到了！”斯克利亚西纳哈哈大笑说，“攻击美国，你们向来有准备；但要你们开口抨击苏联，就没人干了。”

“显而易见，他们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亨利说。

“我不明白！”斯克利亚西纳说，“难道你真的瞎了眼睛？还是你害怕了？迪布勒伊已经被收买了，这人人皆知。可是你！”

“迪布勒伊被收买了！你自己都不会相信吧！”亨利说。

“噢！共产党可不会用钱来买你们。”斯克利亚西纳说，“迪布勒伊老了，他名声显赫，他已经拥有资产阶级读者，他需要大众。”

“那你就去向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宣布，迪布勒伊是共产党员！”亨利说。

“革命解放联合会！好一个漂亮的骗人协会！”斯克利亚西纳说道，把头紧倚着扶手椅的靠背，一副疲乏不堪的样子。

“朋友之间哪次聚会都少不了为政治吵吵闹闹，再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度过一个晚上，你觉得这不令人伤心吗？”路易朝亨利笑吟吟地说，“搞政治，可以，可为什么动不动就非谈政治不可呢？”

路易的目光越过斯克利亚西纳的头部，试图重新获得在年轻时代时与亨利那种心领神会的默契。亨利也有这种愿望，正因为如此，他心里感到更加恼火。

“我完全也是这样想。”他不快地说。

“搞来搞去，搞得最终都忘掉了地球上还存在着其他的东西。”路易说道，显得很不好意思地望着自己的指甲，“那其他东西就叫美，叫诗，叫真。现在谁也不关心这些东西了。”

“对此还是有人感兴趣的。”亨利说。他暗忖：“我应该对他说我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要侮辱他最老的旧友而又不刺激他，谈何容易。亨利放下酒杯，站起来正要走，可朗贝尔开了腔：

“谁也不关心？”他激动地说，“反正《警觉》不会不关心。要您接受一部稿子，必须掺杂一点政治；若仅仅是美、是诗，您也决不会发

表的。”

“我责备《警觉》的正是这一点。”路易说，“当然，以政治为主题的书也可以写得很美，你的小说就是一例。”他彬彬有礼地添了一句，“但我以为恢复纯文学的权利更合乎人们的愿望。”

“对我来说，纯文学这个词毫无意义。”亨利说。他声音刺人地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个危险的词。鼓吹将文学与其他一切割裂开来，最终将导致什么后果，这人人皆知。”

“这要视年代而论。”路易说，“一九四〇年时，我认为可以摆脱政治，当然是我的过错。请相信我完全清楚我错误的严重性。”他以坚信不疑的口吻补充道，“可在今天，我觉得又有了仅仅为了自己的旨趣进行纯创作的权利。”

他以谦恭、征询的神态望着亨利，仿佛真的恳请恩准。这股虚伪的恭敬劲头让亨利十分恼火，可发火无济于事。

“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他冷冷地说。

“没有那么自由！”朗贝尔说，“你不知道，逆流而上多么艰难。”

路易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尤其在当今，世上的一切都企图让人相信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要逆流而上就更艰难了。倘若个人恢复了价值，就可重新获得许多东西，但是问题的症结正在这里：由于不给个人任何施展的余地，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是的，是不给。”朗贝尔有力地说。他神情激动地望着亨利：“你还记得有一次在斯克里布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跟你说过每个人都应该关心自己，我始终这么认为。如果认为个人微不足道，无能为力，那你要人沦为何种样子呢？瞧瞧吧，尚塞尔故意找死，塞泽纳克吸毒，樊尚酗酒，拉舒姆向共产党出卖了灵魂……”

“你把什么都混为一谈！”亨利说，“我看不出纯文学会给樊尚或塞泽纳克带来什么东西。至于你关于个人失落与复得的高见，”他向路易转过身子说道，“纯属无稽之谈。有的人举足轻重，有的人微不足道：这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安排。人年轻时，尚不清楚到底如何安排自己一生，因此而无所适从，可一旦对某事发生了兴趣——自身之外的事——就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了。”

他气呼呼地说了一通。朗贝尔竟对路易的胡言乱语认真对待，使他大为不快。他站起身：“我得走了。”

斯克利亚西纳也站了起来：“你真的已经决定不考虑我提供的情况？”

“你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情况。”亨利说。

斯克利亚西纳给自己满斟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他又抓起酒瓶。克洛蒂赶紧走到他跟前，用手挡住了他的胳膊：

“我认为维克多这个小老头儿喝得已经够多了！”

“您以为我喝酒是为了自己取乐？”斯克利亚西纳猛烈地高声嚷道。

亨利微微一笑：“这倒是个好借口。”

“我只有这样才能忘掉！”斯克利亚西纳又斟了一杯说道。

“忘掉什么？”于盖特神色惊恐地问道。

“两年后，俄国人必定占领法兰西，你们就下跪迎接他们好了。”斯克利亚西纳说。

“两年！”于盖特惊叫道。

“不会。”亨利道。

“你们正在把欧洲拱手交给他们，你们都是同谋！”斯克利亚西纳说，“你们害怕了，事实就是这样：你们之所以背叛，是因为你们害怕了。”

“事实是你恨苏联恨得头脑发昏。”亨利说，“你颠倒事实，到处传播无稽之谈。这是肮脏的勾当。透过苏联，你攻击的是整个社会主义。”

“你完全知道苏联已经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斯克利亚西纳笨嘴拙舌地说。

“别对我说美国跟社会主义更加贴近吧！”亨利道。

斯克利亚西纳气得两眼发红，瞪着亨利：“你口口声声说是我的朋友！可你却为判处我死刑的制度辩护！等哪一天他们枪杀了我，你就在《希望报》上好好解释他们杀得在理吧！”

“我的上帝！”亨利说，“老战士们已经够让人烦了！现在又要让我们为将来要遭受枪杀的人们烦心！”

斯克利亚西纳仇恨地瞅了瞅亨利，他端起半满的酒杯，向空中摔了过去。亨利一闪，杯子击碎在墙上。

“你该睡觉去了。”亨利说道，边向门口走去。他微微招了招手：“再见。”

“不要责怪他。”克洛蒂说，“他醉了。”

“看得出。”

斯克利亚西纳跌坐在扶手椅上，双手捂着脑袋。

“什么场面呀！”亨利与朗贝尔走到寓所的院子，说道。

“是呀。我与伏朗热观点一致：政治辩论应该禁止。”

“斯克利亚西纳不是在辩论，他是在预卜未来。”

“噢！不管怎么说，事情总是这样。”朗贝尔说，“闹得把杯子往头上砸，可连谈什么都弄不清楚。你们俩都不了解东德发生的情况。他对苏联有偏见，可你又偏袒苏联。”

“我不偏袒。我十分清楚苏联国内的一切并不十全十美，要是十全十美那才怪呢！但是，走上正道的到底是他们。”

朗贝尔扮了个鬼脸，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在琢磨斯克利亚西纳对这次见面到底抱着什么目的。”亨利说，“可能是路易给他出了主意：他希望我帮助他挽回面子。”

“也许他渴望与你言归于好。”朗贝尔说。

“路易？瞧你说的。”

朗贝尔困惑不解地打量着亨利：“他是你过去最好的朋友吧？”

“那是一种奇怪的友情。”亨利说，“他是从巴黎城来上的蒂勒中学，一来就把我迷住了。他也觉得我不像别人那么土气。可两人从未有过什么真正的情谊。”

“我倒觉得他挺讨人喜爱的。”朗贝尔说。

“你觉得他讨人喜爱，那是因为你讨厌政治，维护纯文学。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朗贝尔犹豫了一下：“不管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他说的是实情。个人的问题确实存在，当谁都对你啰唆、说你不该提出这些问题时，那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容易了。”

“我可从来就没有说过不该提。亨利说，“这些问题必须提出，我同意。我说的是不应该把它们与别的问题割裂开来。要想了解你自己和你想做的事情，就必须确立你在世界中的立脚点。”

朗贝尔跨上摩托车，亨利坐在他身后。“一年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他心里想，“可他们现在又摆出一副稳坐钓鱼台的傲慢劲儿，仿佛已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由于他们说的与我们不同，所以朗贝尔和他这个年纪的人都会认为是他们带来了新的东西。年轻人必定被诱惑。不行，”亨利暗暗叮嘱自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斗争。”等摩托车一停，亨利便语气热烈地说道：

“你知道，我接受了你的主动帮助，感激不尽。你出的主意很出色：我们要继续当家做主！”

“你同意了！”朗贝尔喜形于色。

“当然。这件事整个儿搅得我心情很不好，不然我准会高兴得跳起来。但是你想象得出我为能保住报纸，多么幸福啊！”

“你认为特拉利奥会同意吗？”朗贝尔问。

“他将不得不同意。”亨利说。他热情地紧握着朗贝尔的手：“谢谢。明天见。”

“不，眼下不是回避的时候。”亨利走进自己的房间时想。他对迪布勒伊的怨恨不可能很快平息，但是，这并不阻碍他们一起工作，这些感情问题都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要阻止伏朗热卷土重来。一定要取得胜利。他点燃了一支烟。成为《希望报》领导委员会成员，这对朗贝尔来说是件好事，亨利将尽一切努力使他更紧密地参与报社的活动，朗贝尔可以在政治上得到锻炼，社会生活的失落感将大大减轻，一旦投身于社会就再也不会无所适从了。

“眼下，作为一个年轻人，可真不易啊。”亨利心里想。他决定近日与朗贝尔推心置腹地谈一次。“我到底跟他谈什么？”他开始脱下衣服。“若我是共产党员或基督教徒，事情就不会这么难办了。一种普通

的道德，可以尽量强迫人们接受，可要赋予生命以意义，就不同了。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应该引导朗贝尔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世界。”亨利叹息了一声。文学的作用正在于此：向别人展示他所看待的世界。可问题在于他尝试过，但失败了。“我真的尝试过了吗？”他扪心自问。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坐在床沿上。他曾想创作一部毫无创作动机的书，不带任何动机，不强迫自己，无缘无故地去写，可他对此很快就丧失了兴趣，这不足为怪。他曾暗暗发誓，一定要做到心诚，但只是做到了随意。他企图不站在过去也不站在现在的角度谈论自己，但是，他生命的真实存在于自身之外，存在于事件、他人和他物之中。要谈自己，必须谈其他的一切。他站起身，喝了一杯水。当时，设想文学再也毫无意义曾使他心安理得，可这并没有阻止他创作了一部自己颇为得意的剧作，一部有明确时间、明确地点的剧作，而且也具有某种意义，正是为此他才感到满意。那么，为什么不动笔创作一部时间与地点明确，而且具有一定意义的小说呢？叙述一个当今的故事，读者们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忧虑，发现自己的问题；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他辗转反侧，好不容易睡着了。

迪布勒伊没有成功，既未能说服特拉利奥，也没有说服萨玛泽尔。但是，他们也许不明白朗贝尔进入报社领导委员会对亨利来说是一种何样的保证，抑或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阴谋企图；他们没有作难，很容易地接受了亨利向他们提出的合作方式。这次人员变动看似纯属行政性质，对此谁也没有多在乎，唯独樊尚不同。他闯入总编室，当时只有亨利和吕克在场。他怒气冲冲地责问道：“我实在不明白眼下发生的事情。”



“可事情很简单。”亨利说。

“我不认识那个特拉利奥，可一个有那么多钱的人肯定危险。不要他也一样能行。”

“可不成。”亨利说。

“你为何让朗贝尔进入委员会？”樊尚问道，“意想不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你以后多着呢！他明明知道底细，却和他父亲重归于好！我一想到这事就生气！”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那位老人出卖了罗莎。”亨利说，“你不要对别人乱加评价，我了解朗贝尔，对他完全信任。”

樊尚一耸肩膀：“这事整个儿让我痛心！”

“应该承认我们把事情搞砸了。”吕克叹息道。

“什么事情？”亨利问。

“整个事情。”吕克答道，“本来希望事情有所改变，没想到一切如故。只有钱顶用。”

“不可能改变那么快。”亨利说。

“永远也改变不了什么！”樊尚说。他猛地转过脚跟，向门口走去。

“他不知道我把事情告诉你吧？”吕克忐忑不安地问。

“不知道。”亨利说，“我什么也没跟他说，以后也不会告诉他。告诉他干什么呢？”

原定签约的那一天，尽管十一月的天还很暖和，但波尔在壁炉里生起了旺旺的劈柴火。她一边漫不经心地拨着火，一边问道：

“你已经完全决定签约了？”

“完全。”

“为什么？”

“我别无出路。”

“出路总是有的。”她说。

“可这件事没有。”

“有。”她站起身子，面对亨利，“你可以一走了之！”

多少天来，她笨拙地闷在心里的这些话终于倒出来了。她一动不动，双手抽搐地拧着披肩的两端，俨然一位把自己的躯体奉献给猛兽的殉难者。她声音忽然变得坚定起来：“我认为你一走了之更有风度。”

“要是你知道我对风度何等不在乎……”

“若在五年前，你决不会有半点犹豫，你早就走了。”她说。

他耸耸肩膀：“这五年里我学会了许多东西。你不也是吗？”

“你学会了什么？”她声音夸张地问，“学会了妥协，学会了让步。”

“我已经把我为什么接受的理由给你解释过了。”

“噢！理由总是有的，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牵扯进去。可问题正在这里，必须善于推翻理由。”波尔脸色骤变，双眼露出惊恐、哀切的神色，“你知道，你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选择了自甘寂寞与洁身自好的道路：皮萨内洛 [\[2\]](#) 笔下的那个身披金光闪耀的洁白圣装的小圣乔治，我们过去常说就是你……”

“是你过去常说……”

“啊！别否认我们的过去。”她叫嚷道。

他不快地说道：“我什么也不否认。”

“你否认你自己，你正在背叛自己的形象。我也知道是谁的责任。”她气愤地补充道，“我总有一天要跟他算账。”

“迪布勒伊吧？但这说到底，纯属荒谬。你对我比较了解，还不知道谁也别想指使我干我不愿意的事吗？”

“有时，我感觉到已经一点也不了解你了。”她绝望地看着亨利说道，接着神色茫然地问道：“这真的就是你吗？”

“我觉得是。”他一耸肩膀说道。

“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把握。我又看到了你过去……”

他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不要总是从过去当中寻找我。我今天与昨天一样真实。”

“不。我知道我们的真实何在。”她声音激动地说道，“我要不惜一切保持我们的真实。”

“我们总是吵个没完没了！我变了，你脑子里要牢记这一点。波尔，人都在变，人的思想和感情也同样在变。你最终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绝不。”她说。泪水涌上波尔的双眼：“请相信对这些没完没了的争吵，我比你更加痛苦；若不是被逼到这一步，我决不会跟你吵。”

“谁也没逼你。”

“我也有我的天职。”她愤怒地说，“我一定履行。我决不允许别人把你引入歧途。”

对这些夸大的字眼，他不知如何是好，声音阴郁地嗫嚅道：“你知道这会导致何种后果？我们最终会弄得彼此仇恨的。”

“你会仇恨我？”她把脸埋进手里，接着抬起脑袋，“如果非到这一步不可，那我也可以承受你的仇恨。”她说道，“为了爱你。”

他一耸肩膀，没有作答，向房间走去。“必须摆脱。我要摆脱。”他气呼呼地对自己说。

十一月份，革命解放联合会支持了多列士的要求，共产党人也对革命解放联合会表示了几分善意，工厂里人们又开始阅读《希望报》了。可是好景不长，共产党人愤怒地反击亨利和萨玛泽尔的文章，亨利在文章中指责共产党投票赞成一千四百亿军事贷款，萨玛泽尔那篇文章则着重指出了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就三强的政策问题产生的纠纷。对此，共产党人做出了强烈反应，派人打入革命解放联合会，不惜一切手段与革命解放联合会进行斗争。萨玛泽尔提出与共产党人公开决裂，依他看，革命解放联合会应该组成政党，在六月的大选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他的提议被否决，可领导委员会决定利用大选的机会，对共产党采取不怎么被动的政策：到时发起一次运动。

“我们并不想削弱共产党，可我们希望它改变路线。”迪布勒伊做结论道，“那么，眼下就是一个迫使它改变路线的良机。仅仅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进行宣传触动不了它。可对群众基础，它不得不予以重视。我们鼓励人们投左派政党的票，但同时要提出他们的条件。目前，无产阶级对共产党怨声载道，倘若我们引导这种不满情绪，能够将之转变成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有希望迫使领导人物改变态度。”

每当迪布勒伊做出一项决定，往往让人感觉到他先前一切的生活似乎都是以此为基点的。当他们开完会议，像以前每个星期六一样来到河畔一家小餐馆用晚餐时，亨利再次发现了迪布勒伊的这一脾性。迪布勒伊向亨利简述了当天夜里准备动笔撰写的文章，仿佛他事先早有考虑，安排文章在预定的确切时间见报。他首先指责共产党人支持

了向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借款一事：确实，这能促使繁荣早日恢复，但工人们从中得不到任何益处。

“您认为这次运动真的可以造成影响吗？”亨利问。

迪布勒伊耸耸肩：“到时看吧。您在抵抗运动期间一直主张只要一投入行动，就要有胜券在握的气概。这是个很好的主张，我坚持采用。”

亨利打量了迪布勒伊一番，他心里想：“要是在去年，他决不会给予这种答复。”眼下这段时间，迪布勒伊明显忧心忡忡。

“换句话说，您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他说。

“噢！听我说，希望还是不希望，这纯粹是主观的事。”迪布勒伊说，“如果一切以个人情绪为准，那就永无休止，最终将成为另一个斯克利亚西纳。当你要做出决定时，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

他的话声和微笑之中隐含着一种随和的味道，若在过去，这早就让亨利动心了。但是，自从十一月份的危机爆发以来，他对迪布勒伊失去了任何热烈的情感。“他之所以对我如此信任，这样跟我说话，是因为安娜不在场，他需要在别人身上检验自己的思想。”亨利思忖。同时，他也暗暗责备自己心存恶意。

迪布勒伊在《希望报》发表了一系列措辞极为激烈的文章，共产党的报刊愤然反击。他们把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态度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态度做了比较，说托洛茨基分子曾以抵抗运动是为英帝国主义效劳为借口拒绝开展抵抗运动。尽管如此，革命解放联合会和共产党之间这场相互攻击，指责对方不了解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论战还保持着比较有礼有节的态度。但是在一个周四，亨利惊愕地在《铁钻》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迪布勒伊在文中受到了极其猛烈的抨击。文章批判了他在

《警觉》连载的论著。几个月前，迪布勒伊曾跟亨利谈到过此书，其中的这一章也只是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涉及了政治问题。但是，他们却以此为突破口，无缘无故地对迪布勒伊大加攻击：控诉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工人阶级的死敌。

“他们到底怎么了？拉舒姆怎么会允许发表这篇文章？他真卑鄙。”亨利说。

“他让你吃惊了？”朗贝尔问。

“是的。文章的口气也叫我震惊。眼下，倒是有一种宽容的气氛。”

“我并不那么大惊小怪。”萨玛泽尔说，“离大选还有三个月了，他们决不会诽谤像《希望报》这样一份成千上万的工人、甚至连共产党人都阅读的报纸。就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解放联合会而言，情况也完全一样，他们不对它进行攻击是有利的。至于迪布勒伊，毁掉他在左派年轻知识分子中间的威信，这样做他们有利可图。”

萨玛泽尔和朗贝尔十分明显的幸灾乐祸的情绪让亨利心中大为不快。两天以后，朗贝尔一副乐呵呵的、近乎逗弄的神态对他说：“我针对《铁钻》的文章玩儿着写了一篇东西。只是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同意发？”听了这话，亨利感到心里一阵抽搐。

“为什么？”

“因为我对拉舒姆和迪布勒伊各打了五十大板。拉舒姆是活该，他以后就会学乖把文章写得模棱两可了。要是个知识分子，那他就不能为政治而牺牲知识分子的美德；如果他把知识分子的美德当作徒有虚名、装潢门面的东西，那就让他先说清楚。至于自由思想什么的，就只好另找地方去谈了。”

“我确实怀疑能在《希望报》发这玩意儿。”亨利说，“再说，你也不公平。还是拿出来看看吧。”

文章尽管充满恶意，但巧妙、辛辣，有时还相当中肯。它猛烈攻击共产党人，但对迪布勒伊也极为不敬。

“你还真有论战的天赋。”亨利说，“你这篇玩意儿很出色。”他微微一笑，“显然，不能发。”

“我说的不是实话？”朗贝尔问道。

“迪布勒伊被肢解，这确是实情；但你责怪他，我感到惊讶。你知道，我情况跟他一样。”

“你？但是，这是由于你对他忠心耿耿的缘故。”朗贝尔说。他把文章又放回口袋，“请注意，并不是我非要坚持发我这篇破文章，可事情确实有趣。即便我想发表，也没有法子。对《希望报》或《警觉》来说，我过分反共；可对右派分子来讲，我又过分亲左。”

“我是第一次不用你的文章。”亨利说。

“噢！通讯报道、评注，这些东西到处可发。但是，一旦我想对某件有一定重要意义的事情谈谈我的想法，你就只能向我表示歉意了。”

“那你就试试吧。”亨利友好地说。

朗贝尔微微一笑：“幸好我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要说。”

“你没有尝试再写短篇小说？”亨利问。

“没有。”

“你打退堂鼓打得太快了。”

“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叫我打退堂鼓吧？”朗贝尔突然咄咄逼人地说，“是因为我读了《警觉》上那个小珀勒维写的故事。要是你也欣赏那类文学，我就再也不理解了。”

“你不觉得那很有意思？”亨利诧异地问。“从中可以感觉到印度支那的氛围，感觉得出一个移民的命运，同时也感觉得出一个童年时代的生活。”

“干脆说《警觉》既不发表长篇小说，也不发表短篇小说，只发通讯报道而已。”朗贝尔说，“只要哪个家伙在殖民地度过了童年，并反对殖民地，您就宣称他富有才华。”

“珀勒维是有才华。”亨利说，“事实上，说一点儿总比什么都不说强。”他又接着说道，“你写的短篇小说的缺陷，就在于你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讲述。若你像那位小伙子一样谈谈你的亲身经历，你那篇东西也许可以写得十分出色。”

朗贝尔耸耸肩膀：“我也曾想过写写我的童年，可后来放弃了。我个人的经历不会给世界提出什么问题，它纯粹是主观性的，依您的观点看，是毫无意义的。”

“任何东西都不是毫无意义的。”亨利说，“你的童年也有其意义：需要你自己来寻觅，并让我们有所感受。”

“我知道，”朗贝尔以揶揄的口吻说道，“不管用什么玩意儿，都可以编造出一篇富有人情味的东西来。”他摇摇头，“我对此并不感兴趣。若我写作，那就要谈谈那些陷于无意义之中的事物。我要以我的手法尽力拯救这些事物。”他一耸肩膀，“请你放心，我不会干的：我问心有愧。只是我不喜爱您所爱的文学，因此我便什么也不写：这更简单。”

“听我说，下次出门，咱们再认真谈谈这些事情。”亨利说，“如果是因为我让你对写作丧失了兴趣，我深表歉意。”



“别抱歉，这用不着。”朗贝尔说。他板着脸走出办公室，就差点儿砰的一声关上门了。他真的受到了伤害。

“他会消气的。”亨利心里想。他决定不再庸人自扰，事情的发展总不如想象的那么糟糕。萨玛泽尔也不像亨利担心的那样碍手碍脚。除了吕克，他可凭自己的热情抓住手下的全部人员。特拉利奥从不登报社的大门。报纸的订数大幅度增加，说到底，亨利还跟以前同样自由。但尤其使他感到乐观的是他那部新动笔的小说。他曾担心会遇到巨大困难，没料到小说几乎自行形成了结构。这一次，亨利差不多可以肯定开了个好头，写得轻松愉快。唯一的麻烦是波尔非要他在她身边写作，还执意要看他的初稿，亨利拒绝，她便生气。这天早晨，他俩刚刚用完早餐，波尔又开了腔：

“你写作顺利吗？”

“勉强勉强。”

“你什么时候给我一点儿瞧瞧？”

“我已经不下二十遍告诉你现在还看不出什么名堂，还没有成形。”

“是呀，从你第一次告诉我到现在，可能已经成形了。”

“我全都从头重写了。”

波尔的双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颌：“你对我再也不会很信任了，是吗？”

“当然信任！”

“不，你再也不相信我了，打从那次骑自行车旅游之后。”她若有所思地说。

亨利惊诧地打量着她：“那次旅游对我们俩又会有什么影响？”

“事实说明问题。”她说。

“什么事实？”

“呃，你再也不相信我对你说的话。”亨利耸肩，波尔马上补充道：“你不相信我，这类情况我可以给你列举出二十次来。”

“比如？”

“比如，我在九月份就告诉你，你如果愿意，自个儿可以到那旅馆里去睡，可是你每次还是一副犯罪似的模样问我同意不同意。你并不相信，与我自己的幸福相比较，我更愿意你自由。”

“听着，波尔，我第一次上旅馆睡了之后，第二天早晨发现你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有哭的权利，不是吗？”她用挑衅的声音问道。

“我可没有心思让你哭。”

“当你拒绝信任我，当我发现你把手稿锁起来，你确实锁了，难道你认为我不会伤心流泪……”

“确实没有什么可哭的。”他气呼呼地说。

“这是欺侮人。”她说。她神态惊恐，几乎像个孩子似的瞧了瞧亨利，“我有时不禁自问，你是不是故意虐待人。”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没有答理她。波尔气得嚷了起来：“你害怕我乱翻你的草稿吗？”

“如果我是你，我是会翻的。”亨利强作轻快地说。

她站起身，推开椅子：“你承认了！你是因为怕我才把抽屉锁得死死的。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是为了避免你一时生出什么念头。”他说。这一次，他声音中那股轻松的劲儿完全是装出来的。

“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她重复道，两眼直瞪着亨利，“要是我向你发誓不碰那些稿子，你会相信我吗？你就会放心地开着抽屉？”

“你那么死盯着那些倒霉的手稿，你自己恐怕不会守誓的。我当然相信你的诚意，可我还是要关好抽屉。”

出现了一阵沉默。波尔慢慢地说：“你从没有像刚才那样伤我的心。”

“如果你受不了，就别逼着我说实话。”亨利猛地推开椅子说道。

他登上楼梯，坐在桌前。也许应该把手稿给她看一看，这样一来，就可以摆脱她的纠缠了。显然，发表时他必定要对这些段落做些修改；除非不等发表，她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可在这之前，每当他重读这些段落时，他都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比生活更真实。”他思索着，“生活中，迪布勒伊耍弄了我，路易是个混账，波尔又毒害了我的生命，而我却要对他们强装笑脸。可在纸上，只要有什么感受，就可尽情倾吐。”他又快速浏览了分离前那一场景：在纸上，说离便离，多容易啊！仇恨、喊叫、相互残杀，一切都可尽情表达。正因为如此，这才是虚假的。“假虽假，”他暗自思忖，“却挺让人满意的。在生活之中，人不断自我否定，别人也经常与你背道而驰。波尔惹我发火，但是等一会儿我又会怜悯她，她以为我心里对她还有爱情。在纸上，我可让时间停止流逝，把我的信念强加给世界：让这些信念成为唯一的现实。”他拧开了钢笔帽。波尔绝不会读到这些段落。然而他得意洋洋，仿佛终于迫使波尔认清了他给她描绘的形象：一位只爱装模作样、想入非非的虚假恋人，一个扮演伟大、宽宏、忘我的角色，但实际上没有自尊、没有勇气、虚情假意、自私自

利的倔女人。在他眼里，她就是这个形象，在纸上，她与这个形象完全吻合。

以后的日子里，亨利尽最大努力避免再引起吵闹。没料到波尔又找到了一个斗气的借口：他同意去克洛蒂那儿做报告。他开始还试图辩白一番：连迪布勒伊都在克洛蒂那儿做了报告，那是为了给一个儿童之家弄点钱，难以拒绝。可是由于波尔缠着不放，他决定保持沉默。显然，这种策略只能给波尔火上浇油；她表面上也缄默不语，但脑瓜子里似乎在反复斟酌重大的决策。报告会那一天，当他在卧室的镜子前系领带的时候，她是那么严厉地看着他，以至他暗存侥幸地思忖：“这下她要主动提出跟我分道扬镳了。”他和蔼地问道：

“你坚决不陪我一起去吗？”

她突然大笑起来，要是亨利不了解她，真会以为她是疯子：“笑话！陪你去那个可笑的场面！”

“随你的便。”

“我还有更正经的事情要做呢。”她的话音分明在逗引别人追问。亨利乖乖地问道：

“你有什么事情要做？”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她傲慢地答道。

这一次，他没有再问下去。可当他刚梳理好头发，她忽然以挑衅的口吻说道：

“我要到《警觉》杂志社去见迪布勒伊。”

亨利猛地转过身，她不可能没有察觉到他的反应。“你为什么要去见迪布勒伊？”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这几天要找他说个明白。”

“说什么事？”

“我要跟他说的话多了，有我的，也有你的。”

“我求求你不要掺和我与迪布勒伊的关系。”亨利说，“你没有什么好跟他说的，你不要去见他。”

“我请你原谅，”她说，“我找他已经太晚了。那人是你的恶神，只有我能帮你摆脱他。”

亨利感到血往脸上涌。她要去跟迪布勒伊说些什么？亨利在怒不可遏或忧虑不安的时刻曾毫不顾忌地在波尔面前谈了自己的想法，要是这些话有的被搬过去，简直不能容忍。但是如何劝她不去呢？克洛蒂那儿在等着他，他无法在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找到法子说服她，除非把她捆起来或关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你瞎说。”

“瞧你，像我这样生活十分孤寂的人，思考问题的时间是很充裕的。”波尔说，“我考虑了你，考虑了有关你的一切，有的时候，我有所领悟。迪布勒伊那个人，我几天前就看透了他，而且看得十分准，非同一般。我终于看透了他准会不惜任何手段把你彻底毁掉。”

“啊！要是你开始产生什么幻觉的话！”他说。他试图找到办法恫吓一下波尔，可最终只找到一个：以分手相威胁。

“我相信的不仅仅是我的幻觉！”波尔故弄玄虚地说。

“那还相信什么？”

“我做了调查。”她说道，一束诙谐的目光紧逼着亨利。亨利困惑不解地打量着她：

“安娜肯定没有跟你说过迪布勒伊要毁掉我。”

“谁跟你说安娜了？”她说，“安娜！她眼睛比你还要瞎。”

“那么，你请教的那位超人一等的高明者是谁？”他问道，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

波尔的目光变得严肃起来：“我跟朗贝尔谈过了。”

“朗贝尔？你在哪儿见到了他？”亨利问道，气得喉咙发干。

“在这里，犯了罪了？”波尔神态冷静地说，“我打电话让他来的。”

“什么时候？”

“昨天。他也不喜欢迪布勒伊。”她得意地说。

“那是滥用别人的信任！”亨利说。一想到她用那古怪的语言、可笑的激动劲头与朗贝尔瞎说八道，他真恨不得扇她几耳光。

“你口口声声说什么纯真、风雅，”他气呼呼地说，“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共同生活，参与他的思想、他的秘密，却在他背后自作主张，事先不打声招呼，干那卑鄙的勾当，你听见了吧，”他一把抓住波尔的手腕说道，“卑鄙。”

她摇了摇头：“你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因为我为你的生活牺牲了我的生活，我对它享有权利。”

“我从没有让你做任何牺牲。”他说，“我去年曾想方设法帮助你创造你自己的生活，你死活不愿意。这是你自己的事，你对我没有任何权利。”

“我不愿意是因为你。”她说，“因为你需要我。”

“你以为我需要这样永无休止的争吵？你完全错了！有时，你真搅得我想永远也不再踏进这个家门。我这就跟你明说：要是你去见迪布勒伊，我决不饶恕你。你永远别再见我。”

“但是，我是想救你！”她激动地说，“你不明白你正在毁自己！你一味妥协，还要到沙龙去做报告……我知道你为什么再也没有胆量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你的惨败反映到了你的作品中，你感觉到了这一点。你感到耻辱。那耻辱感是那么强烈，以致你把手稿都锁了起来。非得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才会耻辱到这个地步。”

亨利狠狠地看着她：“如果我把手稿给你看，你向我发誓不去见迪布勒伊。”

波尔的神态突然软了下来：“你一定给我看？”

“你向我发誓？”

她思虑片刻：“我向你发誓今天不去找他。”

“行。”亨利说。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灰绿色封面笔记本，扔到床上。

“我可以读吗？真的？”波尔声音极不和谐地说。平日那份悲剧演员的自信在她身上不见了，相反，她突然显出一副可怜的模样。

“你可以读。”

“啊！我是多么高兴。”她说，继而羞涩地一笑，“今天晚上我们再像过去那样，好好讨论讨论。”

他没有回答，两只眼睛望着波尔用手掌轻轻地抚摸着笔记本。那上面只有纸、墨，看上去就像是锁在他父亲药房里的药粉一样安全、无害。实际上，他比一个下毒者还更卑鄙。

“再见。”当亨利逃跑似的快步穿过公寓时，波尔俯在栏杆上喊道。

“再见。”

下楼梯时，他还继续跑，试图忘却脑中的一切。待他晚上再与波尔见面时，她肯定已经全读过了。她准会细细阅读每一句话，重阅每一个字：这是一起暗杀。亨利止住了步子。接着，他手扶栏杆，返身慢慢地登了几级楼梯。那条黑狗狂吠着向他扑来。他恨这条狗、这座楼梯，恨波尔疯狂的爱，恨她一时缄默无语、一时又吵吵闹闹，恨她那些没完没了的烦恼事。他转过身子，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来到了街头。

这是一个美丽的冬日，天空蒙着薄薄的雾霭，背景呈玫瑰色。透过玻璃窗洞，亨利瞥见了一隅温柔的天际。他把收回的目光，向听众投去，可一见到面前的听众，到底该讲些什么，就更加让人犯难了。满目小巧玲珑的帽子、珠宝首饰和裘皮衣装：大多是女流之辈，尤其是那些风韵犹存、自以为善于修饰的女人。法国新闻史，这对她们来说会有什么兴趣？屋里太热，空气里弥漫着香水气味；亨利的目光与玛丽-昂热淡淡的笑靥相遇；樊尚乐呵呵地朝他扮了个鬼脸；不远处朗贝尔坐在一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阿根廷女郎和一位热心赞助文艺事业、弯腰曲背的女人之间。亨利没有勇气与朗贝尔正面相对：他感到羞辱，他再次垂下眼睛，一任话语从嘴中吐出。

“好，好极了！”

克洛蒂发出了鼓掌的信号，掌声四起，欢呼声雷动，他们纷纷向讲坛跑去。于盖特·伏朗热打开了亨利身后一扇小门：“往这边走。克洛蒂马上就要把那些太太们驱出门外，她只留下了您的好友和几位知己。您肯定渴得要命吧。”她补充说道，一边拉亨利往酒茶台子走去，那儿，朱利安独自一人面对着两个招待，正在斟一杯香槟酒。



“请你原谅，我什么也没有听。”他粗声粗气地说，“我来这儿，完全是为了白喝个够。”

“原谅你了。报告会嘛，听报告和做报告一样让人感到讨厌。”亨利说。

“对不起！我可一点都不感到讨厌。”樊尚说道，“甚至还觉得富有教益。”随后他又笑着说，“不过，我也要喝一杯。”

“喝吧！”亨利说，他脸上显出亲切的微笑。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夫人，胸前挂着荣誉勋位勋章，快步向他走来：

“谢谢您的支持！妙极了！您知道您报告的收入比杜阿梅尔更高！”

“我很高兴。”亨利说道，两眼寻找着朗贝尔。波尔跟他说了些什么？亨利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自己的私生活，他肯定通过纳迪娜了解了他的一些私事，可对此亨利根本不在乎，他与纳迪娜的那段风流韵事像一杯清水一般一目了然。波尔就不同了。他朝朗贝尔微微一笑：

“聚会结束后，用摩托送我回去，麻烦你吗？”

“我很乐意！”朗贝尔声音十分自然地說道。

“谢谢！咱们还可以聊聊。”

他打住了话头，因为克洛蒂像股狂风似的进了沙龙，向他快速奔来：“这下您可成了宠儿，您得为几本书题词：这些太太都是您狂热的崇拜者。”

“很高兴。”亨利说，他又低声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不能久留，报社等着我。”

“您无论如何要见贝洛姆母女一面，她们是专程为您而来的，她们即刻就到。”

“半小时后我就走。”亨利说。他接过一位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递过的书：“什么名字？”

“您不知道我叫什么，”金发女郎傲慢地淡然一笑说，“以后您就会知道的：科莱特·马松。”

她又神秘地一笑，表示谢意。亨利又在另一部书上题了另一位的名字。好一出闹剧！他签名、微笑，又微笑、签名。小沙龙里挤得满满的，他们成群结队，都是克洛蒂的知己。他们微笑着，紧握着亨利的手，双眼闪烁着好奇又好似放肆的光芒，重复着上一次对杜阿梅尔说过的话语，下一次也肯定会不加任何改变地对莫里亚克或阿拉贡老调重弹。不时有一位热忱的读者自以为非得倾吐出内心的崇敬而后快：这一位被一段对彻夜难眠的描写打动了心，那一位又为有关墓地的一句话动了情，可是提到的都是信笔涂抹、不足挂齿的段落。吉埃特·旺达杜尔嗔怪地向亨利发问，为何选择一些那么可悲的先生为主人公，紧接着向周围一大群更加可悲的人——微笑。“人们对小说的人物是多么苛刻啊！”亨利暗忖，“容不得他们有任何缺陷。这些人的读法都那么古怪！我猜想他们大多没有沿着给他们指引的道路前进，而是像瞎子似的在书中盲目穿行。偶尔，某个词在他们心间发出共鸣，唤醒了天知道什么往事或什么思念之情；或者，他们自以为从某个形象中发现了自己的映像。于是他们一时止步，对着映像仔细地观照，然后又摸索着迈进。最好还是永远不和自己的读者见面。”他心想。他走到玛丽-昂热身旁，玛丽-昂热一副嘲笑的神态打量着他。

“你为什么要嘲笑人？”

“我没有嘲笑，我在观察。”她用讥讽的口吻说，“你是应该隐居，你并不闪光。”

“要闪光得怎么办？”

“瞧瞧你的朋友伏朗热，好好学几课。”

“我没有这个天赋。”亨利说。

博取他们的赞叹，亨利没有这份雅兴；可非说要惹他们生气，也不实在。朱利安高谈阔论，一边故意显示，一边一杯接着一杯饮酒，周围的人们一个个露着纵容的微笑。“我呀，要是我有这样的名气，”他高声说道，“我非得赶快把他们一扫而光。贝尔桑斯 [3]、波利尼亚克 [4]、拉罗什富科 [5]，这些名字充斥着法国史书，全是历史灰尘。”他可以尽情侮辱这些历史名人，甚至说些不堪入耳的奇谈怪论，周围的人也少不了会着迷。一个写诗的人如果未能封以尊称、获得桂冠或授以勋位，那当个小丑倒也不错。朱利安自欺欺人，自以为高人一筹，可心底那种矮人一截的心理反倒证实了他的地位。不，唯一的办法是不与这些人打交道。围着克洛蒂大献殷勤的时髦作家和冒牌文人也许还更为让人沮丧。他们没有写作的兴趣，没有思维的心思，他们自寻的一切烦恼全都显现在脸上。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为自己创造形象，是获得成功；他们频繁交往，只是为了能更进一步相互嫉妒。多么可怕的乌合之众。亨利一眼瞥见了斯克利亚西纳，向他充满好感地微微一笑：此人虽然狂热、糊涂、难以容忍，却是活生生的。他用词说话是出于表达激情的需要，而不是用以换取金钱或沽名钓誉，在他身上，虚荣心是次要的，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缺点。

“希望你别埋怨我。”斯克利亚西纳说。

“当然不会，你是喝了酒。怎么样？你一直住在这里？”

“是的。我专门下楼来向你问个好，我原以为上流人士全走了呢。你就是对这些人做报告？克洛蒂还让我也说说呢。”

“这些听众并不差。”伏朗热迈着懒洋洋的步子凑过来说道，他挨个朝各位送去一个傲慢的微笑，在朗贝尔身上止住了目光：“腰缠万贯的人总是装得微不足道，可实际上他们对真正的价值往往具有鉴赏力。比如克洛蒂的奢侈就很精明。”

“奢侈，这让我讨厌。”斯克利亚西纳说。

玛丽-昂热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路易狠狠瞪了她一眼。

“您意思是想说假装奢侈吧。”于盖特宽容地说。

“不管是真奢侈还是假奢侈，反正我不喜欢。”

“人怎么能不喜欢奢侈呢？”于盖特问。

“我不喜欢那些爱奢侈的人。”斯克利亚西纳说。“在维也纳，”他突然补充道，“我们三个人挤在一间破屋子里，总共只有一件外套，还经常食不果腹。可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又表现了一种奇怪的犯罪心理。”伏朗热打趣地说。

“我有什么心理，我清楚，跟这毫不相干。”斯克利亚西纳生硬地说。

“当然相干！你们俩都是清教徒，和所有的左派分子一个样。”伏朗热转身朝亨利说道，“你们反感奢侈，因为你们难以承受良心的责备。这种清教徒的思想太可怕了。要是拒绝奢侈，渐渐发展下去，就是拒绝诗和艺术。”

亨利没有反驳。他对伏朗热的话不屑一顾。他所感兴趣的，是发现自他俩最后一次见面以后，伏朗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无论在他

的声音还是在他的微笑中，再也不见一丝谦逊的痕迹。他那种根深蒂固的傲慢本性又复活了。

“奢侈与艺术不是一码事。”朗贝尔怯生生地说。

“对。”路易说，“但是，倘若任何人都没有内疚的心理，倘若恶从地球上消失，那艺术也就消失了。艺术是一种容忍恶存在的企图。有组织的进步分子想要除恶：他们无异于判处艺术死刑。”他叹息道，“他们向我们展示的世界将是多么阴暗。”

亨利耸耸肩：“你们这些有组织的反进步分子，真是滑稽。忽而预言永远都无法消除不公平，忽而又宣称生活将变得像羊圈一般索然无味。完全可以用你们的论调反击你们自己的论调！”

“认为恶对艺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这个观点倒挺有意思。”朗贝尔审视着路易说道。

克洛蒂把手搭在亨利的胳膊上：

“吕茜·贝洛姆来了。”她说，“就是那位风度极为优雅、身材颇长的棕发女郎。来，我给您介绍一下。”

她手指着一位身着黑色服装、干巴巴的高个子女人，此人真的风度极为优雅？亨利从未真正明白这个词的意义，对他来说，女人只有让人喜欢和不让人喜欢之分，这一位就属于不让人喜欢之列。

“这位就是若赛特·贝洛姆小姐。”克洛蒂介绍道。

不可否认，姑娘相貌漂亮，但是若要扮演让娜，这种时髦的身段根本就不合适：裘毛服饰、香水、高跟鞋、红指甲、螺旋形的琥珀色云发，俨然一个普通而又华丽的玩具娃娃。

“我读了您的剧本，美极了。”吕茜·贝洛姆以肯定的口吻说道，“我肯定这部剧可以赚大钱：对这类事情我有嗅觉。我已经与第四十六

演出厅经理维尔依谈及此事，他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很感兴趣。”

“他不认为剧本争议太大吗？”亨利问道。

“争议大可以把剧本打入冷宫，也可以帮助推出剧本，这取决于许多因素。我以为可以说服维尔依冒一次险。”她停顿了片刻，接着没有任何过渡性的词语、近乎蛮横地说：“维尔依准会同意给若赛特一次机会。若赛特只扮演过一些小角色，今年才二十一岁，可她富有演技，对人物的感觉方式尤为惊人，我希望您亲耳听一听她对第二幕那段重头戏的处理。”

“我将很乐意。”亨利说。

吕茜朝克洛蒂转去身子：“您有没有个安静的地方，让姑娘表演一下？”

“噢！现在不行。”若赛特说。

她一副惊恐的神态看了看她母亲，又看了看亨利。她没有那些华贵的模特儿常有的自信，相反，她似乎为自己的美貌感到惶恐不安。两只浅色的大眼睛，一张稍稍有点厚的嘴巴，浅黄褐色的云发下，乳白色的肌肤晶莹透亮，她确实相貌不凡。

“只是十来分钟的事情。”吕茜说。

“但是我不能就这样仓促上场。”若赛特说。

“不要着急。”亨利说，“假如维尔依真正接受剧本，我们再约。”

吕茜嫣然一笑：“如果说定若赛特扮演主角，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一定会接受。”

金发女郎从脖子一直红到头发根，细嫩的肌肤烧得像团红红的火。亨利朝若赛特亲热地笑了笑：

“您愿意定个日期吗？星期二，四点左右，您行吧？”

她点了点头。

“您就上我家来好了。”吕茜说，“您工作起来保准很方便。”

“您对角色感兴趣吗？”亨利习惯性地问道。

“当然。”

“我承认我设想中的让娜没这么漂亮。”

悲切的唇间掠过一丝文雅的微笑，可惜未能留在嘴边，对于成功必不可少的各种面部表情变化技巧都已经教过若赛特，可她表演笨拙。这张迟钝的面孔，配上两只缺乏机智的眼睛，扮演了各式各样的假面具。

“对一个女演员来说，再美也不过分。”吕茜说，“当您那位好妻子半裸着身子登台表演，观众们想看到的，正是这种东西。”她突然撩起若赛特的裙子，两条柔嫩光滑、修长的大腿连同半个臀部暴露无遗。

“妈妈！”

若赛特惊恐的声音使亨利心头为之一颤，她真的只是一个跟别的东西没有两样的华丽的玩具娃娃吗？她肯定不大聪明，亨利暗忖，可无法相信这张悲怆动人的面孔会没有任何表露。

“别假作天真了，这不是你的行当。”吕茜·贝洛姆声音生硬地说，接着添了一句：“你没有把约会时间记下来？”

若赛特乖乖地打开小提包，取出一个记事本。亨利瞥见了一块花边手绢和一只玲珑精致的金粉盒。昔日，那女人小包的里边对他似乎充满神奇的奥秘。他接过修饰得像麦芽糖似的细长的手指，在手中握了片刻：

“星期二见。”

“星期二见。”

“她中您的意吗？”等母女俩一走，克洛蒂猥亵地一笑，“要是您真的动了心，您就去。那个可怜的丫头，长得可并不太诱人。”

“为什么可怜？”

“吕茜活得并不容易。您知道，成功之前吃尽了苦头的女人，一般都不是贤妻良母。”

若在别的时候，亨利说不定会兴致盎然地听克洛蒂说长道短，可伏朗热和朗贝尔在场，而且看来谈得还十分火热。伏朗热侃侃而谈，姿态优雅；朗贝尔则不停地点头，满脸微笑。亨利真恨不得加以干涉。忽见樊尚离开了酒柜，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樊尚粗声粗气地嚷道：

“我想给您提个问题，只问一句：像您这种家伙在这儿干什么？”

“您瞧，我不是在与朗贝尔交谈吗？”路易平心静气地回答道，“您嘛，是来灌酒的，这也同样是明摆的事。”

“也许事先没有人告诉您，”樊尚说，“这是一场为关进集中营的人的子女募捐的报告会。这里没有您的位置。”

“谁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确切位置？”路易说，“倘若您认为清楚自己的位置，那准是上帝对酒鬼们的特殊恩赐。”

“噢！那是因为樊尚是个人物！”朗贝尔尖刻地说，“他无所不知，对谁都评头论足，而且从不出错，而且您也用不着出钱让他给您上课。”

樊尚脸色苍白，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仿佛眼中就要喷出血来。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总算认出了一个混账家伙……”



“我认为这个年轻小伙子需要治一治。”路易说，“这般年纪的小伙子，浑身冒着酒气，让人看了泄气。”

亨利急忙凑上前去：“你那么勇敢，口口声声要容忍罪恶，可你突然又变得这么严厉！樊尚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生活，为什么人就不能多喝酒？”

“一个混蛋，一个混蛋小子。”樊尚一声狠狠的冷笑，低声骂道，“两人肯定气味相投。”

“你说什么？再重复一遍！”朗贝尔说。

樊尚加重了声音：“我说你居然跟一个出卖了罗莎的家伙重归于好，必定是个混蛋。你还记得罗莎吧？”

“跟我下楼到院子里去，咱们讲个清楚。”朗贝尔说。

“用不着下去。”

亨利拉住樊尚，路易把手搭在朗贝尔的肩头说道：“算了。”

“我恨不得砸了他的脑袋。”

“另找一天。”亨利插话道，“你答应用摩托送我回去的，我现在有急事。你嘛，就让我们安宁一会儿吧。”他和蔼可亲地对樊尚说道，樊尚满嘴含糊不清地叫骂着。

朗贝尔给拉走了，可穿过院子时，他脸色阴沉沉地说：“你不该拦我，要不，我准好好教训他一顿。你知道，我可会打了。”

“我没说你不会，可动拳头，是蠢事。”

“我本该不动嘴巴，马上就动手打的。”朗贝尔说，“我反应不快，该动手的时候，却动嘴。”

“樊尚喝了酒，你完全清楚他有点疯疯癫癫。”亨利说，“别计较他说了些什么。”

“那太便宜了他！若他果真疯到这个地步，你不会与他要好的。”朗贝尔气呼呼地说。他跨上摩托车问道：“你上哪儿？”

“回我家。等一下再去报社。”亨利说。

他脑中突然出现了关于波尔的幻觉。她坐在公寓中间，目光呆滞，身子一动不动：她读了手稿。有关分手的那一场景，她一句句、一字字细细地读过了。她知道了亨利对她的全部看法。他渴望再见到她，立即见到她。朗贝尔沿着河畔马路，驾车疯一般地向前飞驰。当他在最后一道红灯前停下车子时，亨利问道：

“咱们喝一杯吧？”

他必须立刻见到波尔，可一想到就要与她正面对峙，他缺乏这份勇气。

“随你。”朗贝尔闷闷不乐地说。

他们走进了河畔马路一角的那家咖啡馆，在酒柜前要了几杯白葡萄酒。

“你总不能因为我阻拦了你和樊尚打架，就朝我出气吧？”亨利和蔼地说。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受得了那个家伙。”朗贝尔愤怒地说，“他酗酒，逛妓院，衬衫脏得全是污垢，还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勇士架势，这一切让我看了恶心。他在游击队杀过人，可像他这样的多了，根本就不成其为故作悲惨、游戏人生的理由。纳迪娜称他为大天使，笑他差不多是半个废人！不，我实在不明白。”朗贝尔重复说，“若他真疯，那就给他过几次电，让他别再碍我们的事。”

“你太不公道的！”亨利说。

“我倒认为是你偏袒。”

“我是很喜欢他。”亨利有些生硬地说，紧接着补充道：“我想跟你说的不是樊尚。波尔跟我谈了一件怪事，她昨天打电话找你去，向你提了一些有关迪布勒伊的问题。我觉得她这样做极为不妥，当时的情况也许让你很为难。”

“不。”朗贝尔连忙说，“我没有听明白她到底想说些什么，可她很客气。”

亨利审视着朗贝尔，他真的显得十分真诚，也许波尔在他面前规规矩矩的。“眼下，她正恨迪布勒伊，这女人太过分了，你可能没有感觉到。”

“对，可我也不太喜欢迪布勒伊。她并没有为难我。”朗贝尔说。

“那就好！我担心你们这次见面不愉快。”

“一点儿也不。”

“那就好！”亨利重复道。“等会儿见。谢谢你送我。”

亨利缓步踏进小巷。再也不可能拖延，两分钟后，他就要面对波尔，脸上就要感觉到她的目光，他将不得不寻找遁词。“我矢口否认。我就告诉她伊维特与她毫不相干，只不过借用了她的一些言谈举止，但一切都做了变动。”亨利开始登楼梯。“她决不会相信我的！”他心里想。也许她都不会容许他开口辩解，或许……他加快了步子，他喉咙紧缩，跑上最后几级楼梯。没有一点响动，没有一声狗吠，没有闹钟的摆动声，也没有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声。“死一般的沉寂。”他自言自语道。忽然他恐惧地想到：“她自杀了！”他在门前止住步子，这时耳边传来低语声。

“进来。”

波尔笑盈盈的，她还活着。坐在长沙发边沿的女门房站了起来：“我这些破事情浪费了您的时间。”

“哪里话。”波尔说，“您的事我很感兴趣。”

“放心吧，明天我就跟房主说去。”女门房说道。

“天花板开始塌了。”等女门房关上门，波尔乐呵呵地说。“这女人很有趣。”她补充道，“她跟我谈了许多有关街头流浪汉的趣闻，都可以写本书了。”

“我想象得出。”亨利说。他带着交织着失望和轻松的复杂心情望着波尔，她跟女门房整整闲聊了一个下午，没有来得及读手稿，刚才的一切又要重新经历。他完全清楚自己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她没有让你读成我的小说吧？”他平心静气地问道，继而强作笑脸，“那可很值得一读！”

波尔神情激动地瞥了他一眼：“可我已经读过了！”

“啊！你有什么看法？”

“很出色。”她说得直截了当。

他拿起笔记本，故作淡漠地翻了翻。

“你觉得夏瓦尔这个人物怎样？你认为他可爱吗？”

“并不十分可爱，可他具有真正的伟大之处。”波尔说，“我猜想你想达到的正是这一点。”

亨利点了点头：“你喜欢七月十四日那个场面吗？”

波尔思索片刻：

“并不是我偏爱的段落。”

亨利打开了决定命运的那一页：“与伊维特分离那一段，你有何看法？”

“很动人。”

“你真觉得？”

波尔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你为何感到惊奇？”接着淡然一笑，“你落笔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们吧？”

他把笔记本扔到桌上：“你真蠢！”

“这将是你最出色的一本书。”波尔以权威的口吻说道。她含情脉脉地把手伸进亨利的头发：“我真不明白你为何这般故弄玄虚。”

“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他说。

亨利被深深的沉寂憋得几乎惶恐不安。地毯、窗帘和帷幔把豪华、宽敞的客厅裹得严严实实，透过紧闭的门扉，听不到一声富有生气的动静。亨利不禁自问是否非得掀翻家具，才能把某个人叫醒。

“我让您久等了吧？”

“没怎么等。”他彬彬有礼地说。

若赛特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面前，唇间挂着惊恐的微笑。她身着一件琥珀色的衣裙，显得单薄，很不得体。“她长得并不诱人。”克洛蒂曾这样说过。这笑靥，这静寂，还有铺着裘皮的沙发，显然在引诱着各种放肆的举动。这再也明白不过了。若乘机下手，亨利准会感到自己像当着一个暗自冷笑的鸨母的面，干了诱骗少女的勾当。他有些生硬地说：“如果您愿意，我们马上开始。我比较忙。您有本子吧？”

“那段独白我背会了。”若赛特说。

“开始。”

他把剧本放在独脚小圆桌上，舒适地往安乐椅一坐。那段独白最难把握。若赛特本就没有理解，紧张得如同惊弓之鸟。亨利见她胡演一气，却又强烈地希望能中他的意，心里很不好受。他显然感到自己

就像是腰缠万贯的裸露癖，正在一家高级妓院观看一场别开生面的裸体表演。

“我们试试第二幕第三场。”亨利说，“我给您配台词。”

“边念边演，难呀。”若赛特说。

“试试吧。”

这是一场爱情戏，若赛特表演得稍自如一些。她吐词清晰，面部表情和声音甚为动人。谁知道一个机智的导演最终会在她身上猎取什么东西？亨利乐呵呵地说：

“您完全没有进入角色，但有希望。”

“真的？”

“我敢肯定。请您在这儿坐下，我给您解释解释角色。”

她坐在他身旁。他已经很久没有有这样漂亮的姑娘身边坐过了。他一边说戏，一边嗅着她的秀发。她用的香水与别人的没有两样，然而从她身上散发出的这股芳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馨香。它激起了亨利强烈的欲望，他恨不得闻一闻他隐隐约约从她衣裙下嗅出的那另一种湿润、温馨的气息，禁不住想在她的云发间狂吻，把自己的舌头伸入她那胭红的嘴里：这一切轻易可以得到，甚至再容易不过。他感觉到若赛特正顺从地等待着他爆发出强烈的欲望，可那股顺从劲儿真叫人泄气。

“您明白了吗？”他问道。

“明白了。”

“那快去，我们重新开始。”

他们重练了一遍，她试图把真情实感灌注到每一句台词中去，可反比第一次糟糕多了。

“您太过分了。”他说，“演得再纯朴一些。”

“啊！我怎么都演不好！”她深表遗憾地说。

“多练练，您就会演好的。”

若赛特长叹了一口气。可怜的丫头！等一会儿，她母亲又要斥责她不争气了。亨利站了起来。他对自己的顾忌有些遗憾：这张小嘴是多么惹人喜爱！跟一个真正诱人的女人睡觉，他回味着这曾给他带来多大的欢乐。

“我们再另约一次吧。”他说。

“我白白浪费了您的时间！”

“对我来说，这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亨利说。他微微一笑，“倘若您不害怕浪费您的时间，也许下次试戏后我们可以一起出门走走？”

“可以。”

“您爱跳舞吗？”

“当然。”

“那我一定带您去跳。”

第二个星期六，亨利又来到加布里埃尔街若赛特的家，沙龙里摆着玫瑰色和白色的家具，光滑如缎。他一见到她，心中不禁微微一震。这是真正的美的化身，眼睛一旦离开了她，就无法确切地描绘：若赛特的肌肤比他记忆中的更白皙，云发的色彩也更淡雅，她那两只眸子仿佛嵌着闪光片，犹如比利牛斯山激流一般深邃。亨利一边漫不经心地给她配台词，一边用目光打量着这具被黑丝绒衬托得线条分明的躯体，他暗暗思忖，只要有这容貌，这声音，她的多少笨拙都可以原谅。再说，只要好好引导，看不出若赛特就为什么非要比别的女人笨。相反，有的时候，她甚至把握住了动人的音调。亨利决定一试。

“准行。”他热情地说，“当然，还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但准行。”

“我是多么希望能行啊！”她说。

“现在我们去跳舞。”亨利说，“我想可以去圣日耳曼-德普雷区，您觉得如何？”

“随您。”

他俩来到了圣伯努瓦街的一家地下舞厅，坐在一幅肖像画下面，画中的女人长着胡须。若赛特身着一条舞裙，她脱去开襟短背心，露出浑圆、丰腴的臂膀，与她那张娃娃脸形成鲜明对照。“要让我提起玩乐的兴致，缺的正是这东西。”他快活地思忖，“身边伴着一位放荡的美女。”

“我们跳舞吧？”

“跳。”

手中搂着这个轻柔、温顺的躯体，他不禁感到有点昏眩。他过去是多么喜爱这种昏眩！如今他仍然兴头不减！他重又爱上了爵士乐，爱上了这烟雾、这年轻的声音和别人那欢快的劲儿。他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去爱这乳房、这腹部。只是在冒险一试之前，他还是希望能先感觉到若赛特对他已有所好感。

“这地方您喜欢吗？”

“喜欢。”她犹豫了一下，“很特别，对吗？”

“我想是的。您更喜欢什么样的场所？”

“噢，这里很好。”她急忙说。

只要他想让她开口说话，她就露出一副惶恐不安的神色。她母亲也许对她谆谆教导，叮嘱她学会保持沉默。他们就这样边喝酒边跳



舞，一直沉默到清晨两时许。若赛特显得既不悲伤，也不快活。两点时，她要求回家去，他实在闹不清她要回家到底是因为厌烦、困倦，还是出于稳重。他送她回家。在车上，她认真而有礼貌地说：“我很想读一本您的书。”

“那容易。”他朝她微微一笑，“您爱读书？”

“当我空闲时。”

“您常常得不到空暇？”

她叹息道：“不一定。”

她到底是真蠢或只是有点儿不开窍？抑或因为羞怯而变得迟钝？一时难以断定。她如此漂亮，按常理，她该是个傻姑娘；但同时，她的这副美貌又使她显得神秘莫测。

吕茜·贝洛姆决定在她府上签约，在这之前，还要举行一次亲切的晚宴。亨利打电话给若赛特，请她共同庆贺这个好消息。她一副上流女士的腔调，对他友好的亲笔题词并差人把书送到了她家深表谢意，然后约他晚上在蒙马特尔一家小酒吧相见。

“您高兴吗？”亨利紧握着若赛特的手不放，问道。

“因为什么事？”若赛特反问道。她显得不像平常那样年轻，而且没有一点儿高兴的模样。

“签约的事。已经决定签约了。您不高兴？”

她把一杯维希矿泉水送到唇边。

“这让我害怕。”她低声地说。

“维尔侬又不疯，我也不疯。别害怕，您一定会很出色。”

“可您预想的角色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吧？”

“我再也不会设想别的样子。”

“真的？”

“真的。”

确是真的。她演的角色可能好一点或者差一点，但是他不愿设想让娜可能会有别的眼睛、别样的声音。

“您太可亲了！”若赛特说。

她带着真挚的感激之情凝望着他。可不管她出于谢意还是出于盘算，这毫无差别，亨利意欲得到的不是这个。他没有乱动。在那甜蜜的靡靡静寂之中，他俩谈起了可能的导演人选、角色分配以及亨利所希望的布景配置。若赛特仍然惶惶不安。亨利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她久久地握着他的手：

“星期一见。”她声音哽咽地说。

“您不再害怕了吧？”他问道，“您可以乖乖地入睡了？”

“不，”她说，“我害怕。”

他微微一笑：“您就不请我最后再喝一杯威士忌？”

她神情快乐地看了看他：“我不敢！”

她急匆匆登上楼梯，把裘皮披肩一扔，露出了裹着黑丝裙的上身。她递给亨利一大杯酒，里面的冰块发出欢快的叮当声。

“祝您成功！”他说。

她猛地触摸了一下木桌面 [6]：“别这样说！我的上帝！要是我演得很糟糕，那该多么可怕！”

他又重说了一遍：“您一定出色！”

她一耸肩膀：“我一事无成！”

他淡然一笑：“这倒让我惊奇。”

“事实就是这样，”她犹豫了一下，“我不该跟您说的：到时您一定会丧失信心。今天下午我去见一位用纸牌算命的女人，她告诉我正面临着一次深深的失望。”

“用纸牌算命的人总爱夸大其辞。”亨利坚定地说，“噢，您是不是碰巧定做了一件新的裙服？”

“是的，是为了星期一穿的。”

“呃，这件裙服赶不上穿了，这就是您面临的失望。”

“噢！这可真让人扫兴！”若赛特说，“晚宴上我穿什么？”

“失望，确实让人失望。”他笑呵呵地说，“别担心，您准还是最漂亮的。”他补充道，“不管是星期一，还是别的时候，这总不比胡演一通严重吧，是吗？”

“您安排事情的方式是那么可爱！”若赛特说，“遗憾的是您不能把上帝的位置夺过来。”

她紧紧地挨着他。难道仅仅是感激之情使她圆圆地鼓起她的嘴巴、双眼变得蒙蒙眈眈？

“可我也不会把我的位置让给上帝！”他双臂拥抱着她说道。

当亨利睁开眼睛时，他在若明若暗之中隐约看见了一面淡绿色贴面的墙壁，这第二天的轻松劲儿在他心头升腾而起。他要求得到强烈、刺激的乐趣：冲个冷水澡，擦擦马鬃手套。他悄悄地溜下床，没有惊醒若赛特。当他洗完澡，穿上衣服，又饥又渴地走出浴室时，若赛特仍在酣睡。他踮着脚尖穿过房间，朝她俯去身子。她盘曲着身子，浑身湿漉漉的，散发着温馨的气息，晶莹的秀发自然披散在眼前，亨利为拥有这个属于他的女人，为自己是个男人而感到无比幸福。她微微睁开一只眼睛，仿佛还试图用另一只眼睛挽留住睡意。

“你已经起床了？”

“对。我要到街角的酒吧去喝杯咖啡。马上就回来。”

“不，”她说，“不！我给你沏茶。”

她揉着惺忪的睡眼，爬出被窝，身上穿着毛绒绒的内衣，浑身热乎乎的。亨利把她搂在怀里：

“你就像一个农牧神童。”

“一个农牧女神。”

“一个农牧神童。”

她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朝他伸去嘴巴。无论像波斯公主、印度小姑娘，还是像狐狸、像牵牛花，或像一串美丽的紫藤花，只要说她们像这种或那种东西，女人们总是喜欢的。“我的农牧神童。”他轻轻地拥吻着她，反复说道。她穿上晨衣，趿上拖鞋，亨利跟着她来到厨房。天上阳光灿烂，洁白的方砖地面闪闪发光，若赛特动作迟疑地忙乱着。

“牛奶还是柠檬？”

“来点儿牛奶。”

她把茶盘端进肉色的小客厅，亨利好奇地打量着里面的独脚小圆桌和镶边墩状软垫。若赛特衣着服饰如此得体，言谈举止如此和谐，她怎能生活在这种糟糕的像电影布景似的环境之中？

“是你布置了这间屋子？”

“是妈妈和我。”

她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他，亨利连忙说：

“屋子很漂亮。”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住在母亲家的？为什么不住？他突然想对她提出一连串问题。她已经走过了整整一段人生旅程，度过了每一个白昼、每一个黑夜的每一个小时，然而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眼下不是让她经受审问的时刻，但是身置所有这些挑选得十分糟糕的小摆设和这些无形的纪念品中间，他感到很不自在。

“你不知道咱们该做点什么吧？咱们俩去散步：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早晨。”

“散步？去哪儿？”

“到街上。”

“你是想说漫步？”

“对，漫步街头。”

她显出为难的神色：“那我得换衣服吧？”

他哈哈一笑：“那敢情好，可你没有必要打扮得像个贵夫人。”

“我穿什么衣服？”

早晨九时漫步街头，怎样穿戴？她打开壁橱，翻开抽屉，披肩和衣服抖搂了一件又一件。她穿上了长统丝袜，亨利透过手心，重又感觉到了这紧裹着丰腴的肉体、燃烧着一团火似的丝织物。

“这样行吗？”

“你美极了。”

她身着一件浅色的套衫，肩披一条绿色披巾，头发高高挽起：她可真姿色迷人。

“你不觉得我穿上这件套衫显得胖了？”

“不。”

她神色忧虑地照着镜子。她发现了什么？做女人，做漂亮女人，此中滋味怎能从镜中体察得到？腿上的丝袜和热乎乎的腹部光灿灿的衣缎的这般轻抚，怎能从镜中感觉得出？他自问道：“她对我们的良宵将留下怎样的记忆？她在这夜里是否呼唤过别的名字？皮埃尔，维克多，雅克？亨利这一名字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指了指以显著的位置放在独脚小圆桌上的他的那本小说。

“你读过了？”

“我看过了。”她犹豫片刻，“真蠢，我读不懂。”

“读书让你厌烦？”

“不，可我很快就会梦想到别的事情。一个词就会引起我走神。”

“走神走到哪里去？我是想说，你梦想什么？”

“噢！说不清。做梦，总是糊里糊涂的。”

“你梦想某些地方、某些人？”

“什么也不，只是梦想而已。”

他把她搂到怀里，笑咪咪地问道：

“你经常动情吧？”

“我？”她耸耸肩膀，“对谁？”

“爱过你的人一定很多，你这么漂亮。”

“长得漂亮，这让人活受欺侮。”她扭过脑袋说道。

他松开双臂，他实在不太明白为什么她会引起他如此怜悯。她生活奢侈，不劳而食，长着贵小姐的嫩肢嫩手，可一见到她，怜悯之心往往油然而生。

“这么早在街上走真有趣。”若赛特朝天空扬起涂抹了脂粉的脸说道。

“跟你一起在这儿真有趣。”他紧挽着她的手臂说道。他欢快地呼吸着外面的空气。这个早晨，一切都似乎焕然一新。春意清新，虽然刚刚复苏，但从空气中已经闻出它那么默契、温馨的气息。阿佩斯广场散发着青菜和鲜鱼的味道，一些身着晨衣的妇人正在以怀疑的神态仔细察看着时鲜生菜，她们那睡得黏乎乎的头发呈现出从未见过的色彩，不像自然的色泽，也没有艺术的光彩。

“瞧那个老妖婆。”他手指着一位涂脂抹粉、珠光宝气、头戴一顶脏乎乎的高顶礼帽的老太婆。

“噢！我认识她。”若赛特说，“她不招人喜欢，也许哪一天我也会落到这个地步。”

“我不信。”他俩默默地下了几级台阶。若赛特的鞋跟太高，连连绊脚。亨利问道：“你多大年纪？”

“二十一岁。”

“我是想问：你真的多大？”

她迟疑了一下：“我二十六岁了。你可别告诉妈妈我对你说了。”她恐惧地补充道。

“我都已经老了。”他说，“你显得那么年轻！”

她叹息道：“因为我时刻都留心自己，这可真费神。”

“你就别费这个神了！”他深情地说，他把她的手臂搂得更紧了，“你早就想搞戏剧了吧？”

“我从来就不愿意当模特儿，我不喜欢老家伙们。”她嘀咕道。

显然是她母亲为她挑选了情夫，也许她真的从未爱过。二十六岁了，看她那双眼睛，那张嘴巴，竟然从未有过爱情，她可真值得怜悯！“那我，我对她来说是何许人？”他自问道，“我以后会是怎样一个

人？”不管怎么说，她昨夜表现出来的乐趣是真情实意的，她两只眸子里射出的信赖的目光是真挚的。他们来到了克利希林荫大道，赶集商人落脚的临时木棚还在沉睡；两个孩子骑着一只小小的旋转木马在打转；高低起伏的滑车道被罩在篷布里睡大觉。

“你会玩日本弹子球吗？”

“不会。”

她乖乖地跟他来到一张布着洞眼的球台前，站在他的身旁。亨利问道：“你不喜欢集市？”

“我从来没有赶过集。”

“你也从来没有登过游艺滑车或坐过鬼怪游艺火车？”

“没有。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很穷，后来妈妈把我送进寄宿学校，等我出来时，我已经成了大人。”

“你当时多大？”

“十六岁。”

她认真地把木球弹向圆洞：“真难。”

“不难，瞧，你差不多赢了。”他又挽起她的胳膊，“最近哪个晚上，我们一起去坐木马玩。”

“你，你坐木马？”她一副怀疑的神态问道。

“当然我一个人不会去坐。”

她在陡坡道上又绊了一下。

“你累了吧？”

“我的鞋子挤得我好疼。”

“进里面去。”亨利顺手推开了一家咖啡店的门，说道。这是一家堂面很小的店，桌上铺着漆布。“你喝点儿什么？”



“一杯维希矿泉水。”

“怎么总是喝维希矿泉水？”

“因为肝。”她神色阴郁地解释道。

“一杯维希矿泉水，一杯红葡萄酒。”亨利招呼道。他指了指挂在墙上的一张布告牌：“看！”

若赛特声音缓慢而又深沉地念道：“只饮葡萄酒，反对酗酒。”她毫不掩饰地咯咯大笑起来。

“真有意思！你熟悉的地方可真有趣。”

“我从未来过这里。可你知道，随便走走可以发现许多新奇的东西。你从来不出门走走？”

“我没有时间。”

“你到底忙些什么？”

“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上朗诵课，买东西，去美发厅：你想象不出上美发厅要花费多少时间，还有茶会、鸡尾酒会。”

“这些玩意儿，你都有乐趣吗？”

“你可见过多少有乐趣的人？”

“对自己生活满意的人，我认识的真不少，比如我就是个。”

她没有说什么，他温柔地搂着她。

“怎样才能让你高兴？”

“不再需要妈妈，能肯定永不再受穷。”她一口气说道。

“这都会实现的。你到时做些什么？”

“我到时会的。”

“我是问你到时做些什么，你去旅游？出门远行？”

她耸耸肩：“我没有想过。”

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只金质粉盒，抹了抹嘴唇：“我得走了，我要到妈妈的时装店去试装。”她忐忑不安地瞧了瞧亨利，“你真认为我的裙子赶不上穿了？”

“不。”他哈哈大笑着，“我认为那个算命女人完全错了。你知道，她们有时会算错的。那件裙子漂亮吗？”

“你星期一就可以看到了。”若赛特叹息道，“为了给我自己做广告，我不得不多抛头露面，这样我也就得精心打扮。”

“精心打扮让你厌烦吧？”

“你知道那试装有多烦人！弄得我整天头昏脑胀。”

他站了起来，两人往出租汽车站走去。

“我送你。”

“别麻烦了。”

“我高兴送。”他深情地说。

“你真好。”

每当她闪动那两只眸子，用她那特有的嗓音说一声“你真好”，这声音总是一直飘进他的心窝。在出租汽车上，亨利让若赛特的脑袋依偎在他的肩头，心里自问：“我能为她做些什么？”扶助她成为演员，对，可是她并不特别喜爱戏剧，这决不能填补他在他身上感觉到的空虚。万一她不成功或她对自己生活的严峻与无聊不满？可让她对什么产生兴趣呢？想方设法与她交谈，开阔她的思路……他总不能到处带着她去参观博物馆，参加音乐会，给她借书，把她介绍给所有人吧。他轻轻地吻着她的头发。应该把爱献给她：跟女人打交道，最终总是这个结局。对所有的女人，都应该给予特有的爱。

“今晚见。”她说。

“好，我到我们的那个小酒吧等你。”

她轻柔地按了一下他的手，他意会到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将共枕同眠的良宵。当她消失在庄严的大楼里时，亨利举步向塞纳河走去。十一点半。“我可提前到达波尔身边，定会让她高兴。”他心里想。这天早上，他渴望让所有的人高兴。“不过，”他有些忧虑不安地想，“我无论如何得跟她谈谈。”怀中搂抱过若赛特之后，他一想到要和波尔过夜，就再也无法忍受。“也许这对她来说无所谓，她十分清楚我对她再也没有任何欲望。”他满怀希望地思量。波尔极力逃避，不承认是他小说中那位可悲的女主人公，然而自从读过手稿之后，她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吵闹，看见亨利把手稿、衣服一点点转移到旅馆的房间去，也不再反对。亨利经常在旅馆过夜。谁知道她是否会平心静气地同意在和睦、安宁的气氛中相处？这初春的蓝天洋溢着多么欢快的气息，人们仿佛可以实实在在地生活，而不造成他人的痛苦。在街道拐角，亨利犹豫不决地在一家花店前止住了脚步，他真想像昔日那样给波尔带回去一大束淡色的紫罗兰，但是他害怕这反而会引起她惊奇。“捎一瓶好葡萄酒，也许不会引起过多麻烦。”他打定主意，往隔壁的食品杂货店里走去。上楼梯时，他满怀喜悦。他又饥又渴，嘴中已经感觉到了陈波尔多酒醇厚的滋味，他把酒紧紧贴在心间，仿佛它凝聚了他意欲献给波尔的全部情谊。

他像往日一样没有叩门，轻轻地把钥匙伸进门锁，推开了房门。波尔没有听见一点儿声响，正跪在地毯上，上面撒满了旧纸片：他认出了那些正是他写给她的信。她双手捧着一幅他的照片，正在仔细地端详，那神情他从未见过。她没有哭泣，可是一旦看到那两只干涸的眼睛，不难明白泪水虽然已经流尽，但还残存着一线希望。她正视着

自己的命运，对它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但仍然接受它的安排。她面对那幅毫无生气的照片，显得那么孤单，不禁使亨利感到手足无措。他又关上门，一股怒气不可阻挡地陡然而起，原先的怜悯之情顿时凝固了。他叩了叩门，只听得一阵丝绸的窸窣声和纸张的沙沙声，接着她用极不镇定的声音说道：“进来。”

“你在干些什么玩意儿？”

“我正在读以前的信，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早回来。”

她把信全扔在了安乐椅上，照片早已藏了起来。她面部表情平静，但抑郁不欢。他应该清楚她早已不见欢乐。他气恼地把酒放在了桌上。

“你最好不要沉湎于过去，还是多在现实中生活吧。”他说。

“噢！你知道，现实！”她茫然地朝桌上瞥了一眼。“我没有摆餐具呢。”

“我带你去饭馆好吗？”

“不！不！我一会儿就好。”

她向厨房走去，他把手伸向那些信。“别动！”她猛地吼道。

她一把抓起信，全部扔进了一个壁橱。他耸耸肩。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有道理的，所有这些凝固了的陈旧的话语已经全都变成了谎言。他默默地看着波尔在桌边忙碌。要跟她谈情谊并不容易啊。

他们相对而坐，面前放着一个个盛着冷盘的椭圆形小盘子。亨利启开了瓶盖。

“你喜欢波尔多红酒，对吧？”他殷勤地问。

“是的。”她漠然地回答。

当然，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企图与波尔共庆他新的艳遇，这是极端的盲目与自私。但是，亨利在责备自己的同时，却渐渐感到了一种极度的忌恨悄然而生。

“你总该出门走走吧。”他说。

“出门走走？”她如坠雾里似的问道。

“是的，到外面走走，看看人。”

“干什么？”

“整天闷在这个窝里，这于你有何好处？”

“我的窝，我喜欢。”她悲切地一笑说，“我并不感到厌倦。”

“我不能让你像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你再也不愿唱歌，就不唱，这事就算了。可你得设法找点别的事做做呀。”

“什么事？”

“得去找呀。”

她摇摇头：“我都三十七岁了，又什么行当都不会。我可以去捡破烂，还能干什么？”

“行当是可以学会的，什么东西也不会阻挡你去学呀。”

她忧虑不安地看了看亨利：“你是想让我挣钱过日子吗？”

“这不是钱的问题。”他有力地说，“我是想让你对事情感兴趣，让你有所事事。”

“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俩。”她说。

“这不够。”

“十年来就是这么过的。”

他集中了身上的全部勇气说道：

“听着，波尔，你完全清楚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已经变了，自欺欺人无济于事。我们曾有过美好、高尚的爱情。必须承认这种爱情正在逐渐成为友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绝对不是。”他紧接着补上一句，“但是，你必须重新独立生活。”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决不可能对你产生什么友情。”她唇间掠过一丝微笑，“你对我也是一样。”

“会产生的，波尔……”

她打断了他的话：“瞧，今天上午，你迫不及待，未到固定的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回到了家。你过去敲门敲得这么急过吗？你就称此为友情。”

“你错了。”

见她如此固执，他重又怒火中烧。突然，他想起了刚才在她脸上无意中发现了多么悲切的神情，涌上喉间的恶言恶语即刻消失了。他们默默无语地吃完了饭。看波尔的脸色，容不得任何寒暄。离开饭桌时，她声音平淡地问道：

“你今晚回这里来吗？”

“不。”

“你不常回来了。”她说，她苦笑一笑，“这是你新的友情计划的一部分吧。”

他迟疑地说：“就这么认为吧。”

她目光强烈地打量了他良久，然后慢吞吞地说：“我跟你说过，我现在对你是一种宽宏大度的爱，绝对尊重你的自由。这就意味着我决不责问你一句。你可以跟别的女人睡觉，可以不告诉我，也用不着对

我产生什么负罪感。对于你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平凡琐事，我已经越来越不在乎了。”

“可是我没有对你隐瞒过什么。”他尴尬地说。

“我想对你说的，”她严肃地说道，“是你用不着顾忌什么，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回这儿来睡觉，用不着考虑自己是否有愧于我们俩。我今天夜里等着你。”

“活该！”亨利思忖，“是她自己愿意这么做的！”他高声说道：“听着，波尔，我现在就开诚布公地跟你讲：我认为我们从此不应该再一起过夜了。你对我们的过去是那么眷恋，你完全知道我们过去曾共同度过多么美好的夜晚，不要糟蹋了过去的记忆。现在，我们相互之间再也没有多少欲望了。”

“你对我已经再也没有欲望了？”波尔不信地问道。

“没有多少了。”他说。“你恐怕也是如此。”他又说了一句，“别跟我说不是，我也有记忆力。”

“但是你错了！”波尔说，“你错得太严重了！这是个可怕的误会！我没有变！”

他知道她在撒谎，但是这不仅仅是对他，肯定也是对她自己。

“不管怎样，我变了。”他平心静气地说，“一个女人，也许不同，可是一个男人，不可能对同一个躯体有无限的欲望。你和过去一样漂亮，可你对我来说已经太习以为常了。”

他焦虑不安地打量着波尔的面部，想尽量对她笑一笑。她没有哭泣：像是被惊瘫了。她费力地啜嚅道：

“你再也不到这儿睡觉了？你现在跟我说的确实是这话吗？”

“对。可这不会产生多少差别……”

她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她唯独接受自己对自己编造的谎言。无论是和风细雨，还是采取强制手段，要她正视事实确难做到。

“走吧，”她并不生气地说。“走吧。”她重复道，“我需要一个人呆着。”

“让我给你解释清楚……”

“求求你！”她说，“走吧。”

他站起身：“随你吧。我明天再回来，我们一起谈谈。”他说。

她没有答腔。他关上门，在楼台上呆了一刻，听听有否哭泣、跌落或动手的声响，但是一片寂静。亨利下楼时，想到了被送去进行活体解剖前被割断声带的狗：它们的痛苦在世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总要比听着它们狂吠好受一些。

第二天和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一直没有交谈：波尔假装忘了他俩的那场谈话，亨利也不愿旧事重提。“我无论如何要把若赛特的事跟她谈谈，但用不着马上讲。”他思量着。他每天都在那间淡绿色的房间过夜。这是一个个十分醉人的夜晚，但是他每天起床时，若赛特从不试图挽留他。签约的这一天，他俩原来说定要一起呆到下午晚些时候，没料到她两点钟就离开他，去了美发厅。是慎重？还是淡漠？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赋予，只慷慨奉献自己躯体的女人，要衡量其真情实感谈何容易。“我呢？我是否已经开始迷恋上她了？”他自问道，一边茫然地看着圣奥诺雷区的玻璃橱窗。他感到有些心慌意乱。去报社还太早。他拿定主意，先去红酒吧坐坐。过去，每当他要打发时间，总是去那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踏进那家酒吧的门了，但里面毫无变化。樊尚、拉舒姆、塞泽纳克都坐在他们平常坐的那张桌子边。塞泽纳克也仍旧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见到你真高兴！”拉舒姆咧嘴一笑，说道，“你是开小差儿了吧？”

“多少有点儿。”亨利落了座，要了一杯咖啡，“我也想见到你，可不仅仅是为了高兴。”他似笑非笑地说，“倒是想跟你谈谈我的想法：上个月发的那篇有关迪布勒伊的文章，真卑鄙。”

拉舒姆面孔一沉：“对，樊尚跟我说过你反对。可反对什么？费科说的许多事情是真的吧，不是吗？”

“不对！那幅画像的总体错到那个程度，以致没有一个细节是真实的。迪布勒伊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哎哟，算了吧！你不记得了？一年前，也在这同一张桌子上，你给我解释你、你的伙伴、迪布勒伊和我应该携手合作。可你发表那种卑鄙玩意儿！”

拉舒姆以责备的神态看着他：“《铁钻》可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对你的文章。”

“快了！”亨利说。

“你明明知道不会的。”

“为什么在那个时刻，以那种方式攻击迪布勒伊？”亨利问道，“你们的其他一些报纸对他还是比较有礼貌的。可突然，你们无缘无故针对一篇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文章，开始对他进行粗鲁的侮辱！”

拉舒姆犹豫了一下：“对。”他说，“时机选得不对，我也承认费科太过火了些。可是应该理解！那个老家伙，处处抬出他那毫无价值的人道主义，让我们厌恶透了。在政治方面，革命解放联合会并不怎么碍事；可作为理论家，迪布勒伊能说会道，有可能影响年轻人，他给他们出些什么主意？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古老道德标准

融成一体！得承认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这种东西！资产阶级道德标准必须彻底清除。”

“迪布勒伊所捍卫的东西有别于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亨利说。

“他口头上是这么宣称，可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蛊惑力。”

亨利耸耸肩：“我不同意。可不管怎样，为什么不谈你方才对我说的这些话，而非要把迪布勒伊当作资产阶级的走狗呢？”

“如果想让人们明白，就不得不说得简单一点。”拉舒姆说。

“算了吧！《铁钻》面向知识分子，他们完全可以明白。”亨利不快地说。

“啊！那文章又不是我写的。”拉舒姆说。

“可你接受了。”

拉舒姆声音骤变：

“你以为我干的全是我乐意干的事情？我刚刚跟你说过时机选择不合适，依我看，费科也太过火了。我认为跟迪布勒伊这样的人应该论战，而不该侮辱。如果报纸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我的伙伴肯定会这样做的……”

“那再也不是一份你能畅所欲言的报纸了？”亨利微微一笑，问道。

“谈不上了。”

出现了片刻沉默。亨利打量着拉舒姆：

“我知道什么叫纪律。但是，既然你不同意，却还留在《铁钻》，你不感到痛苦？”

“我想我留在那儿比别人在那里还是要强一些。”拉舒姆说，“他们让我留多久，我就呆多久。”

“你认为他们不会让你呆下去吗？”

“你知道，共产党不是革命解放联合会。”拉舒姆说，“如果两股力量对峙，失势的一方很容易受到怀疑。”

他的话中多少隐含着苦涩。亨利不禁问道：“告诉我，你那么怂恿我加入共产党，看来你也许就要退党了。”

“我知道有些人正等着我这样做！那帮知识分子，是一大篓螃蟹，互相乱咬。”拉舒姆摇摇头，“尽管如此，我决不退党。有时我真恨不得一走了之。”他补充道，“谁都不是圣人。可是得学会忍耐。”

“我感到永远都学不会。”亨利说。

“你说这话。”拉舒姆说，“但是倘若你坚信党在总体上做的是对的话，那么你就会认为与那些有关的事情相比，你个人的琐事实实在无足轻重。你理解，”他激动说，“有一件事情我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唯有共产党人做的是有益的工作。如果你愿意，就蔑视我吧。我什么都可以忍耐，就不愿意一走了之。”

“噢！我理解你！”亨利说。他心里想：“真正正直的到底是谁？我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是因为我赞同它的路线，但是我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行动很可能流于失败。拉舒姆以实际效果为目的，接受他不能苟同的方式方法。任何人都不能百分之百地左右他自己的任何行为，这是行动本身所决定的。”

他站起身：“我上报社去了。”

“我也去。”樊尚说。

塞泽纳克从座椅上站了起来：“我陪你们一块儿走。”

“不用，我有事要和佩隆谈。”樊尚毫不客气地说。

当他俩推开酒吧的门时，亨利问道：“塞泽纳克的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他说在搞翻译，可谁也不知道翻译些什么。他吃住都在朋友家，眼下，他正睡在我家。”

“当心点儿。”亨利说。

“当心什么？”

“吸毒的家伙危险。”亨利说，“他们会六亲不认。”

“我又不疯。”樊尚说，“他什么底细都不了解。他挺惹我喜欢。”他又补充了一句，“跟他，没有什么好谈的。他让人绝望透了。”

他们默默无语地往街道下方走去。亨利问道：

“你真有事要跟我说吗？”

“对。”樊尚搜索着亨利的目光，“听说你的那个剧本十月份要在第四十六演出厅演出，小贝洛姆要一举成为明星，确有其事？”

“我今晚就跟维尔依签约。你问这事干什么？”

“你肯定不知道贝洛姆母亲被剃过一次光头，那是她罪有应得。她在诺曼底有个城堡，在那里接待过许多德国军官，跟他们睡觉，那个小的十有八九也睡过。”

“你为什么来跟我谈这些闲话？”亨利问道，“你打从什么时候起当起警察来了？你以为我爱她母女俩吗？”

“不是什么闲话。有确凿的材料，是我的几个伙伴亲眼所见：有信，有照片，一个小伙子闹着玩，全都收了起来，心想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用场。”

“你也看到了？”

“没有。”

“肯定的。不管怎样，我不在乎。”亨利气愤地说，“这跟我无关。”

“要阻止混账们重新掌握国家大权，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这跟咱们人人有关。”

“到别的地方教训人去吧。”

“听着，你别生气。”樊尚说，“我只想先通知你一声，贝洛姆母亲已经是个目标，大家都在监视着她，要是你为了她那种贱货惹一身骚，那就太愚蠢了。”

“别为我担忧。”亨利说。

“得了。”樊尚说，“我是想让你心中有数，没有别的意思。”

他们默默地走完了余下的路程。但是亨利的胸口总是堵着那个声音，它在不停地回响：“那个小的也睡过。”整整一个下午，这声音强烈地反复回荡。若赛特几乎招认过她母亲曾不止一次出卖了她，再说，亨利期待从她那儿得到的，只是再共度几个夜晚，也许仅仅几夜而已。然而，在那永无休止的晚宴上，见她一副娇滴滴的讨好劲头，对维尔依频频微笑，亨利简直坐立不安，真恨不得单独对她好好审问一番。

“这下您高兴了吧？已经签约了！”吕茜说。

那衣裙和首饰就像头发似的，对她是那样贴身，仿佛她生来就穿着这种印有阿玛丽莉字样的裙服，穿着它睡觉，也将穿着它了却一生。一绺金发像波浪似的夹在她那乌黑的云发间，亨利着迷地凝望着她：要是她顶个光头，该会是怎么一个丑模样！

“我很高兴。”

“杜杜尔会告诉您的，一旦我操办一件事，别人尽可放心。”

“噢！这是位非凡的女子。”杜杜尔静静地说。

克洛蒂向亨利保证，杜杜尔这个正式情夫为人极为正直。果然，此人一头银发，五官端正，表情平静，此副尊容只有在非同一般的无赖当中方可见到。这类家伙相当富有，可以赎买自己的良心，也许他的正直是按自己的标准定的。

“您转告波尔，她没有来，太不应该了！”吕茜说。

“她真的太疲乏了。”亨利说。

他对若赛特欠了欠身子，告辞要走。所有的女人都身着黑色服装，首饰熠熠发亮。若赛特也一身黑色，整个身子仿佛被偌大的一团头发压塌了似的。她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向他伸过手来。整个晚上，她一举眉，一眨眼，无不表明她表面的那股漠然神情纯粹是虚假的。虚伪对她来说就那么轻而易举？夜里，当她赤裸着躯体，她是多么纯朴，多么直爽，多么诚实。亨利心中交织着温情、怜悯和厌恶的复杂情感，思忖着那些材料里是否也有她的照片。

近几天来，出租汽车又可以自由行驶了，哑女广场就停了三辆，亨利租了一辆前去蒙马特尔。他刚要了一杯威士忌，若赛特便一屁股坐到了他身边一把座位很深的扶手椅里：“维尔侬真热心。”她说，“他还是个同性恋。我真有运气，这样他就不会缠着我了。”

“别人缠着你的时候你怎么办？”

“看情况，有时就难办了。”

“大战期间，德国人没有过分缠你吗？”亨利尽量保持自然的口气问道。

“德国人？”就如他已经见过的那次一样，她脸色霍地发红，从胸口一直红到头发根，“你问我这些干什么？别人跟你乱扯了些什么？”

“说你母亲在她诺曼底的城堡里接待过德国人。”

“城堡被强占了，可那又不是我们的过错。我知道村里的一些流言蜚语，因为他们恨妈妈；她也是活该，她对人不客气。但是，她没有干过任何肮脏的事情，跟德国人一直保持距离。”

亨利微微一笑：“即使情况不是这样，你也不会对我直说的。”

“噢！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她说。她神情悲切地看着他，双眼蒙上了一层泪水。他颇为震惊，想不到自己对这张美丽的脸庞竟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你母亲要经营她的时装店，再说她又无所顾忌，她也许会想办法利用你吧。”

“你到底想到哪里去了？”她神色惊恐地问道。

“我猜想你处事不慎，比如跟军官们出过门。”

“我待人以礼，仅此而已。我常跟他们讲话，时不时他们用车从村庄把我送回家。”若赛特耸耸肩膀，“我对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你知道，他们很正派。我当时年纪小，对那场战争一点儿也不明白，一心希望早日结束，就这些。”她赶忙又补充道：“现在，我才知道他们和那些集中营是多么可怖，还有种种……”

“你知之不多，但这没关系。”亨利深情地说。在一九四三年，她年纪并不算太小，纳迪娜当时才十七岁呢。但是，她们俩无法相比。若赛特从小没有好的教养，得不到慈爱，谁也没有对她晓之以理。当她在村镇的小街上与德国军官相遇时，对他们过分亲热地报以微笑，然后又登上他们的汽车。事后，这足以引起村民们的愤慨。还发生过更严重的事情吗？她是否撒谎？她那么直爽，又那么虚伪：如何了解清楚？又有什么权利去了解？亨利突然反感地想。他为自己扮演警察的角色感到耻辱。

“你相信我吗？”她羞怯地问。

“我相信你。”他把她拉到自己身上。“再也别谈这事了。”他说，“永远也不谈了。我们回你那儿去。快回去。”

五月底，朗贝尔先生一案在里尔开庭审理。他儿子的出面无疑帮了他的大忙，此外，他可能也让人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他被宣布无罪。“对朗贝尔来说真太好了。”亨利得知判决后，心里想。四天后，朗贝尔正在报社忙着，有人从里尔给他打来电话：他父亲本该乘晚间的快车抵达巴黎，但他从车门口摔倒下来，伤势极为严重。事实上，一个多小时后，众人得知他当场摔死了。朗贝尔几乎没吭一声，跨上摩托车走了。等他埋葬了父亲回到巴黎，便闭门不出，没有一点音讯。

“我得去看看他，下午就去。”憋了几天之后，亨利思量着。他曾试着给朗贝尔打电话，但白费气力，电话给朗贝尔切断了。“一种卑鄙的行径。”亨利反复思忖，一边并不信服地看着摊在桌上的材料。那人年纪已大，并不十分惹人喜欢，朗贝尔对他的怜悯也远多于爱。然而，亨利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此事不闻不问。那一判决，还有这次事故，真是命运多舛。他尽量集中注意力，去读那些打成铅字的材料。

“中午了，若赛特就要来，这材料看来读不完了。”他在心底责备自己。卡拉干达、查兹库伊、乌兹别克，这些野蛮的地名，还有那些数字，无论如何也激不起他的兴趣。然而，他倒希望在下午会议之前掌握这些材料。实际上，他之所以对这些材料不感兴趣，是因为他对它们不甚相信。对斯克利亚西纳转交的材料应该相信几分呢？那个神秘的苏联官员确有其人吗？他真的专门逃出那座特大的红色监狱，以到处传播这些情况吗？萨玛泽尔肯定了这些材料，甚至声称已经查证过，但是亨利仍然表示怀疑。他翻了一页。



“咚咚。”

是若赛特来了，她身着一件白色的大衣，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肩头，还等她关上门，亨利便站了起来，把她搂到怀里。一般情况下，几个热吻之后，他旋即会沉浸在一个大大缩小的世界之中，周围一切全成了娇小的玩具，变得无足轻重；然而今天，这种变化比往常困难了一些，内心的忧虑感紧紧地缠绕着他。

“你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她快活地问，“你从来没有邀请我来，这下明白了，这里太不像样了！你的书放在哪里？”

“我没有书。我读完一部书，便借给朋友们，他们也不还给我。”

“我以为一个作家总是生活在摆满书本的四壁之中。”她以怀疑的神色打量着他，“你肯定自己是个真正的作家？”

他哈哈大笑起来：“反正我在写。”

“你刚才在工作？我来得太早了吧？”她一边坐下，一边问道。

“给我五分钟，然后就属于你了。”他说，“你想看看报纸吗？”

她扮了一个小小的鬼脸：“有社会新闻吗？”

“我以为你已经开始爱读政治性文章了呢。”他责怪地说，“没有？兴头已经过了？”

“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试着读过。”若赛特说，“可是那些句子在我眼底飞似的溜过去。我感到那玩意儿与我毫不相干。”她满脸委屈地补充道。

“那就好好读一读蓬图瓦兹那个被活活吊死的人的故事吧。”他说。

诺里尔斯克、伊加尔卡、阿布萨卡契夫。这些地名还有那些数字毫无生气。他也一样，句子在他眼底飞似的溜过，他感到这一切与他

毫不相干。这一切发生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那个世界是多么不同、多么难以评价。

“你有香烟吗？”若赛特低声问。

“有。”

“火柴呢？”

“这儿。你说话声音为什么这么低？”

“以免打扰你。”

他笑着站了起来：“我干完了。我带你上哪儿吃午饭呢？”

“去‘博罗梅安群岛’。”她果断地说。

“就是前天开张的那个极时髦的馆子？不，对不起，找个别的地方。”

“可是……我已经给我们预订了桌子。”她说。

“退掉很容易。”他把手伸向电话，她挡住了他：

“有人等着我们。”

“什么人？”

她垂下脑袋，他追问道：“谁等着我们？”

“这是我妈的主意，我得马上开始为自己做广告。有人提到了那家餐馆。她请了一些记者，给我搞一次小小的摄影采访，类似于‘作者正在与其表演者交谈……’”

“不，亲爱的。”亨利说，“你愿意让人拍多少照片都可以，可是不要带上我。”

“亨利！”若赛特两眼泪水汪汪，像个孩子似的想哭就哭了起来。亨利一时不知所措。“我专门让人做了这件裙子，我原来是那么高兴……”

“既可以好好玩，又可以安安静静在里面呆着的餐馆多着哩。”

“可是那儿有人等着我！”她绝望地说。她两只泪涟涟的大眼睛直盯着亨利。“哎，你真愿意为我做点事情吗？”

“可是，我亲爱的，你为我做点什么呢？”

“我？可是我……”

“对，你……”他乐呵呵地说，“可是我，我也……”

她没有笑。“这不一样。”她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个女的。”

他还是笑呵呵的，心里想：“她言之有理，她总是有理：这不一样。”

“你对那顿午饭看得就那么重？”他问。

“你不明白！这对我的事业是必不可少的。要想成功，必须抛头露面，让人议论自己。”

“首先必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好好演，别人自然会称赞你的。”

“我想为自己赢得一切机会。”若赛特说。她脸色突然阴沉起来，“你以为要向我妈妈请求施舍是件有趣的事情？当我走进她的沙龙，她当着众人的面责问我‘你为什么穿木鞋’时，你以为我快活吗？”

“木鞋子又怎么了？很漂亮嘛。”

“在乡村穿着吃午宴很好，可在城市就太随便了。”

“我总觉得你是那么优雅……”

“因为你对此一无所知，我亲爱的。”她悲切地说。她耸耸肩膀，“一个没有成功的女人的生活，你不了解是怎么回事。”

他把手放在她那柔嫩的手上：“你一定会成功的。”他说，“走，去博罗梅安群岛餐厅，让他们给我们拍照吧。”他俩走下楼梯。她问道：

“你有车吗？”

“没有。我们要辆出租车。”

“你为什么没有自己的车？”

“你还没有发现我没有钱？你以为你拥有的鞋子还不是巴黎城最漂亮的吗？”

“可你为什么没有钱呢？”当他俩坐进出租车时，她问道，“你可要比妈妈和杜杜尔聪明。你是不爱钱吧？”

“谁都爱钱，可要真的弄到钱，那就非得爱钱胜于一切。”

若赛特思虑了片刻：“并不是我爱钱胜于一切，但我喜欢用钱买的东西。”

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也许我的剧本会让我们发大财，到时我们给你买你喜欢的东西。”

“你还带我上漂亮的餐馆？”

“偶尔。”他快活地说。

花园里鲜花盛开，女人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男人们则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当他在这些男男女女的目光打量下向前迈步时，心里感到很不自在。玫瑰花丛，古老的椴树，阳光照耀的欢乐的水面，这美丽的景色令人心醉，然而他却仍然无动于衷，自问道：“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美吧，对吗？”若赛特兴意盎然地说，“我爱乡村。”她又补充了一句。她开口大笑，顺从的面容顿时变了模样。亨利也微微一笑：“很美。你想吃点儿什么？”

“我想只能要个柚汁，再要份烧肉。”她遗憾地说，“因为要保持身段。”

她身着一一条绿色的布裙，裸露出嫩而健美的双臂，显得十分年轻。她虽然一身时髦女郎的装束打扮，但实际上是多么自然！她渴望成功，渴望出人头地，一心想要穿好、玩好，这是很自然的。她有着巨大的优点，那就是直率地袒露她的渴求，而并不想弄清这种种欲望是高雅还是肮脏。即使有时撒谎，她也比从不说假话的波尔更加真实。波尔为自己编制的那份高尚的密码中有着许多虚伪的成分。亨利想象着波尔对他这般轻浮、奢侈表示抵触时的傲慢面孔，想象着迪布勒伊诧异的微笑和安娜惊骇的目光。当这场答记者问和这些照片见报时，他们一个个准会神色惊恐地直摇头。

“确实，我们大家都有点儿像苦行僧。”他心里想，“我自己也包括在内。这是因为我们讨厌别人公开显示我们的特权。”他本想躲避这次午宴，以免承认自己有能力享受。“然而在红酒吧，跟朋友们在一起时，晚上挥霍多少钱，我都从不计算。”

他朝若赛特俯过身子：“你高兴吗？”

“噢！你真好！”她说，“只有你。”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对这类幼稚而不该提起的话题报以如此微笑。可怜的若赛特！她笑的机会并不很多。“女人总是不快活。”他望着她，心里想。他与波尔的历史正接近可怜的尾声，至于纳迪娜，他一直不知该给她些什么。若赛特呢……也许这不一样。她希望成功，他也许能助她成功。她向正朝前走来的两位记者和蔼地一笑。

两个小时后，当出租汽车把他送到朗贝尔的大楼前时，纳迪娜正从大门往外走。她朝他亲热地笑了笑，她一直认为自己在两人的艳史中掌握着主动权，所以对他始终十分友好。

“嗨！你也来了！可爱的孤儿，关心他的人多了！”

亨利带着几分愤懑瞪了她一眼：“这事没什么特别好笑的。”

“那个老混蛋死了，跟他有什么关系？”纳迪娜说。她耸耸肩膀，“我完全知道我的角色应该是扮演慈悲的嬷嬷，给人安慰，可是我不会。今天我打定了从善的主意，可伏朗热又来了。我便走了。”

“伏朗热在上面？”

“对。朗贝尔常见他。”她回答道，那漫不经心的口吻，亨利简直无法辨别其中是否隐藏着险恶用心。

“我还是上去。”亨利说。

“我祝你愉快。”

他慢慢地登上楼梯。朗贝尔常与伏朗热见面：他为什么没有对他讲呢？“他害怕我对此事生气。”他思忖，事实确实如此，他对此极为气恼。他揪了门铃。朗贝尔朝他淡然一笑，不见一丝欢乐劲儿。

“啊！是你？真客气……”

“多么愉快的巧合。”路易说，“已经几个月没见面了！”

“几个月了！”亨利朝朗贝尔转过身子。朗贝尔身着法兰绒套装，翻领上缀着一道黑纱，一副失去父亲的孤儿模样。这套衣服，朗贝尔先生欣赏的也许是古典美。“这些天，你也许没有多大心思出去走动走动。”他说，“但是，今天下午在迪布勒伊家有个重要会议。《希望报》要做出有关决定，我很希望你同我前往。”

实际上，他根本用不着朗贝尔，可是他希望能让他从痛苦的冥想中摆脱出来。

“我的心思在别的地方。”朗贝尔说。他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声音阴郁地说：“伏朗热肯定我父亲不是死于事故。他是被推下去的。”

亨利一惊：“推下去的？”

“车门不会自己打开。”朗贝尔说，“他刚刚被宣布无罪，也不会自杀的。”

“你不记得发生在里昂和瓦朗斯之间的莫利纳里事件？”路易问道，“还有佩拉尔事件？他们都是刚刚被宣布无罪不久，从火车上掉下去摔死的。”

“你父亲年迈体弱，”亨利说，“审判时又激动，也许伤了脑子。”

朗贝尔摇摇头：“我一定要弄清是谁下的手！”他说，“我会弄清的。”

亨利的双手在抽搐，八天来一直缠绕着他的，正是这份怀疑。“不！”他暗自在心中祈求，“不是樊尚干的！不是他，也不是别人！”莫利纳里、佩拉尔，他根本无所谓。也许朗贝尔老先生跟他们一样混账。但是，铁路道砟上那张鲜血淋漓的脸，那张闪烁着两只惊人的蓝眼睛的蜡黄的脸，异常清晰地显现在他的眼前。无论如何应该是场事故。

“法国有不少杀人团伙，这是事实。”路易说，接着站起身子，“这不愿平息的仇恨是多么可怖！”出现了一阵沉默，他以令人心动的声音说道：“最近哪个晚上，到我家来吃顿饭。我们相互间从不照面，这太愚蠢了。我有一大堆事情要跟你谈。”

“我一有空暇就去。”亨利搪塞道。

当路易关门离去后，亨利问道：“里尔那些日子很难熬吧？”

朗贝尔耸耸肩：“人家杀了你的父亲，要是你心绪不宁，便说你没有男子汉气概！”他声音中充满积恨，“管它呢！我承认这给了我极大的打击！”

“我理解，”亨利说，继而微微一笑，“那些男子汉气概的说法，全是女人家的念头。”

朗贝尔对他父亲抱以何种感情？他只承认怜悯之情，也流露出忌恨，但其中无疑也交织着崇敬、厌恶、尊重和失望的爱。不管怎么说，那人对朗贝尔来说曾经是举足轻重的。亨利以最亲切的声音说道：

“别老是这样闷着自我折磨。打起精神来，跟我走，那会引起你的兴趣，对你有所帮助的。”

“噢！不管怎样你都有我一票。”朗贝尔说。

“我喜欢的是你的看法。”亨利说，“斯克利亚西纳声称一个从苏联来的高级官员给他带来了耸人听闻的情报，当然对苏联制度是很不利的。他向萨玛泽尔建议，请《希望报》、《警觉》和革命解放联合会宣传这些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到底有何价值？我手头倒有几份零碎材料，但没有办法做出评价。”

朗贝尔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啊！这，我感兴趣！”他说，他猛地站了起来，“我对此很感兴趣！”

当他俩跨进迪布勒伊的书房时，他正单独与萨玛泽尔谈话。

“您要知道，抢在别人之前发表这些材料，这可会引起轰动！”萨玛泽尔说，“最近一个五年计划产生于三月份，大家对此几乎还一无所知。特别是劳改集中营的问题，定将引起舆论哗然。要知道这个问题早在大战前就有人提出过，我本人所属的那一派对此尤为关注。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未能引起多少反响。如今，任何人都不得不对苏联问题表明态度，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重新澄清这一问题。”



与此粗壮、低沉的声音相比，迪布勒伊显得细声细气：“凭经验而论，这类材料双倍地可疑。首先因为控诉者在他所谴责的制度下苟活的时日甚久，其次因为一旦他摆脱了这个制度，就无法指望他对自己的攻击掌握分寸。”

“对此人到底了解多少情况？”亨利问。

“他名叫乔治·佩尔托夫，原是塔布里乌卡农业学院院长……”萨玛泽尔说，“一个月前，他从德国的苏联管辖区逃到西方控制区。他的身份已经完全查清。”

“可他的秉性没有查清。”迪布勒伊说。

萨玛泽尔不耐烦地一摆手：“不管怎样，您已经研究了斯克利亚西纳交给我们的材料。俄国人自己也承认确实存在劳改集中营和行政拘禁所。”

“这不错。”迪布勒伊说，“可是这些集中营里有多少人？这是问题所在。”

“我去年在德国时，”朗贝尔说，“有人传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关的人绝没有苏联解放以后那么多。”

“在我看来，一千五百万是个十分保守的推测数字。”萨玛泽尔说。

“一千五百万！”朗贝尔重复了一遍。

亨利感到一阵恐慌升腾而起，涌上喉间。他已经听人说过这些集中营，但没有放在心上，传说的东西多着哩！至于这份材料，他浏览了一番，心里并不信服。他怀疑斯克利亚西纳。纸头上，那些数目似乎跟那些听起来怪里怪气的名字一样，纯属虚构。但是，这位俄国官员确实存在，迪布勒伊严肃对待此事。不闻不问，这样做确实简单，

但这无助于对现实做出判断。他刚才跟若赛特在博罗梅安群岛餐厅时，天青日晏，他曾感到过几分内疚，但轻而易举便化为乌有。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遭受压迫、饥饿和残害。

斯克利亚西纳快步走入房间，大家的目光刷地全都投向跟在他身后的那位陌生人。此人银灰色的头发，双目炯炯有神，宛若两个乌黑闪亮的煤球，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俨然一个先天的瞎子，两道炭画似的浓眉拧在一起，正下方是一只尖尖的鼻子，他身材高大，穿着无可挑剔。

“我的朋友乔治。”斯克利亚西纳说，“我们暂时就叫他这个名字。”他向四周扫了一眼，“这地方绝对安全？我们的谈话没有被偷听的可能吧？谁住在楼上？”

“一个十分善良的钢琴教授。”迪布勒伊说，“楼下的人度假去了。”

对斯克利亚西纳这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亨利第一次没有心思去笑。他身边这个高大阴沉的身影给整个场面陡添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庄严气氛。大家全坐了下来。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乔治可以讲俄语或德语。他身上带着一些材料，马上给诸位做一个扼要的介绍和说明。在他所揭露的令人惊悸的问题中，劳改集中营问题具有最为直接的现实意义。他先谈这个问题。”

“让他用德语讲，我来翻译。”朗贝尔连忙说。

“随你们。”斯克利亚西纳用俄语讲了几个词，乔治点点头，但那副面容没有任何变化，他仿佛被一股痛苦而难以磨灭的积恨推入了麻木的境地。突然，他开口讲了起来，目光仍然直勾勾地射向出现在他心底的那些在世间并不真正存在的幻影。然而，在他那死一般的嘴中

却传出了富有色彩和激情的声音，显得冷漠而又悲怆。朗贝尔两眼直盯他的双唇，仿佛在解读聋哑人的语言。

“他说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劳改集中营的存在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因此不要幻想哪一天能彻底清除。”朗贝尔翻译道，“苏联的国家投资规划要求物资有盈余，这只能由超量的劳动来提供。如果自由工人的消费低于一定水平，生产力就可能相应地降低。因此，便有组织地着手创建一个次无产阶级阶层，付出最大限度的劳动，获取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一种调节措施只能在集中营中付诸实施。”

一阵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在书房里，谁也没有动弹一下。乔治继续往下说，朗贝尔又将那悲怆的声音转化成话语：“惩罚性劳动早在制度建立之初就已存在，但直到一九三四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才被赋予了权力，可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决定为时不超过五年的劳改监禁；若超过这一年限，就有必要先进行审判。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劳改集中营有一部分全走空了，许多囚犯被编入军队，其他一些人活活饿死了。但近一年来，劳改集中营重又人满为患。”

此时，乔治在摊在面前的纸上指着一些地名和数字，朗贝尔逐一翻译。卡拉干达、查兹库伊、乌兹别克。这不是一些词，而是一块块冰天雪地的草原、沼泽，一处处破烂不堪的木棚。在这里，男男女女每日劳动长达十四个小时，换取六百克的面包。他们有的冻死，有的累死，还有的身染坏血病、痢疾而丧命。一旦谁过分虚弱而无法干活，便被关进一些医院，有组织地让他们在那儿活活地饿死。“可这是真的吗？”亨利反感地在思量。乔治很可疑，苏联那么遥远，传说的东西何其多！他看了看迪布勒伊，只见他铁板似的面孔没有任何表情。迪布勒伊选择了怀疑这一招。怀疑，这是本能的防御，但对此也不应

该过分信赖。传说的所有事件中，总有一些是真实的。在一九三八年，亨利曾怀疑大战迫在眉睫；在一九四〇年，他又怀疑瓦斯房的存在。乔治肯定夸大事实，但是也可以肯定他所说的并非全是他凭空捏造。亨利打开厚厚的材料，放在膝上。几个小时前他漫不经心浏览的一切突然间产生了可怕的意义。里面有译成英文的官方文件，这些文件承认了劳改集中营的存在。若不是出于恶意，谁也不可能全盘否认或来自美国观察家，或源自落入纳粹分子魔爪、后又身陷苦役犯监狱的流亡者的证词。确实无法矢口否认：在苏联，也有人在极度地压迫另一些人！

当乔治说完话，出现了一阵久久的沉寂。

“您心甘情愿、自然而然地从知识分子那儿接受了精神专政的思想，”斯克利亚西纳说，“但是，有组织地对人、对所有人犯下的种种罪行，您能容忍吗？”

“依我之见，答案是不容置疑的。”萨玛泽尔说。

“我请您原谅，对我来说还存在着疑问。”迪布勒伊冷冷地说，“我既不明白您的朋友为什么要逃到国外，也不明白他又为什么与他在我们面前大加谴责的那个制度合作了那么长时间。我猜想他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但是我不愿冒险去支持一次反苏阴谋。再说，我们也没有权力以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名义对您做出回答：领导委员会只出席了一半。”

“如果我们同意，一定能在领导委员会通过。”萨玛泽尔说。

“您怎么还能犹豫！”朗贝尔气得满脸透亮，“哪怕他说的只有四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也应该动用一千只高音喇叭立即呐喊。您不知道什

么叫集中营！不管是俄国的，还是纳粹的，完全是一回事儿。我们与一些人斗争并不是为了怂恿另一些人……”

迪布勒伊耸耸肩：“不管怎样，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苏联的制度，而仅仅要在今日之法国影响人们对苏联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与我们有着直接的关系。”朗贝尔说。

“不错，但是若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就贸然卷入，我们会铸成大错的。”迪布勒伊说。

“换句话说，您怀疑乔治的话？”斯克利亚西纳问。

“我并不把它当作《福音书》而确信无疑。”

斯克利亚西纳拍了拍桌上的材料：“所有这一切，您怎样处理？”

迪布勒伊摇摇头：“我认为任何事实都没有得到认真查证。”

斯克利亚西纳连珠炮似的讲了一通俄语，乔治不动声色地对他做了回答。

“乔治说由他负责给你们提供确凿的证据。请派一个人去西德，那儿有些朋友可给你们提供有关苏联管辖区内集中营的确切情况。此外，在德意志帝国档案中找到了德苏条约签订后由苏联提供的某些文件，这些文件列举出了一些数字，你们可以设法一阅。”

“我去德国。”朗贝尔说，“立即动身。”

斯克利亚西纳以赞许的目光看了看他。

“行前先来见我一次。”他说，“这是一项微妙的使命，必须认真准备。”斯克利亚西纳朝迪布勒伊转过身子：“如果我们给您送上您所要求得到的证据，您能下决心揭露吗？”

“把你们的证据送来，委员会当会做出决定。”迪布勒伊不耐烦地说，“眼下，这一切纯属闲谈。”

斯克利亚西纳站了起来，乔治也跟着起身。“我请诸位对我们刚才的谈话绝对保密。乔治一直要求跟你们见见面。但是，你们想象得出巴黎这样一座城市威胁着他的是何种危险。”斯克利亚西纳说。

他们全都点头，那神态令人放心。乔治僵硬地弯了个腰，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跟着斯克利亚西纳走了。

“我对推迟表示遗憾。”萨玛泽尔说，“就问题的实质而言，无可置疑。我们可以立即摘录发表这一材料，这已足以造成舆论。”

“造成反对苏联的舆论！”迪布勒伊说，“我们现在特别应该避免的，正是这一点！”

“但是可以利用这一行动的不是右派，而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它十分需要！”萨玛泽尔说，“自大选以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还继续想持骑墙态度，革命解放联合会就要完蛋。”他激烈地补充道，“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使许多犹豫不决的人打定主意加入共产党。也有许多人将由于恐惧心理而投入反动派的怀抱。对于前者，我们无可奈何。可对于后者，如果我们公开攻击斯大林主义，答应重新组建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左派，我们就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滑稽的左派，在反共的纲领下搜罗反共分子！”迪布勒伊说。

“您是否知道将导致何种后果？”萨玛泽尔气恼地说，“倘若继续这样下去，两个月后，革命解放联合会就会成为一个受共产党人束缚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它将受到共产党人的蔑视和摆布。”

“谁也不能摆布我们！”迪布勒伊说。

亨利迷迷糊糊地听着这些激动的声音。对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眼下他不屑一顾。乔治所说的到底有几分实情，这才是问题之所在。除非他讲的全是谎话，不然，从今以后就难以像过去那样看待苏

联，一切就必须重新审视。迪布勒伊对什么也不愿重新审视，他陷入了怀疑主义。萨玛泽尔一心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巴不得吹响反共的号角。亨利绝对不想与共产党人决裂，但是他也不愿对自己撒谎。他站了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乔治说的是真是假。目前，全是空谈。”

“这正是我的意见。”迪布勒伊说。

朗贝尔和萨玛泽尔跟着亨利出了门。身后的门刚一关上，朗贝尔便发起牢骚：“迪布勒伊真的被收买了！他想封住这件事。可这一次，他没有这个权力。”

“可惜委员会对他唯命是从。”萨玛泽尔说，“实际上，革命解放联合会就是他。”

“但是《希望报》并非一定要服从革命解放联合会！”朗贝尔说。

萨玛泽尔淡然一笑：“啊！您提出的可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若有所思地又添了一句，“显然，如果我们决定立即透露真相，谁也挡不住我们！”

亨利惊诧地看了看他：“您考虑《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决裂吗？您到底怎么了？”

“根据目前情况的发展，两个月后革命解放联合会将不复存在。”萨玛泽尔说，“我希望《希望报》能存在下去！”

他直率地大笑着离去了，亨利凭倚着河畔的栏杆。

“我真闹不清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他说。

“如果他真希望《希望报》重新成为一份自由的报纸，那他是道理的！”朗贝尔说，“那边，他们恢复了农奴制；这里，他们又在杀人。可有人却想叫我们不吭声！”

亨利看了看朗贝尔：“在萨玛泽尔建议决裂的情况下，请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支持我。”

“好。”朗贝尔说，“只是我先对你说清楚：若迪布勒伊一意孤行，要封住此事，我便离开报社，收回我的股份。”

“听着，在事实没有查证之前，谁也不能做出任何决定。”亨利说。

“那由谁来决定事实是否得到了查证呢？”朗贝尔问。

“委员会。”

“那就是说迪布勒伊。若他抱有偏见，谁也别想说服他！”

“要是没有证据就让人说服，那也是抱有偏见！”亨利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说。

“别跟我说这一切全是乔治凭空捏造的！别说这些材料全都是假的！”朗贝尔气呼呼地说。他怀疑地打量了亨利一番，“你是否同意若是事实，就必须予以揭露？”

“对。”亨利回答道。

“那就行。我尽快出发去德国，我向你保证在那儿决不浪费时间。”他微微一笑，“我把你丢在哪儿？”

“不用了，谢谢，我走一走。”亨利说。

他要去波尔那儿吃晚饭，但并不急于与她相聚。他小步走去。要揭露事实真相。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引起多少严重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朗贝尔：这几乎是一种生理反射。但是，他实际上既不知道该信些什么，也不清楚该做些什么，他一概不知：脑子至今稀里糊涂，仿佛头上受到了狠狠的一击。显然，乔治并没有完全凭空捏造，也许确有其事。有不少集中营，一千五百万劳工在那儿被迫处于非人



的境地。但正是多亏了这些劳改集中营，纳粹主义才被战胜，一个伟大的国家才渐渐建立起来。它是中国和印度在饥饿中挣扎、过着非人生活的亿万人们的唯一希望，是被非人的境地所奴役的数百万工人的唯一希望，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我们的这一希望难道也将破灭？”他恐惧地自问。他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地对此提出过疑问。苏联的缺陷和弊端，他全都了解，尽管如此，一个公正与自由和谐共存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有一天要在苏联并通过苏联的努力取得胜利。倘若今晚他丧失了这一信念，那么整个前程就将陷入一片黑暗：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希望，哪怕是希望的幻影。“莫非我是因此而陷入怀疑？”他自问，“难道是出于怯懦，因为天底下再也没有一块可以对之抱有几信心的土地，因为空气再也不堪呼吸，我才拒绝承认明摆的事实？或相反，”他心里想，“也许是因为我热衷于接受经过我精心篡改的恐惧形象吧。若我归附共产主义不成，便坚决地反对它，倒是一种慰藉。要是能泾渭分明，不是完全赞成就是彻底反对，该多好！但是若要反对，就必须要有其他的希望，把它们献给人们。再也清楚不过的是，革命要么由苏联来进行，要么就没有革命可言。可是，倘若苏联仅仅是以一种压迫制度来取代另一种压迫制度，倘若它又恢复了农奴制，那怎能对它保持友谊？……也许罪恶到处存在。”亨利思忖。他回想起了在塞文山区那间高山小屋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曾幸福地沉浸在纯洁无瑕的莫大快慰之中。若罪恶到处存在，就不会有什么纯洁无瑕。不管他做什么，他必定都错：若传播篡改的事实，是错；若掩盖哪怕是篡改的事实，那也是错。他走下了陡峭的河岸。倘若罪恶处处都有，那无论对人类还是对他自己，都没有任何出路。难道最终不得不想到这一步？他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河水流淌。

---

[1] garrigue, 地中海地区毁林后的常绿矮灌木丛。

[2] Antonio Pisanello (1395—1455) , 意大利画家、奖牌雕刻家。

[3] Henri François-Xavier de Belsunce de Castelmoron (1670—1755) , 法国宗教人士, 曾任马赛主教。

[4] Melchior de Polignac (1661—1742) , 法国红衣主教、外交家。

[5]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 , 法国作家。

[6] 这是一种迷信的做法, 据说摸一下木头可以避邪。